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我是妓女吸毒者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调查附记

我们初次和克利斯蒂娜见面的时候是在柏林法庭上的一次审判会上。当时她只有十五岁，被法院传讯出庭作证。我们邀请她接受我们的采访，以便对德国的青年问题进行一系列的调查。谈话的时间预定为两个小时。可是后来，我们的采访却持续了两个月，而我们这两位调查者竟成了她入迷的听众。她的经历和口才的确令人感动不已！本书就是据克利斯蒂娜本人的谈话录音整理出来的。她的经历使我们了解到当前德国一大部分青年的精神状况。依我们看来，她的经历胜过一份内容十分充足的调查报告。克利斯蒂娜非常希望这本书能够出版问世，因为如同所有的吸毒者一样，她希望她的呐喊，能够打破当前对青少年吸毒问题所表现出的这种棘手的沉默。克利斯蒂娜原先所在的团伙里的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家长支持我们这个计划，并且同意我们公开发表他们的名字和照片，以突出本书文献的特点。但考虑到为了避免对她们的家庭产生某些不良的影响，我们在本书中只写他们的名字，而省略他们的姓氏。除了克利斯蒂娜本人的自述之外，我们还附上她的母亲及其他有关人士的谈话记录和文章，以便从另外的角度来补充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分析。

序言

本书给我们讲述了为我们的社会所竭力掩盖、抑制的某种苦恼。依我看来，书中所披露的内容远比一大堆由社会学家所作的分析，或由专家们所写的长篇理论更为重要。这份独一无二的资料终将会使广大的群众——至少这是我们所抱的希望——了解到：今天日益严重的青少年吸毒和酗酒问题，以及年轻人热衷秘密结伙的现象，全都不是什么“舶来品”，而是我们的社会本身所酿成的悲剧。这些到现在还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外来的疾病，竟然产生于我们的家庭、学校及唱片俱乐部里，而这些地方却正是任何人都可以接近的。年轻的克利斯蒂娜（在凯·赫尔曼和霍斯特·里克的帮助下）在她所提供的这份资料中还告诉了我们许多别的事情：在通往吸毒的道路上，并非仅仅拥挤着一班素有怪癖而完全超脱社会的青少年，而是和整个社会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合人情的住宅条件、远不充分的娱乐场所，父母之间关系的破裂。学生与学校和家庭格格不入以及普遍的孤独情绪等等都是促使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社会因素。当读者看完她的叙述而合上这本书的时候，一定会提出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纵然不幸的克利斯蒂娜是个吸毒者，是一名少年犯，但是，如果把她同她周围那些构成这个所谓“正常的”社会的人们相比，究竟谁是更富有“人性”。更为“体面”的人呢？

自从年轻人造反的风波日渐平息以来，我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就以为一切都已纳入正常轨道，可以高枕无忧了。他们认为，除了一小撮恐怖分子和他们的匹敌者之外，今天的青年人都已和整个社会融为一体而毫无冲突。产

生这种思想的根源是因为我们常常对某些社会现实加以掩盖和压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青年人对社会强烈不满的情绪以及他们那些几乎是天天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挑衅行为到了七十年代已经销声匿迹。因此，人们往往小看、甚至是忽视了这种抵制的新形式——因为这种形式不像往日那样大喊大叫，那样耸人耳目。须知当今年轻一代的相当大一部分人所采取的正是这种新的反抗形式。

诚然，当我们受到家庭里。中学里和大学里那种整体上的冲突业已平息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大街小巷已经从那些没完没了的游行示威中挣脱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当然也不愿意看到，就在这个升平世界的外表下面，在为数日益增长的年轻人身上，开始出现另一些令人担忧的征兆：一种奇怪的麻木不仁的状态，一种自我反省的倾向。大多数已经立足于社会的成年人都采取一种基本上是防守的，逆来顺受的态度：“搞你们的‘反文化’去吧，过你们的稀奇古怪的生活方式去吧，只要你们不干扰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就行了。可到头来你们终将明白，要想在我们这个有高度组织而且是无情的社会中生活下去，那你就不得不下山还俗，重新做个平民！”对青少年漠不关心，甚至对他们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我们可以用这两句话来形容他们的用意：“让我们安静！”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其实，这种见解只不过是成年人主观的愿望，也是一种盲目的愿望。因为事实上克丽斯蒂娜和其他千千万万的青少年都是由于感到失望而脱离了我们的世界，因为大人并不懂得给这些孩子们展现出一个人类大家庭的形象，本来这个大家庭也有他们的一份，而且他们也将乐意参加，并且会在这个大家庭得到理解，感到安全和温暖。克丽斯蒂娜和她那帮吸毒者，卖淫的伙伴一样，都有满腹苦衷的父母，他们的父母往往无意之中把自己的失望和孤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以及他们自身的痛苦和怨恨转嫁给他们的孩子。

往往正是像克丽斯蒂娜这样的孩子特别敏感，他们的感情十分脆弱，可同时却又充满着自尊。他们从父母一代的失败中得到教训，因而想逃避这个与他们格格不入的所谓“正常的”社会。看到这些脆弱的未成熟的孩子为了适应一个不现实的。但却能满足他们内心深处的欲望而结成团伙时，实在可悲之至。而他们的这些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克丽斯蒂娜究竟想从她的团伙中寻求些什么呢？无非是要求得到一点点真正的友爱和远离喧闹尘世的安宁。

她寻求自己能为他人所接受，以逃脱种种有形无形的压迫。“我不敢肯定，到底在那些不吸毒的青年人当中能否存在像我们团伙中的这种友谊？”对她来说，团伙还是一个逃学避难所。本来，从理论上讲，学校应该是他们所向往的地方，可她却用一种失望的口气讥讽学校：“什么叫‘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不就是首先教导人们懂得和别人一起生活。这才是这所讨厌的学校应该教我们的课题。应该教我们懂得彼此相互关心。而不应该让每个人说大话，总想出人头地，为了捞个好分数而整天挖空心思不择手段。”

也许有的读者为了自我宽慰而认为本书所披露的现象只不过与几个大城市有关而已，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社会边缘的视象罢了。对这种读者，我们可以直言相告：少年吸毒。少年酗酒，以及由此产生的副作用——少女卖淫和与吸毒直接相连的少年犯罪等早已成为一种遍地蔓延的疾病。可是，为什么人们对这些祸害没有足够的认识呢？克丽斯蒂娜的忏悔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解释：在那些了解内情的部门当中——其中有一部分是官方机构（诸如

警察局、社会保健机构、医疗所)——很少有人对这个问题刨根问底,拉起警报。这些总是悄悄地过去,仿佛其中存在着某种默契似的,不管什么部门,都只能按例行公事的老一套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总是满足于观察、登记,最多也只能是把他们关押起来了事。因此,对于这些失足青年的痛苦、绝望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人们都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而且竭力把吸毒这个问题说成只是走私。贩卖毒品者的罪行,因而所进行的斗争只不过是一种消毒的问题。有关部门如果能及时在政治上得到更多的支持,那么他们完全可以在治疗和预防方面做出更多的工作。可惜这种政治上的支持迄今仍然有虚无实。而政治行动本身也受到普遍主张克制的公众舆论的压力。这种倾向是由某些政治势力精心策划出来的,因为他们担心任何微小的形影都可能会给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带来损失,所以把一切都归咎于不适应的人或者是外国腐化者的失败。

这里不仅是一个改进有关吸毒者的信息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改变成年人对吸毒问题的态度: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勇气来正视这个不幸的社会问题,因为我们本身对此负有主要责任,无法开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吸毒问题只不过是反映我们这些成年人——我这里只当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无能的一种,明显的症状,说明我们没有办法去说服年轻人的一代相信这一点:在我们给他们所提供的这个社会里,他们完全有机会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寻找到真正人间的温暖。事实上许多青少年之所以投身到吸毒或秘密结社的行列,这完全不是他们生来一蹴而就的天性,而是那些做父母的拒绝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当然这并非是做父母者本来的心愿,而是不知不觉地在同别人相处中形成的足够的条件,导致他们只好走上歧途,另找出路。听听孩子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切身问题,几乎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而恰恰相反,许多做父母的都常常把他们自己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负担转嫁给孩子们,把他们当成了替罪羊或者让他们卷入冲突之中,更有甚者——这种情况也并不罕见——让孩子们替他们解决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克丽斯蒂娜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这种心理机制:人们完全可以准确地分析出这个孩子面对着自己的父母之间的怨恨和他们那远来得到满足的欲望所采取的态度,可是对她来说,由于任务过重,力不从心,因而注定要失败,只不过其失败的方式不同于她的父母罢了。

无论如何,如果把孩子们走上脱离社会的道路看成是他们产生那种无可救药的孤独感的起点,那将是大错特错,因为这种孤独感早已存在。因此我们不能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孩子们一意孤行而拒绝同别人的交往。而事情恰恰相反,他们这种孤独感的产生正是由于他们同那些负有给他们带来关心和支持使命的人缺乏可靠而牢固的联系。

不过,倘若就事论事,把这个问题简单说成是某个当爸爸或某个当妈妈的过错,那未免又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因为实际上还有许多其它因素导致家长给孩子们带来有害的影响。

克丽斯蒂娜在这本书中用一种罕见的尖锐口吻,一针见血地指出某种城市规划的弊病,正是这些弊病阻碍了人们之间的正常交往。我们许多所谓“清洁地带”的现代建筑群实际上把人们关闭在一个完全是人为的,冷漠的。机械的环境之中,这样的环境只能大大加剧人们之间的冲突——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当他们搬到这里来安家时,在他们的行李里本来就已经藏着许多矛盾。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格罗比小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这种大建

造群比比皆是，可是在设计的时候往往只从管理和技术上考虑，而忽略了人们情感方面的需要，结果造成一个小区实际上就是一块文化大杂烩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成了少年酗酒和吸毒的“热点”。虽然事出有因，并非偶然。此外，学校也和一些大工场一样，那里也往往充满一种相互陌生、精神孤独的气氛，同样也充满看激烈和残酷的竞争。在这种条件下，当充满生机活力的孩子无法随波逐流，屈服于这种千篇一律的严酷现实时，他们就会在暗地里逃避到另外一个平行的世界中去——一个被他们的幻想所美化了的世界，而只是从表面上去应付家庭或学校里的规矩。这种现象往往难以为人们所觉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克利斯蒂娜瞒着她周围的人，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过着一种两重性的生活，用其“合群”的假象来欺骗那些可以给她伸出援助的手的人。这些人本来可以给她以勇气，让她悬崖勒马，以免自身堕入那无边的苦海。

这就是这份个人心碎的资料为我们所提供的第一个教训：一个人的堕落往往是要经历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做为家长和学校教师，完全可以通过许多征兆察觉出来，从而及时采取措施，为身遭祸害的孩子提供必要的帮助。无论如何，如果你觉得一个孩子开始显得“心不在焉”，并且似乎只是从表面上本能地参加家庭生活的时候，那你就必须刨根问底，睁大眼睛。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在家里的人眼里已慢慢变成一个局外人，甚至对那些他往日所信任的人也慢慢疏远起来的话，那你就应该想方设法去了解到底这个孩子出了什么事情。然后该怎么办呢？当然，一切都取决于家长、教师的愿望：从孩子的自我反省中认识到一个危险的信号，或者更应该从中看到孩子从他那些不良的恶习中解脱出来的好处。

第二个教训：应该拥有进行早期治疗的条件，而这种治疗越早越好，越迅速越彻底越好。如果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取得家长的合作，甚至有可能的话取得老师的合作，在专家的指导下，开展“家庭治疗”，这方法只要进行及时，效果必然很佳，成功的希望也很大。当然，如果一个年轻人毒瘾已经成性，那就更应该给予治疗，只不过到这种时候再来治疗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些对增加治疗手段以及增设新的治疗中心漠不关心或不屑给予支持的人，着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满足于把吸毒者监禁起来——这是一种为某些政治倾向的人所主张的目前广为流行的做法——这实际上就是对这些年轻人彻底撒手不管，让其自生自灭的做法，是一种大儒主义的做法。不管对吸毒者的治疗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做为一个想成为“人道主义”的社会就必须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参与这一工作。我们并不缺乏治疗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让这些失足者从堕落的深渊重新爬上来。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治疗的过程往往要比失足者堕落的过程还长得多。治疗这种恶习的花费也是浩大的，在这个充满着自私和冷漠的世界里，要想实现这项工作更非一件容易事。例如在这个世界里，有人就想利用这些年纪轻轻的受害者，让他们被迫落到小女卖淫的地步，以便从中渔利。

由此可见，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只是通过增加治疗中心的数目，或者提高治疗补助费用所能奏效的。只要克利斯蒂娜的这种遭遇仍然受到普遍的容忍时，那么对吸毒分子的治疗工作的开展就会违背某些人的利益，这些人打着自由的旗号，大言不惭地声明他们有权对这些年轻的吸毒者进行“性消费”。其实像克利斯蒂娜那样失足的孩子同样是我们的同胞，只不过她是处在那些自认为和社会“融洽无缝”的公民的另一边。后者有时出自于“人道

主义”，愿意为他们提供治疗，而有时又想利用他们，甚至把他们贬为“商品”。这种矛盾本身就是我们的社会文明的一个普遍的特征。年轻的克里斯蒂娜向我们描述了她堕落的真实缘由，她的叙述要比那些著名的研究所所举行的冷冷清清的研讨会更有意思，更能使我们了解到这个被人天天吹捧为“健康的”社会腐败到了何等的地步。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这本不寻常的书对他们来说是，而且必须是——几乎难以容忍的。

霍斯特·埃贝哈德·里希特教授

注：本序言作者里希特教授是德国一位著名的医学、哲学博士。生于1923年。他在1952~1962年期间担任柏林“儿童精神病防治中心”主任医生。从1962年以来任西德基森市大学精神病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家庭、家长、孩子和神经官能症的心理分析》、《类型》等。

——原注。

克里斯蒂娜自述

这种情景真叫人感到惊讶。近几天，妈妈整天没完没了地收拾行李，把大大小小的箱子都塞满了衣物。我一看就明白：我们即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我刚满6岁，等搬家以后我就该正式上小学念书了。当妈妈正忙着收拾行李并且变得越来越激动的时候，我几乎整天呆在农民沃尔凯尔家里。我等着那些奶牛回到牛棚里挤奶，我给猪和鸡喂食，我还和小伙伴一起在草垛上打滚，有时就抱着小猫到外面散散步。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夏天，像是我完全能记得清楚的第一个夏天。

我知道我们很快就要出远门了，要到一个名字叫柏林的大城市居住。妈妈比我们早动身，以便去料理我们住房的问题。妹妹、爸爸和我，我们三个得过几个星期以后才上柏林去找妈妈。我们将乘飞机到柏林去，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这是平生头一次空中旅行，这该多有意思。

爸爸妈妈早就给我们讲了许多美好的故事，说我们将要住上一套有六大间房子的公寓，说他们将会挣到很多很多的钱，妈妈还说我和妹妹将单独有一间大房子，家里还将购置许多大型的家具。妈妈还有眉有眼地向我们描述了我们房间的摆设。这一切我都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我还小的时候，我一直在幻想着这些东西。随着岁月的消逝，我的想象就变得更加美。

我也没有忘记，当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我看到了我们房子的样子，当时这套房子真的使我产生了一种恐惧的心理。这套房子又大又空旷，我真怕在里面转不出来。当你说话大声一点，就会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回响。

只有三间房子用来居住，草草地摆上家具。两张床、一个旧的厨房用的碗柜，妈妈在柜子里摆着我们的玩具。这就是我和妹妹的房间。第二间摆着爸爸妈妈的床。第三间，也是最大的一间，摆着一个旧沙发和几把椅子。这就是我们在柏林——克罗伊茨贝尔克的房子的模样。

几天后，我骑着我的自行车上街逛。我看到街上有许多比我大一点的小孩在玩耍。要是在我的家乡，村里头的大孩子总是和小的一起玩，并且会

照顾他们。这些柏林的小孩却大声嚷着：“这个”丫头来干什么？”说着便把我的自行车抢走。当我要回来的时候，一只轮胎跑了气，一块挡泥板也撞得凹凸不平。

由于我的车被弄坏了，我挨了爸爸一记耳光。从那以后，我只能骑着车在我们的六间房屋之间转着玩。

这些房子中间有三间本来是打算用来做办公室的，因为爸爸妈妈想在这里开设一家婚姻介绍所。可是爸爸妈妈说过的什么办公室呀，什么扶手椅呀，始终连影子也没有。而那个厨房的旧碗柜倒是一直摆在我们的房间里。

一天，家里的沙发，床铺和柜橱都被装上一辆卡车，然后拉到克罗比小区的一幢塔楼里。我们搬进了 11 层的一套只有两间半的房间里。那半间当然就是我和妹妹的屋子。没有妈妈给我们说过的那些好的东西，一件也没有。

克罗比小区的塔楼群里一共住着 45000 人。楼房之间有一些绿草地和商业中心。从远处看，这片楼房的样子倒是相当新式和讲究，可当你走进里面去，在楼房之间就会闻到一股屎尿的臭味，因为住在小区里的小孩和狗随地屙屎撒尿，要是走进楼梯间里，那就更是臭气熏天。

我的父母十分恼火，他们说这都是那帮工人的孩子干的缺德事，是他们把楼梯给弄脏的。其实这并不是那些工人子弟的过错，因为我有一次在外头玩耍的时候，突然想上厕所，这回我自己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在我等电梯上 11 层楼的时候，我终于憋不住而尿在裤裆里。后来爸爸把我揍了一顿，在经历过三四次同样的经验——没有及时上楼而遭到的一顿痛打以后，我也学会了跟其他孩子一样：找个隐蔽的地方蹲下就地解决。可是，由于楼房居高临下，不管你蹲在什么地方都可能被人看见，所以最安全的地方还是楼梯下面拐角的地方。

小区里的孩子们把我看成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佬，因为我没有和他们一样的玩具，甚至连一把射水枪也没有，就连我的穿着和口音也都和他们不一样，还有，我根本不懂得他们的游戏。其实我看他们同样也不顺眼。要是在我们村里，大家经常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到森林中去，一直骑到一条上面架着小桥的小溪旁边。大家在河边修筑小水坝，或堆沙堡。有时大家一起玩，有时各玩各的。要是想把我们的建筑物摧毁掉，那必须得到大家的同意，我们就是这样在一起，玩得很痛快。另外，在村里，谁也别想发号施令，每个人都可以建议玩这个或玩那个，然后大家一起商量。有时年纪大的总是让着年纪小的，这样谁也不会有意见，那才是真正的儿童民主呢！

可是，在克罗比小区里，我们就得有一个头。他就是那个力气最大的男孩，他还有一把最漂亮的水枪。我们常常做强盗的游戏。自然是那个男孩做强盗的头目。而游戏的基本法则就是盲目地服从他的命令。

在多数时间里，我们并不是真正地在一起玩耍，而是一帮人和另外一帮人对垒。这实际上就是戏弄别人。例如，出其不意抢走对方的新玩具，然后把它捣碎。整个游戏无非就是如何搞坏别人的玩具，同时使自己能占便宜，或者如何夺取权力并施展他的权力。

那些最软弱的人当然就要吃最多的亏，我的妹妹不很强壮，她总是有点胆怯。他们常常叫她吃各种各样的苦头，而我还不能出面相助。

到了开学的时候了。对我来说，上学可是一件大喜事。爸爸妈妈告诉我永远做个乖孩子，听老师的话，我觉得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在村子里，

孩子们对大人总是尊敬的。所以我心里想，一到学校，其他人也都得听老师的话。可是，事情恰恰相反。开学没过几天，孩子们就到处闲逛，并且在课堂上打起架来，弄得那位女老师不知所措。她不断地嚷着：“坐下！”她的命令不仅没有人服从，反倒引起一伙人嘲笑，而另一伙人起哄得更加厉害。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动物。在我们家里，人人都喜欢动物。那可是一种真正的爱好。

我对此感到特别骄傲，因为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家庭能像我们一样喜欢动物。我真可怜那些家长不让自己在家里养动物的小孩。我们家的这两间屋子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动物园。我有四只小老鼠，两只大花猫，两只小白兔，一只金丝雀，此外，还有那条我们从乡下带来的棕毛狗“阿萨斯”。

阿萨斯总是在我的床边睡觉。我也总是喜欢睡觉的时候把一只胳膊露在被子外面和它逗着玩。

我认识那些家里也养着狗的小孩。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更好相处。我发现在距离小区不远的鲁道夫那里有一小块真正的天然地方。从此以后，我们常常把自己的狗带到那里去玩。那里有一片覆盖着泥土的废弃的垃圾场，这就是我们的游戏场。我们的狗总是和我们一起玩耍。我们最喜欢的游戏是“猎犬游戏”：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藏起来，而他的狗由别人牵着。当这个人藏好以后，把狗松开，让它去找出自己的主人。总是我的阿萨斯嗅觉最灵敏。

至于我那些小动物，有时我也把它们带到沙滩上，甚至带到学校里去。老师还把它们当成生物课的观察教具。有时候，学校的老师甚至允许把阿萨斯拴在教室里陪我听课，它从不捣乱，乖乖地躺在我的脚上，一动不动地直等到打下课铃的时候。

多亏了我的这些小动物，我的日子才算过得有意思。爸爸和我们的关系可是越来越糟了。妈妈天天上班，爸爸却老呆在家里。他们那个婚姻介绍所的计划早就成了泡影。爸爸发椅上打发日子，耐心等待。而他那火药桶似的脾气越来越变得严重了，动辄就大发雷霆。

晚上，妈妈下班回来就常帮我做功课。我好长时间总是分不清字母 H 和字母 K。妈妈总是用一种天使般的耐心给我解释。可我几乎听不进去，因为我已经看出爸爸开始冒火了。我一看就知道有何后果：他终于到厨房去找来一把扫帚，然后就劈头盖脸地打下来。挨完打之后，我还得向他说出 H 和 K 的区别。当然，我仍然是糊里糊涂地闹不清楚，结果只好屁股再挨一顿打，然后让你上床睡觉了事。

这就是爸爸帮我做功课的方式。他希望我做个好学生，将来好成为一个“人物”。不管怎么说，爷爷倒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从前甚至有一个印刷厂和一家报纸，当然还有其它许多财产。可战后，他的财产全部被民主德国征用了，他当时居住在东德，所以至今每当爸爸认为我在学校的学习不行就会大发雷霆。

今天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当时某些夜晚的细节。有一次，有一道作业题要求我们在算术本上画出六座房子：宽 6 格，高 4 格。我已经画好了一座，并且完全知道该怎么画下去。突然间，爸爸坐到我的身边，他问我下一幢房子应该从哪画到哪，我因为害怕而没有数好格，只好随便回答。当我一弄错，他就立即给我一记耳光。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我再也说不出任

何答案来。这时，他气得站了起来，朝着帆布雨衣那边走过去。我知道他干什么。他拿起那根支撑雨衣的竹棍，嗨，一股脑儿就朝我的屁股打过来，一直打到我的屁股露出来才罢休。

每当一上桌吃饭，我就害怕起来：只要我弄脏了什么地方，那就是一场哭啦，我要是碰倒什么东西，那就得小心自己的屁股。我连碰一下我的奶杯都感到害怕。我几乎每顿饭都提心吊胆，生怕闯出什么祸来。

每天晚上，我总是很客气地问爸爸是否出去。他经常晚上出去，而留下我们母女三人，这可算是最愉快的时刻，因为我们可以过上一个安宁的夜晚。可当他一回来，事情就常常不好了。他常常是喝完酒才回家的。只要一点点借口——比如说我们的玩具或者衣服没有摆整齐——他就会小题大作，火冒三丈。爸爸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过日子最要紧的是井井有条！”有时候他要是半夜回来，一看我们的东西摆得乱七八糟，他就会把我从床上揪起来打耳光，然后就会轮到我的妹妹。接着他就会把我们的东西全扔在地上，限我们在五分钟之内把全部东西整理得整整齐齐。我们常常无法办到，于是，他就要重新对我俩乱打一通。

妈妈常常站在门槛上，忍气吞声地看着我们挨打。她很少敢于替我们辩护，因为爸爸也打她。只有我那条狗阿萨斯，倒是常常上来居间调停。它用一种诉苦般的声音呻吟，两眼充满无限的忧伤。还是它最懂得使爸爸恢复理智，因为爸爸和我们一样也非常喜欢狗。有时候爸爸也会叱责它，不过，他从来也不打它。

尽管如此，我还是尊敬和喜欢我的爸爸。我觉得他和别人相比还是强得多。我虽然怕他，但我觉得他的举止仍然是正常的。克罗比小区的其他孩子并不比我更好受。他们有时候眼睛都被打肿，连他们的妈妈也不能幸免。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小孩的爸爸喝得酩酊大醉，像一堆烂泥似地躺在大街上或游戏场上。而我自己的爸爸也没有喝醉到这个样子。我们有时还看到一些家具从窗口飞出来，摔碎在街上，妻子大喊救命，甚至把警察叫来。在我们的家里，情况还不至于如此严重。

爸爸经常责备妈妈花钱太多，其实是妈妈挣钱养活我们全家。有时妈妈也和他顶嘴，她说是爸爸的那些狐朋狗友的酒会。他的那些女人，还有他那辆汽车，才是填不完的底洞。

这么一来，他们俩就得动起手来。

爸爸的那辆“波尔什”牌汽车可以说是他在世界上最心爱的东西。他天天把他那辆车擦得光亮如镜。在克罗比小区里爸爸的这辆“波尔什”肯定是独一无二的。反正我还没见过哪个失业的人会开着一辆“波尔什”。

当然，在这个时候，我还不懂得爸爸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干吗三天两头的发脾气？只是到了后来，当我和妈妈说话多了一点的时候，我才琢磨出一点点道理来。原来只是爸爸能力不够。他曾经有过雄心壮志，可是连连失策，一事无成。正是因为这个，爷爷才一直瞧不起他。在妈妈和爸爸结婚之前，爷爷就提醒过妈妈。他把他的儿子说成是无赖货。原来爷爷还把希望寄托在爸爸身上，希望他有朝一日能把家境恢复到被征用以前的那种显赫的光彩。

要是爸爸没有遇上妈妈的话，也许他早已当上一个什么财产保管行政官——当他们认识的时候，爸爸正在做考试的准备——并且将会会有一个养狗场。可惜当时妈妈怀上了我，他也就只好中断学业而娶了妈妈。从那以后，

他肯定认为妈妈和我是导致他失败的丧门星。如今，在那些他最向往的东西中，只剩下他那辆“波尔什”和几个能说会道而无所事事的朋友。

他不仅憎恨他的家庭，而且根本就把我们撇在一边。他竟能使他所有的朋友都不知道他是个结了婚的。有家有眷的人。每当我们遇上他的朋友，或是他们上家来找他，我们都得叫他“理查叔叔”。我不知挨了多少耳光才终于牢牢地记住：当着外人的面，他就得变成我的叔叔。

对妈妈来说也是如此。他禁止她向他的朋友透露她是他的妻子，尤其是不能表现出他们的夫妻关系，我记得他把她说成是他的妹妹。

爸爸的那些朋友都比他年轻，他们还有自己的前途，至少他们相信自己会有时来运转的时候，爸爸也想和他们一样无牵无挂，而不想着自己已经是一个有家的男人，却连养活自己的本事都没有。

当然，在这个时期——从我6岁到8岁的时候——所有这些事我一点也察觉不出来。爸爸的行为在我眼里看来只不过是肯定了我街上或学校里学到的那个生活规则：要不打人，要不挨打。由于妈妈在他的生活中也同样挨够了揍，所以她也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对我说：“永远也别先动手，但是要是人家打了你的话，你就还手，并且狠狠地打，想打多久就打多久。”可她，她已经再也不能还手了。

慢慢地，我终于学会了这一手。在学校里，开始我只攻击那个最软弱的老师。我一上他的课就故意做些滑稽的动作，逗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后来当最厉害的老师上课我也敢捣乱的时候，同学们无不对我敬佩三分。

这些初步的胜利激励我去试试我的筋骨。其实我还是个柔弱的姑娘，可我的狂热使我勇气倍增。很快我就敢于和那些比我强壮的人比个高低而毫不手软。要是有人敢来冒犯我并且让我在校门口碰上的话，那我倒是有几分高兴。不过，在多数情况下我也不着急动手，因为其他的孩子都尊重我。

现在我8岁了。我的最大愿望就是快点长大，变成大人，变成像爸爸那样的大人，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对别人行使我的权力了。可眼下，我只能取得我手中的这点权力。

爸爸终于找到了工作，可这份工作还不能令他满意，不过挣点钱去维持他那辆“波尔什”和他那些青年人的爱好还是可以的。这一来，放学后回到家里就只剩下我和妹妹两个人了（妹妹比我小1岁）。我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女朋友，我对此感到非常骄傲。跟她在一起，我就觉得自己更加强壮。

我们几乎天天和小妹妹一起玩耍。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家里，我们到处从烟灰缸里或纸篓里拾烟头，然后在手背上磨光就抽起来，当妹妹要求让她也抽一口的时候，我们就用手指弹她。我们对她发号施令：洗碗去，把抹布拿过来。总之，就是让她干那些家长让我们干的家务活。完事以后，我们就抱着我们的囡囡到外面散步去，把小丫头一个人关在屋里。只等她把全部工作做完之后才能让她自由。

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我8岁的时候——在小区附近的鲁道夫街开着一家跑马俱乐部。起初，当我们看到郊区最后一个自然的小岛也被铁丝网围起来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生气。可很快，我和那里的工作人员就熟悉起来，我常常替他们干点活，比如帮助他们用草擦马或打扫马厩。而他们每周允许我免费骑一刻钟的马。我觉得这种玩艺很有意思。

我真喜欢马，我觉得我对俱乐部那头小毛驴特别感兴趣。不过，最使我高兴的还是骑马。对我来说，骑马是显示我的力量和权力的最好的机会。

你看这匹马比我强壮得多，可它得服从我的指挥，当我摔下来的时候，我立即又重新骑上去，直到马听我的话为止。

可惜有一天我被“解雇”了。从那以后，我要想骑马就得先付钱。家里并不经常给我零用钱，那么我就开始做些不正当的手脚：我偷偷拿合作社的息票去换钱，或者把家里的啤酒瓶拿出去退掉。

在我 10 岁左右的时候，我就开始干点小偷小摸的事。我常常到超级市场偷一些家里没有的东西，尤其是糖果一类的小吃。这些东西差不多别的孩子都有权享受，可我们就吃不到。爸爸说吃糖果对牙齿没有好处。

在克罗比小区里，人们在学习如何违反种种禁令方面真可谓是无师自通。因为在这里几乎什么东西都被禁止，尤其是那些你觉得好玩的游戏。整个小区禁牌林立。那些把楼房隔开的所谓“花园”竟成了真正的牌子森林。而且几乎所有的这些牌子上面总有几条针对儿童的禁令（几年之后，我还曾经在我的日记本上模仿出“禁止”这两个字的字样）。

第一个牌子就竖立在我们这幢楼的门口。实际上，这里的小孩无论是在楼梯上，还是在楼房周围走动，全都得踮起脚尖。什么禁止玩耍。禁止奔跑。禁止骑车。禁止滑旱冰……。

只要哪里有一块小小的绿草地，那就会有一些牌子：禁止践踏草地。我们甚至连袍着囡囡在上面坐一坐都不行。在一个极为普通的蔷薇坛旁边也得装饰着一块牌子：“绿地保护区”，上面还特意为那些想走近花坛的人标明各种各样的威胁。

我们也就只好全部被赶到游戏场地去。所谓游戏场地，每个楼群中间都有一个，实际上只有一堆发出尿臭。堆有粪便的沙上。不须说，这里也会有一块大牌子。这块牌子特意用坚固的铁栏杆保护起来，以防被我们毁掉。这是一块“游戏场规则”的牌子，上面写着“供儿童们使用”，为了“他们的快乐和休息”。不过，当你想来放松一下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一行划着粗线的字：“开放时间 8：00 — 13：00，15：00 — 19：00”。换句话说，就是放学以后不准到此玩耍，因为一般放学时间正好是 13 点。

我和妹妹实际上连到这里来玩的权利也没有，因为牌子上写得清清楚楚：“儿童必须经负责教育的人员同意并在其带领下方能使用游戏场”。还有不许吵闹，应该“照顾居民的休息”。所以在这里实际上也只能老老实实地扔皮球而已。而且“凡是体育球类不许使用”。

所以玩橄榄球也不行，踢足球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对于这些规定，那班男孩子就感到委屈了。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活动场地，结果就只好把他们过剩的力气用来破坏那些游戏设备，尤其是那些写着禁令的牌子。所以，人们常常三天两头花钱换牌子。

有一天下午，我的一只小鼠在草地上跑掉了。后来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找着。我真为此伤心，不过当我想到它在外面的时候也许会比在笼子里活得更幸福的时候，我也就感到放心了。

就在这天晚上，爸爸来到我的房间里。他一看小鼠笼就大声嚷起来：“怎么就剩两只！”

那只哪去啦？”我真没想到爸爸会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从来就不喜欢这些小鼠。并且常常叫我把它们放掉。我告诉他有一只小鼠在游戏场上跑掉了。

爸爸用一种发疯的眼神看着我。我知道用不着过 30 秒钟，他就控制不

住了。他大声地嚎叫起来并且一巴掌朝我打过来。当时我正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无法逃脱。他仍然继续揍我，他从来也没有这么厉害打过我，我想这一回他非把我打死不可了，趁他转过身去抽打妹妹的时候，我本能地从床上蹦了下来，立即往窗台跑过去。我以为我已经从 12 楼跳下去了，可惜爸爸一手把我抓住，然后把我推倒在床上。这时候妈妈正在换衣服，她站在门槛上，眼泪哗哗地流下来。我看不见她，只是当她扑到爸爸和我中间来的时候我才看见她，她用拳头狠狠打爸爸的头部。爸爸顿时张惶失措。他把妈妈推到走廊里，边拖边揍她。我突然间顾不了自己。倒担心妈妈会被打坏，她拼命地从爸爸手里挣脱出来，想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可是爸爸揪住她的头发，就像每天晚上一样，浴缸里泡着一大堆衣服——因为我们一直买不起洗衣机。爸爸把妈妈的头往盛满水的浴缸里按，我不知道后来妈妈是怎样跑出来的，是他放了她，还是她自己挣脱了出来？

爸爸面无血色，躲进他的卧室。妈妈打开壁橱，取出大衣，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妈妈离家出走的那一刹那间成了我一生中最感可怕的一个时刻，就在那一刹那的功夫，妈妈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留下我们孤零零的姐妹俩。当时我只想爸爸一定会重新大发雷霆。可是他房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是电视里的广播。

我把妹妹抱到我的床上。我们俩紧缩成一团，挨在一起。这时候妹妹想撒尿。她不敢上浴室去，可她又怕把床尿湿会挨爸爸打。她开始哆嗦起来。最后还是我拉着她的手把她带到浴室里去。这时爸爸在他房间里说话了：“祝你们晚安。”

第二天早上，没有人来叫醒我们，这一天我们没有上学去。快到中午的时候，妈妈回来了。她几乎一声不吭，一进门就收拾东西。她把小花猫装进提袋里，并且叫我把狗牵着，然后带着我们向地铁走去。后来我们上妈妈的一位同事家里住了一些日子。这时候妈妈告诉我们，她决定和爸爸离婚。

妈妈这位同事的房子也很小，根本无法接待我们母女 3 个人，还有那只小花猫和阿萨斯，没过几天，这位同事也开始烦起来了。妈妈只好重新收拾行李，带着我们和那两只动物回到克罗比小区。

正当我和妹妹在洗澡的时候，爸爸回来了。他朝着我们走过来，用一种完全自然的声音对我们谈话，好像家里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似的。他问我们：“你们干吗要走？你们用不着到别人家里睡觉去。咱们 3 个满可以过舒服的日子。”我和妹妹一听，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好。那天晚上，爸爸直来直往，仿佛家里根本就没有妈妈存在似的。后来他对我们也一样，不再跟我们说话，连看我们一眼都不看。这真是比挨打还难受。

爸爸再也没动手打过我。不过他这种对我们冷漠的举止倒更使我难受。我只是这个时候才真正体会到他是我的爸爸。其实，我从没有恨过他，我只不过怕他而已。而且我过去一直为他感到骄傲，因为他也喜欢动物，因为他有一辆大汽车，这是一辆“波尔什”62 年新型的车。可现在，他几乎不再是我爸爸了，尽管我们依然一起住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祸不单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我的阿萨斯因为腹部穿孔而死去了。我真伤心透了。可是，谁也没有来安慰我。妈妈只想着她自己的事，想着她的离婚。她常常哭，再也沒露出过笑容，我感到十分寂寞、孤单。

一天晚上，门铃响了。我去开门。这是爸爸的朋友克劳斯，他来找爸爸喝酒去。可爸爸已经出去了。

妈妈请这个家伙进屋来。他要比爸爸年轻得多，看来是个二十二三岁的人。他突然问妈妈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去吃晚饭？妈妈立即回答：“去，干吗不去？”她马上换好衣服，跟着这个家伙走了，把我们姐妹俩留在家里。

要是别的孩子也许会感到难堪，或者替妈妈担心。我也是这样，有那么一阵子感到不好受。不过，很快就觉得应该替她高兴，从心底里替她高兴。看她出门时显得那么兴奋，尽管她没有过分的流露出来。妹妹也跟我的看法一样。她说：“这回妈妈可高兴啦。”从那以后，克劳斯常常趁爸爸不在家的时候来找妈妈。有个星期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妈妈叫我们倒上去。我回来的时候故意静悄悄地不发出一点声音。当我朝卧室里瞧一眼的时候，我看见克劳斯正在亲我妈妈。

我觉得这大可笑了。我悄悄地溜进我的房间。他们没有看见我，而我也没有把我所看见的告诉任何人，甚至对妹妹也没谈，尽管平时我对她没有什么保密的事。

现在那个男人总往我们家里钻。我觉得他很讨厌。不过他对我们倒很热情，尤其是对妈妈更体贴入微。妈妈再也不哭了，有时又能听见她的笑声。她开始憧憬未来。她又向我们描绘将来和克劳斯一起生活以后的新房子。可眼下还只是一个幻想，再说爸爸一直也不搬走。

甚至当法院已经判决他们离婚以后还不想搬走。我的父母互相仇恨，可他们还在一张床上，那个时候我们总是没钱花。

后来我们终于搬到鲁道夫另一套间里，就在小区地铁站附近。搬家以后也不觉得日子过得有多好。克劳斯还是常常钻到我们家里来。我越来越讨厌他，可是他仍然是客客气气。无论如何，他的确是我和妈妈间的一个障碍，我打心眼里不愿意接受他当我们的爸爸，我也不愿意让这个青年男子指挥我。我对他越来越厉害。

我们终于吵起架来，都是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有时是我挑起了事端。最经常的是因为我那些唱片。妈妈在我 11 岁生日的时候特意送我一部电唱机，所以到了晚上，我总想听一下唱片——我有几张管弦乐的和一些迪斯科的唱片——我把声音放得响响的，响得连鼓膜都要震破了。

一天晚上，克劳斯突然出现在我房间里，他让我把声音放小一些。我不理他，照样放下去。他走过来，干脆把唱机的唱头臂搁起来。我又重新把它放上去，并且站在唱机面前不让他过来。克劳斯把我推开。我不能容忍这个男人碰我一下，所以我终于发火了。

妈妈通常总是小心翼翼地站在我这边。这倒不是上策，因为这样一来就会引起克劳斯和妈妈吵起架来，而我顿时就会感到是我惹起了风波。在我们家里的确多了一个人。

其实，有时还会出现比吵架更糟糕的局面，那就是那些在家里安静的夜晚：我们全都会集到客厅里，克劳斯不是翻阅画报，就是摆弄电视机的旋钮，妈妈尽量想找个话题，好让大家聊起来。她一会儿跟我们说话，一会儿跟她的朋友说话，可谁也没有认真理睬她，使她枉费一番苦心。这种情景才真让人难受。我和妹妹都感觉到我们在这个房间里的确是多余的人。当我们一说要出去散步的时候，谁也不会反对。至少克劳斯，他看到我们出去一定会暗自高兴。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便尽量多出去，并且尽量在外面多

呆一些时候。

回想起来，我觉得克劳斯没有什么好责备的，当时他只不过是一个 20 来岁的小伙子，他哪里懂得什么叫家庭，他也不可能理解妈妈对我们以及我们对妈妈到底有多重的分量。他完全不理解我们多么需要在晚上和周末与妈妈一起度过这短暂而难得的时刻。可妈妈既想照顾我们，又想留住她的朋友。就这样，她又一次作茧自缚，使自己陷入困境而无法自拔。

面对着这种处境，我无法逆来顺受，我变得更加爱吵闹，更加咄咄逼人。妹妹却变得越来越沉默。妈妈感到难受，我想她一定还不完全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过她提出来要回爸爸那里去。我觉得她这个想法特别荒唐，因为她忘了爸爸过去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了。可是这回爸爸真的建议我和妹妹回到他那里去。他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他有一位年轻的女朋友。

当我们碰见他的时候，他显得脾气特别好，并且显得和我们挺亲热，他还送我一条狗。一条母狗。

我 12 岁。我已经有了一点胸脯，并且开始对男孩子和男人有强烈的兴趣。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一些怪人。他们全都很粗鲁。无论是逛大街的大小伙子，还是克劳斯和爸爸，我都觉得他们是粗鲁的人。他们使我害怕，可同时又使我着迷。他们很强壮，他们掌握着权力。我羡慕他们。无论如何，他们的脾气和他们的权势吸引着我。

我终于用起妈妈的吹风机，用指甲刀为自己剪出两道刘海，并且把头发往一边梳。我很注意整理我的头发，因为有人说过我留着这头长发很好看。我再也不愿意穿我那些小姑娘穿的格子花呢裤子。穿着它显得幼稚。我喜欢穿牛仔裤，家里就给我买牛仔裤。我喜欢穿高跟鞋，妈妈就把她的一双高跟鞋给了我。

我就这样穿着牛仔裤和高跟鞋，几乎每天晚上去逛大街，一直遇到 10 点钟才回家。我觉得家里人并不喜欢我呆在家里。可要从另一方面想，我倒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我想要多自由就能多自由。我甚至觉得和克劳斯吵架是一件有甜头的可爱的事，因为我能从中感觉到我的威力——敢于把一个成年人痛骂一顿。

妹妹无法忍受这个家庭的环境，她终于做出一个令我无法理解的决定：回到爸爸那里去。她离开妈妈，尤其是离开了我。这一来使我觉得更孤单。可是对妈妈来说，这可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她又开始哭泣。她在她的男朋友和亲生女儿之间无能为力，又一次陷入绝境之中而心痛欲裂。

原来以为妹妹过不多久就会回来的，谁知她在爸爸那里却过得很满意。爸爸不仅给她零花钱，还替她交纳骑马费，并且特意为她买了一条真正的马裤。这一切对于我来说真是难以相信。我又开始到跑马场那里去干零活，以便换取免费练习骑马的机会。因为机会不多，所以身穿漂亮马裤的妹妹骑马技术很快就超过了我。

不过，我终于也得到了赔偿：爸爸给我提供了一次到西班牙去旅游的机会。当时由于我在学校学习成绩优秀，学校宣布我可以继续上中学，并且给我在克罗比小区的“综合性中学”报了名。因此，从逻辑上讲，我将有机会学完全部高中学业，一直到参加中学会考。就在即将跨进人生中一个新的阶段的前夕，爸爸和他的女朋友带着我飞往西班牙的多尔莫利诺。这真是一个愉快的假期。爸爸表现得很好，我也发现他也一直喜欢我——只不过他有他的爱法。现在他几乎拿我当大人看待。有些时候，甚至当他晚上跟女朋友

出去散步时还把我带上。他已经变成一个非常讲道理的人。现在他也有许多和他同年龄的朋友，可他再也不向他们隐瞒他结过婚，我也再用不着叫他“理查叔叔”。我是他的女儿。他也显得为我而感到骄傲。美中不足的是，这一次爸爸完全是根据他的时间表安排出国度假，这刚好是我假期末尾的时间，弄得我到新学校报到时整整迟到了两个星期。

我真感到为难。在我这个班里，别人都成群结伙地成为好朋友，而我却孤零零地躲在我的角落里。最糟糕的是，在我呆在西班牙的那两周期间，校方已经给同学们解释过学校的新制度。这种制度对一个刚从小学升上来的新生来说实在太复杂了。每个学生都得自己选择学科方向，并且对所选修的课程都得——申明。其他的同学都知道底细，懂得该选修哪些课程。而我却没人引导，只好自己瞎选一通。在这么一个学校里，我真被弄得糊里糊涂，六神无主。这里和小学也不一样，老师并不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因为一个老师必须同时给几百个学生上大课。如果你想读完高中参加会考，那就得全靠靠自己奋斗。必须决心努力学习，争取被选入水平最高的小组。要不就有父母从旁辅导和督促才行。可有谁来管我？我真是一只可怜虫。

在这个学校里，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神气”，因为别人已经比我多上了两星期的课。

在一所新学校里，缺两个星期的课可不是一件小事，我开始施展我在小学里的绝招：在课堂上起哄，打断老师的讲话，对老师的讲话进行反驳。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老师讲错了。我又重新起来造反，反对老师，反对学校。我想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赫赫有名的人。

我们班上的头头是一个女生，大家都叫她凯茜。她已经有一个丰满的胸脯，看上去至少要比我大两岁。她同时也显得比较成熟老练，大家都非常尊敬她。我对她十分崇拜，真想成为她的好朋友。还有一点，她长得很像美国的麦当娜，很性感，那时我已经喜欢麦当娜了，常在电视里见到她大胆的演出。

凯茜有个男朋友，一个了不起的家伙。他在我的年级里的另一个平行班上，不过，他比我们的年龄大一些。他叫米兰，身高1.70米，一头又黑又鬃的长发一直披到肩膀上。他穿着紧身的牛仔裤，还有一双最时髦的皮鞋。所有的姑娘都狂热地迷恋他。凯茜的威信不仅是因为她有丰满的胸脯和成年人的风度，同时又是因为她是米兰的好朋友。

我们这些姑娘对心目中最喜欢的男孩子有一个准确的形象：他不应该穿着喇叭裤到处逛来逛去，而应该穿着牛仔裤，神气十足，还得穿上时髦的皮鞋（尤其是不要穿运动鞋，以免显得幼稚），最好是穿着带有饰边并且是高跟的皮鞋。我们最瞧不起那些在教室里扔纸团或苹果核胡闹的男生。往往就是这些淘气的男生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喝牛奶。玩足球。而那些真正的硬汉却躲在角落里抽烟。喝啤酒。我还记得有一次凯茜跟我讲到米兰曾经喝到酩酊大醉，使我听后十分吃惊。

我还不知道如何能够使一个像米兰一样的男生喜欢我，或者——其实也是一码事——使凯茜能够把我看作她的好伙伴。光是她那外号“凯茜”就叫我羡慕不已。我又幻想着有一天我也会有个美丽的外号。

我心里想：自己和老师并没有什么相干，因为充其量也不过几天见他一个小时，何必白费力气去讨他的欢喜。最要紧的是让那些能够终日同你在一起的人喜欢你。于是我简直无法把课听下去。我和那些老师没有任何个人

的联系。再说，大部分老师表面看来对什么都瞧不起，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权威，只会大喊大叫而已。我也敢叫他们看看我的脸色。很快，我就能够单枪匹马把一堂课搅得混乱不堪。自然，这一来，班上的同学谁也不敢瞧不起我。

我翻箱倒柜，把抽屉里的钱拿光去买香烟，以便跟那班烟鬼一起躲到那个角落里去抽烟。凯茜每个课间休息时也跑到那里去。由于我去的次数越来越多，我觉得凯茜开始对我感兴趣了。

每当放学的时候我俩总是一起走，终于有一天，她邀请我上她家去。我们一面喝着啤酒——弄得我的头有些不好受——一面谈起我们的家境。她和我一样，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她的处境甚至比我还要糟糕。

凯茜是个私生子。她的妈妈朝三暮四，经常更换男朋友，所以这些男人自然对她也没有什么感情。她刚度过一个艰苦难堪的时刻，因为最后的那个男人也动手打她妈妈，甚至捣毁她家里的家具，最后还把她家里的电视机从窗口扔出去。不过，凯茜的妈妈和我的妈妈不一样，她对凯茜显得十分厉害：没有特殊许可，凯茜每天晚上必须在8点钟以前回家。

现在学校里一切都很顺利。我的意思是说我已经得到了同学们的重视。这可是一场艰难而又持久的战斗，弄得我几乎没有时间去学习功课。我最得意的日子就是那天凯茜允许我坐在她身边。她教我怎样逃学。当她不想上某一堂课的时候，她干脆就溜出学校，跑去与米兰幽会，或者干别的事情去。头几次我真有点害怕，可我很快就发现，一天当中缺一两节课完全可以不让别人察觉到。只要头节课点名时在就行，再说有那么多班，老师根本就管不过来，哪能知道谁来谁没来。况且逃学的人多着呢。

凯茜已经让男孩子亲吻。抚摸。而且她开始出入那个“黑窝”：这是一个年轻人聚会的地方，美其名为“新式教堂”。在这个地窖里，有一个类似舞厅的“俱乐部”。那里只接受14岁以上的年轻人。但是凯茜有办法装扮成比她的13岁还大的人。

几经苦苦哀求，妈妈终于答应给我买一个乳罩，其实我还不需要这种东西，不过带上乳罩。胸脯就显得丰满多了。我也开始学化妆。凯茜终于带我来到这个每天下午四点钟开门的“俱乐部”。

在地窖我碰见的第一个人就是我们学校里的一个男孩。他是三年级的学生。在我的眼里，这个男孩是“俱乐部”里最了不起的人，比米兰还棒。他长得更帅，而且神气十足。他在“俱乐部”里走来走去，俨然一个洋洋得意的明星。他的名字叫彼埃特。他班里的同学对他总是敬而远之。他举止与众不同，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风度。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这里的男孩穿着也十分特别：紧身的牛仔裤，高跟的皮靴，绣花的背心，或者色彩浪漫的上衣，料子漂亮，就像地毯一样。

凯茜认识这里所有的男孩，并且一一向我介绍。我感到十分激动，多亏了凯茜的帮助我才有幸和他们接近。在“俱乐部”里，大家都很尊敬这些男孩，我们还可以和他们坐在一起。

第二天晚上，伙伴们带来一根特大的水烟袋，当时我还不不懂这是什么玩艺。凯茜告诉我，他们就是用它来抽白面儿的。我不知道白面儿到底是什么东西，只知道这是一种被严格禁止的毒品。

他们把水烟袋点燃，然后轮着抽起来。每个人抽一口，甚至连凯茜也跟着抽。当轮到我的时候，我拒绝了，因为我还没有这种爱好。我倒很想加

入他们的团伙，可是叫我吸毒，我可不愿意！我真感到害怕。

我感到很不自在，真想往老鼠洞里钻。我不能离开这张桌子，不能因为他们吸毒而露出一副格格不入的样子。我说我想喝一杯啤酒，我随手捡来几个到处乱扔的空瓶子。我用四个空瓶子换来一瓶装满的啤酒。就在其他人正在抽水烟袋的时候，我喝下有生以来第一瓶啤酒。他们边说边谈论音乐。可惜我对音乐几乎没有什么见识，所以无法参加他们的交谈。我默不作声，免得在大伙面前出洋相。

很快我就明白了他们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也就随声附和，说我也喜欢这些音乐，喜欢戴维·伯韦的歌曲。在我们的眼里，这些男孩一个个都是值得崇拜的偶像。从背后看去，他们真像是戴维·伯韦，尽管他们只不过是些16岁的男孩。

团伙里的人一个个都很高尚，他们的举止和风度实在令我佩服。他们不大吵大嚷，从不打架斗殴，也不搞恶作剧。他们非常安静，彼此之间十分热情。进门的时候，大家互相轻轻地亲一下嘴。

我和凯茜又一次逃学。就在上最后两节课的时候我们溜出来了。凯茜约好米兰在乌兹吉亚里地铁站见面。这时候他还没有到，我们只好在车站附近转来转去，并且随时注意有没有老师路过这里，因为这时正是老师下班的时候，十分危险。

当凯茜正在低头点烟的时候，我突然看见团伙里的彼埃特和他的同学查理向我们走过来。我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了！好久以前我就盼望着能在白天见到彼埃特，或者其他的男孩，以便邀请他上我家去。啊，老天真不负有心人！当时我对异性还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我只不过是个连月经还没有来的12岁的女孩子。我所追求的是可以向别人吹嘘一下。说彼埃特到过我家，这样别人一定会以为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至少也会把我看成团伙里一名正式的成员。

在这个时刻，我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妈妈和她的男朋友都上班去了。我对凯茜说：“咱们找那些男孩子聊聊去。”我的心怦怦地跳。不过几分钟后，我却能够用一种十分镇定的声音问彼埃特：“请您上我家坐一会儿怎么样？我家里没有人，而且我妈的男朋友有几张标准唱片。”

我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不仅熟悉他们所喜欢的音乐，而且也懂得他们那些与众不同的行话。对我来说，学习他们那些新词汇要比数学和英语动词更为重要。

彼埃特和查理一口接受我的邀请。我高兴极了，感到无比的骄傲。一到家我就嚷起来：“妈的，哥们，什么喝的都没有！”我们一起凑钱，然后由我和查理到超级市场买酒去。啤酒实在太贵了，我们买不起，只好花两个马克买来一升红葡萄酒。

我们一面聊天，一面把那瓶红葡萄酒喝得精光。我们的话题主要是讨论警察，彼埃特说因为我们吸毒，对警察必须格外小心。他们说了警察的许多坏话，埋怨我们是在警察的统治下生活。

这些话题对我来说都十分新鲜，因为直到现在，我只知道讨厌那些约束我们玩耍的公寓看门人。对我来说，警察还是一个尚未触及的世界。而现在我才明白，我们是生活在警察的统治下，知道警察远比那些看家狗更危险。这些话都是彼埃特和查理说的，我想一定都是真的。

喝完酒之后，彼埃特说他家里还有一点毒品，大家真是喜出望外。彼

埃特从阳台爬出去，不一会儿就拿回来一些毒品，还带来一根长长的烟袋。他们把药面儿掺在烟丝里面，然后仰起头来轮流抽着。

我看着他们是怎样抽的。我想今天彼埃特和查理都到我家里来，我再也不好意思拒绝了。于是我对他们说：“今天我可得抽它一口。”屋里烟雾弥漫，我们一边抽，一边听音乐。每个人的眼神都迟钝发呆。

我等待着身上能有什么感觉。我心里想，这回你可吸毒了，一定会有不寻常的感觉。可惜什么感觉也没有，只觉得有些困意，其实是由于喝酒的缘故，当时我还不懂吸毒并非一下子就能产生什么效应，必须经过一个阶段的训练以后才能有所感觉。而喝酒的效果会来得很快。

彼埃特和凯茜坐在沙发里彼此挨得很紧。彼埃特摸着我的女友的胳膊，过了一会，他们俩站起来，然后走进房间里把门关上了。

这时候我孤单一人和查理呆在一起。他坐在我的沙发扶手上，一只手搂着我的肩膀。我觉得他比彼埃特还可爱。他能喜欢我使我感到很高兴，我最怕男孩子看出我只有12岁，嫌我年纪小而不要我。

查理开始轻薄地抚摸我。我也记不得是否我很乐意。我浑身发烧，也许是由于害怕的缘故。我感到全身僵硬。我尽量找些有关音乐的话题来缓和紧张的心理。当查理开始摸弄我的乳房的时候——实际上是将来会长出乳房的地方——我“嚯”地站了起来，跑到电唱机前胡乱摆弄了一阵。

彼埃特和凯茜从我房间走出来。他们的脸色很难看，似乎布满愁容。他们互相避开目光，谁也不说一句话。凯茜满脸通红。我觉得他们似乎经历过一场难受的体验。

彼埃特终于问我今天晚上是否到“俱乐部”去。这一问使我更加高兴。我胜利了。一切进展顺利，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结果：邀请男孩子到我家来，并且完全成为团伙的成员。

彼埃特和凯茜先回家了。查理却迟迟不走。我开始感到害怕。我真不想单独和他呆在一起。我明确地告诉他，我现在必须收拾房间，然后得开始做功课。他终于走了。我往床上一躺，两眼看着天花板，试图弄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

我感到很苦恼。这回算是加入了团伙，可其实那里并不是我该去的地方，年纪那么小，哪能对付那些男孩子的进攻。

查理倒是很有风度，可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现在再也不喜欢他了。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过去了。有人敲门。我把一只眼贴到门眼上，看到门口站着的男孩就是查理。我没有开门，我踮着脚尖回到我的房间。我真害怕单独和这家伙呆在一起。我现在讨厌他。而且我也感到有点害羞。到底是因为吸毒，还是查理，我一点也搞不清楚。现在我才明白，我根本无法和那些男孩子混在一起，至于他们所说的有关警察、国家等等的话，我一点也不感兴趣。

然而，我仍继续出入团伙的“俱乐部”。一天，我们一道去看电影。我本来想争取坐在凯茜和一位我素不相识的男孩中间，可查理却挤到我这边坐下。看电影的时候，他又开始抚弄我。他把手放在我两条腿中间，我好像僵化了似的，没有表示反抗，可我心里害怕得要命。我真想拔腿就跑，可我又想：“克丽斯蒂娜，这就是你加入团伙的代价。”我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再说，这个家伙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只是当他要我也摸他的时候，我拒绝了。当时他抓住我的手往他身边拉过去，我挣脱开来，两手交叉紧紧地放在膝盖上。

电影终于散场了。我松了一口气，赶紧去找凯茜，我把刚才发生的事全讲给她听，并且向她表示，我再也不愿意见到查理。肯定她把我的意思转告给了他。因为后来我才知道，凯茜自己正爱着他，为了这个，她在俱乐部当众哭了一场，因为查理开始追求其他姑娘而对她冷淡了。后来凯茜向我承认，当时她的确爱查理爱得发疯，每当查理离开她的时候她就想哭。

不管怎么说，从今以后我就是团伙里的成员了，当然，大家都叫我“小姑娘”。团伙里的男孩没有一个想碰我，因为他们都知道我还小，不懂得这些事。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的团伙也不同于那些酒鬼，我说的是那些整天喝啤酒和烧酒的年轻人。他们对那些所谓“假正经”的姑娘心肠特别狠。哪个姑娘不依他们，那就会遭到他们的嘲笑、辱骂，甚至被殴打。

而在我们团伙里，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从没有使用暴力的事。大家同舟共济，一团和气。谁也不会大嚷大叫，也从不讲那些下流话。除了彼埃特、凯茜和我，其他人全都有一份工作干。不过，大家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在家无温暖，工作也不顺心。有些时候那班酒鬼也跑到我们这里来撒酒疯。这时，团伙里的男孩也敢于毫不客气地把他们臭打一顿。他们干了一天活，总想消遣散心：吸吸毒，听听音乐……这就是我们的乐趣。我们可以把一天的烦恼忘得干干净净。

我的感受还和其他人不一样，也许是由于我的年纪还小。但是他们就是我的榜样。我尽力模仿他们，学习他们无忧无虑地打发日子。无论如何，如今不管是父母还是老师，对我已经毫无影响。唯一能使我感兴趣的，除了我的狗和猫之外，就是团伙。

我之所以会走到这个地步，也是由于在家庭中的生活已经变得无法忍受。最糟糕的是，妈妈的男朋友克劳斯特别讨厌动物。至少这是我当时的看法。起初，他只是没完没了地找茬儿，说什么公寓房子太小，根本养不了这些畜生。后来他竟禁止我的狗进入客厅。这只狗是父亲送给我的。

这一下我可火了。我们养的狗一直就是被看作家里的成员。而现在这个家伙却想把我的狗从客厅里赶出去！这还不算，他还禁止我让狗在我的床边睡觉。他想要我一可不是说着玩的——在我的卧室里给狗搭个笼子。可我的房间本来就小得可怜。我当然不会听他的话。

后来他又得寸进尺，扬言家里不养牲口。妈妈站在他一边，说什么我现在根本不照顾猫、狗，这还不是为了讨好他！当然，由于我经常晚上回家较晚，他们也只好亲自把狗带到外面拉屎，除此之外，我的业余时间全都是用来照顾这些小动物。

我连哭带闹也都枉然，我那只狗终于被他们拿去送人。我的狗很娇气，万一适应不了新环境而死去，那将是克劳斯和妈妈的过错。我再也不要理睬他们这种人。

所有这些事发生在我开始入“俱乐部”和抽白面儿的时候。幸亏我那两只猫仍被留了下来。夜里，它们就睡在我的床上。可白天，它们就不需要跟着我，既然我的狗已被送人，我也就没有任何呆在家里的必要。我每天都迫切地盼望四点钟的到来，因为这是“俱乐部”开门的时间。有些时候，我在午后就去找凯茜和其他的哥们。

我每天晚上都抽白面儿。在团伙里，谁手头有毒品，一定会让别人共同享受。辅导员时不时为我们上品德课。其实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也承认吸过

毒。这些辅导员都来自大学，是学生运动的成员。在大学里，抽白面儿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们只是劝我们不要抽得太凶，不要把它当作一种逃避现实的手段，尤其是不要使用那些药性过强的毒品。

我们觉得他们的劝告不痛不痒。他们真是多管闲事。这与他们有什么相干？他们自己不也抽白面儿吗？

我觉得只抽白面儿已经得不到满足。每天手头弄不到兴奋剂的时候，我就喝葡萄酒或啤酒，我整天都觉得需要一些刺激，以便消除学校和家庭给我带来的烦恼。我的毒瘾迅速增大了。

我的身体也起了很大变化。我变得十分瘦弱，因为我几乎饭菜不沾。所有的裤子穿起来都显得又肥又大。我的两腮也凹陷下去。我常常照着镜子端详自己。我这新模样倒使我感到非常得意。我越来越像团伙里的其他人。我那副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孩提脸孔已经全部消失了。

我整天沉醉于自己的体态。我强求妈妈给我买一些贴腿的裤子和高跟鞋。我把头发从中间分成两半，让脸被垂下来的头发掩盖住，因为我想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好让别人无法看透我的庐山真面目。

一天晚上，在“俱乐部”里，彼埃特问我是否已经做过迷幻的旅行。我回答他：“我的老兄，我当然做过。”我早就听说迷幻药这种玩艺，以及吸了迷幻药以后会做的“旅行”。

彼埃特笑了一笑。可以看得出来，他根本不会相信我的话。我瞎编了一个我的“旅行”的经过。但是彼埃特仍然不相信我。要想骗他可不容易。我真感到羞愧万分。

他对我说：“如果你想试一试的话，我星期六就可以弄到一些，到时候我可以分给你一点。”

我焦急地等着周末的到来。当我吃了迷幻药以后，我就会完全和其他人一个样了。当我来到“俱乐部”的时候，凯茜已经开始做她的“旅行”。彼埃特对我说：“假如你真的下定决心我的话，我现在就分给你一半。头一回吃下去这么多就够了。”他递给我一粒用卷烟纸包着的东西。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颗药片，我不想当着大伙的面把这颗药片吞下去，因为我实在太激动了。再说，我害怕在犯罪的时候被人抓住。最后，我终于跑到厕所里，关起门来把那药片吞了下去。

当我从厕所回来的时候，彼埃特一口咬定我把药片扔到马桶里。我焦急地等待奇迹的出现，好让大家相信我真的把药片吞下去了。

可是到十点钟，“俱乐部”关门的时候，我仍然任何感觉都没有。我陪彼埃特坐地铁。

在那里我们碰见了他的两个同学弗朗克和保罗。他们很安静地呆在那里，真叫人觉得可爱。

彼埃特告诉我：“他们刚打完海洛因的针。”当时我并没有留意听他的话，因为药片开始发作了，我已自顾不暇。

一坐上地铁，我就感到昏迷不振，没有精神。我完全变得痴呆了。我仿佛觉得自己被装进一个罐头盒里，有人用一把大勺子在里面捅来捅去。地铁列车的声音震耳欲聋，令人无法忍受。乘客的面孔显得疲惫不堪，可能都是刚下班的工人。这些人整天就是地铁——上班——睡觉。我心想：“你可真算幸运！”我看着彼埃特。他的脸孔显得比平常更小、更难看。

只是神态还是正常的。

到站了。一走出地铁，我就觉得格外高兴。街上五颜六色的灯光显得格外好看。刚才地铁里我觉得冷，可这回却觉得热起来了。我觉得好像来到西班牙，而不是在柏林。街道变成了沙滩，树木也变成了棕榈树，就像旅行社的漂亮广告一样。我没有对彼埃特说起我此时正在飘泊之中，我想独自一人做第一次神奇的迷幻旅行。

彼埃特也是飘飘然的。他建议一起到他的一位女朋友家里。那是一位他非常喜欢的姑娘。她的父母可能不在家。我们先到大楼地下停车场去看看她父母的汽车是否停在那里。停车场的天花板很低矮，那些水泥柱子仿佛被压弯了似的。

她父母的汽车就停在那里。

彼埃特大声地嚷了一声：“多臭的停车场！”突然间，他转过身问我：“你说，你刚才是不是把药扔啦？”他盯着我，然后马上说：“小丫头，我刚才什么也没说。瞧你的瞳孔放得多大！”

外面的世界又变得十分美丽。我坐在草地上，看着附近一幢红墙的房子，它看上去像是初升的太阳的反光。黑影在跳动着，似乎想消失在灯光的前面。那道红色的墙好像凹陷下去，并且突然间化成火焰。

我们一起到彼埃特家里去。他有惊人的绘画天才。我很欣赏他的画作，并且和他讨论起来。走的时候，彼埃特借给我几张唱片，并对我说：“这些唱片对于帮助你恢复正常有特殊的功效。”

我回到了家。妈妈当然一直在等着我，又是一阵习惯的罗嗦：你到底上哪去啦？……可不能老这么下去，等等。看等等。看她穿着那件又肥又大的白睡袍我觉得可笑。她由于生气而满脸怒容，就像地铁里那班乘客一样。

我一直闭着口不言语，因为我再也不想跟她说话，除非迫不得已说几句无关紧要的废话。我再也不愿她碰我，也不愿意她吻我。有时候我自己想。我再也不需要母亲和家庭。

我们现在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一边是妈妈和她的男朋友，一边是我自己。他们丝毫不知道我在于什么。他们还以为我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姑娘，一个正在发育的姑娘。可我又能够对他们说什么呢？

无论如何，他们是不会理解我的。他们只晓得给我下一道道禁令。反正这就是我对他们的看法。我一见到她下班回来带着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马上忙于家务，就觉得可怜。可我心里又想，大人过着这种愚蠢的生活是他们自己的过错。

母亲的诉说

我经常问自己，怎么没有能早一点看到克利斯蒂娜身上发生的变化呢？答案是简单的，但只是在和很多家长交谈之后我才能忍受它；我不愿意看到我的女儿是个吸毒者。就是这么简单！只要能够，我就遮住自己的眼睛。

我的男朋友——那个从我离婚之后就和我同居的男人——早就有所怀疑。可是我对他说：“你这是在瞎想，她还是孩子呢！”这大概就是最严重的失误：总是想象着我们的孩子“还不到这步田地”。其实，自从克利斯蒂

娜变得孤僻，自从我发现她越来越避免和我们接触，在家里呆不住，而是与朋友们外出过周末，我就该开始给自己提问题了。至少，我该想想她为什么会这样。我把很多事都看轻了。

很可能，当人们要上班工作，便不能有足够的精力照料孩子，总是盼着清静，看见孩子走自己的路，心底便相当满意了。当然，克丽斯蒂娜有几次回家晚了，但她总有合理的托辞，我也只好相信。就像她越来越不听话，让我觉得是年龄关系一样。所以我想：这会很快过去的。

我不愿意限制克丽斯蒂娜，因为我早已受够了这种限制。我曾有过一个十分严厉的父亲，在我长大的海斯村里，他是一个显要人物，是一所采石场的场主。他对我们的惟一教育就是禁止。例如我不幸地提到男孩子——仅仅是提到——就会挨上两记耳光。

我永不会忘记那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和一个女伴在散步，两个年轻人在离我们 100 多米远的后面跟着我们。而正在此刻，纯属偶然，我的父亲从这里经过。他猛地停下，从车里跳了出来，在大街上就抽了我两个嘴巴，把我塞进汽车，带回家中。而这一切不过是因为有两个男孩子在我们后面走路！这使我愤慨。当时我 16 岁，我惟一的念头就是：如何溜走。

我的母亲，一个心地慈善的妇人，但她可没有发言权。家里甚至不允许我自己选择我的职业。我梦想成为一个助产士，而我的父亲却强迫我学商业，为的是我能给他管理账目。就是在这时候我遇到了理查德，我后来的丈夫。他比我大 1 岁多一些，正在接受农业培训。他注定要管理地产，而这也是为顺从我的父亲。起初，我们不过是伙伴。但我的父亲当然要阻止我和他会面，而他越是竭力阻止，我越是顽固。事到最后，我只有用惟一的办法来赢得我的自由：怀孕——不得不出嫁。

此事发生在我 18 岁的时候。理查德马上中断了他的学业。我们离开本地，到北方去，在他父母居住的村庄安了家。我们的婚姻是个彻底的失败。从一开始，我就没能够依靠他。

甚至在我怀孕的时候，他都整夜整夜地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他只想他的小汽车和他那宏伟的计划。好像什么工作都不配他干。他无论如何要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总是在唠叨，在战前，他家有有钱有势：他的祖父母曾拥有一家报社、一间珠宝店。一家肉店和大片的领地。

他顽固地想拥有属于自己的企业。一会儿他想做成一笔运输交易，一会儿又想去销售汽车；还想和他的一个朋友合伙，成立一家园艺——苗圃承包店。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合同的初期阶段。所以，在家里，他就拿孩子出气。我的劝解毫无作用，拳头还是雨点般地落在孩子们身上。

过日子所需要的钱大部分是我挣来的。那还是克丽斯蒂娜快 4 岁的时候，我在一家婚姻事务所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有时候，我不得不在周末加班——因为有些合同要签定——这时理查德就帮我的忙。两年之间，一切还算好。后来，理查德跟我的老板吵翻了，我丢了差事。理查德决心自己开一间婚姻介绍所——一项辉煌的计划，地点在柏林。

我们是在 1968 年迁居的。我盼着这次环境的变化能成为我们这对夫妇的新起点。但是，等待我们的不是预想的漂亮的住房，华丽的办公室，而是克罗比小区两间半房子，而且地处近郊区。理查德没能凑足开业所需要的资本。以往的生活又从头开始，他把他的怒气都发泄在我和孩子们的身上。有一回，那是在偶尔走运的时候，他在贸易界干了一段时间。但是从内心深处，

他不能像克罗比小区其他的居民那样，心甘情愿地当一名小人物。

我常常想到离婚，但我没有勇气干到底。爸爸留在我身上的不多的自信心已经让我的丈夫摧毁了。

幸运的是，我很快在柏林找到了工作，当一名办公室职员，每月薪金整整 1000 马克。

受人尊重，能重新干点什么的感受给了我某种力量，我不再事事依靠我的丈夫了。我开始发现，他的妄自尊大相当可笑，我们之间的争吵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了。好几次，我们试着分手，但都没成功。我还恋着他——可能因为他是我的第一个男人，当然也因为孩子们。我没有为小家伙们在托儿所找到位置，再说，我也付不起托儿费。所以，我得知理查德不时地留在家也还挺高兴，因此，我总想改变我的决心。终于，到了 1973 年，我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挽回我的过失了，我去找律师，并提出了离婚。

我希望克丽斯蒂娜将来不会走我的老路，过着我过去的那种生活。从她一落生，我就发过誓：绝不能让她像我那样，为了脱离家庭去嫁给自己所遇到的第一个男人。我要当个模范母亲。而后来，可能正是这些想法使我显得无能为力。

离婚一经提出，头一件事就是我得找一间新的公寓，因为理查德拒绝搬走。我找到了一间，月租金 600 马克（车库在内。但我没有汽车，车库又有什么用呢？）。对我来说，这太昂贵了，但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总之，我想离开丈夫。不论花多大代价，要让我 and 孩子们开始新的生活。

理查德没钱支付抚养费。我只有一件事可做：自己去想办法。我常说“只要需要，我就去加班加点工作。无论如何，一定要让孩子们过上体面的生活。”这时两个姑娘，一个 10 岁，一个 11 岁，而在她们的整个童年，她们只见过一间用少得不能再少的家具——而且还都是旧货——布置的住房。我们甚至没有一套像样的沙发，不能为孩子们提供一个舒适的家庭环境使我打心眼里难受。

现在，我离婚了，我要改变这一切。总之，我要有一所住我们三人都感到舒适的精心布置的住宅。我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为了能够不时地给孩子们买点礼物，买几件漂亮的衣服，还为了在周末出去走走的时候不必大多记挂着开销多少而工作。

我拼命地。狂热地追求着这个目标。孩子们有了一间房子，里面彩色的糊墙纸和家具都是她们按自己的口味选择的。1975 年，我还给克丽斯蒂娜弄了一套带音响设备的电唱机。

这一切都使我喜气洋洋——我终于能够让孩子们舒适一点了，我感到十分幸福。

我经常在下午从办公室回来的时候给她们带一件小礼物回家，都是些小玩艺。我很高兴能在一些大商店里给她们买点东西……那往往是推销品，一个滑稽样子的铅笔刀啊，新奇的小玩具啊，甜食啊，她们跳起来搂住我的脖子。这让我觉得总是在过圣诞节。

当然，今天我知道，这是为了使自己心安理得的一种方式，因为我照管她们太少了，这只是一种补偿而已。我真不该那么看重金钱，与其那么工作，不如多照料一些自己的孩子。

今天，我还是不很理解我的态度：我为什么要丢下孩子不管呢？礼物不能代替其它的东西。

既然孩子们需要我，我本可以靠社会津贴过日子的。但是这样使我觉得不光彩：我的父母早就告诉过我不能这样做，不能靠国家来养活自己。也许我应该要求我的前夫支付抚育金，我不知道。总而言之，为了寻求内心的虚荣，我自寻苦头，却看不到真正的先于一切的东西。

我白白地在这方面找原因。思前虑后，我总是这样地责备自己：我过分地让孩子们自顾自了。而克利斯蒂娜肯定更需要引导和支持。她比她的妹妹更不安稳，更敏感。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她有着向邪路滑过去的危险，虽然我对我们周围，对小区里发生的事看得很清楚。每天都有争吵、酗酒，在小溪里发现一个醉得要死的男人。妇女，甚至未成年人不算什么稀罕事。但是我没想，假如给他们一个好楷模，假如不让他们由着性子干，孩子们就会有榜样可学——那么一切都会平安大吉了。

我真的觉得我们的道路是不错的。早晨，姑娘们去上学，中午她们自己准备午饭，下午，她们常到动物俱乐部去，两个女儿都喜爱动物。

实际上，在一段时间里，一切都挺好，除了有的时候孩子们和克劳斯——他是我的男友，和我们在一起生活——之间因为妒嫉发生点不愉快。我愿意在工作。家务和孩子之外留点时间给他。可以这么说，他是我寻求平静的避风港，也是在这里，我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了更多地委身于他，我把克利斯蒂娜的妹妹送到她父亲那里去了。理查德感到孤独，就用应允她一大堆东西的办法来吸引她。

克利斯蒂娜只好只身一人上学去了。她开始结交一些坏朋友，可我一点也没有发觉。她和她的女友凯茜一起度过下午。从她的年纪来说，凯茜算是一个明白事理的女孩子，她的妈妈还不时地照料一下这两个姑娘。我们是邻居，有时克利斯蒂娜到她家去、有时候凯茜到我家来。

她们都是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正是开始对什么都好奇。什么都想试一试的年纪。所以，晚上她们到“俱乐部”去，那是一个基督教堂资助的青年中心，我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可指责的事情。我以为，在那些人中间，克利斯蒂娜只会受到好的影响，甚至在我做着最坏的噩梦时，我都没有想象到他们在那里吸大麻。

相反地，当我看到在妹妹走后变得郁郁寡欢的克利斯蒂娜又变得活泼时，就更放心。自从她交了凯茜这个朋友，她又开始有笑容了。有时她们起劲地说些蠢话，我也忍不住笑了。

我怎么能够料到，她们的快乐、她们的疯笑都是大麻或其它什么毒品在作怪呢？

克利斯蒂娜自述

团伙就是我的家。我在那里可以得到友谊、温暖和某种类似爱情的东西。且不说别的，光就大伙见面时那轻轻的一吻，我就觉得热乎乎的十分亲切。我们彼此相亲相爱，爸爸从来就没有像他们那样亲过我。在团伙里，什么烦恼事也没有，我们也从不在那里诉说自己的烦恼事。谁也不会把家里或工作上不顺心的事搬到这里来叫别人分忧。只要我们在一起，外面人世间的种种烦恼事就不存在，我们谈论音乐，谈论各种兴奋剂和时装服饰，有时也

议论那些敢于用各种不同方式向这个警察社会端一脚的勇士。我们觉得不管是谁偷了汽车、或是抢劫了银行，都是英雄好汉。

自从我做了第一次“迷幻旅行”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和团伙里其他人一样，我的感觉非常正常，我的运气真不错，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头一次“旅行”是很难受的，往往令人感到恐慌，可我却感到很得意，就像成功地通过一门功课的考试似的。所以现在，每当有人建议我吃一片迷幻药时，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接受。

我与人和物之间有了一种崭新的关系，我又重新发现了自然，以前，由于我常常带着狗出去散步，我和自然保持着接触。而现在，每当我出去散步之前，我总要抽几口大麻，这时，我眼睛里的大自然五彩缤纷，完全和过去不一样。好几个月来，我真感到洋洋得意。

在学校里，我的功课越来越糟糕。我把作业全都扔在一边。每天早上我总是醒不过来，可我仍能跟着升班。我对某些功课多少也花点功夫，诸如文学课或国民教育课，因为上这两门课有时能碰上一些使我感兴趣的问题。

我和老师和同学的关系也越来越糟。我觉得学校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冷淡。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课堂上和老师吵起来，因为他在班上大谈特谈什么“环境保护”问题。同学们对这类题目毫不感兴趣，因为他回避了更重要的问题。因此，我大声地嚷起来：“什么叫环境保护？首先应该教人们学会彼此和睦相处，互相关心，这才是最要紧的。因为现在谁也瞧不起谁，互相争斗，还不是为了得到一个好成绩？老师更该了解这些情况，评价学生要公平合理……”等等。本来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位老师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觉得有必要和他吵一架。

我对这个学校真讨厌透了。我们和老师之间没有任何接触，没有任何个人的交往。同学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大家奋斗的目标无外就是为了压倒其他同学。谁也不会帮谁的忙，因为每个人都想争当第一名。老师也可以任意压倒学生，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分数都是由他们打出来的。反过来，要是碰上一个老实的教师，学生都会群起而攻之，显示他们的威力。当我嘲笑老师的时候，同学们就会感到很得意，可是当我认真提问的时候，他们都认为我假正经。所以我觉得学校的确是个讨厌的地方。

其实我现在对学校里的事无所谓，对我来说，得到团伙的承认是要紧的事。因为在团伙里没有这些勾心斗角的事。不过，在团伙里，我也慢慢觉得没意思起来，因为整天无非是听音乐、抽大麻。议论各种毒品的行市。我的话越来越少，越来越想单独一个人呆在自己的屋子里。

然而，我有一个新的目标，那就是挤进“音响舞厅”。整个城市里都贴满这个舞厅的广告：“音响舞厅是欧洲最现代化的舞厅。”团伙里的人经常上“音响舞厅”去，可惜那里只接待16岁以上的青年人，而我这时候才只有13岁。虽然我涂改了学生证上的岁数，可我仍担心人家不会让我进去。

我知道“音响舞厅”里有贩毒市场，在那里什么都能买得着，从大麻到海洛因还有各式各样的兴奋剂，无所不有。在我的心目中，“音响舞厅”里一定会有许多热情的小伙子，对我这个整天只知道从家门到校门的小姑娘来说，那里一定是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方，灯火辉煌，音乐悦耳，当然还会有热情的小伙子。我好几次都打算和其他朋友到“音响舞厅”去，但总没有成功。这一次，我和凯茜策划了一个精密的行动计划：星期六，我告诉妈妈，说我晚上到凯茜家里过夜，凯茜对她妈妈说到我家来过夜。就这样，我们的

妈妈都上当了。凯茜的一位名叫佩姬的女友要和我们一道去。佩姬比我稍大一点。我和凯茜一道上佩姬家里等着她的男友米萨。凯茜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米萨是个注射海洛因的吸毒者。我真想认识认识他，因为他将是第一个我了解底细的秘密吸毒者。

米萨来了。他果真是个很动人的小伙子。我觉得他比团伙里的那些小伙子更可爱。在他面前，我突然产生出一种自卑感。

几个月之后，米萨死去了。

我们乘地铁一直坐到选帝侯街。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一次长途的旅行了。我觉得离家很远，很远。这个地方显得破烂不堪，那里有许多溜马路的姑娘，当然，我并不会想到她们是在那里卖淫的。人行道上还有几个小伙子走来走去。佩姬说他们都是一些毒品贩子。当时要是有个说我有朝一日也会跑到这个可怕的地方卖身，那我一定会把他当做疯子。

我们来到“音响舞厅”。当我一走进里面的时候，我真感到大吃一惊，因为我所见到的和我想象的截然不同。这座所谓“欧洲最现代化”的迪斯科舞厅原来是一个地下室，天花板十分低矮，又脏又闹，许多人挤在舞池里扭摆，各跳各的，电风扇时不时地吹来一股臭味。

我坐在一张长椅上，连动都不敢动。我觉得大家都在看着我，看我坐在那里无所事事。

凯茜马上混入人群中去寻找标准的小伙子，而我却坐在那里发愣。别人都在吃一些我不知道是什么玩艺的药片，并且喝着啤酒，我真觉得没有意思，我这一夜就喝着那两杯果汁。如果照我的意思，我早就回家去了。可我不能回去，因为我已经跟妈妈说过了我这个晚上到凯茜家里睡觉，有一阵子我真想妈妈能够发现我的秘密，马上来找我回家去，想着想着，我终于睡着了。

别人把我叫醒。这时是清晨5点钟。凯茜说她要 and 佩姬回家去。我肚子疼得很厉害，可谁也不来管我。就这样，我独自一人，在清晨5点钟的时候，从选帝侯街走到地铁站。地铁里尽是醉汉，叫人一看就感到恶心。

好久以来我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地打开自己家的门，看到妈妈从卧室里走出来。我对她说凯茜今天起得特别早，我只好跑回家来睡个懒觉。我把我的那两只猫抱到床上，钻进被窝睡觉了。快睡着的时候，我心里想：“克利斯蒂娜，你不是干这个的，你走错了路。”

中午时我醒过来，觉得浑身不舒服。我真想找个人诉说我的遭遇，可我知道，团伙里是没有人会理解我的，我只能找妈妈说去。

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我说：“妈妈，你听着，昨天晚上我和凯茜到了‘音响舞厅’。”妈妈一听感到十分吃惊。我赶紧对她说：“其实那个地方很不错，是一个很大的夜总会，里面还有一座电影院呢。”

妈妈立刻像往常一样骂我一通，我正等着她盘问，可妈妈却不吭声了。这正是星期天的下午，她又是忙得不可开交：料理家务、下厨做饭，还有对克劳斯的厌烦。因此，她无暇对我大发雷霆或喋喋不休。也许，她根本就不想知道我的心事。

我也没有勇气说话。再说，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有讲话的必要，我对什么都没有主见，我全凭意气打发日子，我对明天从来就没什么打算，没有什么雄心壮志，我能有什么雄心壮志？我们从不谈论前途问题。

下一个周末，按我们和母亲所商定好的，凯茜到我家来过夜。我把她

带到家里。她完全沉醉于毒品的迷幻之中。我也吃了一些药片，不过我的眼睛还能看清眼前坑坑洼洼的路。刚才凯茜傻呆地站在马路中间，要不是我把她拉到人行道上，说不定她会被迎面开来的汽车压得粉身碎骨。

我把她推进我的卧室里，妈妈立刻跑过来。我和凯茜都已产生了幻觉：我看到的妈妈太胖了，她被门框夹住了，进不了我的房间。我们哈哈大笑，笑个不停，我看见妈妈变成一条龙——一条温顺的龙，头发上还饰着一块骨头。我们俩笑得直不起腰，妈妈也和我们一道快乐地笑起来。她心里准想着：“看这两个疯丫头！”

从此以后，凯茜几乎每个星期六晚上都带我到“音响舞厅”去。起初，我只不过是陪陪她而已，要不我真不知道如何打发周末的夜晚。慢慢地，我习惯了俱乐部里的一切。我跟妈妈说，我们上舞厅去，她答应了，只不过要求我一定乘最后一班地铁回家。

直到1975年夏天，一切都很顺利。有一次周末，我们决定在舞厅过夜。和往常一样，我们各自对母亲说到对方家里过夜。因为我们两家都没有电话，所以母亲无法监视我们的行踪，因而这一招一直很灵。我们先到“团伙之家”，在那里，我们先把两瓶葡萄酒喝光，然后再吞一些迷幻药，凯茜还另外吞下了一颗“埃非特灵”。过一会儿，她哭起来了。我明白其中的奥妙，因为“埃非特灵”这种药有时会使你产生一种反悔的痛苦心理。

当我突然发现凯茜不见了的时候，我感到害怕。我马上想到她会去的地方，所以立刻乘地铁找她去。她果真在那里，躺在一条长椅子上睡着了。在她身边的地上，有一袋炸土豆片。就在我把她叫醒之前，一列地铁进站了，凯茜的妈妈从车厢里走出来。她在一家蒸气浴室里工作，总是在晚上十点钟左右下班。当她发现她的女儿在站台上睡觉时，感到十分惊奇。因为她还以为女儿是上我家过夜的。她走上前去，狠狠地打了女儿左右两个耳光。这耳光打得可真响，凯茜醒过来，吐了满地。她妈妈拉着她的胳膊——就像警察抓人一样——把她带走了。

也许地铁站台上这两记耳光使她免遭了许多的麻烦，否则凯茜一定会沦为“拉客的丫头”。

从那以后，凯茜被禁止再来找我，每天晚上被锁在家里。有一段时间，我真感到孤独，现在团伙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多大的乐趣。虽然我们继续到“团伙之家”聚会，可是星期六晚上，我一定要上“音响舞厅”去。我觉得那个地方更有意思，那里的人也比团伙里的好，都是我崇拜的对象。只不过我现在常常身无分文，因为过去凯茜每个月能拿到100马克的零花钱，这点钱足够我们俩购买大麻和药片。可是从那以后，我只好自己找钱花，所谓找钱也就是偷钱。

再也没人陪我上“音响舞厅”，我只好独自一人去。我也不想凯茜，什么都不想，我在这个五花八门的世界中漂泊。

在地铁的车厢里，我还喜欢注意观察那些上“音响舞厅”的人的打扮。这些人一眼就可以识别出来：他们总是打扮得十分讲究，留着长长的头发，脚上穿着有10公分高的高跟鞋子。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的明星，是“音响舞厅”的明星！我再也不害怕独自一人上那个地方去了。

在“音响舞厅”的楼梯上，我碰上了一个小伙子。他盯着我，悄悄地和我说了几句话。

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棒。他个子很高，身躯修长，留着一头长长的金

发，看样子是个十分文静的男孩。我们一直站在楼梯上交谈，我真感到高兴。我们越谈越投机，我们喜欢同样的音乐，就连我们吃完迷幻药所作的“旅行”也都一样，他叫阿特兹。他是第一个使我动情的小伙子。对我来说，真是一见钟情，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爱上了一个男孩。

阿特兹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这是一帮很热情的小伙子，我立刻感到如鱼得水，十分惬意。我们一起谈论各种毒品，谈论“作旅行”的最好方法。我现在知道的东西也和他们一样多。他们还谈论海洛因。大家都知道这种东西不能开玩笑，谁要是染上了它，还不如朝自己头上开一枪。我说：“只有那些毫无志气的人才会去打这种针。”然后，大家又谈起时装来：如何把牛仔裤改得更窄。这方面我也略懂一点，因为我瘦得很快，所以几乎每个星期都得把裤子改瘦一点。穿贴腿牛仔裤实际上已经成了“音响舞厅”成员的标志。我可以教他们如何把裤子改瘦，这也是我惟一会做的针线活。

用不着我苦苦哀求，这伙人马上就接纳我加入他们的行列。我也觉得问心无愧，充满信心，我突然发现这伙人当中还有一个小伙子特别热情。他叫戴特莱夫。他和阿特兹不同，显得格外温柔。文静，他那张俊俏的脸蛋还带着几分孩子的稚气。在团伙里，大家都叫他“小瓷人”，他16岁。跟他说话我觉得特别自由自在；还有一个特别滑稽的姑娘，她的名字叫阿斯特丽，很受大家的赏识。她一开口就会叫你笑掉了牙。我真欣赏她的本事，这伙人当中只有一个家伙不怎么样，就是那个布拉基。这人有时真损人，甚至敢在你面前作出下流的小动作，所以跟这样的人说话要特别留意。还有另外一个男孩我也不怎么喜欢，因为他特别喜欢尾随女人。自从我和查理的那次交往以后，我特别瞧不起这种男孩子。

就这样，我们常常一起聊天过夜，有时也出去抽一口大麻。当舞厅关门以后，我们就到选帝侯街溜溜。而每当我乘上地铁回家的时候，我总觉得心里乐滋滋的，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感受到爱情的温暖。

我现在总盼着周末的到来。

阿特兹很温情，很会体贴人。在我们第三次在“音响舞厅”见面的时候，他吻了我一下，我也回送他一吻，这是一个纯洁的吻。我不愿意走得更远。阿特兹感觉到了我的意思，当然他不会当面说出来。

我和阿特兹如同兄妹一般亲热。他是我的大哥。我们总是手拉手地走路。这样我就觉得是受到一种保护似的。阿特兹今年16岁，是一名装配窗玻璃的学徒工。他特别讨厌这种工作。为了使她高兴，我改变了发型，还从旧货商那里买了一件大衣。如果没有阿特兹，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打发日子。

现在，早晨5点钟舞厅关门之后我也不回家了。我和伙伴们大清早就去溜大街，然后去参观博物馆或动物园。有时候，我们整个星期天都呆在一起。我曾经把凯茜的遭遇告诉过妈妈，不过，我又编造了一些新的女朋友，好骗妈妈说我是到女友家去过夜。我的想象力十分丰富，我可以随时给妈妈编出一串一串的话来，向她交待我的周末是怎么度过的。

我和老团伙里的人渐渐疏远了。虽然我有时候也上他们那里去，向他们讲述我在“音响舞厅”的种种奇遇。他们都对我露出羡慕的目光。显然，我已经比他们走得更远了，可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更没有想到会有许多老伙伴步我的后尘。

在“音响舞厅”里，除了海洛因以外，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毒品。我抽大麻也抽得越来越凶，还常常吃迷幻药和兴奋剂，我完全沉浸在一种无忧

无虑的幸福之中。

直到一个星期六晚上，当我到达“音响舞厅”的时候，我碰上了团伙里一个名叫于维的男孩。他对我说：“你知道吗？阿特兹已经辞掉他的工作，他现在每天都到这里来。”我觉得于维说话的声音有点异常。我一听马上明白，肯定他又跟上别的姑娘了。

我问：“到底怎么回事？”

于维回答说：“他有一个名叫莫妮的姑娘。”

这是多么沉重的打击！我惟一的希望就是：这不是真的。我走进舞厅，看见阿特兹一个人呆在那里。没有什么和往常不一样，他仍旧亲吻我，然后把我的衣物锁到他的柜橱里。在“音响舞厅”，大家都把东西锁在小格柜橱里，否则就会被人偷走。

过一会儿，那个叫莫妮的姑娘也来了。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她。她很自然地和我们坐在一起，因为她也是团伙里的一员。我故意坐在离她稍远一点的地方，以便暗中观察她的行动。

她和我完全不同，矮小的个子，胖乎乎的，总是挂着笑。她和阿特兹显得格外亲热。我心里不断地重复：“这不是真的，这不可能，他怎么会把我抛弃而爱上这么一个傻丫头？”可我也不得不承认，莫妮有一张十分漂亮的脸蛋，还有一头美丽的金黄色头发。我心里想：“也许他需要这么一个既温存又热情的姑娘。”后来我又产生另外一种猜测：“阿特兹喜欢那种愿意跟他睡觉的姑娘，莫妮一定是这类货色。”

我的脑子完全清醒。再说，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服什么麻醉药品。当我再也无法忍受看到他们呆在一起的时候，我跑到舞池里自我发泄了一通。当我回来的时候，他们不见了。我像一个疯子似地到处奔跑，寻找他们。最后终于发现他们呆在电影院里，紧紧地抱在一起。

我立刻跑回来找其他的伙伴。有个男孩马上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就是戴特莱夫。他把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不想哭，因为我总觉得当着伙伴的面哭鼻子是丢脸的事。为什么“丢脸”？我也不知道。可是，当我觉得实在无法忍受住眼泪的时候，我马上穿过马路，跑到舞厅对面的公园里躲起来。我伤心地哭成一个泪人。”

突然间，戴特莱夫来到我的身旁，他递给我一张擦口纸，接着又递给一张。刚才我已经自顾不暇，所以没有发现他来到我的身边。过了好一阵子之后，我才想到他专门出来找我是多么的好心。

我再也不想见阿特兹。只要见到他我就感到难受，正是他害得我现在当着众人的面掉眼泪。戴特莱夫又把我带回“音响舞厅”里去。

无论如何，我还得回去一趟，因为我的衣物还锁在阿特兹的小柜里，钥匙还在他手里。

我只好硬着头皮跑进电影院去跟他要钥匙。东西取出来之后，我再也没有力气把钥匙送回去。幸好戴特莱夫帮了我的忙。

这时候已经是清晨两点钟，我误了最后一班地铁。我站在舞厅门口发呆，不晓得该上哪去。此时此刻，我多么想吃点药片，可我身上连一粒都没有，就在这个时候，原来团伙中的一个名叫庞代尔的小伙子走过来，我知道他是一个毒贩子，身上一定带有好药。我向他要了一份迷幻药。他感到十分奇怪，为什么在这种时候我会如此迫切地吃这种药，他很痛快给了一份质量上等的迷幻药，我一口把它们吞下去，然后下到舞池里跳舞。我像疯子似地

跳了至少一个小时。我忽然遇上彼埃特，我向他诉说我刚才跟阿特兹吃醋的经过。可是彼埃特无动于衷，因为他也刚吃过迷幻药。他只是冷淡地对我说：“姑娘，忘掉它吧！”“别为这种事难过。”等一类的话。

我吃了一小块香草糖，自己不断地嘀咕着：“我总是孤孤单单一个人。生活真叫人讨厌。”我只好再下去跳舞，一直跳到舞厅关门的时候。

在门口，我又碰见阿特兹和莫妮，还有团伙里的好几个伙伴。我觉得无所谓了。

阿特兹把莫妮带到他家去，我和其他伙伴则到动物园附近的溜冰场溜冰。因为下过雨，冰上积了许多水，在上面滑冰就像在海上行走一样。突然间我听到一声敲破玻璃的声音。男孩子把收款台的玻璃亭子砸破了，有个小伙子从破口爬进去，打开抽屉，然后把一捆捆硬币向我们扔过来。还没等我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家便撒腿跑起来。因为我穿着高跟鞋，刚一跑就摔了一跤，弄得浑身都湿透了。幸好戴特莱夫等着我，拉着我的手跑了出来。

我们来到克朗兹莱咖啡馆门口，一起瓜分刚才抢来的“战利品”。每个人都有一份，我觉得真有意思。他们分给我两捆5个马克的硬币。大家都乐坏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弄到了不少钱，而且主要是我们竟能成功地逃开滑冰场里那两名已经跟踪我们多时的私人警察的监视。那几串小钱大家都不分，而是把它们打开，然后往空中撒出去。人行道上铺满了一片小币。

我们又回到动物园地铁车站，那里有一家饭馆已经开门营业。这个地方给我的印象很坏。我是头一次来到动物园地铁车站的。真叫人恶心。有许多小伙子躺在痰渍累累的地上，到处都有喝得烂醉的酒鬼。我哪里会想到，事隔数月之后，我竟然也会每天下午来到这个地方和他们鬼混在一起。

快到10点钟的时候，我决定回家去。一躺到床上，我就感到浑身难受，直到中午12点我才醒过来。我全身僵硬，神态不清，就像死了一样。我心里只明白这一点：“你真是一个大笨蛋，好不容易交上的第一个男朋友这么快就把你甩掉了！”我对着镜子照照自己。我讨厌我的模样。昨天我还觉得我的容貌楚楚动人，富有神秘感，是一副妙龄少女的面孔。可今天，我的容颜憔悴无光，眼睛也罩上一圈黑晕。我心里想：“克丽斯蒂娜，舞厅的生活已经结束了。你可别再去找阿特兹和团伙里的人。”从那以后，我尽量克制自己对别人的感情，我再也不吃任何毒品，整天只喝拌着大麻的茶。几天之后，我觉得自己已经恢复常态。除了对我自己之外，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我觉得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感情。我再也不愿意到“音响舞厅”那里去了。

第二个星期六晚上，我有生以来第一个最漫长的黑夜开始了。好久以来，我第一次呆在家里过周末，我既没有心思看电视，也无法安然入睡。这时候我身边也没有足够的药品可以过瘾。我开始感觉到不去“音响舞厅”简直无法生活下去，不见团伙的哥们，我的生活就变得十分空虚。

我焦急地等待着下个周末的到来。我已经盘算好如何回到“音响舞厅”去。我试着改变我的发型，最后终于决定不梳头发，这样一来我的神态就会显得更加神秘。

星期五那天，我吞服了几片镇静剂，在上“音响舞厅”之前，我又吃了一片“曼特拉克”。这样，我再也不怕见到阿特兹和其他的人。我戴着一顶大布帽，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脑袋耷拉着，整夜在那里打盹。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戴特莱夫把我脸上的帽子掀开了，并且抚摸着我的头发。我尽量表现出十分冷淡，可心里却觉得他能如此关心我实在难得。

下一个周末，我们几乎一直形影不离地呆在一起。现在我到“音响舞厅”去又有了一个新的借口：为了和戴特莱夫见面。

这一回我并不像对阿特兹那样一见钟情。起初，我们只是在舞厅里碰上时才呆在一起。

我们谈话谈得特别投机，他的确和阿特兹不一样。我和戴特莱夫完全平等相待，谁也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和他谈话我觉得非常随便，用不着担心对方抓住什么弱点。再说，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是个热心人。不过，他不像阿特兹那么英俊。戴特莱夫显得过于秀气，甚至带着一种孩子的稚气。我对他的感情越来越深。最后我不得不承认我已经爱上了他。

这期间，我变得特别安静。因为我再也不服兴奋剂，而是大多服用镇静剂。我完全丧失了原来的活力，甚至连舞都不想跳了。我在家里对什么事都不吭声，因为我再也不想改变我的家庭生活。

1975年圣诞节的时候，我正好13岁半，我觉得由于我性格的改变，使我和妈妈的关系有所改善。这样一来，我也愿意对她说点心里话。因此，我告诉她，前些日子我根本就没有上凯茜家里过夜，而是上“音响舞厅”去，不出所料，她的反应十分粗暴，并且训了我一通。我对她解释，对我来说，时不时到舞厅去过一夜可以使我回到家更加安静。听话，没有什么坏处。再说，让她了解我的真实生活总比整天让我对她撒谎强。这回她倒同意我的观点。

说实话，我本来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去对妈妈讲述我的生活。不过，整天对她撒谎也不容易，因为要编造那么多的故事让她相信，实在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这也是我被迫“忏悔”的理由之一，因为我已经找不出任何借口可以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上舞厅去而不呆在家里，经过我的解释，妈妈终于同意我在节日晚上出去玩。我赶紧对她说“音响舞厅”是个好地方，对青少年并没有什么风险。再说，每个星期让我出去一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我的心情一好，呆在家里也就安静多了。

然而，在“音响舞厅”里，一切都变了。突然间，海洛因这种最厉害的毒品风靡整个“音响舞厅”。甚至我的团伙里，大家都在谈论着海洛因。其实，大家都反对海洛因，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多少人死于这种毒品的摧残之下，可也无法阻止这些哥们接二连三的尝试。而大多数人在试了一针之后就上瘾了。海洛因破坏了我们的团伙，因为那些沾上海洛因瘾的人立即就离开团伙另找出路了。

海洛因对我也有一种可怕的吸引力，可当我想到我只有13岁时，我就不敢沾边了。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那些打海洛因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要比别人高一等，所以也成了我崇拜的对象。这些人常常用一种鄙夷的眼光看着我，因为在他们眼里，大麻一类的毒品只不过是“儿童毒品”，看来我永远也加入不了他们的行列。“升级”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因为我从心底里讨厌海洛因，它是深渊之底。

团伙的溃散对我来说并不要紧，因为我已经有了戴特莱夫作为贴心人，其他人的远近都无所谓了。我和戴特莱夫的关系越来越好。有个星期天——那是1976年初的时候——我把他带到家里来。因为我知道妈妈和她的朋友不在家。我为戴特莱夫做饭，我为他准备了一顿真正的午饭，我们坐在一起，像一对真正的夫妻似地吃了一顿家庭午餐。我觉得很有意思。

从那以后，我整个星期只想着戴特莱夫，我焦急地等待着星期六的到来，等待着我们在“音响舞厅”里的会面，我很高兴来到舞厅，走之前什么药都没吃。戴特莱夫正和一个六神无主的丫头呆在一起。我在他们的旁边坐下来，可戴特莱夫几乎连看都不看我，他的心思全挂在别的事情上。突然间，我心里这么想：莫非和阿特兹同样的故事又重演了？这不可能。

戴特莱夫怎么会为了这么一个废物丫头而把我扔掉？

他们说话不多，只是交换几句没头没尾的话。我只听出他们是在谈有关海洛因的买卖。

我想，大概戴特莱夫向她要海洛因。我生气地对戴特莱夫说：“我说你疯啦，你才16岁，怎么就能想起打海洛因！”

看来他把我的话完全当成耳旁风。我接着说：“你要吃药片我完全可以提供，哪怕一次吃三粒都可以，就是不能打海洛因的针。我求求你别干这种蠢事。”我苦苦地哀求他，可他仍无动于衷。于是，我气得大声地嚷起来：“如果你打海洛因的话，我们俩的关系就吹了。”

你可以走你的路，我再也不愿意见到你。”说着，我站起来，跳舞去了。

我刚才真做了一件蠢事。我不该演这出电影。我本来应该等到只有我们俩仍呆在一起的时候慢慢地说服他。我完全可以影响他的。我真不该把他孤独地扔在一边，因为他当时已经到了头脑发热、跃跃欲试的地步。

过了两三个小时之后，有人来告诉我，戴特莱夫和他最要好的朋友贝尔恩德打了一针海洛因。

当天夜里，我又见到戴特莱夫，他对着我笑——一种似乎来自很遥远地方的微笑。看样子他很幸福，甚至不觉得有必要和我说话。而我也不想主动去靠近他。对我来说，这一次要比那天夜里我失去阿特兹时还难受。戴特莱夫走了，走向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就这样，由于一支海洛因注射器的缘故，我们之间突然变得毫无共同之处而分道扬镳了。

我继续出入“音响舞厅”。戴特莱夫很快就找到另外一个女友。她的名字叫安琪，是一个又丑陋、又冷酷的姑娘。可以断定，他们的关系是好不了的，我从没见过戴特莱夫和她说话。但是，安琪死死地缠着他。有时候戴特莱夫也来看我，不过，他总是像个陌生人一样，对我一点也不亲热。一般来说，他找我无非是为了向我要几个马克好去买他的海洛因。要是身上有钱，我总是满足他的要求。

星期天的上午实在难熬，我一直溜达到地铁车站，心里想着：“这里的一切实在糟糕透顶。”我再也不知道我已经走到什么地步，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要上“音响舞厅”去，为什么我要吸毒，为什么我还得干别的事情——我糊里糊涂，一点也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有个星期六，因为我身上有不少零用钱，我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毒品，然后一股脑儿全吞下去。

我不知道那天我是怎么回的家。反正我知道从地铁到家门口的路上我摔倒了。我只好扶着路边的树木和路灯杆连爬带滚回到了家。路途显得特别遥远，走不到头。可我得坚持到底，否则非死在路上不可。最难受的是我的胸口疼得要命，就像有人用刀捅我的心脏似的。

第二天早上——星期——妈妈无法把我叫醒，到了晚上她下班的时候，我还是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妈妈好几次强迫我喝几口蜂蜜。一直到了星期二下午，我才有点力气下床。

我对妈妈说，我感冒了，而且血压降低。我倒经常有这种病状。我还向妈妈解释，说班上有好几个女同学都有这种病状，这大概是青春发育期的一种现象。我想尽量避免妈妈请医生来，因为我害怕医生会看出我真正的病因。妈妈对我的话信以为真，所以也就不去找医生来。每当我对她解释我的身体状况时，她总是显得很满意。

因为我手头的药片几乎全吃光了，所以一直到周末我几乎没有吃过什么药，我又觉得浑身难受。

星期六晚上，到了“音响舞厅”之后，我决定做一次“迷幻旅行”。这一次的效果特别可怕。我好像觉得我的血被抽空了，整整难受了好几个小时。我既走不了路，也说不出话。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来到电影厅里，我在那儿的一把椅子上整整坐了五个钟头。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家搬到了克勒兹堡，离“柏林墙”很近。从此以后，我上学必须坐一个钟头的地铁，但是，我的家却离“音响舞厅”更近了。

有天早上，当我去坐地铁时，我突然发现街上贴满了海报，上面写着：“戴维·波维前来柏林献艺”。我真不敢相信！戴维·波维这位大歌星是我们心目中崇拜的偶像。许多小伙子都喜欢模仿他的打扮。而这回他真的到柏林来了。

妈妈从她的单位给我弄来了两张这场音乐会的免费赠票。很奇怪，我马上就想到应该把另一张票送给谁：弗朗克。为什么是他？我自己也不问个为什么。弗朗克是“音响舞厅”团伙里的一位老伙伴，他很崇拜戴维·波维，甚至连头发都染成和他一样的褚红色。也许正是由于这缘故，我才把他选为我的送票对象。

而弗朗克也是我们团伙中第一个染上海洛因毒瘾的人。从前，他胖乎乎的，大家都管他叫“小母鸡”。可现在，他骨瘦如柴，就像一具“游尸”一样，所以大家都叫他“僵尸”。

音乐会的那天晚上，我和弗朗克约好在海曼广场见面。我从没有注意到他是如此又高又瘦。他和团伙里其他小伙子的年龄差不多，也是16岁左右的人，他说他现在体重只剩下63公斤。这是他刚才卖血时才称的重量。弗朗克常常靠卖血挣钱来支付他吸毒的部分费用。

音乐会在“德意志大厅”举行。气氛非常热烈，观众情绪高涨，因为在场的几乎都是戴维·波维的崇拜者。在我们座位旁边，坐着一帮美国士兵。他们嘴里叼着烟斗，抽着大麻。

只要你看他们一眼，他们就会把烟斗让你抽一口。尽管弗朗克拼命地抽，但他仍觉得越来越难受，因为他的烟瘾太大，无法控制。

戴维·波维的演唱开始了。他的歌声和形态太棒了，几乎完全跟我想象中的一样。不过，当他刚唱起《已经太迟了》这首歌的头几句时，我就觉得难过极了，因为这首歌所描写的也正是我眼下的处境。

音乐会结束的时候，弗朗克几乎没有力气站起来。我们遇见戴特莱夫的伙伴贝尔恩德。

他说得想办法给弗朗克弄到一针海洛因。可我们身上的钱不够，于是，我搬出我那讨厌的绝招：“我没有钱买地铁车票，请大家帮帮忙吧！”来参加音乐会的人多数身上都带着不少钱，而且这时候刚刚散场，街上的妓女还来

不及缠上他们。所以我刚开完口，一大批硬币就像雨点似的“叮铃当啷”落在我的塑料口袋里。

这些钱已经足够买两针海洛因——当时这玩艺还比较便宜。

贝尔恩德拿着钱就去找卖主。突然间我起了这么一个念头：“既然这些钱是我搜集来的，我为何不试它一针，体验体验海洛因到底有多大功效。”因为普通毒品对我来说已经无济于事，所以海洛因将是我在吸毒道路上的归宿，看来这是必然的，符合逻辑的。当我说出我的主意时，小伙子们都一致反对我。弗朗克生气地对我说：“你可不能干这个，你不知道这种东西的厉害，你要是沾上这个，那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变成我现在这个可怜的模样。”

既然我已打定主意，我也就听不进他的劝告。相反地，他们越说，我越是想试一试，再说，我只想体验一下而已，往后再也不打还不成吗？

他们没法说服我，只好也分给我一份。贝尔恩德教我怎样注射，其实这是多余的，我早就听说过。我说我不想打针，只想口服。

我把分给我的那份药面儿吃下去了，起初我觉得又苦又辣，我真想立即吐出来，很快我就觉得我的四肢变得很沉。很沉，一会又觉得很轻，很轻。我身上的不舒服一下全消失了。

我从没有感觉到这样的轻松，愉快。

这一天是 1976 年 4 月 m 日，离我 14 周岁的生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到了早上 5 点钟的时候，贝尔恩德建议我们到他家去。我很高兴地挽着弗朗克的胳膊和他一起去了。

我觉得我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充满欢乐的家庭。我感到和这两个男孩在一起可以无拘无束地说话，甚至最秘密的心里话也可以对他们讲。海洛因已经使我们变成亲密无间的兄妹。

我从没有这样幸福过。

我在贝尔恩德的床上和他睡在一起，他并没有碰我。我们是兄妹关系——对海洛因的难兄难妹。弗朗克自己睡在地板上，头靠着沙发。

夜里我觉得浑身发痒，我只好脱光衣服，用梳头发的梳子全身上下地挠，一直挠到出血，尤其是腿肚子那块地方。我知道，凡是打海洛因针的人都会浑身发痒，他们身上都会伤痕累累，特别是腿肚子的地方。这是识别吸毒者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弗朗克的腿肚子已经沒有一块好皮肉，全都被他抓烂了，因为他并不是用梳子挠痒，而是用小刀子刮。

晚上，我回到家里。我不时地想着：“你才 13 岁，可是已经沾上了海洛因。”最初的时候，因为还没有毒瘾的危机发作，所以我感到十分高兴。整整一个星期我的脾气好极了，在家里，没有吵过一次架；在学校，我接连得到几个好分数。

当我回到“团伙之家”时，我发现还有另外四个伙伴也开始打海洛因针。我们五个人坐在一边，以示高人一等。很快，团伙里服海洛因的人越来越多。海洛因终于像一颗炸弹似地把整个格罗比斯小区炸开了。

于尔根·克万特牧师

（青年辅导员，清除“团伙之家”的社会文化中心负责人）

许多年来，“团伙之家”的地下酒吧曾经是克罗比斯小区和努考林小区的年轻人主要聚会的地方。每天晚上，至少有五百多名青少年前来这里活动，直到 1976 年我们把它关闭为止。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海洛因的使用在这里毁坏了一代青年人。我希望对这个“团伙之家”的关闭能够引起政府有关部门对这种灾难性局势的关注。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对于烈性毒品在克罗比斯小区传播如此之快感到十分惊讶。早在学生运动时代，我们就曾经讨论过如何限制普通型毒品的问题。但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在我们的中心就有 30 到 50 个年轻人转而服用烈性毒品。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如果我们不采取法律的措施，而局限于向年轻人做正面的说服教育，那会被认为是怂恿他们越走越远，将会被看作是我们承认对毒品的斗争无能为力表现。

尽管某些政府机关不承认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我们通过对“团伙之家”的调查表明，吸毒的现象并没有减退的趋势，恰恰相反，这种现象无论从数量到质量，都可以同美国相比拟。今天，受害最深的是那些没有经过职业训练或失业的青年。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起来公开反对当局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我们对“团伙之家”地下酒吧的关闭一定会把这种长期被掩盖的现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诚然，西柏林的有关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吸毒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开始积极采取措施加以治理。

当我们在许多方面获得满意的结果之后，我们决定重新开放“团伙之家”的地下酒吧。

这也是我们这一决定的先决条件。因为我们已经在这里设立起由国家补贴的戒毒治疗中心和咨询服务处。我们的治疗设备有很大改善。尽管如此，事隔两年之后，吸毒的问题并未消声匿迹，因为新的青少年一代也同样存在吸毒现象。至于两年前的那些老吸毒者，有不少人已经死于毒品的摧残之下。

我们在“团伙之家”新接触到的年轻人，大部分出身于工人家庭，尽管近几年来，人民的生活表面上看来有所提高，但他们的生存条件实际上越来越糟。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身带武器，在某种情况下，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凶器。而且可以看到，某些青年人的民族好斗情绪完全是受到纳粹主义思想的影响。

年轻人的处境之所以日趋恶化，一方面是由于学校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学习过于艰苦，功课负担过于繁重；另一方面是一旦走出学校，立即就会遭到失业的威胁和各式各样的家庭纠纷。

情况十分严重。像克罗比斯这样的住宅区，居民多达 45000 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上“大批”这样的形容词：大批的青年失业者，大批高考落第者，大批的家庭纠纷……等等。

除此之外，那里的“自然”环境也没有多少自然的特征，几乎无法为人们提供任何休息、娱乐的场所。这对那些弱者来说，特别是青少年和老年人，的确受害非浅。在克罗比斯小区，一旦工程完工，那就意味着每寸可以建筑的土地都被占光，既没有为孩子们留下一块活动场地，也没有任何青少年的娱乐场所，没有一块可以消遣、散步的地方。这里既没有一个大的公园，也没有草地，没有树林，没有一处可让儿童嬉戏、青年人散步的地方。

这种大规模的住宅区完全是按照商业价值的观念设计出来的，丝毫不

考虑居民的实际生活需要。这种强加给居民的生活方式的后果一直为人们所担忧，而今天，这种恶劣的后果越来越明显了。

物质生活的困难总是来源于社会冲突和问题。由于房租昂贵，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上涨，迫使当父母的必须一道外出工作，迫使男人和女人必须为日常的操劳付出更大的力气和艰辛。而这一切的努力并没有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少欢乐和财富。

毒品向来就是阻止那些在社会发展中身受其害的人们觉醒起来的最可怕的手段之一。就像长期以来，酒精对于工人阶级所起的麻痹作用一样。近几十年来，除了酒精之外，又增添许多种毒品，诸如各种兴奋剂或麻醉剂，其买卖是合法的，也是有利可图的，还有非法的药品，但其利润更加可观，如海洛因、可卡因等。

事实上，最令人感到惊奇的并不是吸毒的人很多，而是那些虽然身处困境，却不求助于毒品的人更多。这种现象对于青年人更是如此。尽管他们有不少人身处逆境，尽管吸毒的人有增无减，尽管青少年犯罪和暴力事件增加，尽管法西斯思想被捡起来当作时髦货在青年工人中传播，可是走正路的青年人仍大有人在，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事实。

克利斯蒂娜自述

我第一次吸毒的那个周末，就在“音响舞厅”碰到了戴特莱夫。他立刻看出我的状况：“你干得好！你完全处于虚幻状态了。”阿斯特里德已经告诉他了。

我回答他说：“安静点儿，老朋友。你自己才真上瘾呢。而我呢，我不会让自己上瘾的。”

戴特莱夫没有找到反驳的话。因为他有气无力。他没有毒瘾发作——他尚未达到肉体上依赖毒品的程度——但是他非常想注射一针毒品。他终于对我说，他很想买一点儿兴奋剂，但是他没有钱。

我说：“伙计，你瞧。”我建议我们一起去偷窃。他同意了——但是他应该知道这对我会产生什么结果。20分钟后，我扒到20马克。戴特莱夫到手的少得多，但是这点儿钱对于我俩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们要想“神游”一番，需要极少量的毒品就够了。自然也没有两人平分的必要，那天晚上，戴特莱夫给自己注射了一针毒品，我只是嗅了嗅。我一个月前下的决不碰海洛因的决心，突然烟消云散。

戴特莱夫和我重新在一起，好像我们从未分开过似的。好像这几个星期末我们在“音响舞厅”几乎像陌生人似地擦肩而过这件事也不曾存在过。他和我都不再提这事。世界又变得像那个星期天那样美，那天我给戴特莱夫做饭，接着我们又一起吃午饭。

我心里很高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假如我没有去试一试海洛因，我就永远不会同戴特莱夫和好。我设想我将始终只是一个“周末吸毒者”。吸毒者开始时总是这样想的，虽然谁也没有见过一个仅限于周末吸毒的人。另外，我以为我能够挽救戴特莱夫，阻止他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吸毒者。我对这些

幻想感到满意。

我的这些幻想并不是无意识的。我不愿意听到海洛因；假如有人要冒这个险，我就会发怒，大嚷叫他滚开。就像我第一次吸海洛因，阿斯特里德想问我问题时的情景一样。我开始仇恨所有与我同龄的女孩子，我的印象是她们同我走的是一条道。我在地铁里和“音响舞厅”里都能认出她们，这些十二三岁的黄毛丫头吸印度大麻，吸麻醉毒品，并试图穿戴得跟放荡女人一样。我心里不停地想：“这个小丑八怪最终会给她自己注射毒品的。”平常我并不刻薄，但是那些女孩子们的确使我变得好斗。我恨她们，我确实恨她们。那个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我是在恨自己。

我连续几个周末吸毒后，我确实停了半个月。这对我绝对没有什么影响——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从身体感受来看，我并不觉得比以前难受。但是后来呢……我又重新开始吸毒。

我对什么都没有胃口，我又开始跟我妈拌嘴。几天之后，就应该是 1976 年的复活节假期。

复活节假期的第一个星期六，我去了“音响舞厅”，坐在楼梯旁的一条长凳上，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我到这里来干什么？两个女孩子从楼梯上下来，她们大约 12 岁左右，但是她们戴着胸罩又化了妆，尽量使自己显得像 16 岁的样子。我也是如此，除了我的知心朋友外，我对所有的人都说我是 16 岁，我也化妆，使自己显得大些。这两个女孩子立刻就使我讨厌，但是同时她们又让我感兴趣。我一直盯着她们。

我立刻看出她们在拉关系，试图使她们被接受入伙。在她们看来，最有吸引力的是吸毒者团伙。她们认识里斯，“音响舞厅”的厨子领班——他是职工中惟一一个老的，他快 40 岁了。可是他很喜欢十二三岁的女孩子。那两个女孩子因此和里斯聊起天来。可是她们已经注意到我在观察她们，她们不停地朝我这边瞧一眼。毫无疑问，因为我也与她们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后来她俩中的一个朝我走来。她有一副纯真的天使般的面容。她自我介绍，“巴普西”，又问我是否能给她一针毒品。

“一针毒品？你要那个干什么？放弃算了，那些玩意儿可怕得很。”我欣赏着自己优越于她的态度。要让她知道，她不应该这么放肆地向一个尝试过海洛因的人讲这话。她大概也发现我给人印象很深，而且无所顾忌，就像几个月前那些在吸毒的问题上比我滑得远的家伙给我的印象一样。巴普西告诉我她想请我喝一杯果汁饮料，她起身去取，很快又回来了。

她刚转过身，她的伙伴就走过来。她叫施特拉。她问巴普西向我要什么。我回答：“一针毒品。”

“她给你钱啦！我少了 5 马克，我敢肯定是这个小丫偷的。”这十分像施特拉的为人。

后来，我每天听到类似的话。巴普西和施特拉以后成了我的最好的朋友。直到巴普西成了报纸头版头条的新闻人物：她死于过量吸毒，至今柏林所知的最年轻的海洛因的牺牲品。

巴普西拿着果汁饮料回来。她使我感到讨厌，但同时我又很喜欢她，包括她那天使般的面容和天真的动作。我们一起聊天。巴普西和施特拉被一所普通制中学开除了，因为她们经常逃学。她们之所以逃学，因为她们已经加入了一个团伙，那里面的人像疯子似的吸印度大麻。这会儿，她们刚从家里逃出来，正在寻找新的尝试。巴普西 12 岁，施特拉 13 岁。

我请巴普西第二天早上去了我家。由于她没有衣服穿，我给了她两件我的旧T恤衫和一条三角裤。我在准备饭时，她在我床上小睡了一会儿。现在，我真正觉得她很热情，第二天，我也与施特拉结下了友谊。这两个女孩子同我一样，年纪还很小。可我同她们在一起，感到比同那些吸毒者在一起好。她们俩吸大麻和麦角酸。二乙酰胺（L、S、D），她们与我所交往的人不同，不是那些只想海洛因、光谈海洛因的人。我满足于每个周末吸一点点毒。其他人笑我，经常跟小娃娃们在一起，我不在乎。

我们仨人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我们也有同样的家庭烦恼。巴普西的父亲自杀了。当时她还是一个很小的的小姑娘。她母亲当过舞蹈演员后来又当了模特儿。巴普西的继父是一个大钢琴家。巴普西强调说，他是一个具有世界声誉的钢琴家，她对此感到很骄傲。当我们去一家迪斯科舞厅，她看见印有她继父的名字和照片的唱片袋时，她喜形于色。但是这位大钢琴家几乎从来不关心她。巴普西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简直就像由祖父母收养着她一样。祖父母让她过着公主般的生活。后来我去过巴普西那儿：我看见了她的寝室——真漂亮，家具精美极了。她有一架最新式的电唱机和大量的唱片，各式各样的衣服应有尽有。但是巴普西与她的祖母相处得不好，她祖母是一个老泼妇。巴普西很想回她妈妈家去。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她从她那舒适，漂亮的卧室逃走，她已经厌烦这一切了。

施特拉的母亲也很漂亮。施特拉很爱她。但是她很少有时间照顾施特拉。她喝酒，因为她独自一人很难熬——施特拉的父亲三年前死于一场火灾。施特拉有一个崇拜的偶像：穆罕默德·阿里。她欣赏他的力量。在我看来，阿里在她心目中，代表着她的父亲和他的情人。

我们仨人因而上了同一条船。从第一天晚上起，我就认准这两个女孩子最终是会注射毒品的。但是施特拉向我要海洛因的那天，我还是感到吃惊。我又一次发火了，我责骂施特拉：“别碰那玩意儿！总之，没有人会给你。再说我也快戒毒了。那玩意儿绝对没有什么用。”

我让其他人也不要给施特拉海洛因。但是几天之后，她还是把布朗基说动心了，这是“音响舞厅”的团伙中的一个小伙子，他成了她的伙伴。她开始吸毒，当然巴普西也跟着她学。

但是，这两个女孩子很快就不得不停下来。她们被抓到警察局又被领回了家。我连着几个星期都没有看见她们。

春天到了，天气越来越暖和。在一年开初的日子里我总是情绪很好。这从我童年时代就开始了，赤脚走走，脱掉外衣，在水里趟来趟去，观看花园中的花朵开放。但是1976年的春天，我却丝毫没有往常的那种幸福感。我心想当太阳变得越来越热时，生活不可能不变得更美丽。但是我总是背着一大堆问题，甚至不大清楚究竟是些什么问题。当我吸毒时，所有的问题化为乌有，可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每星期吸一次毒已经不够了。

这年5月，我庆贺我14岁生日。我母亲吻了我一下，又给了我50马克。这笔钱，是她从家庭开支中节省下来的。她让我用它去买我喜欢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去了选帝侯街，买了40马克的海洛因。我还从未一次有过这么多海洛因。我又用6马克买了包香烟——我已经成了一个大烟鬼，2、3个小时就能抽完一包烟。

我还剩了4马克：去“音响舞厅”的钱。

在“音响舞厅”，我碰到了戴特莱夫，他温柔地拥抱我向我祝贺生日。

我也向他祝贺：他的生日比我的早两天。他有点伤心，因为今年他父母没有向他祝贺生日，只有他奶奶向他祝贺了生日。他的确比我不幸。我试图用“老朋友别难过”这类话安慰他。另外，我给他准备了一件好礼物：注射用的毒品。我有足够两人美美地过一番瘾的可卡因。

我们小小地庆祝了一番生日后——我吸了很多毒品，戴特莱夫也美美地打了一针——我们俩的关系确实更密切了。以前，戴特莱夫大部分时间同他的伙伴们呆在一起，而我则与巴普西和施特拉在一起。现在，只要有一分钟的空闲，我就与戴特莱夫在一起。戴特莱夫实际上从来不忙。他刚刚辞掉他的学徒的工作。有足够的钱时，我们就去过过烟瘾。

暑假到了。

暑假第一天，我们同几个伙伴去了温茜海滩。我们又一次囊空如洗。我很快弄到了值钱的东西。

我们在小树林里宿营——女孩子们喜欢的地方——因为她们经受不住太阳。开始，我们仅限于搜罗我们的急需品：我们瞄准一些游泳的人扔下盖单和冰箱无人看管，我走过去并高声说：“瞧，没有人看守！”我从冰箱里拿了几瓶可口可乐。又一次，我拿了一条毛巾和一块浴毯。晚上，我的战利品大大丰富起来，还有一些零七八碎的东西和一架半导体收音机。

戴特莱夫则弄到了一块手表。

我立刻在“音响舞厅”用半导体收音机换了50马克。这是很不错的一天。我很激动，对戴特莱夫说：“喂，我吸毒已经吸够了。我想注射毒品。”

戴特莱夫反对这种方式。吸毒或注射毒品，没有多大的差别，只不过，谁只要是光吸毒，他还不能算一个真正的吸毒者。

在选帝侯街，我们的老卖主隔着很远就认出了我们，他立刻溜进更远的几条街上，一直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我向这个卖主买了40马克的毒品。我决定给自己打第一针海洛因。

当人们吸毒时，效果来得慢，而注射毒品时，效果来得就像离弦之箭一样快——我听见其他的吸毒者把这比作性欲高潮。我想尝试一下这个，丝毫没有考虑到我这样会在吸毒的泥沼里陷得更深。

我们走到波茨坦街旁的公共厕所里。那是一个肮脏的地方，厕所门前挤满了流浪者，醉汉们也到这儿来睡觉。有人向他们散一包香烟。他们已习以为常，他们窥伺着我们的到来。

“音响舞厅”的一个女孩子蒂娜陪着我们。戴特莱夫从一个塑料包里取出器皿——针管、勺子、柠檬。他把可卡因倒进勺子里，又加进一点水和柠檬汁。这样，从来就不会是完全纯的可卡因，就能够溶解得好一些。他用一个打火机给装满了可卡因的针管加热。这是一个旧的一次性使用的针管，脏得可怕，针头完全钝了。戴特莱夫第一个注射，接着轮到蒂娜。他们打完之后，针头全被堵塞住不能用了，至少他们两人都这么说。大概是不想让我注射。但我还是很想打。

另外一个吸毒者走近厕所来注射毒品。他完全虚了，处于毒瘾发作的最难熬的阶段。我向他借针管。他同意了。但是，突然我非常害怕把这个针头扎进静脉里。我把针头置于肘弯上——我知道怎样注射。我经常看别人注射。但是我怕，我不敢这么做。戴特莱夫和蒂娜视而不见，就像这一切与他们无关似的。我不得不求那个吸毒者帮我一下。当然他立刻明白我是第一次注射毒品。在一个有经验的吸毒者面前，我简直像一个傻瓜。

他对我说这么做很恶心，但是他还是拿起了针管。由于我的血管看不清，他半天找不到一根。他连扎了三针，才回了一点血到针管里，他又嘟囔了一遍，这玩意儿不好，接着就把针管里的毒品都推进了我的静脉。

我果然立刻就有犹如离弦之箭似地感觉，但这不是我所想象的性欲高潮。紧接着，就是云里雾里，我勉强知道我周围所发生的事，我什么都不想。我走进“音响舞厅”，坐在一个角落喝果汁。

戴特莱夫和我现在平等了。我们有福同享，俨然像一对结了婚的夫妇。除了我们还没有在一起睡过觉。我们尚未发生任何性关系。我总感觉自己还不成熟为时尚早，戴特莱夫也同意这一点，没有怎么争执。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觉得戴特莱夫很不错。这是个很好的小伙子。

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同戴特莱夫睡觉。我很高兴我还从未与别的小伙子这么做过，我确信我们两人将会在一起。从“音响舞厅”出来，戴特莱夫陪我走回家，步行需要两个小时。

然后，他一般是搭车回他家。他同他父亲住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谈论过许多古怪的事情。我完全丧失了对现实的感觉。对于我来说，现实并不现实。昨天或明天我都不感兴趣。我没有打算，只有梦想。我最喜欢谈论的话题就是假如戴特莱夫和我有许多钱，我们拿它干什么。我们会买一所宽敞的房子，一辆大型的小汽车，一些高级的家具。我们梦想许许多多的东西——除了海洛因。

戴特莱夫忽然想出一个赚钱的点子。他告诉我，有一个卖毒品的人准备赊卖给他 100 马克的海洛因，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小包，再以每包 20 马克的价钱卖出去，这样我们立刻可以赚 100 马克，然后用这笔钱买可卡因，我们又如法炮制，使我们的资本翻一番，就这么不停地倒卖。我认为这个主意简直太妙了。那个时候，人们对倒卖毒品抱有很大的幻想。

戴特莱夫果真得到了赊卖给他的值 100 马克的海洛因。那时候，小的毒品转卖商不是极缺吗？我们带着可卡因并不冒险，我们去“音响舞厅”出售。戴特莱夫有一颗仁慈的心，他总是正巧碰上身无分文，而毒瘾又极度发作的人。于是他就赊卖给他们，当然他们从来不付钱。一半的海洛因就这样弄光了，剩下的一半我们自己用了。不久，我们又落到既无可卡因又身无分文的地步。

赊卖可卡因给戴特莱夫的那个转卖商气坏了，但他也仅仅是骂了一通了事。无疑他只是想试一试戴特莱夫的转卖能力。试验结果确定无疑的：他一无所获。

暑假的头三个星期，戴特莱夫和我总是每天下午见面。我们一般都是一起去弄钱。我干一些我以前从不会干的事。我像个小鸟似的，在大商店里行窃，尤其是偷一些能在“音响舞厅”迅速卖掉的物品。这样干一天也很少能弄到够买两针毒品的钱，不过我们尚未达到需要那么多毒品的程度。我们还没有到身体上依赖毒品的地步。有时碰上“断顿”的日子也不要紧。

暑假的后半部分时间早已定好了。我将去外婆家度过，我外婆住在汉斯的一个小村庄里。这多少有点奇怪，但我一想到既可以看见我外婆又可以到乡下去，就高兴极了。一方面，我又无法想象怎么能离开戴特莱夫二、三个星期，甚至不可想象要一连几天离开“音响舞厅”和城市的灯光。然而另一方面，我又很高兴能重新见到那些从不知道什么是毒品的乡下年轻人，很想去骑马，游泳，等等。总之，我不再清楚我是哪一种人。

我不知道我已分成了两半，变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我给自己写信，更确切地说，克丽斯蒂娜给维拉写信。维拉是我的第二个名字。克丽斯蒂娜是想去她外婆家的那个 14 岁的女孩子，一个好孩子。维拉是吸可卡因的女孩。

我母亲一把我送上火车，我就只是克丽斯蒂娜了。一进我外婆的厨房里，我立刻就有完全到家了的感觉，就像我从未到过柏林似的。只要看见外婆坐在这间厨房里的安详和轻松的神态，我就觉得心里热乎乎的。这才叫厨房，壁炉里燃着火，有许多小锅和大锅，里面总是在炖一种好吃的菜。就像一本幻想书所写的一样。我感觉良好。

我立刻就跟我的表兄们和表姐们以及其他与我同岁的小孩子们混熟了。他们同我一样的确还是孩子。我很高兴又恢复了童心。我也不知道有多长时间以来我不再有童心。我把我的高跟鞋扔在角落里，外婆家的人借给我凉鞋；下雨时，又借给我胶鞋。我一次也没有用过我的化妆品。在这里，我没有什么可显摆的，也无须让什么人佩服。

我经常骑马。我们组织了许多竞赛，走路的或骑马的。但我们最喜欢去玩的地方还是小溪。我们长大了，我们修筑的小水坝现在规模也很可观了。小水坝拦起了一个真正的人工湖。晚上，我们在堤上凿穿一个窟窿，一个至少有三米高的瀑布就落到小溪里。

其他的人当然问我有关柏林的事情，问我在哪儿干什么。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什么。我一点也不愿意想起柏林。简直不可想象，我居然不想戴特莱夫。我本来打算每天给他写信，结果我一次也没有写。有时到了晚上，我试图使自己去想他，可是我似乎连他的轮廓也想不起来。我觉得他好像属于另一个世界，而我却不懂那个世界的信息。

后来晚上躺在床上时，我焦虑不安。我眼前老是晃动着“音响舞厅”里那些家伙们的幽灵般的面孔，我想不久我就应该回柏林。我对柏林害怕极了。我心想应该请求外婆把我留下，但是用什么理由呢？又怎么向我母亲说呢？必须把一切坦白出来。但是这样做我下不了决心。假如我告诉外婆，她的外孙女注射海洛因，她立刻就会气死。

因此，我应该回柏林，柏林的嘈杂声，灯光，喧哗，我以前喜欢的这一切，现在却让我很恼火。晚上，嘈杂声使我不能入睡。我去选帝侯街时，来往的车辆和人群使我惊恐万分。

开始，我甚至不试图使自己重新适应柏林的一切。我知道返校一个星期后，我们全班要去黑森林呆几天。我时刻想着买海洛因；因为我有了钱，我外婆给了我 50 马克作为礼物。

我也没有去找戴特莱夫。听说他已经不去“音响舞厅”了。

我对这次旅行很高兴，但是两、三天以后，我感觉不舒服，我每次饭后肚子都疼，出外游玩我累得精疲力尽。我们坐公共汽车去参观苏查尔的巧克力工厂，凯茜坐在我旁边，她突然对我说：“哟，你脸色蜡黄，你有黄疸。”这下可好，我很清楚，所有的吸毒者都会得这个病。由于吸毒者们经常轮着用注射器，针头和针管不干净。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到海洛因，我也立刻回想起我第一次注射毒品时的那个肮脏的针头。但后来我发现凯茜并不是很严肃地说上述那番话的，于是我心想，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注射毒品了——肯定不会有什么事。

在苏查尔工厂的大门口，巧克力夫人大殿的前面，我买了一把塑料勺

子。我把它伸进每一个稍微能引起食欲的溶化缸里。当我认为实在很好时，我就向导游提很多问题，接着我又把勺子伸进缸里。这样，我把衣服角都弄成褙了，走出工厂，我的衣服边糊满了巧克力。

车刚一开动，我就发誓再也不碰一点儿巧克力了。回到我们住的招待所，我简直累瘫了。我不得不狼吞虎咽地吃这成堆的巧克力。我的肝脏也似乎没事了。

老师也发现我的面色蜡黄。他叫来一位医生，又来了一辆救护车——不停地响铃——把我送进医院。儿科医院的隔离室很小，墙壁雪白。墙上了一幅画一张图都没有。一些女护士给我送来药和饭，什么话都不说。一位医生时常来问我感觉怎么样。三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

我不能离开寝室，甚至不能出去小便。没有一个人来看我，也没有人来跟我说话。我既没有有趣的书看，又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我不止一次地认为我快变成疯子了。

惟一给我以安慰的事情，就是我母亲的来信，我也给她写信。但我主要是给我的小猫写，我仅有的小动物。我把信折得很小，装进我自己做的小信封里。

我时常想念外婆，想念村里的孩子们，以及小溪和马群。有时我也想柏林“音响舞厅”，戴特莱夫，以及海洛因。我不知道我是谁。当我感到自己情况很糟时，我自言自语：“你是一个吸毒者，第一次得了肝炎，以后算完了。”当我想象着同我的两只小猫在一起玩时，我决心回学校去上学，每个假期都到我外婆家去度过。这一切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可我有时候也长时间地盯着天花板，什么也不去想，好像我情愿死去一样。

另外，我总是害怕医生们发现我脸色发黄的原因。幸好注射毒品的痕迹已经消失，我的胳膊上还没有留下瘢痕和血栓形成的印迹。谁会到弗里堡的儿科医院找一个女吸毒者？

三个星期后，我重新开始走动。医生准许我乘飞机回柏林。路费由社会保险机构付。我一回到家就去睡觉。我很高兴又见到了我母亲和我那两只小猫，其他什么我都不去想。

过了一会儿，我母亲告诉我，戴特莱夫来过好几次打听我的消息。她告诉我，戴特莱夫看样子对于很久没看见我很懊丧。于是我又想起了戴特莱夫，仿佛又看见了他那一头卷曲的头发，温柔而漂亮的面孔。我感到十分幸福。有一个人在思念我，一个真正爱我的人。他就是戴特莱夫。我感到内疚，好几个星期以来，我几乎把他和我们的爱情忘掉了。

我回来几天之后，戴特莱夫来看我。我一见他走到我床边，我不禁一怔，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瘦得皮包骨，他的胳膊细得几乎连我的手都能攥得过来，他的脸苍白，轮廓塌陷。可他还是那么英俊。他的眼睛显得更大，也更忧郁。忽然，爱情又在我心中复活。即使他变得骨瘦如柴也没有有什么关系。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

好一阵子，我们俩不知道说什么。他想知道我的情况，可我没有那么好讲的。我甚至忘了跟他讲我假期在我外婆家的情景。我只是问他为什么不去“音响舞厅”了，他说“音响舞厅”真讨厌。那么，他现在去哪儿呢？他终于说了出来：“地铁动物园站。”干什么？“我卖淫”。

这时，我并不感到吃惊。我知道一些吸毒者有时就这么干。我没有怎

么明白这里的含义。再说我也不太想知道。我只知道那主要是满足同性恋者，而不是自己，这个活儿能赚许多钱。我没有让戴特莱夫解释别的。我只是很幸福地望着他，我爱他，他也爱我。

紧接着的那个星期天，戴特莱夫来邀我出去。我们走到一家咖啡馆。里面坐满了同性恋者。他们几乎都认识戴特莱夫。他们对我也很热情，一个劲儿地恭维我。祝贺戴特莱夫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我发觉戴特莱夫为我感到骄傲，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把我带到这个咖啡馆来，这里人人都认识他。

我很喜欢这些同性恋者。他们对我很客气，恭维我可又不像他们对其他男人那样勾引我。他们觉得我很可爱，非常喜欢我，但不向我提什么要求。所有这些恭维都使我心花怒放。我去梳洗时照了照镜子，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我两个月没有吸毒，对我的身体大有好处。我的脸色变好了，我发现我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戴特莱夫说他要到地铁动物园站转一圈。他与贝尔恩德，他的最好的朋友有一个约会，今天，贝尔恩德已经安排好了去给他俩弄钱。戴特莱夫去地铁动物园站，这可不是我的错。

因而，这不必争论。我陪他去。再说，我也很高兴能又见到贝尔恩德。

贝尔恩德刚刚跟一个马路嫖客走了。我们只好等他。那天晚天，地铁动物园站并不是像我日后回忆中的那么阴森可怕。尤其是我看见戴特莱夫。他把我扔下而去跟另一个伙伴说话时，一些外国佬就过来与我搭讪。我只听见“60 马克”或诸如此类的话。我紧紧拉住戴特莱夫的胳膊，这样我就有了安全感。我劝他跟我回“音响舞厅”去。后来，我让他给我一点儿钱去吸一吸毒。他当然拒绝了。但我一再坚持：“只是今天一晚上。只是为了庆祝我回来。我想稍微舒服一下，就跟你一样。要不然你也什么毒品都不准碰。”

他让步了，说这是最后一次。我回答他：“那是当然。”两个半月以来，我刚刚证实自己能够摆脱海洛因。我甚至也注意到戒毒对我确实有好处。

这是一个很有影响的理由。戴特莱夫对我说：“听着，小家伙，我也要戒毒。你瞧着吧。”这样，他注射毒品，我吸毒。我们感到幸福，我们谈论着我们幸福的未来，永远在一起，没有海洛因。

第二天下午，我又在地铁动物园站见到了戴特莱夫。我又有权利吸一次毒。过了些天，我又重新开始注射毒品。就像我从未离开过柏林似的，就像我两个半月没有吸海洛因这事从未存在过。我们几乎天天都谈论我们戒毒的决心，戴特莱夫说，这很容易。

我从学校出来后，经常是直接去地铁动物园站。我的书包里装着吸毒的器皿和一大包三明治。我母亲如果看见我突然消瘦会吃惊的，于是我每天早上就带上一些三明治。我知道戴特莱夫和他的朋友们等着我给他们送午饭。

开始，戴特莱夫看见我来就生气。他不愿意让我看见他在卖淫。他说：“你可以在随便什么地方跟我约会，但就是不要到这里来。”

我不听他的。我想跟他在一起。逐渐地，我习惯了那儿的一切。我不再觉出尿的味道和消毒水的味道。顾客们、妓女们、外国佬们、警察们。流浪汉们、醉汉们，都构成了我每日所处的环境。这里就是我的位置，因为戴特莱夫在这里。

开始，其他的女人们盯着我，上下打量我，弄得我很紧张。而在我看

来，最咄咄逼人的还是那些嫖客们的眼光。后来我意识到，来这里卖淫的这些女人害怕我，怕我把他们的好顾客抢走了。难道我是一个能引起人胃口的新鲜商品？这是真的，我的风度比她们的好，我的举止高雅，我几乎每天都洗头。一看见我，没有任何人会怀疑我是一个吸毒者。我知道我优于其他的女孩子，我感到很愉快。所有的马路嫖客也确实围在我身边。但是我不需要去卖淫，戴特莱夫已经为我这样做了。其他观察我的人大概会想：这个小姐，她有可卡因，却无须为它疲于奔命！

开始，那些马路嫖客使我害怕。尤其是外国佬们没完没了地说着这类话：“你接吻吗？你去旅馆吗？”一些人出 20 马克。很快，我就以撵走他们来取乐。我对他们说：“喂，老东西，你瞎了眼啦？我？谁要是没有至少 500 马克就别想接近我。”或者我就面对面盯着他们，一副无所顾忌的样子，向他们甩出一句话：“你找错对象了，老朋友。走开。”我说完这番话后，很开心地看着这帮坏蛋垂头丧气地走开。我对那些马路嫖客也这样，我比他们高一等。假如偶尔他们中的一个人向我表示傲慢或无礼的挑衅，戴特莱夫会立刻挺身而出。每当戴特莱夫跟一个嫖客走时，他总是关照他的伙伴们照顾我。他们像兄弟一样对待我，时刻提防着想对我施无礼的家伙。

现在，我也不再去“音响舞厅”了。我除了地铁动物园站的我们小团伙里的朋友以外，没有别的朋友了。小团伙由戴特莱夫和我、贝尔恩德和阿克赛尔组成，后两人都是 16 岁。

这三个小伙子都住在阿克赛尔家。

阿克赛尔与其他两人正相反，他长得很丑。他的脸部没有一处协调的地方，他的四肢仿佛应该接在另外一个身躯而不是他的身体上。的确，他没有什么可吸引同性恋者的。但是他有嫖客，甚至是回头客。戴特莱夫厌烦时，就骂嫖客们并同他们吵架。阿克赛尔碍于他的长相，不得不时刻压住自己的火气，装出一副可亲的样子。另外，在床上，阿克赛尔大概有特殊的東西，特别能讨同性恋者的欢心。没有这一手，他就不可能继续吃这碗饭，因为在地铁动物园站，有许多竞争者。

他也尽可能地进行报复。只要他碰上一个比较笨的嫖客，就要诈骗他。阿克赛尔是一个有个性的小伙子：谁冒犯他和污辱他都没用，他能自我控制，从不流露自己的感情。而且他简直是出奇地客气和乐于助人，这在吸毒帮中是极少见的。说真的，像他这样的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他的为人就好像他不是生活在这个腐败堕落的世界里似的。不幸的是，他一年之后就死了。

阿克赛尔的经历与我们相似。他的父母离了婚，他一直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后来他的母亲搬到另一个朋友家住，可是她很慷慨：把两间一套的房子和几件家具以及一台电视机留给了他。她每个星期来看他一次并给他一点儿钱。她知道他在吸毒，还多次劝他戒毒。她自认为她为儿子做了许多事，比其他的父母为子女做的事多得多。她给了儿子一套住房和一台电视机，难道不是吗？

周末我在阿克赛尔家度过。我对妈妈说我在一个女朋友家里。

阿克赛尔的套房真是一个吸毒者的陋室。我一跨进门槛，臭气就熏得我喘不过气来，空的沙丁鱼罐头盒扔得到处都是，满处是油和番茄汁，上面又沾满了烟头，还有许多脏的无脚酒杯和茶杯，里面残留着一点点的水、烟灰。香烟。香烟纸。我想把酸奶放在桌上——惟一的一张桌子——两个沙丁鱼罐头盒就滚滚落下来，里面的汁撒在地毯上。谁也不在意。

总之，地毯发出一种可怕的臭味。阿克赛尔注射毒品时，我明白了地毯为什么会这么臭。他从胳膊上拔出针头，把一点暗玫瑰色的液体——针管里还有几滴血——滴在地毯上。

这就是他清洗针管的方法。原来地毯发出的可怕臭气，是血液干后的味道与沙丁鱼汁味的混合。甚至窗帘也全都发黄了，发出臭味。

在这一切乱七八糟中间，放了一张床，上面铺着雪白的床单。我立刻逃到床上，我把脸埋在枕头里，枕头散发着洗涤液的味道。我相信我从未睡过如此干净的床铺。

阿克赛尔对我说：“这些床单被褥都是我为你准备的。”每个星期六我都发现床铺是干净的。我的被单总是盖一次就换一次，而那几个小伙子却从来不换他们的被褥。

他们尽力让我高兴。我总是有足够使我满意的吃喝。尤其是他们为我买上等的可卡因。

我的肝脏一直不好，如果我注射掺了假的可卡因，我就会病倒。我身体不舒服时，他们总是尽心费力。他们给我买最好的海洛因，当然这很贵，没办法。我需要他们时，这三个小伙子总是在我身边。实际上，他们只有我。我呢，我有戴特莱夫——戴特莱夫排第一——其次是阿克赛尔和贝尔思德，再无其他的人。

我真是幸福。我似乎很少这样幸福过。我感到自己受到了保护。我在家里是孤独的，所以下午到地铁动物园站，周末到阿克赛尔臭烘烘的房间。

戴特莱夫是小团伙中最强的人，我是最弱的。我感到自己不如小伙子们，不论在体力上还是意志上。特别由于我是一个女孩子。然而，我第一次感到我情愿这样软弱。我享受着戴特莱夫对我的保护。我需要人帮助时，戴特莱夫，阿克赛尔，贝尔恩德总是挺身而出，我品味着所受到的这种宠爱。

我的男朋友是我的，他会做其他吸毒者不会做的事；他只要有海洛因就与我分享。他为我挣钱，去干最肮脏的活儿。为了给我买毒品，他一天要多接一、两个嫖客。我们俩跟别人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男人为了女人而卖淫。大概我俩是世界上惟一一对这么做的情侣。

1976年的秋天，我从未想过我自己去卖淫。至少从未认真想过。我的脑子里大概闪过这种念头。尤其是我看见戴特莱夫跟一个恶心的家伙走了，我感到内疚的时候。可是我知道假如我提出这事，戴特莱夫会狠狠地责备我。

再说当时，我始终不知道这里面的细节，或者至少是我不愿意去想它，不可能想象我会去干。戴特莱夫从来不谈此事。从这三个小伙子的谈话中，我听出好像是替鸡奸者手淫。

对于我来说，这与戴特莱夫和克丽斯蒂娜无关。戴特莱夫是被迫去干这种事的，于是不认为这事多么恶心。他乱摸那些鸡奸者，这倒不怎么害怕，这是他的任务——令人作呕的活儿，但却能使我们有了可卡因。只是我不愿意那些家伙乱摸戴特莱夫。他是属于我的，属于我一个人。

开始，我还觉得有几个同性恋者比较热情。小伙子们有时说杜尔柯或马善是个不错的家伙，不要怠慢他。我记住了这些。我同戴特莱夫在地铁动物园站时，有几个人对我特别热情，好像他们很喜欢我。不时地，其中一个小小伙子递给我一张某个鸡奸者认为我“很可爱”而给我的银行支票。戴特莱夫没有告诉我，这帮家伙中的一些人纠缠着他说想接近我。

我观察其他的姑娘。几乎全部跟我一样还是孩子。我觉得她们很不幸。

尤其是吸毒者不得不为了能够注射毒品而卖淫。我看见每次当一个嫖客挑逗她们时，她们的脸上都显出厌恶的神情，但她们还是强装笑脸。

我鄙视那帮家伙，他们悄悄地溜进车站大厅的人群里，不时用眼睛搜寻着“新鲜猎物”。当他们能够与一个完全不相识的女子睡觉时，他们便格外高兴，显然这很讨厌，不可能在这事上不遇麻烦吗？

那些同性恋者，我也很容易恨他们。渐渐地，我发觉他们让戴特莱夫遭受痛苦。他经常不能抑制住他的反感，很难迫使自己把那种活儿干完。总之，假如他不是处在毒品的恍惚状态中，这种活儿他不可能干下去。他毒瘾发作时——即他最需要钱时——见嫖客他就溜掉，于是阿克赛尔或贝尔恩德就去顶替他。他们尽量压制住他们的厌恶。他们也一样，需要用吸毒来麻醉自己，才可能去干这种活儿。我看见鸡奸者们追逐戴特莱夫就生气。他们向他结结巴巴地表示非常可爱的“爱情”，往他手里塞情书，这些都是当着我的面。这帮家伙就应该把他们单独关在一处！我不可能同情他们。我真想向他们大喊：“听着，伙计，戴特莱夫是属于我的，不属于其他任何人，更不属于一个混蛋鸡奸者，你们懂吗？”但正是这些家伙付给我们钱，他们就像给圣诞节的火鸡拔毛似的，大把大把地花钱。我们又需要他们。

我逐渐发现这些人中间的一些人与戴特莱夫很亲近，甚至比我跟他还亲密。很让人恶心。一天，我听戴特莱夫、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三个小伙子谈话才知道，一些嫖客要等到他达到性欲高潮才肯付钱。我真觉得恶心得要命。

我越来越难看见戴特莱夫，因为他随时都要跟一个混蛋嫖客走。我真替他担心。有人告诉我有时候卖淫的小伙子最后自己也成了同性恋者。可我什么都不能对戴特莱夫说，我们需要钱，不断地需要钱。自从我入了他们的团伙，我就决定，至少无意识地觉得，应该跟他们一样，变成一个真正的吸毒者。我每天注射毒品。我总是注意留出足够第二天早上注射的海洛因。

但是，戴特莱夫和我还是尚未达到身体上依赖毒品的程度。对于那些不是每天注射毒品的初期吸毒者，身体上依赖毒品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两天没有海洛因还顶得住：我们用别的替代品来“过瘾”，并不怎么痛苦。于是，我们以为我们跟其他人不同，跟那些堕落到底的吸毒者不同。我们想什么时候戒毒都可以。

我有幸福的时刻。每个周末在阿克赛尔家。戴特莱夫和我一起躺在那张干净的床上，向我说声“晚安”，又在我嘴上温柔地吻一下，于是我们就睡觉。我俩背对背，屁股冲屁股地躺着。我醒来时，戴特莱夫吻我一下并问我早安。

我们六个月以来一直呆在一起，没有发生别的肉体关系。我刚认识戴特莱夫时，我就已懂得了要提防着小伙子们的粗鲁。我立刻对他说：“你明白吗？我是处女。我还想再等一等。我觉得自己还太年轻。”

他立刻明白了，从未找过麻烦。对于他来说，我不仅仅是与他相处很好的女朋友：他很清楚 14 岁的我还是一个孩子。他极为敏感，能感觉出我所希望的以及我能否做的事。这年 10 月，我向我妈要避孕丸。她给我弄了一个处方。她立刻明白了我和戴特莱夫的事。可是当我告诉她，我和戴特莱夫什么事也没发生，她怎么也不相信。她对这类事情总是存有戒心。

于是，我吃了避孕丸，但没有告诉戴特莱夫。我还是害怕。10 月底的一个星期六，我到了阿克赛尔家时，看见铺在那张干净床上雪白的床单比我

们往常睡的要宽。阿克赛尔向我解释说何必两人挤在一张小床上呢，他自己睡到另一张大床上，把他的床让给我们。

那天，大家情绪都好，忽然戴特莱夫建议打扫一下房间，大家立刻同意。我先把窗户打开。涌进来的新鲜空气才使我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空气如此污浊的房间里。任何一个正常的人是连一分钟都不能忍受这种恶臭的——干的血迹、灰尘和发霉的鱼罐头混杂在一起的怪味。

两个小时后，我们还在房间里大扫除。有的扫地，把堆积成山的垃圾装进塑料袋里。我开动吸尘器，我甚至还把金丝雀的鸟笼打扫了一遍，大扫除把鸟惊得乱蹦乱跳。阿克赛尔的母亲把这只鸟留给他，算是对他的奖励，因为她的朋友不喜欢鸟。阿克赛尔也恨这只不幸的小鸟：当鸟叽叽喳喳叫唤时，阿克赛尔嫌吵，就会给鸟笼一拳，可怜的小鸟像一个疯子似地龟缩在栅栏中。三个小伙子谁也不管它，阿克赛尔的母亲定时来给鸟送食物。我每星期六都给鸟放一周的食料。我还给小鸟买了一个玻璃小器皿，里面放上够鸟喝六天的干净水。

那天晚上，我们睡觉时，情景和往常不一样。戴特莱夫没有吻我并说“晚安”，也没有转过背去。他跟我说起话来，说的都是温柔的话。我感觉到他的手在抚摸我，非常温柔。我一点儿都不怕了。我也抚摸起他来。我们互相抚摸，长时间地相互抚摸，谁也不说话，这真好！过了有一个小时，戴特莱夫才打破沉默，他对我说：“下星期六，你想做爱吗？”

我回答：“好吧！”我总是怕这个问题。现在我很高兴戴特莱夫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过了一会儿，我说：“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不论是你还是我，都不准吸毒。不能有海洛因。假如我们处于吸毒后的恍惚中，我可能感觉不出做爱的欢乐。我愿意完全处于清醒的状态。我希望你也这样，以便也能判断你是否真这么爱我。”戴特莱夫说：“可以。”他温柔地吻了我一下祝我“晚安”，我们又背对背地睡了。

第二个星期六，我们都很守信：我们任何毒品都未用。阿克赛尔的屋子重新变得又脏又臭。但是，我们床上的被褥却白得耀眼。我们脱了衣服。我还是有点害怕。我们并肩躺着，一句话也没有。我回想着我班上的女同学们曾经告诉过我的情景，第一次小伙子怎样粗鲁地扑向你，不顾一切地与你做爱，直到他满足时才停下来。女同学们说第一次做爱疼得可怕。

我对戴特莱夫说，我不愿意出现我班上女同学们所描述的情景。

他回答我：“行啊，我的小乖乖。”

我们互相抚摸了很久，开始性交，我只感觉出一点儿。当我感到疼时，不等我说，他已经感觉出来。

我心想：“他有权利把我稍微弄疼点儿。他已经等待了六个月。”

但戴特莱夫不想把我搞疼。过了一会儿，一切都好了。我们俩都感到很好。我爱他，爱得发狂。但是我却僵直得像块木板，戴特莱夫也是一动不动。他肯定明白我无法表达出的意思：我被担忧和幸福弄得呆住了。

做爱以后，他紧紧搂住我。我的感觉真是出奇地好，我问自己，我怎么配得上这么一个好小伙子呢。他一心想到我，从不为他自己考虑。我想起了查理，有一次看电影时，他把手悄悄地放在我的大腿中间。我很高兴把身子给了戴特莱夫，属于他了。我太爱这个男孩了，以致惊慌失措。我害怕死了。我总是自言自语：“我不愿意戴特莱夫死。”

在他抚摸我时，我对他说：“戴特莱夫，咱们戒毒吧！”

他回答说：“好吧，我不愿意你成为吸毒者。”

他拥抱我。慢慢地，我们分开睡了，还是背靠背，屁股冲屁股。

戴特莱夫的手放到我身上把我弄醒了。天还早，一道灰色的光透过窗帘。我们互相抚摸，尔后，我们做爱，很和谐。我的感觉主要还是精神上的，而不是肉体上的。但是我发觉与戴特莱夫做爱的确妙不可言。

星期一，我直接从学校到地铁动物园站。戴特莱夫在那儿。我把我的快餐和一个苹果给了他。他饿了。我很想注射海洛因，我已经有三天没有注射毒品了。我问戴特莱夫：“你为我准备好一针了吗？”

“没有。而且我再也不会给你了。我不愿意。我太爱你了，我不愿意你成为一个吸毒者。”

我气炸了。我大吼道：“哟，老朋友，你倒有胆量！你完全处于恍惚状态，你的瞳孔已经胀得有大头针的头那样大了。你还来教训我！还是你自己先戒毒吧，你戒我就戒。但是，别说瞎话，老实坦白你是不是想独占可卡因。”

我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他无法辩解。星期六晚上，他又开始注射毒品。他最后向我让了步，并说：“行了，小乖乖，那就让我们俩一块过瘾吧。”接着，他接了一个嫖客，以便为我买毒品。

现在，我们俩躺在一起，我生活中的许多东西都已经改变了。我在地铁动物园站时，已感到很不自在了。我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卖淫。确切地说，是想让嫖客们接近我！去干戴特莱夫和我所做的那种事。做爱，以往我根本不知道它的内容，只是有一种很抽象的概念。现在，这成了戴特莱夫和我之间最好又最亲密的事。那些嫖客们却让我恶心。地铁站所发生的一切在我看来完全无法理解：怎么能跟一个令人厌恶的外国佬、酒鬼或大腹便便的秃头睡觉？听见那些嫖客说蠢话，我不再感到有趣，我没有任何话回答他们。我惊慌失措地溜走。

有时，我甚至打他们。对于鸡奸者们，我现在讨厌他们。我简直想把他们杀了，这帮猪猡。

我要花很多精力来阻止自己去想象戴特莱夫被迫抚摸他们的情景。

但是我每天下午放学后，还是继续到地铁动物园站去。为了见到戴特莱夫。当戴特莱夫接完一个客，我们就坐在台阶上，他递给我一块巧克力。有时候接不到客，好些天戴特莱夫都很难挣到够我们俩用的钱。

逐渐地，我认识了一些其他的小伙子。以前，戴特莱夫总是试图让我疏远他们。他们比我们糟糕得多，他们比我的伙伴们更难找到嫖客。他们是不择手段搞毒品的吸毒者，我以前很欣赏这类家伙。

戴特莱夫对我说，他们是他的朋友，可同时他又让我提防他们。他们总是身无分文，又不顾一切地寻找可以注射的毒品。从来不能在他们面前露出钱或海洛因，否则就有遭暗算的危险。他们不仅诈骗嫖客，他们之间也互相诈骗。

我开始明白什么是真的。吸毒者们的圈子如此吸引我。但我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圈子，或者说基本上进入了。

有时，戴特莱夫大的朋友们对我说：“戒毒吧，你太年轻了，不该吸毒。戒毒，你可以做到，只要你同戴特莱夫分手。总之，他是永远摆脱不了毒品了。别再傻了，你就任他去堕落吧。”

我把那些人都撵走了，让我与戴特莱夫分手？简直不可想象。假如戴

特莱夫自杀，我也会去自杀。当然我没有对那些人说这些，我只是回答他们：“你瞎说，我们不是吸毒者。戴特莱夫和我想什么时候戒毒就能戒毒。”

1976年11月，我每天的生活都一样，从2点到8点。在地铁动物园站，尔后是选帝候街的一家迪斯科舞厅，戴特莱夫现在经常去的地方。那里是吸毒者们约会的地方，比“音响舞厅”还糟糕。我经常在那里呆到夜里12点20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的时间。实际上，我只为星期六晚上活着。每个星期六晚上，戴特莱夫和我做爱，每次都特别好——只要我们不是醉状。

12月到了。我感到冷。以前，我从来不知道冷。我意识到这是身体发出的警告。这个月开初的一个星期天，我就意识到了。我在阿克赛尔的房间醒来，戴特莱夫睡在我旁边。

我冷得要命。我的眼睛盯着一只盒子。突然盒子上面的说明文字，跳到我眼前。文字是彩色的，而且是耀眼的色调，刺得我眼睛难受。尤其是其中一种红得可怕的鲜红色。我吸毒后，最怕红色。但是海洛因却使红色变成一种很温和的色彩。它使红色像其它颜色一样，罩上一层薄雾。

可是在这个该死的盒子上，红色又变得很可怕。我的嘴里满是唾沫。我咽下去，口水马上又涌上来。口水不断涌上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口水又突然消失了，现在我的嘴里又干又苦。我喝了点儿水，但无济于事。我冷得发抖，可一分钟后，我又热得要命，我大汗淋漓。我叫醒戴特莱夫，对他说：“出了点儿事。”

戴特莱夫看着我的脸：“你的瞳孔胀得像茶托那样大。”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尔后他低声说：“怎么样，小姑娘，这下行了吧。”

我又冷得发抖，我问他：“这下行了，是什么意思？”

“吸毒者的发冷，毒瘾发作了。”戴特莱夫回答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犯瘾了。我对自己说，你也到了这种地步，你成了一个吸毒者。但这也不是太可怕，吸毒者式的发冷，为什么人们对这种东西小题大作呢？我并不怎么痛苦：我仅仅是发抖，颜色刺我的眼，接着是嘴里那种可笑的感觉。

戴特莱夫不再说什么，他从牛仔裤的小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和维生素C，又去找勺子，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支蜡烛上加热，又递给我准备好了的针管。我使劲发抖，因而我很难把针扎到静脉里，但是我还是很快扎进去了。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所有的颜色又恢复了本来面目，我的嘴里的状况也恢复正常了，我又睡了，紧贴着戴特莱夫。他也趁着这机会给自己打了一针。我们直到中午才起床，我立刻问戴特莱夫，他是否还有剩下的海洛因。

他对我说：“你别担心。你回家之前，今晚还有一针。”

但是我需要在明天早上注射用的。

“这个嘛，我也剩得差不多了。今天我实在不想去地铁动物园站。因为今天是星期天，一个客都不会有。”

我惊慌了：“难道你不明白吗？假如我明天早上不打一针，我就会发毒瘾，那样我就不能去上学。”

戴特莱夫说：“我早对你说过了，小姑娘，你也上瘾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俩还是去了地铁动物园站。我有时间来思考。我第一次犯毒瘾。我终于也成了依赖毒品。依赖戴特莱夫的人。最使我害怕的是依赖戴特莱夫。一个人完全依赖另一个人时，那爱情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不得不哀求戴特莱夫给我一点儿毒品时，事情又会怎样呢？我已经见过许多犯

瘾时的吸毒者，我看见他们乞讨，不顾廉耻地准备接受所有的污辱。我可是从来不会乞求的。我不会先从戴特莱夫开始我的乞讨。尤其不能向戴特莱夫大乞讨。如果他任随我向他乞讨，那我和他的关系就结束了。

戴特莱夫拉到了一个客，我等他回来。等啊，等啊……我必须习惯于等待，才可能得到我第二天早上的毒品。

我疲倦死了。我低声自言自语：“怎么样，克丽斯蒂娜，你有了你所想要的。这是你那想象的东西吗？肯定不是。但是你自己愿意。你羡慕吸毒者。现在你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别人再也吓唬不住你了。他们向你谈到犯毒瘾，你不必再睁大眼睛，你已经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了。别人再吓不住你了。该轮到你去向其他人描绘那种场面了。”

我精神上并未真正战胜自己。我回想着我过去对待犯瘾的吸毒者的方式。我不明白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是注意到他们极其敏感，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非常脆弱。一个吸毒者一犯瘾，就完全垮了，甚至不敢同人顶嘴。我曾经对他们显示我的强大。只要你愿意，你完全可以把他们摧垮。只须找一个好地方，一点点地揭他们的老底，戳到她们的痛处他们就彻底垮了。吸毒者犯瘾时，他还是知道自己是一个精神和体力上都瘫软的人的。支撑面部的都垮掉了。吸毒者不再认为自己比一切人一切事都强了。

我心想：“现在轮到你吃苦。你犯瘾了。他们将会看到你变瘫，变得愚蠢可笑，可是你早已知道这一切，不是吗？真奇怪，你以前从未想到这一切。”

我的自言自语并没有能够帮我的忙。我需要向某个人诉说。当然，我可以找一个在这里游荡的戴特莱夫的伙伴。我没有这么做，而是龟缩在一个紧靠邮局的角落里。我很清楚别人会对我说什么：“你不应该这样干，老朋友会好起来的，你不是一向认为戒毒很容易吗？有一种药就是专为这个而制作的。”戴特莱夫也讲过这类事。

我只能向我妈诉说。可我一想：“这不行，不能对她讲。她爱我，我也以我的方式爱我的妈妈，如果我对她说了我所发生的事，她会难过的。不管怎样，她不能帮我。她大概会把我送进监狱。这有什么用呢？强制从来不会让任何人走上正道。尤其对我不适用。你筑一堵墙，我赶快溜走。这样更糟糕。

我一直在低声自言自语：赶快停下来！你只是遭受了初次犯瘾的一点痛苦，可是你要下决心自己帮自己渡过难关。戴特莱夫回来时，你就应该对他说：“我不要海洛因，我要戒毒。你也应该这么做，否则我们就分手。你口袋里两份海洛因吗？好吧，老朋友，我们打最后一针，明天结束这一切。”我一边说一边感到自己极其渴望打一针。我叽哩咕噜，就好像我在诉说自己的一个秘密：总之，戴特莱夫不会愿意的。你也很清楚你离不开他。别再乱想了：“你已经走到头了。彻底到头了。你的生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可你自己愿意这么做”。

戴特莱夫回来了。我们一句话没有说，就一起溜到选帝侯大街寻找我们的老卖主。我把我的那份毒品装进衣袋里，回到我家，我立刻躲进寝室。

两个星期后，只有戴特莱夫和我在阿克赛尔房间里。我俩都有气无力。头天晚上，我们没有找到我们想找的贩毒商，另外一个卖主把我们骗了。他卖给我们的可卡因掺假太多了。星期天早上，我们不得不多打一针才支撑得住。现在已经快傍晚了，我们什么毒品都没有，戴特莱夫开始出汗，而我也觉得自己离犯瘾不远了。

我们翻遍了整个屋子，想找一点儿可以卖的东西。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不会有什么可卖的。从电咖啡壶到半导体收音机，早已被卖了换成毒品。还剩一个吸尘器，可它旧得已经卖不了5马克了。

戴特莱夫说：“小姑娘，我们必须赶快去弄钱。最多再有两小时，我们就会处于毒瘾全面发作的状态，那一切可就都糟了。现在是星期天晚上，我一个人不行，你必须帮助我。最好的办法是你到‘音响舞厅’去偷窃。争取弄到40马克，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嫖客弄到40或50马克，我们还可以把明天早上的可卡因也准备好。你能行吗？”

我说：“我当然可以办到。扒窃是我的拿手戏。”我们约好两个小时后会面。我以前常在“音响舞厅”里扒窃。我一般只须挑逗别人就行了。这一招总是很灵。但是今晚不行，我着急，扒窃花的时间多：必须选好偷窃的对象，事先想好接近他们的办法，有时还要跟他们聊一会儿，尤其是要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扒窃倒是很有趣。

但是我的毒瘾犯了，影响了我的扒窃。半个小时后，我才弄到7马克。我对自己说：“你不行了。”我想到戴特莱夫正在地铁动物园站拉客，而地铁动物园站星期天晚上只有以家庭为单位外出的人，爸爸、妈妈和孩子们。另外，戴特莱夫又处于犯瘾的状态。我害怕极了。

我走到街上，辨不清方向。我希望在街上再扒窃一次，我成功的机会要大些。一辆“奔驰”车停下来。我已经习惯看见一些大轿车减速并停在“音响舞厅”门前。这里女子的身价比别的任何地方都便宜，一些女子没有2马克一张的门票，就拉客来付门票和几瓶可口可乐钱。

坐在“奔驰”车里的那个家伙向我招手。我认识他。他经常在这一带转悠，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盯我的梢了。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不想挣100马克吗？”有一次，我问他想用什么来换。他回答：“没有什么特殊的。”我大声地讽刺他。

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大概是这类的问题：“总是看见这家伙，得搞清楚他到底想干什么。你大概还能从他那儿借到一、两个钱。”不管三七二十一，我突然走到“奔驰”车旁边。他让我上车，这里不能停车。我服从了。

实际上，我很清楚会发生什么事情。完全不是偷窃之类的。对于我来说，那些嫖客们不再是另一个星球的人。这类人我在地铁动物园站见得多了，我也经常听小伙子的谈话，所以我知道这部刚开始的“电影”的结尾。我知道不能让顾客定条件。我竭力装出高傲的样子，我不发抖。但是我吸了一大口气，我的话还是没有说出来就走样了。

我说：“怎么样？”

他说：“什么怎么样？100马克。行吗？”

我说：“我不做爱。根本谈不上这个。”他问为什么，我情绪波动得厉害，找不到别的话回答他，就只好照直说了：“我有一个男朋友。我不和其他人睡觉。我不愿意这么做。”

他说：“好吧。那你就替我口淫。”

我说：“不，这也不行。这会使我恶心。”我很固执。

什么都不会使他生气。他回答：“行啊，你替我手淫。”

我说：“那可以。100马克。”这时候，我不害怕，只是在想，这家伙大概爱上我了：100马克就为了这个，在选帝侯街，“小雏妓”角，那里的女子并不值钱！我蜷缩着依在车门上，右手抓住扶手。他知道这不是在演电影。

他减慢车速。我惊恐不安。“他肯定不会满意的。他大概会狠狠打我一顿，或者他不会给我那么多钱。”他停了车。我们到了一个公园，离“音响舞厅”不远。我经常从这个公园穿过。这真是一个肮脏的地方，每个角落都是扔下的避孕套和纸手帕。

我浑身发抖，隐隐感到有点儿恶心。但是那个家伙总是很平静。我鼓起全部勇气对他说，完全按照妓女的规矩：“先给钱吧。”他给了我，我还是害怕。刚才并没有说定他不会让我把钱退给他。我常听到谈论这类事情。但是我知道应该怎么办。近来，我们小团伙的小伙子们尽谈论这件事：他们怎样跟嫖客们“耍心眼儿”。他们相互之间也没有别的事可说。

在等待着他脱裤子的时候——他只顾了自己，顾不上注意我——我趁机把钱塞进我的靴子里。行了，他准备好了。我一直坐在“奔驰”车的后排座上，靠着车门。我一动不动，也不看他，我伸出左手。可是够不着。我不得不向那家伙靠拢一点。在抓住那玩意儿之前，我只好先看一眼。

我感到恶心，感到发冷。我眼睛盯着挡风玻璃，竭力去想别的事情。我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远处一个闪烁着霓虹灯的广告上，集中到透过小灌木丛看见的车灯上。

完的还比较快。那家伙又掏出他的钱包。他拿钱包的姿式使我看见钱包里装满了大面额的钞票。他大概是想让我吃惊。他又给了我 20 马克小费。

钻出汽车，我感到自己很平静。我想了一下：“行了，你 14 岁。一个月以前你还是处女。现在你已经开始拉客了。”

在这之后，我不再去想那家伙以及我所干的事。我甚至还很高兴，因为有了钱。我从未一次有过这么多钱。我不担心戴特莱夫，甚至也不去想他会说什么。毒瘾又发作了，我只有一个念头：打一针。我有运气，立刻碰上了我们的老卖主。他见我有这么多钱就问我：“你哪儿弄的这么多？你卖身啦？”我以盛气凌人的口气对他说：“看你说的，我会干那种事？我都要戒毒啦，而不是想注射毒品。这钱是我爸给我的，他忽然记起他还有一个女儿。”

我花 40 马克买了四份四分之一克的毒品。四分之一克是毒品市场上的一个新计量单位，大约相当于四分之一克。以前，把四分之一克分作三份，现在这些正好够戴特莱夫和我用。

我走到选帝侯街的公共厕所里，我给自己打了一针。这次是上等的可卡因。我把剩下的可卡因和钱装进学生月票的长夹子里。

整个注射过程只用了一刻钟。因而我离开戴特莱夫正好是三刻钟，我满有把握能在地铁动物园站碰到他。他果然在那儿，一副可怜相。这个星期天下午连一个顾客的影子都没有，不用说，他犯瘾了。我对他说：“过来，我已经搞到了。”

他也不问我是怎么弄来的，什么话都没说。他只是着急一件事：赶快回他屋里。我们径直走到浴室。我从口袋里掏出学生月票夹，递给他一个小包。当戴特莱夫把毒品放在勺子里加热时，他翻看着月票夹，发现了另一个小包和钱。“你在哪儿搞到的钱？”“没有扒窃到钱。也没有别的可干。这时碰到了一个有钱的家伙。我替他手淫。只干了这个，我向你发誓。我本来不该这样做。我这样做全是为了你。”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看见戴特莱夫脸色苍白。他气坏了。他大吼道：“你撒谎，没有一个人会因为这点就付 100 马克。这是什么意思：手淫。没有别的？”他说不下去，他毒瘾发作到了高潮，他浑身发抖，他的衣衫全湿

透了，他的腿在抽筋。

他把止血带绷在胳膊上。我坐在澡盆边上哭，我认为他有权利发火。我哭着，等待着戴特莱夫的针起作用。只要他一切恢复正常，他就会给我一记耳光，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不会辩解。

戴特莱夫抽出针头，走出浴室——我跟在他后面——一句话也不说。终于他开了口：“我送你去公共汽车站。”我打开第二包毒品，给了他一半。他把毒品装进牛仔裤口袋里。

我们走到公共汽车站。我很想让他大吼一番，打我一顿，至少他得说几句。但是什么也没有，没有，一点儿也没有。

公共汽车来了，我没有上去。他转身要走，我对戴特莱夫说：“我对你讲的完全是真话。我替那家伙手淫。就这些。这并不太可怕。你应该相信我。怎么，你不再相信我了？”

戴特莱夫说：“我相信你。”

我说：“真的，是为了你，我才这么做。”

戴特莱夫的声音坚定了一点：“别说傻话。你那样做是为你自己。你当时犯瘾了，你已经有办法了，很好。假设我不存在了，你反正要这么做。明白吗？你现在是一个吸毒者。你的身体已经依赖毒品了。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

我回答他：“你说得对。但是，听我说。你一个人已经不可能弄到够我们俩人用的钱了，我们需要的毒品量已经增加了。我不愿意由你一个人去干。现在，该我去干了，我敢肯定我能赚到很多钱。而且我不做爱，我向你发誓，永远不和一个嫖客睡觉。”

戴特莱夫什么也没说，他用胳膊搂住我的肩。天开始下雨了，我不知道他脸上闪动的水珠是雨水还是泪水。又一辆公共汽车停下来，我说：“我们没有走正道。你还记得吗，当我们还在吸大麻和吞服药片时，我们感到非常自由，我们不需要依赖什么东西或什么人。可现在……我们奇怪地掌握在别人手中。”

又走了三、四辆公共汽车。我们低声说着难过的事情。我伏在他胳膊里哭了。他说：“我们要想办法。我们要戒毒。我们俩得一起戒毒才行。我去弄‘瓦尔隆’毒品。我第二天一早就去办这件事。我们要一起戒毒。”

另一辆公共汽车来了。戴特莱夫把我推了上去。

回到家里，我机械地重复着习惯性的动作。我去冰箱里取酸奶。我坐在床上吃。实际上，这只是我借口把勺子取来，为了第二天早上我注射毒品做准备。接着，我去浴室取了一杯水，为的是洗针管。

第二大早上也跟往常一样。我妈7点差1刻叫醒我。我躺在床上装作没听见。她每隔5分钟来一次。我最后对她说：“是，是，我就起床。”她又进来烦扰我一次。我看着时间一直数到7点1刻。这是她应该动身去上班的时间，如果她不愿意误了地铁的话。因为她从未误过地铁。再说我也应该7点1刻走，这样才能准时到学校。

当我听见房门叭嗒一声关上时，我立刻开始行动。我从放在床角的牛仔裤里掏出小纸包。旁边的塑料袋里有我的化妆品，一包罗斯一汉德勒香烟，一小瓶柠檬酸，针管上罩着卫生纸。针管跟往常一样堵塞住了，由于到处乱飞的烟灰，我把针管浸在水杯里，将可卡因粉末倒进勺子里，又加入几滴柠檬酸，一块加热，又把止血带绑在我自己的胳膊上。这一串动作都是如此机

械地进行，就像有的人点燃他们一生中第一支香似的。我经常是打完针后又睡一觉，我只是上第二节和第三节课时才到学校。我在家里打针时，上学总是要迟到。

有时候，我妈终于把我从床上拖起来，让我跟她一起坐地铁。这样，我就只能到地铁莫里斯广场站的公共厕所里注射。这太不愉快：厕所里又暗又臭，而且墙上到处是窟窿，总有些家伙从洞里看女人小便。我老是害怕谁看见我在注射毒品就去叫警察。

我总是把注射器带到教室。以防如果有什么事把我们留在学校，例如一项特殊的活动或者我不能回家去，我就随时随地可以注射。学校的厕所的门没有一个能关得上。于是我的女伴就帮我把门顶住。她知道我的事。班上大多数同学跟她一样知道我的事。但是他们无所谓。在克罗比小区一个吸毒者算不了什么。

我上什么课都睡觉。有时候我干脆头趴在桌上，闭着眼睛。有时毒品的剂量太大时，我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老师们大概早就发现是怎么回事了。但是有一个老师有一天跟我谈起吸毒的事，甚至还问我是否有什么问题。其他的老师则只限于把我看成又懒又笨的学生，并给我打零分。总之，我们的老师多得很，他们中的大数人认为能记住我们的名字就算不错了。我们可以说从未与他们有什么个人之间的交往。

他们很快就对我不做作业不闻不问：我不再做任何作业。他们只是拿出记分册，他们刚一布置完一项作业，我就在我的练习本上写道：“我不知道。”然后交给老师，剩下的时间我就坐在课堂上乱写乱画。我的印象是，大多数老师对学校并不比对我更感兴趣。他们完全不负责任，他们讲课时，只要没有被学生起哄，他们就格外高兴。

过了那个很不错的星期天晚上——我第一次干了挣钱的活儿之后——有一段时间，一切仍然跟往常一样。

我每天都向戴特莱夫发表一篇讲话，向他解释我去偷窃倒没有关系，我不愿意让他一个负担我们俩的需求。戴特莱夫嫉妒得要命。但他也觉得不能继续这么下去，有一天，他建议我和他一道去找活儿。

他对识别嫖客已有一定的经验，他知道他们中有些人既是同性恋者又是异性恋者。一些鸡奸者也很想跟一个女子试一回，只要有一个小伙子在身旁就行。戴特莱夫告诉我选嫖客的方法：选择不做爱。不摸我的家伙。因为有些家伙只愿意别人摸他们。戴特莱夫愿意选这类家伙。他认为我们俩可以挣 100 马克，甚至更多。

我们俩第一个共同的嫖客是马克勒贝格。这是我们给他取的外号。他是戴特莱夫的一个常客，我也认识。戴特莱夫向我解释，这个顾客要求我做的，就是让我光着上身并且打他。

我同意了。我心想，这下我要发泄一下，狠狠地打他一顿。我对戴特莱夫的嫖客总是有一肚子怨恨。马克勒贝格满以为我会跟他们一起去。自然是双份的钱。我跟马克勒贝格约好星期一下午 3 点，地铁动物园见面。

不用说，我去晚了。马克勒贝格已在那里了。戴特莱夫没有来。戴特莱夫跟所有的吸毒者一样，不可能准时。我猜想戴特莱夫又接了一个客，大概这个客付的钱多，他不得不在这位客的家里多呆一会儿。马克勒贝格和我等了将近半个小时，戴特莱夫还是没有来。我怕得要命。但马克勒贝格显然比我更害怕。他不停地向我解释，他至少有 10 年没有与一个女人有过关系。

他说话时，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他总是结巴得很厉害，我勉强能听懂。

简直无法忍受，我必须想个办法。再说，我又没了可卡因，我害怕与马克勒贝格还没有搞完就犯瘾。但我越看见马克勒贝格焦急，对自己就越有信心。我最后很傲气地对他说：“来吧，朋友，戴特莱夫不守约。我一个人伺候你，你瞧着吧，我会使你高兴的。但是我们先要把价钱定好：150 马克。”

他结结巴巴吐出一个“行”，就转过身去。他满脸不情愿的样子。我抓住他的胳膊，完全由我领着他走。

戴特莱夫给我讲过马克勒贝格的忧伤故事。他是干力气活儿的，快 40 岁了，从汉堡来。他的母亲是一个妓女。他小时候挨打差点儿被打扁了。挨他母亲和鸨母们的打，在学校他也挨打。别人把他打得太狠了，所以他说话结结巴巴，现在，他总是需要一顿痛苦才能达到性满足。

我们到了他家。我立刻向他要钱，虽然他是戴特莱夫的一个常客，不必对他存这个戒心。他真的给了我 150 马克。我很得意，轻而易举就从他那儿得了这么多钱。

我脱掉 T 恤衫，他递给我一根鞭子。简直跟电影里似的。我觉得我不是我自己。开始，我打得不重。但他哀求我把他打疼，于是我就狠打。他大叫：“妈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听也不看他。可我立刻发现他身上的鞭痕都肿了，甚至有几处皮都破了。真可怕，鞭打持续了一个小时。

终于完了，我穿上 T 恤衫，立刻跑掉了。我大步跨着楼梯。刚一到室外，我就感到恶心，我就在门前呕吐起来。吐完之后就好了。我没有哭，我不可怜我自己。我很清楚我掉在泥潭里只能怪自己。

我到了地铁动物园站，戴特莱夫在那里。我没有向他讲什么。由于是我一个人接的马克勒贝格，我只是把 150 马克给他看。他也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张 100 马克的钞票。我们俩手挽手去买了许多上等的海洛因。这一天真不错。

后来，我几乎一直是自己挣钱给自己买海洛因。我非常成功，我可以挑选顾客并由我来定条件。从不选外国人。在地铁动物园站的女子们看来，外国佬是最差的一类，她们说：他们总是想骗人，又没有钱——他们一般付的钱超不过 20 或 30 马克——另外，他们做爱总是想搞个够，又不用避孕套。

我一直不和别人睡觉。这个只能留给戴特莱夫。这是我们惟一的私人生活。我只是用手干，后来采用“法国式”的方法，由我来摸那些家伙，而不是由他们来摸我，这样还不太可怕。我最不愿意让他们碰我。如果他们想碰我，我就骂他们。一点儿也不让步。

我总是愿意立刻就谈条件。我对那些很想与我纠缠的人根本不屑一顾。这种人不自爱，会占去我很多时间。找一个接受我的全部条件的合适的顾客，我往往要花整整一个下午。我们很少有像我第一次去马克勒贝格家那天那样手中有许多钱。

马克勒贝格是我和戴特莱夫共同的常客。我们有时一道去他家，有时分开去。马克是个诚实的家伙，很喜欢我们俩。显然，靠他劳作的工资，他不能继续付给我们 150 马克一次，可他总是设法给我们 40 马克——够买一针毒品的钱。有一次，他甚至把储钱罐给砸了，一分一分地给我数了 40 马克，又从一个茶托里拿了几个钱添上。我急需时，我能先从他那赊 20 马克。他有钱时，就赊给我。

马克总是有吃的东西给我们，给我的是桃汁，我最爱喝的饮料。给戴

特莱夫的是粗粉布丁——他最爱吃的。这是马克自己做的，而且冰箱里总是有。他知道我很喜欢干完活儿后吃点儿什么，所以他就买了酸奶酪和巧克力什锦。鞭打他对我来说纯粹是一种形式。一旦这个手续完毕，我就吃、喝、与马克聊天。

可怜的马克越来越瘦。他的钱都付给了我们，他却连肚子都填不饱。他很习惯同我们在一起，他与我们一起非常幸福。同我在一起时，他几乎不再结巴。他早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买报纸，只是想了解因吸毒过量而死亡的人数是不是没有增加。一天，我来到他家，准备打他一顿挣 20 马克，可我发现他脸色铁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结巴得厉害。他看到报纸上说，一个叫戴特莱夫·w 的人是今年无数海洛因的牺牲品之一。当我告诉他，我刚离开我的戴特莱夫，他活得很好时，马克高兴得快要哭了。他反复劝我们戒毒，这已经是第一百次了，他说那玩意儿也会把我们害死。我冷冰冰地回答他，假如我们戒了毒，就不会再到他那里去了。他不说话了。

我们跟马克勒贝格的关系很奇怪。我们恨所有的嫖客，也恨马克勒贝格。但是我们发觉这个家伙并不坏（大概主要是我们需要 40 马克时，他从来不找麻烦）。另外，我们有点同情他。实际上，这是一个比我们还不幸的顾客。他孤单一人，只有我们俩。他为了我们毁坏了自己，这点我们从未想到。以后，我们还会毁坏其他的人，我们的顾客们。

我们有时在马克家里过夜，我们睡觉前大家一起安安静静地看电视。他把他的床让给我们，他睡在地上。一天晚上，我们都处在吸毒的恍惚之中，马克勒贝格放着古怪的唱片，戴着一顶长假发，裹着一条上等皮毛的大衣，像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似地手舞足蹈。我们看着他，笑得要死。突然他失脚跌倒了，他的头撞在缝纫机上，他昏过去了几分钟。我们十分担心，叫来一个医生：马克是脑震荡。他为此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

不久，他失业了。他以前从未吸过毒，甚至从来没有试过。他现在身体彻底垮了，被可卡因摧垮了。他求我们去看他，只是看看他。但是不能向一个吸毒者提这种要求，这不合他的口味。首先，他不可能向别人提这个要求，另外，大概主要是他没有时间，他整天都在疲于奔命地弄钱，为给自己买毒品。戴特莱夫向马克勒贝格解释了这些，马克向我们发誓，他一旦有了很多钱就给我们。戴特莱夫不客气地说：“一个吸毒者就好比一个实业家。他每天都要密切注视他的收支平衡。他不能以同情或友谊的借口赊账。”

初次拉客后不久，我很高兴碰见了好朋友。一天，在地铁站，我在等一个客人……我看见了巴普西。这个小姑娘，几个月前在“音响舞厅”向我要过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巴普西屡次从家中逃跑，抓空吸几口海洛因，又被送回她祖父祖母家。

我们互相望着，立刻都明白我们走了同一条路，我们俩紧紧拥抱在一起，对重逢感到十分高兴。巴普西变得瘦骨伶仃，胸和屁股都没有了。但她比以前似乎更漂亮了。她的金黄头发垂在肩上，发式做得真绝，她非常妖艳。我立刻看出她吸足了海洛因。不用细看她的瞳孔，就能发现它胀得像大头针的头那么大。但是，我敢肯定某个不知道内情的人，不会马上想到这样一个迷人的少女是吸毒者。

巴普西很平静。不像我们其他人从早到晚都在搞钱。她向我解释，她不需要去当妓女，她可以给我注射用毒品和吃的东西。

我们走上台阶。无需讲叙我们各自所做的事情。但是巴普西没有立刻

告诉我，她从哪里弄来的这些钱和可卡因。她只是向我透露，自从她离家逃跑，她的家人对她格外严厉。她每天晚上7点到8点必须回家，根本不可能逃学。她的祖母严密地监视着她。

没办法。我追问她。她说：“我有一个常客，一个上了年纪的家伙，他人挺好。我坐出租车去他家。他不给我钱，光给我海洛因。每天给四分之三克。也有别的女子去找他，他也是这么做，他直接给她们海洛因。只不过现在，他爱上了我。我在他那里呆一个小时。当然，我不做爱。绝不这么做。他只是要我脱光衣服，跟他聊天，他不时地给我拍照，或者替他手淫。”

那个家伙叫亨利。他有一个造纸厂。我已经听说过这人，一个很不错的客，直接给海洛因，这样就可以避免东奔西跑地买海洛因。我羡慕巴普西，最晚8点就回到自己家里，安安稳稳地睡到第二天早上，比我们的生活安稳多了。

巴普西什么都有，甚至有一大堆注射器。他们用的是一次性使用的针管，很难搞到。我用的注射器，针尖都钝了，每次注射时，我都不得不在火柴盒的磷面上磨一磨。巴普西答应给我三个针管、三个针头。

几天之后，我碰见了施特拉，也是在地铁动物园站。施特拉是巴普西的朋友。我们相见彼此都很高兴。当然施特拉也在吸毒。她没有巴普西的运气好。她的父亲在一次事故中丧生，她的母亲跟一个意大利朋友开了一个小酒馆，并开始喝酒。施特拉总是到钱柜里去偷钱，但是有一天，她从母亲的那个朋友的钱包里偷了50马克，被发觉了。从那以后，施特拉再也不敢回家了。

我们俩立刻讨论起顾客。施特拉在我面前把她最好的朋友巴普西给贬了一通。原来巴普西已经彻底堕落了。那个亨利是个恶棍，是一个又胖又讨厌的老家伙。巴普西跟他睡觉。施特拉说：“要是我，这简直就算完了，跟这么一个家伙睡觉。另外，她随便就跟任何一个客睡觉，只差没跟外国佬睡觉了！经常用手淫，这活儿还可以干。可是怎么能做爱呢！”

我感到震惊，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施特拉这时向我讲这个。不久，巴普西告诉我，亨利是施特拉的常客。难怪施特拉对他的要求了如指掌。后来，我也去了亨利家。

施特拉后来告诉我，在地铁动物园站拉客是最“掉价的”。“在那里，尽是些被榨干了的女子以及外国佬。我才不能让讨厌的外国佬一天到晚缠着我呢。”

施特拉接的客是开车的人，在选帝侯街的“雏妓”角，那里的女子几乎全是十三四岁。

我认为这么做很可怕，随便钻进一辆小车，无法知道是在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我对施特拉说：“我认为，这比去动物园站还糟糕。有些女子这样干只能挣到20马克。要接两个客人才能买一针毒品，我真不能这么干。”

我们俩争论了近一个小时，争论是去地铁动物园站拉客“掉价儿”呢，还是在选帝侯街拉客“掉价儿”。但是，我们很快都同意一点：如果巴普西跟那个老家伙睡觉，那她比“掉价儿”的女子更“掉价儿”。

连着几个月，巴普西、施特拉和我几乎天天争论这个有关我们拉客的“名声”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竭力想向自己向别人表白，自己还没有堕落到最低的台阶。如果我们是两个人在一起，就说另一个人的坏话。

当然最理想的就是不要被迫去拉客。我跟施特拉重逢的那天，我们就

认为可以不去拉客：我们可以用扒窃或诈骗的手法来弄钱。施特拉很有一些点子。

她有一个最好的点子，于是我们立刻溜到一个大商店“卡德威”里去试验。在厕所里，必须等到妇女们关上小格子的门。一般她们都把挎包挂在门的把手上。一等她们宽衣解带坐在马桶上，我们就立刻从外面把门的把手猛地往下一扳，挎包就落在地上，我们能很容易地从门下伸手捡过挎包。那些妇女们自然不敢追我们到街上，她们穿好衣裤的那功夫，我们早就跑远了。

施特拉和我因而监视住“卡德威”的女厕所。但是每次施特拉都说：“快点儿，我都厌烦死了。”她不想一个人干，也确实需要两个人四只手，以便能尽可能快地把所有的包抢走。所以，我们在女厕所的行动失败了。而且扒窃又需要胆子大，我从来都做不到，也越来越不行了。

这类的尝试失败了几次之后，施特拉和我决定一起去拉客。去地铁动物园站，我坚持要去那里。我们两人一起拉客。拉客很要冒些风险。风险之一是我们喜欢悄悄地进行，但我们互相注视，彼此都知道对方同意去哪儿。俩人一起拉客有安全感，不容易被欺骗，如果一个嫖客不愿意遵守条件，我们就能够更好地防范。而且接客的速度也快得多：一个负责上半部，一个负责下半部，三下五除二就完了。

另一方面，找一个愿意给两个女子付钱的顾客不太容易。有些顾客害怕要两个女子；有经验的家伙知道，一个女子伺候他时，另一个女子可以很快地把顾客的钱包偷光。我们三个中间，施特拉竭力坚持要两个人一起去拉客：因为她看起来已经不怎么像孩子，她比巴普西和我更难拉到客。

巴普西最容易拉到客。因为亨利已经可以提供她所需的东西，所以她只是为我们干。她凭着她那一副 13 岁的天真少女的脸蛋——她从来不化妆——扁平的线条，她正是那些家伙到“小雏妓”角来寻找的对象。有一次，她一小时内接了 5 个客，挣了 200 马克。

戴特莱夫。阿克塞尔和贝尔恩德立刻接收巴普西和施特拉人伙。现在我们是三个姑娘和三个小伙子。我们出去溜达的时候，总是手挽手，我当然是挽着戴特莱夫。但是其他两对中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们只是一个很要好的小团伙。每个人都可以诉说自己的烦恼——实际上什么都说——向哪个伙伴说都可以。当然，大家又不停地吵嘴，这在吸毒帮里是家常便饭。我们堕落到这种地步，现在只是海洛因及其带来的问题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不敢相信除了连接我们小团伙的东西外，在不吸毒的青年人之间还会有一种友谊。吸毒帮，至少是“初学吸毒”的人中的这些哥儿们义气，对其他一些年轻人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巴普西和施特拉两个女孩子的到来，给我和戴特莱夫的关系带来了影响。我们像以前一样相爱。但是我们吵嘴越来越多。戴特莱夫动不动就发火。我跟巴普西和施特拉呆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他很不高兴。这是他最不能忍受的。以致于他不再帮我挑选嫖客。我就自己干，或者跟巴普西和施特拉一道干。戴特莱夫指责我跟嫖客们睡觉，他非常嫉妒。

我跟戴特莱夫的关系不再是我生活的中心。我爱他，我会永远爱他，但我不再依赖他。

我不再需要他不停地保护，也不需要他供给毒品。实际上，我们俩现在在许多年轻人所向往的那种现代男女之一：两个人各自都完全独立。我们小团伙中的女孩子们有的几天就戒了毒，而小伙子们却继续吸毒。

总之，我们的“友谊”说穿了只不过是吸毒者的友谊。我们全都变得越来越好斗。我们生活在海洛因和奔忙中，为了钱和海洛因每天都在搏斗，还要对付家里的人——必须不停地躲藏，编造新的谎言来欺骗父母——这一切把我们的神经搞得紧张得快绷断了。我们身上的好斗因素越聚越多，以至我们都不能自我控制，甚至在我们彼此之间也是这样。

我跟巴普西相处得最好；主要是她是我们中间最安静的一个。我们经常一道去拉客。我们俩买一样的黑色紧身超短裙。里面，我们穿上黑色连裤袜，系上吊袜带。这身吊袜带和黑色连裤袜装束在我们少女的身上，简直令嫖客们神魂颠倒。更何况我们的脸蛋还保留着稚气。

1976年圣诞节前几天，我爸爸动身去休假，他允许我回他住的屋子里住，那里只剩下我妹妹一个人了。他甚至还允许我把巴普西也领去。从第一天晚上起，我们就大吵一顿。巴普西和我拼命吵架，甩出一大堆粗话，吓得我妹妹——她比我小一岁——直哭。她显然不会想到我们的双重生活，而我们吵架时则使用妓女的伎俩。

第二天早上，巴普西和我又成了世上最好的朋友。总是这样，当我们睡了个好觉，我们又平平静静地回到现实，我们一般还是比较安静的。巴普西和我决定不要马上注射毒品，要尽可能地拉长注射的间距。我们经常这样做——一种真正的运动。讨厌的是，我们不谈别的，光谈有一针上等的可卡因在等待我们。就像两个等待圣诞礼物的孩子在想入非非。

我妹妹好不容易才明白我们不是处在正常状态中。她没有想到我们吸毒，她以为我们有别的原因。她很认真地发誓要保守秘密。

巴普西去找给白奶酪加香料的東西——今天，她选择了草莓香精——她最喜欢这个。她几乎只吃加香料的白奶酪。我的食品一点儿也不复杂：白奶酪、酸奶、布丁、选帝侯街地铁站卖的一种煎饼。我的胃承受不了别的。巴普西在准备她的混合奶酪。就像庆祝宗教仪式一样：我们三人都在厨房，巴普西郑重其事地在准备食品，我和我妹妹虔诚地盯着她。过一会儿，我们仨人将高兴地品尝这一堆早餐白奶酪。吃完东西，巴普西和我要去注射毒品。

巴普西搅拌完的奶酪，变成了一个大雪人。可我们已经等不及了。我们叫我妹妹先吃饭。我们俩立刻跑进浴室关上门。我们已经犯瘾了。

我们只有一只可以使用的注射器，我说我先打。

巴普西发脾气了：“为什么总是你第一？今天我第一。因为这是我的可卡因。”

这下气坏我了。的确，她总是经常比我们的可卡因多，因而会给我们一些，但是我不能忍受她拿得更多。我对她说：“听着，老朋友，你别夸口。你打针占的时间太长。”这是真的，她打针少说也要用半个小时。她的静脉看不见。假如她第一针没有扎准，她就惊慌失措，不断地扎，她会越来越慌。如果她最初扎准了，那真是运气好。

那时候，我没有这类的问题。或者由戴特莱夫给我注射——这是他的一个特权——或者我瞄准一个地方，自己用左手扎。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我胳膊上形成了血栓，我的皮肤成了毡纸。于是，我也找不到下针的地方了。

那天早晨，终归是我赢了。我拿着针管，一扎就扎准了，注射只用了两分钟。这一针打得很可怕。我的血液沸腾。我感到热，太热了！我用凉水冲脸，冲完之后我感觉好多了，我开始在屋里到处乱翻。

巴普西坐在澡盆边上，把针往胳膊上扎，又开始了她的“表演”。她喊叫：“混蛋，人都快憋死了！打开该死的窗户。”

我打了针，感觉很好，这个女子我不怕她。我回答她：“别来烦我。你嫌闷，是你自己我的。”

巴普西把血弄得到处都是，还没有找到静脉。她越来越紧张，大叫：“这屋里怎么没灯呢？给我拿灯去。到寝室里给我拿灯去。”

我很不情愿地去把灯拿来。但是巴普西还是没有找到静脉，我害怕我妹妹发现，最后我帮她注射。这样巴普西总算打完了针。她立刻安静下来，认真清洗针管，擦净澡盆上和地上的血迹。她不再说一句话。

我们回到厨房，我准备吃白奶酪。可是巴普西却抱着沙拉盆，一个人吃。她使劲强迫自己吃，把沙拉全吃光了。她只是对我说：“你最知道为什么。”

我们俩人都很高兴在我父亲屋里住了几天。从第一天早上起，我们就大吵一顿。什么原因都没有。因为我们是吸毒者，久而久之，吸毒者都成了这个样子。吸毒破坏他与别人的关系。甚至在我们的小团伙里——大概我们都还太年轻——我们相互间也争吵不休，我一直认为，这很不正常。

我跟戴特莱夫的争吵越来越凶。我们的身体已经被损坏了。我身高 1 米 69 却只有 43 公斤，戴特莱夫身高 1 米 76，只有 54 公斤。当我们感觉格外难受时——这是常有的事——我们都很烦躁，互相谩骂，都想骂到对方的痛处，突然甩出租俗的语言。对于戴特莱夫和我来说，痛处就是卖淫（当我们不吵架时，我们故意把这个看成是次要的，纯粹是例行公事）。

例如，他说：“你以为我想跟一个与肮脏的嫖客睡过党的女人睡觉吗？”

我说：“我最厌恶一个跟鸡奸者鬼混的人。”如此等等。

大多数的时候，我最后都要哭起来。情况也不总是一样：有时戴特莱夫什么事也没有，有时我们俩人都哭。当我们其中一人犯瘾时，另一个很容易把对方彻底击垮。随后俩人又像两个小孩似地，互相拥抱着蜷缩在一起，但这并不能改变什么。每个人都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堕落的身影。我们互相厌恶，因为我们都很丑恶，于是我们彼此攻击与自己干同样事的对方，想表示自己还没有丑恶到这种地步。

这种谩骂、好斗当然也发生在不认识的家伙们之间。在地铁站，我一看见提包购物的有钱阔妇人就发怒。于是，我嘴上叼着一根点燃的烟，钻进不准吸烟的车厢。如果她们表示抗议，我就对她们说，如果你们不高兴就请到别处去。我最喜欢从最后一排座的阔妇人的眼皮底下偷东西。这使全车厢的人都气愤，有时，人们粗暴地把我赶出来。我的所作所为我自己都气愤（看见巴普西和施特拉这样做我也生气）。但是我又不能制止住我的行为。

我完全不再管别人怎么看我。当我浑身痒得难受时——随时都会出现，一件衣服碰了你，甚至只是隔着化妆层——我就搔痒，根本不管旁人。我一点儿也不难为情地在地铁里脱下靴子，或者把裙子撩到肚脐，我惟一看重的，是小团伙的伙伴们对我的看法。

在吸毒帮里，有一阵子什么都不重要。吸毒者到了这种地步，他也不再属于哪个团伙。

我认识几个“老吸毒鬼”——他们注射毒品已经至少五年了，还没有死。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很复杂。这些铁石心肠的人给我们印象很深，我们给

他们的评语是：个性很强。给人讲认识他们，对我们有好处。另一方面，我又瞧不起他们：他们才是彻底的堕落。尤其是他们使我们这些年轻吸毒者产生恐惧心理。这些家伙连一丝一毫的道德、良心或同情心都没有了。一犯瘾，他们能痛打你，让你交出可卡因。这伙人中间最坏的一个叫马努·勒—菲鲁。所有人都这么叫他，他的外号对他真是名副其实。一看见他，那些卖毒贩子溜得比见了警察还快。

只要他抓住一个卖毒贩子，就把可卡因全抢走。很简单，他一个人用。没有一个人敢反抗。

所以，至于那些小吸毒者们，就可想而知了……

有一次，我正在注射时被他撞见。我刚刚躲进一个厕所里打针，突然我看见一个家伙从隔板上跳下来，正好落在我面前。是马努·勒—菲鲁，别人早就告诉过我，这是他的惯用伎俩：躺在女厕所，等一个女子进来注射毒品。我知道不给他肯定要打人，便立刻把毒品和针交给他，他走出去，站在一个镜子前，自己打针。往脖子上打。这个家伙什么也不怕，这是他惟一还能扎进针的地方。他像一口猪似地喷血。我想他大概把针打进了动脉。他不再看。

对我说：“谢谢。”就走了。

至少我永远不会达到这种程度。我敢肯定。因为要想跟马努·勒—菲鲁活得一样长，必须身体非常结实。我可不是这种身体。

在我们的小团伙里，一切都越来越围着拉客和接客转。小伙子们的问题跟我们的一样。

大家还是互相感兴趣，互相帮助。我们小团伙里的女孩子也互相交流经验。慢慢地，我们接客的圈子缩小了。对于我来说是新客，大概早已是巴普西和施特拉的常客。必须搞清楚怎样坚持。

有些嫖客好一些，有些差一些，有些家伙最好是要避开。这种分类的方法，人的好恶感不起什么作用。我们对于嫖客的职业。家庭情况等等也不感兴趣。我们从不谈论他们告诉过我们的他们的私生活。我们只注意他是否是一个“好顾客”。

“好顾客”的含义之一就是，他非常害怕传染性病，因而使用避孕套。可惜这种人太少了。大多数女子都是业余拉客，最后都染上了病。她们不去找医生看病，害怕医生发现她们吸毒。

“好顾客”也指只要对方替他手淫，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要求的家伙。这样可以避免讲条件浪费时间。但是我们把下列这类人也算在“好顾客”之列：他比较年轻，不太胖，不把我们当商品看待，对我们比较好——有时甚至还经常邀请我们吃晚饭。

但是最主要的标准，当然是出的价钱：他愿意按对方的服务来付钱，应该避免的是：不守信用的家伙，一到了旅馆，就以威胁来欺骗，或者用甜言蜜语说服你增加服务项目。

后来，我们女孩子之间就最坏的顾客互相交换情况——尽可能详细地描叙顾客的外貌特征：那些事后就用武力把钱抢夺回去的家伙，其借口是他们不满意。

1977年到了。我几乎什么也感觉不到。春夏秋冬，圣诞节或新年，对于我来说，每天都一样。这些节日临近，我就只可以接到一、二个客，所挣的钱就相当于圣诞礼物了。总之那些过节时日，几乎没有客。我连着几个星

期如同在云雾里。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感觉不到。我完全只想自己，但是我却不知道我是谁。有时，我甚至不清楚我是否还活着。

这个阶段只有几件事我勉强记得。而其中任何一件都不值得我的脑子去记它。

一月底的一个星期天。

清晨我回到家里，感觉很好。睡在床上，我想自己是一个刚刚从舞会回来的小姑娘。她认识了一个很可爱的小伙子，她爱上了他。现在我只有在梦中才感到幸福，我梦见我是另外一个人。我最喜欢做的梦，就是梦见自己是一个幸福的十几岁的少女，就好像可口可乐广告牌上的那个一样。

中午，我妈叫醒我，并且把午饭给我端到了床上。我星期天在家时，她总是这么做。我强迫自己吃了几口。太难下咽，除了酸奶。白奶酪和烘焙以外的任何东西。我拿起我的塑料包：它已破旧不堪，提手没了，到处都开了口子，因为时常把我的外衣往里塞，还有针管和香烟。我什么都不在乎，根本想不到该换一个包了。更想不到提这包应该避开我妈。我夹着包，走进浴室，把门关上。在我家，别人都不关门。同每天一样，我已经不认识镜子里的我了。这副面孔不是我的。这副皮包骨的身架也不是我的。我的身体没有什么感觉。生病时，身体甚至都无反应。海洛因把身体弄得不知道饿，不知道温暖，不知道发烧。只是犯瘾时，身体才有感觉。

我站在镜子前，准备注射。我极其渴望打一针。这一针有点特殊，因为是灰色毒品。我们这么称呼以区别白的——白色的或近白色的毒品——一般市场上常见的。灰色毒品是一种灰里带绿的粉末，很不纯的海洛因，但它可以直接作用于心脏，所以用量大小要格外小心：如果用多了，人就会死，但是我强烈渴望这一瞬间的刺激。

我把针扎进静脉，我开始喘气，血立刻涌上来。我过滤了几遍灰毒品，但它还是含了大量的杂质。这下好了：针头被堵了。这是最糟糕的，针头正好在节骨眼上堵住了，因为如果血凝在针管里就毫无办法，只能扔掉药品。

我使劲推针管让那些脏东西流过去。我的办法还好，又能使了。我又把针扎进去想一直打完最后一滴。针头又堵了。我气坏了。还有八到十秒我就可以有闪电般的效果。我用全力支撑着自己。心脏飞速跳动，鲜血喷涌，澡盆里满是血。

原来，闪电般的刺激的说法是假的。只是心脏区产生阵阵巨大可怕的痉挛。就像有千万根针扎我的头皮。我用两手抱住头想阻止它开裂——就像有人在打我的头。突然我的左手瘫痪了。

等我能动弹时，我用擦洗刷把澡盆的血迹擦掉。洗脸池、地上、墙上到处弄得都是。好在都有油漆层，很容易擦掉。我正在擦洗，我妈来敲门。她大叫：“开门。让我进来。为什么关门？这又是你的一个怪毛病。”

我说：“得了。我马上就完。”她搞得我很紧张，偏偏在这会儿烦扰我。我像一个疯子似地赶快擦。我慌慌张张，有几处血迹没有擦掉，又把鲜红的擦洗刷忘在洗脸池上。我一开门，我妈就进来了。我什么也没想，只以为她要小便。我拿起塑料包回到寝室，又躺下，点燃一根香烟。

我刚吸了一口烟，我妈就冲进我房间。她大叫：“你吸毒！”

我说：“你没睡醒。谁让你这么说？”

她扑向我抓住我的胳膊。我也不反抗。我妈立刻看见刚打的针眼。她拿起塑料包，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在床上。注射器、烟丝、羊皮纸片，都掉了

出来。纸片用来包海洛因，我总是留着这些纸片：我犯瘾而又不可能弄到毒品时，我就用指甲刮纸片，用刮下来的海洛因末打一针。

我妈不再需要其它的证据。另外她一看浴室的情景就完全明白了：除了刷子和血迹，她还捡到了炭黑——我加热毒品时从勺子里掉出来的。她早就读过有关海洛因的文章，对这玩艺儿也略知一二。

我不否认。我泄了气，尽管我刚打了很可怕的一针。我哭了，说不出一句话。我妈什么也没说，她浑身发抖。这对她震动很大，她走出了房间。

我听见她与她的朋友克劳斯谈话。她又回来。一会儿，她看上去稍微平静了一点儿，问我：“你不能抵制那玩艺吗？你不愿意戒毒吗？”

我回答她：“妈妈，老实说，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你可以相信我。我实在想摆脱那个肮脏的玩艺儿。”

她说：“好，那我们一起来。我去请个假，以便能在戒毒期间一直陪伴你。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说：“太好了。但是还有一点儿事。没有戴特莱夫我戒不了毒。我需要他，他也需要我。他也想戒毒。我们以前经常谈论这件事。”

我妈很惊讶：“什么，戴特莱夫也吸毒？”她以前认为他不错，很高兴我有这样一个热情的朋友。我回答：“戴特莱夫当然也吸毒。你还以为我一个人吸毒？他本来不准我吸毒。

但他也不愿意我一个人戒毒。”

我突然感到很好。我一想到戴特莱夫要同我一起戒毒就很高兴。再说这也是我们很久以来的一个计划。但是我妈的状态极其悲惨，脸发青。我心想她随时可能晕过去。戴特莱夫的事使她又遭到一次打击。让她知道这事已经持续了两年而她却一无所知，什么也没有觉察出来，这也是沉重的一击。现在，她又开始怀疑，想知道我从哪里弄的钱。她很快想到了：卖淫。

但是，我不能。我没有勇气告诉她实情。我撒谎：“我扒窃。我总是可以找到一些人给我马克。我也时常去给别人干家务活儿。”

我妈不再问下去。同往常一样，她很高兴听见我的话减少了她的担心。总之，她今天知道了很多事情。她还算不错，她可怜我。看见她这样做使我很内疚。

我没有浪费时间，立刻动身去找戴特莱夫。他不在地铁动物园站。他也不常去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家。

晚上，我们去看戴特莱夫的父亲。他的父母也离了婚。他父亲是一个职员。他很早就知道戴特莱夫吸毒。我妈责怪他从来没有对她说起过这事。他几乎快哭了。儿子吸毒又卖淫，对他来说这太可怕了。他很高兴看见我妈果断地做出决定。他不停地说：“是的，应该想点办法。”

戴特莱夫的父亲在抽屉里存了许多安眠药和镇静剂。他都给了我。因为我告诉他，我们没有瓦尔隆。没有瓦尔隆，戒毒太可怕了。我拿了4、5个曼特拉克，50个瓦里姆。回家路上，在地铁里，我吞了一把药片，因为我感觉要犯瘾了。药比较管用，我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早上，戴特莱夫来敲我家的门。他正在犯瘾。我认为他这样来我家里很好，说明他没有打针。他知道我没有可卡因。他说：“我跟你一样准备戒毒。”多么好的小伙子！

戴特莱夫跟我一样真心希望戒毒。他对所发生的事感到高兴。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父母也不知道——两人一起戒毒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经常是其中的一个重又吸毒，把另一个也拉下水。我们听说过戒毒，但我们却抱有幻想。我们自以为我们与别的吸毒者不同。我们仍旧觉得我们其中一人去戒毒，是不可想象的。

多亏了戴特莱夫的父亲给的药片，早上算平安地过去了。我们谈论着我们“今后”的生活——我们把它看成是玫瑰色的——我们决定明天或以后，一定要勇敢地挺住。我们很幸福，尽管痛苦又来了。

下午，我们又犯瘾了，难忍难熬。我们大把地吞咽着药片，用一杯杯的酒送下去。但无济于事。我的腿突然不听使唤，腿弯得像灌了铅。我躺在地上伸展腿，想把它伸直，活动活动肌肉。但是我的腿不听使唤。我把腿靠在衣柜上，腿紧贴着衣柜，但无法伸直。我滚到地上，可我的脚却不知为什么紧贴着衣柜。

我出了一身冷汗，眼睛里都是汗水，我很冷，直发抖，这个该死的汗出得要命。这大概是我身体的各部位在往外冒毒品。我简直像经历了一场驱魔法。

戴特莱夫更糟糕。他完全爆发了。他冷得发抖，可又脱掉了衬衫。他走到我喜欢坐的位置上，靠窗户的一个角落。他好像是跑到位置上去的：他的腿细得像火柴棍，不停地走动，可怕地颤抖着。甚至已经不是发抖，简直是“地震”。他不停地擦掉满脸的汗水，他弯成了两节，痛苦地吼叫着。他的胃在痉挛。

戴特莱夫发出的臭气比我还要厉害。我们把整个屋子弄得很臭。我记得听说过吸毒者的友谊从来抵挡不住成功的戒毒，但我还是爱戴特莱夫。尽管他发出臭气。

戴特莱夫爬起来，拖着身子走进我的寝室，站在镜子前说：“我受不了了。我戒不了毒。真的受不了。”我没有话回答他。我没有力气说出鼓励的话。我尽量不像他那样去想。

我竭力强迫自己去想一本惊险小说。我翻动着一本画报，我难受时就撕掉它。

我的嘴和嗓子干得要命，可嘴里又满是口水，吞也吞不下去。我光咳嗽。我又呕吐了。

地毯被弄得很脏。吐出的是一种白色沫状的东西——我的狗吃了青草后吐出的就像这种东西。我咳嗽，呕吐，又咳嗽又呕吐……

我妈一直呆在客厅。当她来看我们时简直不知所措。她不停地跑商业中心买一些我们根本咽不下去的东西。最后，她给我拿来了最好的麦芽糖。这个还行，我的咳嗽止住了。我妈打扫地毯。她真不错，可我连“谢谢”都没有力气说出来。

后来药片和酒还是起了作用。我吞了五片瓦里姆和两片曼特拉克，又几乎喝光了一瓶酒，这是一个常人几天才能消费掉的东西。我的身体刚开始有所反应，因为它在戒毒。至少现在我安静了。我躺在床上。我的床旁边又安了一张床，戴特莱夫也躺下了。我们谁也没碰谁。每个人完全被自己消耗干了。我处于半睡眠状态。我睡着了，但却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感到种种痛苦。我做梦，我思考。一切都同时进行。我觉得每个人，尤其是我妈，都能够像看一本书似地看透我的肮脏的想法。看见我有许许多多恶心的东西。我厌恶我的身体。如果它能被掏空，能脱离掉我就好了。

晚上，我又吃了几种药片。一个正常人吃这么多药是会死掉的，而这

只能让我睡上几个小时。一个梦把我弄醒：我是一条狗，人们对我很好，有一天，人们把我关在一个笼里折磨至死。戴特莱夫乱伸胳膊腿，猛地一下把我打醒。灯点亮了。我床旁边是一床全是水的被子和一条浴巾。我妈把它们拿走了。我擦了一下满是汗水的脸。

戴特莱夫睡得好像很死，但他整个身体在抽动，他的腿在蹬，胳膊在晃动。

我现在感觉好点了。我有了力气，用浴巾给戴特莱夫擦额头上的汗。他一点儿也没有察觉。我知道我一直爱他，狂热地爱他。过了一会儿，我迷迷糊糊——我又困了——我感到戴特莱夫在用手理我的头发。

第二天早上，我们明显好多了。按老规矩，戒毒的第二天会更厉害，可我们不是这种情况。这是我们第一次戒毒，比后来我们的戒毒容易多了。中午，我们甚至开始说话。开始是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后来又谈起我们的未来。我们发誓再也不吸海洛因和 LSD，也不吃药片了。我们想过宁静的生活，置身于安静的人中间。我们将吸大麻，同以前一样——对于我们，那时候是最好的阶段——因为我们想结识吸大麻烟的朋友，这些人一般很和气。而对酗酒者，我们要避开，那是些好斗的家伙。

戴特莱夫将去找工作。“我得回去看我以前的老板，我告诉他我曾经胡说八道，现在我明白了，我变得讲道理了。我的老板总是很能理解人。我要重新开始我的学徒工作。”

我呢？我要当一个勤奋学习的学生，我要获得毕业证书，争取参加中学毕业会考。

这时，我妈进来了。一个好消息：她去找医生开了瓦尔隆的处方。戴特莱夫和我遵照医嘱每人吃了 20 滴。瓦尔隆对我们很有效。我们只是得注意不要过度使用，那瓶药我们必须用一个星期。我妈为我们准备甜食——我们饿极了。她给我们买来冷饮。总之，一切我们想要的东西。一大堆书报杂志和连环画。以前，我认为连环画最没意思，现在我不只是翻一下。戴特莱夫和我一起仔细地看，几乎每一页的画面，俩人很可笑地弯着腰看。

第三天，我们坚持住了。当然我们总是在吃药：瓦尔隆，也吃一些瓦里姆，全都用酒送下去。我们的身体还时常在抵抗戒毒并释放毒素，但总的来说，我们感到很好。第三天晚上，我们很久以来第一次做爱，因为海洛因使得我们没有性欲。自从我首次做爱以来，这是我们第一次不是处在恍惚状态中。真是好极了。很久以来，我们就曾这样相爱，这样亲密。

我们久久地躺在床上，互相抚摸；我们还在出汗。实际上，我们第四天就可以起床，但我们又在床上躺了三天，互相亲热了一番，让我妈周到地照顾我们，又吃了许多瓦尔隆、喝了许多酒。我们认为戒毒也不可怕，摆脱了海洛因真好！

第七天，我们起了床。我妈很高兴。她拥抱我们。我们刚度过的这个星期改变了我同我妈的关系。我对她怀着一种类似友谊和感激的心情。我也很高兴重新得到戴特莱夫，重新得到这个幸福。我总是认为这样的小伙子世上再找不出第二个。如果对于其他的吸毒者，戒毒扼杀了爱情，那我们正好相反，我们比以前更加相爱。真是太妙了。

我们对我妈说想出去透透空气；我们关在小屋子里呆了一个星期。她同意了。“我们上哪儿去？”戴特莱夫问我。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向他提议。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没有地方可去。我们所有的伙伴都是吸毒者。所有我

们认识的地方，我们仍感到自在的地方，都是我们注射毒品的地方。去看那些吸大麻的伙伴们吗？我们不想再跟他们有什么来往。

突然，我感到不太好。我们没有瓦尔隆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点紧张，想出来走走的原因。但是我们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我忽然感到精疲力尽，空空荡荡！海洛因，别了。

可我们不知上哪儿去。

我们向地铁走去。甚至没有做决定，我们就机械地向那个地方走。我们无意识地、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住一样。我们又来到地铁动物园站。戴特莱夫从我们动身起，就一直沉默，现在终于开口了：“至少应该去向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说声再见。他们大概还以为我们坐班房或进坟墓了。”

我忽然松了一口气：“当然。应该告诉他们我们戒毒了。大概我们还能说服他们也这样做。”

我们立刻碰到了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他们有许多可卡因，这是很不错的一天。戴特莱夫向他们讲了。他们认为我们做得好。在祝贺了我们之后，他们说他们要回家去打针。戴特莱夫和我互相看了看。我们的目光碰到一起，都笑了。我冒出一个念头：“第一天肯定很疯狂。”戴特莱夫说：“你知道，我们可以偶尔打一针，这样最好，只要不依赖它就行了。必须注意不要重新依赖毒品，因为我想象不出还会戒一次毒。”

我兑：“当然，偶尔打一针，太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准备，我们知道防备海洛因。”我完全失去了理智。我只有一个念头：打一针。

戴特莱夫对阿克赛尔说：“你能给我们一点儿吗？有机会我们就还你，一言为定。”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认为我们最好还是考虑考虑，并告诉我们，下个星期他们也要像我们一样去戒毒。只等去找瓦尔隆了。重新找工作，只是偶尔打一针，这该多好。

离开我妈的房间才两个小时，戴特莱夫和我又处在注射毒品后的恍惚状态之中。这太妙了。我们手挽着手在选帝侯大街闲逛。在虚幻状态中散步简直太妙了，不急不慌，也不为第二天的可卡因操心。戴特莱夫很高兴地对我说：“明天早上我们做做锻炼，一天不碰海洛因。”

我们自以为像铁一样坚硬。我们天真地认为在我妈屋里度过的难受难忍的一个星期是一次真正的戒毒，虽然我们的身体注射了海洛因。但是相应地，我们又吃了瓦尔隆。瓦里姆，等等。我们甚至没想一想在肉体上戒毒以后怎么办。我妈也太天真。她很希望我们摆脱那玩艺儿。她怎么能想到她的愿望落空了？

实际上，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见过的例子多了。但是我们不愿意正视这些事实。再说我们还是孩子，太幼稚的孩子。再多的教训，也改变不了我们。

我们坚持了近一个月。我们成功地做到了我们发誓的：不拉客。我们有一点钱时偶尔打一针，或者别人给我们一点儿海洛因。只是——当然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总是在伺机寻找弄钱的办法，或者找好心的人给我们海洛因。

这一个阶段很不错。我没有上课——我妈想让我在戒毒的头几个星期过得愉快。她同意戴特莱夫继续住在我家。戴特莱夫又重新向我显露他的个性，我更加爱他，尽可能地爱他。

他没有忧虑。快活，想法多极了。我们俩心情一直很好，充满了活力。

至少我们装成这个样子。

我们在森林中散步。有时，我们带着我的两只小猫，我们让它们爬树。我们几乎天天晚上做爱。一切都很好。我们有时连续三天不注射毒品。当我们弄到海洛因，我们便赶快离开肮脏的地铁动物园站。我们喜欢去的地方是选帝侯街：我们混在有钱人的人群中散步。实际上，我们应该像他们那样——只有一点儿不同。总之，我们想向世界显示，虽然我们注射过毒品，但我们不是吸毒者。

我们去迪斯科舞厅，完全陷入虚幻状，我们看见其他的人——有教养的年轻人和有钱人——我们认为我们几乎跟他们一样，完全不是吸毒者。有时，我们一整天都呆在屋里。我趴在窗户上，戴特莱夫抓住我的腿，我就能摘到几片树叶。我们拥抱亲吻，我们像疯子似地看书看报，一天的四分之三时间我们像两个快活的傻子一样。我们从不认真谈论我们的未来。

有时候我忽然觉得不舒服，但这种情况很少。当出现这种问题，例如，戴特莱夫和我就一个很愚蠢的事情争论起来，我想不通时就反复思考，我害怕有时候为了一点儿愚蠢的小事失去自我控制。这时候，我往往想打一针——因为它一下子就可以驱散任何烦恼。

但是真出现了一个问题。克劳斯，我妈的朋友，因为戴特莱夫而找了许多麻烦。他说房子太小不能让一个外人住在里面。我妈不敢反驳他。而我呢，只有再一次无能为力，如同克劳斯命令我把我的狗弄走的那天一样。一切全完了。美好的日子又结束了。我必须回学校，戴特莱夫不能与我过夜。

我没有觉察到我已缺了三个星期的课。总之，我很久以来就缺课了。我又有了一个新问题：抽烟。我没有吸毒时。我一天抽四五包烟。久而久之，从第一节课起，我就支撑不住了，我走出教室到厕所里抽几支烟。我一上午不停地抽，抽得直恶心：我呕吐在卫生纸上。

我很难得真正坐在教室里。

三个星期以来第一次，我一整天没有见到戴特莱夫。第二天，我有一个预感，我放学后跑到地铁动物园站。我的戴特莱夫在那里。他在等那种人。

我很厌恶地看着他站在肮脏的地方等待恶心的家伙。他向我解释他一个钱也没有。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又去阿克赛尔和贝尔恩里德家去睡觉，每天来地铁动物园站拉客，又每天打一针。如果我想见他，我也必须回到动物园站。我只有他。没有其他的人。我不能没有他。因而我又回去了，几乎天天在地铁动物园站。

母亲的诉说

那个星期天，就在那个星期天，我在浴室里看见了溅出的血迹，我检查了克丽斯蒂娜的手臂，我知道我错了。这是沉重的一击！克丽斯蒂娜就是这样展示了我曾引以为自豪的教育的成果。那一天，我明白我把一切都看错了，而这不过是因为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要重复我父亲在教育方面的错误。

比如，当克丽斯蒂娜开始频频出入于“音响舞厅”时，我并不怎么高

兴。但她的朋友凯茜和“团伙之家”的其他年轻人都去那里，所以，我想，好吧，干嘛要禁止克丽斯蒂娜去呢？我记起我当姑娘时代被父亲剥夺的那些元害的娱乐。

当克丽斯蒂娜给我介绍了戴特莱夫，我还是表示应允。她是在“音响舞厅”认识他的，他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彬彬有礼，态度开朗，和蔼可亲。

一个挺可亲的男孩子，是吧？所以我发现克丽斯蒂娜爱上他是正常的。我想：这正是初恋的年纪，要紧的是男孩子要好。而且，我还看出来他真地爱我的女儿。

假如当时有谁告诉我这两个孩子在注射毒品，我一定会把他们当成疯子。除了她对戴特莱夫的感情之外，我在克丽斯蒂娜身上没发现什么特殊的东西。

相反地，她显得比以前——曾有一段时间，她激烈地反抗——显得安静而镇定，就是在学校里，她的表现也似乎好一些了。

她每天放学后都要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打算干么：到一个女同学家里去啦，到工厂门口等戴特莱夫啦，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指责的。

在一周之中，一般她是回家吃晚饭的。假如她回家晚一些，就会打电话给我们。有时候，饭后她还会出去，到“团伙之家”或去找朋友——至少，她是这样告诉我的。

在家里，她也开始帮我一点忙了。我呢，为了酬答她，有时候也给她一些小礼品：一张唱片啦，多给一个马克的零用钱啦，但我的朋友克劳斯不同意，他认为，克丽斯蒂娜在剥削我，我应该多想想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可能是对的。但我总觉得该为克丽斯蒂娜做些特殊的事，应该补偿她某些东西。只是当时我没分析得这么清楚。

我的男友还认为允许克丽斯蒂娜在她的女伴家过夜是错误的。实际上，说她到这个或那个女友家过夜，他是不相信的。不过我确实不是窥伺她行动的那种人。我父亲曾经时时地监视我，而我并没有干过什么有愧于心的事。

后来有一天，克丽斯蒂娜对我说她已经和戴特莱夫同过房了。“妈妈，”她说，“你都想不到他对我多么好。”此时我明白了，至少我认为我明白了她为什么总愿意在星期六晚上睡在女朋友家。

好，终于到了这一步。但我也觉得有什么可怕，所以有那么两三次，我允许她到戴特莱夫那里去过夜。

我怎么能阻止他们一起过夜呢？何况在电视里、在报纸上，心理学家们不是反复地说今天的青年成熟得早得多，不应该压抑性欲。到处都是玩世不恭的嬉皮士。再说，这也是我的观点。

至少克丽斯蒂娜有了一位固定朋友了，这使我安心。周围的一些姑娘就像换衬衫那样更换男朋友，这我见得多了。

在另一方面，正派的方面，我又感到局促不安，特别是因为克丽斯蒂娜在“音响舞厅”结识的那些朋友，她告诉我他们中有些人在吸毒。她从没和我说起过海洛因，只是说大麻或失足，她告诉了我一些吓人的事，她甚至悄悄告诉我说，她的女友巴普西就是个瘾君子，但是她描述这一切时的方式和表情表示了她的厌恶，使我一刻也没想到她也是这么干的。

而当我问她：“可你为什么总和这些人在一起呢？”她回答我，“妈妈，我觉得他们可怜，没有人愿意和他们打交道，可是他们需要人帮助的呀，要

是有人跟他们聊几句，他们可高兴了。”克丽斯蒂娜有副好心肠。今天我才知道她是在说她自己。

一天晚上，那正好是一周的中间，她回家很晚，快11点了。她对我说：“妈妈，求求你，别生气。我和一些伙伴到青年吸毒接待站去了。在这些地方，人们和吸毒者谈话，试着挽救他们。”她奇怪地轻笑了一下，补充说：“就是这样。要是有朝一日我吸上了毒……”我吓坏了，盯着她。“啊，我不过说说而已——对我，这不是个问题。”“那戴特莱夫呢？”我问。她气冲冲地说：“戴特莱夫吗？没问题，他就差干这个了！”

这是发生在1976年底的事。从这天起，我有所怀疑，但我克制住了，而且我也不相信我的男友的话。他当时坚信克丽斯蒂娜在吸毒，用什么打赌都行。但是我什么都听不进去。

作为一个母亲，要她承认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失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很固执：“不会的，我的女儿不会这样！”可我还是试着约束她。但我明白地命令她回家吃晚饭，她没回家。我能怎么办？我到哪里去找她？即使我不是那样善于克制自己，我也永远不会想象到是在地铁站。我挺高兴，因为快9点钟的时候，她给我打来电话：“别着急，妈妈，我马上就回去。”

有的时候她也听我的话。我听到过她在耳机里几乎是骄傲地对她朋友说：“不，今天我不出去了。家里不答应。”好像这并不使她不高兴，这种矛盾确实很奇怪。一方面，她不服管教，肆无忌惮，根本没办法和她谈话；另一方面，当你给她描绘出清晰的行为准则时，她好像也愿意遵循。不过，这时候已经太晚了。

真相大白是在1977年1月末的一个星期日，那真是可怕。我想进浴室，门却锁着，这在我们家是不平常的。克丽斯蒂娜把自己关在里面，而且不开门。这时候我明白了，一下子明白了，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一直在自己骗自己，只是我还不能立即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我用力地敲门，但克丽斯蒂娜就是不开门。我觉得自己像疯了一样，我求她开门，我骂她，最后，她开了门，跑了出来。我在浴盆里看见一把烧黑了的勺子，墙上有些血点。这就是证据，这就是证明，正像报纸上所描述的那样。我的男友只说了一句：“现在你相信了吧？！”

我跟着她进了卧室。我对她说：“克丽斯蒂娜，你干了些什么呀？”我彻底地垮了。全身颤抖着，我不知道是哭好还是喊好。但是，首先我得和她谈谈。她悲悲切切地哭着，也不看我。我问她：“你注射海洛因了？”

她没回答我，她呜咽着，说不出话来。我用力拉直了她的手臂，看见了痕印，两只胳膊上都有。但还不显得可怕，皮肤没有变成蓝色，只有二、三个针孔，包括最后一针在内。还不能说明什么，只不过有点发红。

她眼泪汪汪地承认了，在此时此刻，我想：“我要死了。”我觉得我真的想死。我这么失望，连思维的能力都没有了。脑子里空空如也。我说：“现在可怎么办呀？”我真的向克丽斯蒂娜提了这个问题——我彻底地失望了。

这是沉重的打击，是我总是想避免或尽量地拖得迟一些的打击！但是，应该说当时我并不了解吸毒者的症状。克丽斯蒂娜并不显得疲倦，大部分时间我都觉得她快活而精力充沛。

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中，我仅仅注意到有时候她回家晚了，就直溜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去，我把这看作是她因为迟归而心有愧疚。

当我平静一些之后，我们考虑了能够干点什么。必须让他们戒毒，不

然的话，迟早有一个会让另一个重蹈覆辙，这个我非常清楚。我们决定立即在家里开始戒毒。

克丽斯蒂娜似乎什么都不想对我隐瞒。很快她就承认，是戴特莱夫向同性恋者卖身挣来钱购买海洛目的。多大的耻辱！我被吓得目瞪口呆。但是，她没告诉我她干什么。我毫不怀疑，她是爱戴特莱夫的。这还会是假的吗？她说，他挣的钱总够买海洛因的。

克丽斯蒂娜不停地、不停地重复着：“相信我，妈妈，我想摆脱这玩艺，我向你保证。”就在当天晚上，我们二人出去寻找戴特莱夫。这是我第一次留意到这些瘦骨嶙峋、可怜巴巴的生命在动物园地铁站上逛来逛去。克丽斯蒂娜对我说：“我可不愿意落这么一个下场。你看这些家伙，他们彻底地完蛋了！”而她自己，似乎处于比较正常的状态，我几乎感到安心了。

我们没有找到戴特莱夫，便到了她父亲家。他已经知道了他儿子的事，但他不知道克丽斯蒂娜也在吸毒。我责备他为什么不早一些告诉我，他说，因为他感到羞耻。

他好像松了一口气，他愿意在金钱方面帮助我们，直到此时为止，他还没有见到过一个愿意帮助他儿子的人。在他眼里，我好像是上苍派来的天使，我自己也觉得是个强有力的女人。要是我知道支持我的是什么……

第二天，我独自一人出去征询意见。第一步：“儿童救济会”。我对他们说：“我14岁的女儿使用海洛因毒品，我该怎么办？”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把她送到一家训导学校去？“没问题。”我对他们说。可克丽斯蒂娜会觉得是被人遗弃了。此外，他们也不能给我提供地址。首先觉得找一家这样的学校要花很多时间，而且在一个好的为患有性格障碍而设的中心也不易找到位置。我对他们说：“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女儿没有儿童障碍，她吸毒。”他们看了看我，耸耸肩膀而已。最后，他们建议我把克丽斯蒂娜带到一位教育顾问那儿去。

我建议克丽斯蒂娜这么办的时候，她说：“这都是些废话，他们什么也没弄明白，我需要的是治疗！”关于这方面，几个单位都没能提出什么建议。我把毒品咨询中心，技术大学、卡里塔斯协会都转了一圈，我还知道什么呢？我真不知道从何处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人们告诉我在家里戒毒风险很大，不加治疗的戒毒持续不会很久。但是考虑到我女儿还很年幼，还可以试一试。反正在三个月之内没有治疗床位。人们还给了我一些营养学方面的建议，以便更好地对付毒瘾发作时的征状。

这还有效，我又燃起了希望。八天之后，我肯定他们已经度过了难关。感谢上帝，克丽斯蒂娜开始按时上学，而且，好像也开始学习了。

但很快她又开始闲逛了。啊，她总是告诉我她在什么地方。晚上8点钟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向我解释：妈妈，我是在这个或那个咖啡馆，我遇见彼尔或保尔了，我马上回家。

现在，我警惕了。我查看她的胳膊，但没发现注射的痕迹。周末我不再允许她到戴特莱夫家过夜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想让她知道我对她是信任的。所以，我允许她在星期六的晚上晚一些回家。我警惕了，但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该采取什么态度。我头疼死了。

克丽斯蒂娜自述

我一想到又得重新依赖海洛因就感到厌恶。可是，戴特莱夫吸毒后沉醉于虚幻之中，我要不能这样，我俩无法互相交流，彼此就像互不认识似的。所以，当戴特莱夫又拿可卡因给我时，我就接受了。我们拿注射器，决心再也不吸毒了。我们以为自己过去还未吸过毒，以为完全能够轻而易举地戒掉。但是，就在这时，我们已经又在考虑如何才能弄到第二天早晨用的毒品。

糟糕的事又重新开始了。只是我们没意识到自己一开始就会陷到这种地步，还以为能把握一切呢。

有一阵子，戴特莱夫为了我俩去干活儿。当然，这没有持续多久。于是，我又不得不再去街头拉客。不过开头我的运气好极了，我接的客都是过去的常客，这样使我感到不那么恶心。

戴特莱夫见我又不得不去拉客，就把我带到约根的家里。约根在柏林的工商界小有名气。他很有钱，还经常与议员们共进午餐。他已经三十出头但仍显得很年轻。他讲的话用的词全与年轻人一样，而且他也了解年轻人的事儿。他的生活方式与其他“当官儿的”完全不同。

我第一次到约根家里时，见到 20 多个年轻人围坐在一张大木桌旁，桌上的铁制烛台上点燃着许多蜡烛，还摆满了各种名酒。他们什么都谈，气氛轻松。而且还注意到坐在桌旁的男男女女们个个都很漂亮。约根像是个头儿。我心想他大概艳福不浅。这套住宅的豪华使我吃惊，里面的每件东西都值很多钱。另外，尽管阔气，主人却还是那么和蔼可亲，我觉得这真不错。

我们受到朋友般的接待，尽管我们是那里惟一的吸毒者。我们聊了一会儿，一对男女问是否可以洗个澡。约根回答说：“当然可以，淋浴室就是为了洗澡的。”

淋浴室紧挨着起居室。这一另一女朝那走去。有几个男女也跟着他们走进浴室。不一会儿，他们走出浴室，光着身子来要浴巾，我心里想：这伙人真不论！他们似乎相处得很好。

将来，我和戴特莱夫也搞一套这么豪华的房子，我们也邀请这么一帮可爱的朋友。

不一会儿，几个洗完澡的男女在屋里走来走去，他们全裸着身体或者仅在腰上围块浴巾。然后他们互相接吻。一对男女走进卧室，里面放着一张大得出奇的床。一条宽敞的走廊从容厅直通卧室，因而可以看到卧室里发生的一切。在那对男女做爱时，其他的人也来到这张大床上。一些男人开始与女人做爱，还有一些男人与男人做爱。有几个人就在桌子上干开了。

我明白了：这是一处淫乱群居的聚会。他们想让我和戴特莱夫也加入进来，但是我对此毫无兴趣，我不愿意让随便什么人来吻我。他们的举动并不令我感到厌恶，看见他们这样寻欢作乐，甚至我还感到一点刺激。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想单独与戴特莱夫在一起。

我尤其欣赏他理财的手腕。这大概是他身上最使我感兴趣的地方，他给我讲他如何去投资，钱就几乎自动地越滚越多。同时，他又很大方。他不直接付钱给加入淫乱群居聚会的其他人，但有一天，我看见有一个家伙向他要了几千马克去买一条超短裙。约根开了张支票给他，并说：“拿着，你的紧身超短裙。”我有时候去约根那儿，纯粹是去看看他，我不向他提什么要求，他也不向我提什么要求，他是我惟一的这样的顾客。我有时晚上在他那

儿看电视，这样一来，我觉得世界并不是那么坏。

戴特莱夫和我又回到吸毒圈里。我们不再去参加淫乱群居聚会，对于那些我们已经不感兴趣。我不去地铁动物园站时，就去选帝侯街地铁站闲逛。站台上有一百多个吸毒者，他们在卖可卡因。有几个厚颜无耻的流氓专门找吸毒者。但那里主要是一个碰头的地点。

我们在他们中间穿来穿去与他们聊天。有时，我又窜到另一伙贩毒者中间，我的自我感觉好极了。我在地铁站台上溜达就像一个明星置身于一群明星之中似的。我看见一些上了年纪的妇女挎着印有大商店名称的塑料包，惊恐地盯着我们，她们是真的害怕。我心想：“我们这些吸毒者要比她们强。这里生活很艰难，人们随时都可能死，再说人也活不到老。然而这种生活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总之，我喜欢这种生活。”我盘算着我要挣的钱。我一天需要 100 马克，完全是为了买可卡因。加上其他的开销，我一个月的支出达到 4 千马克，因此我必须弄到这笔钱。足足 4 千马克，这相当于一个公司老板的薪水。而我呢，14 岁就要搞到这么多钱。

当然，我只能去拉客，这是个肮脏的行当。但是，当我沉醉在吸毒后的恍惚之中时，这对我来说也不是太难忍受的。说真的，我只不过是应付顾客。总之，他们的钱花得不合算，总是由我定条件，我不接吻。

这里有比我花销更大的吸毒者。据他们所说，他们每天需要 4 克海洛因。这样他们一天就得花 500 至 850 马克。可他们总是有办法搞到这笔钱。他们比一个总经理赚的钱还多，而且还不会被警察逮住。我经常与这些大吸毒者往来，高兴时就去选帝侯街地铁站找他们，与他们随便聊天。

以上就是 1977 年 1 月至 3 月间我的感情与想法。至少我沉醉在吸毒后的虚幻中时是如此。总的说来，我感觉不是很好，但也不是太难受。我还能够让自己沉醉在无数的虚幻中。

我重新吸毒，完全陷进去了。我无所顾忌，什么都不怕。

以前，我什么都怕，从我父亲到我母亲的朋友，从那个可咒的学校到老师，从大楼里的看门人到交通警察，以及地铁的检票员。现在我已是无所畏惧的了。我甚至对有时在地铁站台上巡逻的民警无动于衷，至今，我已躲过了所有的大逮捕。

那个时期，我也常常与一些吸毒者来往，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对可卡因的渴求简直令人作呕。例如阿特兹和卢浮。阿特兹是我的第一个男友，在戴特莱夫之前爱上我的第一个小伙子。1976 年，在“音响舞厅”的时候，卢浮、阿特兹都是我们吸大麻团伙中的旧友。

阿特兹和卢浮开始给自己注射毒品的时间比我稍微早一点儿。目前，他们住在一套铺地毯的漂亮房子里，有客厅，有双人床。卢浮甚至有了份真正的工作，他在一家化妆品公司干粗活儿。他们俩对我说他们在肉体上从未依赖过海洛因，甚至还戒过一、两个月的毒。我相信他们，虽然我每次见到他们时，俩人都完全陷在吸毒后的恍惚中。

我把阿特兹和卢浮看作榜样。我不愿意再回到我戒毒前的状况，那时身体完全垮了。我也想像阿特兹和卢浮那样做。戴特莱夫和我有一天也会有一套漂亮的房子，有大床，有带地毯的客厅。

再说，这两个小伙子也不像其他吸毒者那样好斗。阿特兹有一个情妇，叫西蒙娜，很漂亮，她不注射毒品。但是他俩依然很合得来，我觉得这很了不起。我很喜欢去他们家，跟戴特莱夫吵了架，我就去他们家沙发上睡觉。

一天夜晚，我心情比较好，回到家里，在客厅里碰上了妈妈。她一言不发递给我一张报纸。我全明白。每当报纸上报道某人死于吸毒过量的消息时，她总是这么做。这使我感到紧张，我不愿意读这类消息。

我还是接过了报纸。报上说：“装配门窗玻璃的学徒工安得烈·w（17岁）想戒毒。他的女友，一位16岁的年轻实习护士试图帮助他。然而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在那套他父亲曾花费大笔钱为这对年轻人准备的漂亮房子里，年轻小伙子自己注射了过量的‘能致死的毒品’。”

我没有立刻反应过来，我不愿意相信此事。但是，一切都很清楚：装配玻璃的学徒工、套房，女友。安得烈·w，不可能弄错：原来说的是安得烈·维左内克，是阿特兹。

见鬼。我脑子空空的。我嗓子发干，感到不舒服。这不可能。不会是阿特兹。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呢？他对吸毒向来都无顾忌。我尽力克制自己，不愿在我妈面前流露出这条消息对我的震动——她不知道我又开始吸毒了。我拿着报纸溜进寝室。

最近我没有见到阿特兹，我只是从报纸上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那已经是上个星期的事了，他用了过量的毒品，然后到了医院。西蒙娜在医院等他，她切断了自己的静脉。人们把他俩救活了。阿特兹临死前去过警察局，揭发了他所认识的毒品转卖商，其中包括两个被称作“孪生姐妹”的姑娘，她俩总是有极纯的可卡因。接着他又写了一封遗书。报上登了这封遗书：“我将把自己除掉，因为一个吸毒者带给父母朋友们的只是忧虑、烦恼和失望。吸毒者不仅是在自我毁灭，同时他也毁坏了其他人，谢谢，我亲爱的父母，我最可爱的西蒙娜。”

从肉体上讲，我仅仅是一块废物。成了吸毒者，一切都完了。然而是谁造成了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青年人的不幸？我十分关注那些有朝一日想试一试的人：我试试怎么样？看看我吧，可怜的傻瓜们，看我变成什么样了。别了，西蒙娜，你的一切忧虑都将解除了。”

我躺在床上，自言自语说：“瞧，阿特兹曾经是你的第一个朋友。现在他已长眠地下了。”我没有哭，我已经没有眼泪了。我不可能再有丝毫真正的感情。

第二天下午，我与其他吸毒者聚在一起，没有一个人是为阿特兹伤心。在吸毒圈里，那已经不时髦了。而且有些人还埋怨阿特兹。因为他揭露了贩卖上等可卡因的转卖商（他们已经坐牢了）。这样一来，他应该说欠了许多想吸毒的人的债。

最意想不到的是，可怜阿特兹死了一个星期之后，以前从未碰过海洛因的西蒙娜居然也开始给自己注射毒品。几个星期以后，她放弃了她实习护士的工作，开始拉客。

卢浮是几个月以后死的，1978年1月，过量的吸毒。

阿特兹的死结束了我们这帮吸毒者的黄粱美梦。我不再感到自己是吸毒帮中的明星，不再庆幸自己注射毒品而不会被逮捕。恐惧与不信任感在我们吸毒帮中冒头，因为大家都认识阿特兹。以往，如果大伙儿一块注射毒品，注射器就不够用，每个人都想第一个注射。猛然间，大伙儿都互相推让想排在最后一个。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害怕。实际上每个人都怕得要死：如果那玩艺儿太强，又太纯，如果它还含有土的宁或其它什么脏东西，那可要命了。因为不仅仅过量的毒品能致死，而且高纯度或太脏的可卡因都能致死。

总之，又是无法摆脱的困境。一切都像阿特兹遗书中所描述的一样。我最终也毁了我妈。我高兴时又开始回家，我妈在等我。接着，她吃了几片安眠药以便能睡上一会儿。我看她要不是不停地服镇静剂，已经支撑不住了。

我越来越相信我的结局将会同阿特兹的一样。时常只要我发现一丝希望之光，就连忙紧紧抓住。我有一位我很喜欢的老师莫克先生。他曾让我们排过一出戏——就像舞台上的剧一样——一个年轻人在生活中的一次谈话。例如雇工人时的交谈。我们中间的一人演老板，我演求职者。我不害怕老板，交谈中我很快就把“球”又踢给他，弄得扮演老板的小伙子很尴尬。同时我对自己说：“大概你也要学会从生活的困境中脱身。”

莫克先生还领我们去职业指导中心。我们在中途停下来观看盟军队伍游行。那些男同学们对坦克、技术以及类似的东西感兴趣。可我不喜欢，那些东西会发出可怕的嘈杂声，又只能用来杀人。

但是我很喜欢职业指导中心。我仔细阅读了与动物打交道的有关职业的材料。第二天下午，我与戴特莱夫又去了一趟职业指导中心，索要有关这方面的复印件。戴特莱夫也发现好几种使他感兴趣的职业；他跟我一样，很喜欢与动物打交道，甚至包括农村中这方面的职业。我们开始较多地思考这个问题，几乎忘了我们需要钱去买下次的毒品。

不久，我又出现在地铁动物园站拉客，对职业的向往又显得很渺茫了，但我总是把职业指导中心的材料放在我的挎包里。可是我如果继续这么混下去，甚至连毕业证书都拿不到。

第二天一早，我买了一份《花花公子》杂志，坐地铁去上学。我是为戴特莱夫买的，他很喜欢这份杂志，但我也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花花公子》这份杂志——说真的，现在看来真不可理解，但在当时，在我们看来，这份杂志所展示的是一幅干净世界的画面。正常的性生活，漂亮的姑娘，毫无问题。没有同性恋，没有无赖，小伙子们用烟斗抽烟，开着赛车，腰缠万贯。姑娘们与他们睡觉，因为她们高兴这样做。有一次戴特莱夫对我说，这些都是编的，是荒谬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阅读这份杂志。

那天早上，在地铁里，我从这份杂志上读到一个我很喜欢的故事。我没有全弄明白，因为我完全处在恍惚状态中——我早上刚注射了一针毒品——可是我被故事描述的气氛所吸引。故事发生在很远的某地，那里天空湛蓝，骄阳似火。当我读到那个漂亮的姑娘焦急不安地等待她的男友从办公室归来时，我泪水盈眶，并且一直哭到地铁到站。

课堂上，我不停地想入非非。我很想与戴特莱夫一道走得远远的，远远的。下午我们在地铁动物园站时，我把所想的告诉了他。他对我说他有一个叔叔和婶婶在加拿大。他们住在一个大湖旁边，四周只有树木田野，他们肯定会留我们住下的。但是他说在走以前，我最好是完成我的学业。他先走，去找工作——在加拿大，这不成问题——这样，等我去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住上漂亮的木房子。即使他买不了，也可以租一幢。

我对他说，我也很想完成学业。再说，我在班上学得也不错。今后不能再开玩笑，我要专心学习，拿一个好的毕业证书。

戴特莱夫与一个顾客先走了。我留在那儿。突然两个家伙从我身后冒出来：“你在这儿干什么？”我立刻明白了：是便衣警察。我不怕警察：因为至今他们还没有找过我的麻烦。

几个月以前，我与其他年龄跟我相仿的女孩们在地铁动物园站拉客，

警察天天在那儿查巡。

但是他们只注意带着瓶子或香烟条的东柏林的人。这些人是警察追踪的目标。

我很沉着，回答说：“我等朋友。”

其中一个便衣警察说：“你在拉客吧？”

我说：“不，你想到哪儿去了！你看我像那号女人吗？”

他们问我的年龄：“14岁。”接着又想查看我的身份证。我提醒他们注意，16岁才发给身份证。

看上去像个警长的便衣命令我把我的塑料包交给他。他从包里搜出的第一件东西是勺子。他问我这是干什么用的。

我回答：“吃酸奶。”

但是紧接着他发现了注射器和剩下的东西，他们把我带到警察局。我不怕。我知道他们不可能把一个14岁的少年投进监狱。

他们把我关进一间屋里，恰好在警长办公室的旁边。我甚至不打算扔掉藏在我的牛仔裤小口袋里的可卡因。我连扔掉可卡因的力气都没有。一个女警察来了，给我脱衣服——全被脱光了，包括裤衩和胸罩——满身搜查，最后在牛仔裤里发现了可卡因。

一个警察用打字机打了份详细的报告，又把副本放进一个大文件柜里。这下可好，我算是被定为吸毒者了。但是，警察们待我还和气，他们对所有的吸毒者都重复着这样的话：“怎么样，小姑娘，你干吗要这样呢？你才14岁。一个年轻姑娘，又可爱，可惜已经毁了一半……”

我不得不把我妈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他们通知了她。

我妈下班后五点半来到了这儿，精疲力尽。她与警察交谈——警察总是那些现成话。

“唉，孩子们，”她说，“我真不知道拿他们该怎么办。我曾试图帮助她戒毒，但她不愿意停下来。”

这是什么话！“她不愿意戒毒”！我妈完全站在了警察一边。她什么也不明白，也不了解我，更不知道海洛因。我当然想戒毒。但那又怎么样呢？这我倒很想让她给解释一下。

从警察局出来后，她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还到哪儿游荡来着？——在地铁动物园站吗？——你很清楚，你不应该去那儿。”——“我在那儿等戴特莱夫。我这点权利大概还是有的吧？”

她命令我：“不准再见这个不想工作的无赖、怪人。”接着她又问：“你去拉客了吗？”

我把她臭骂了一顿：“你疯了？你再说一遍试试看。谁让你提这种事？你把我当成妓女啦？”

她不再吭声。但是，打那以后，我的自由受到限制。我母亲冰冷的样子给我印象极深。

我害怕她撒手不管我了，的确，她不想再帮我了。可她又是怎样帮助我的呢，就会教训我：“不准再去地铁动物园站。”“不准再去见那个无赖戴特莱夫。”

她把我领回家。我第二天一早可卡因没有了。清晨，她从床上把我拖起来，盯着我：“瞧你的眼睛，孩子，一点儿神都没有。你好像一脸的焦虑和失望。”

当我母亲一去上班，我就赶快照镜子，我第一次看到自己毒瘾发作后的神情。我的眼睛只剩下瞳孔了，又黑又阴沉。实际上没有任何表情。我感到热，擦了把脸。我又感到冷，就跳进盛着滚水的澡盆里，我不敢出来，外面太冷了，我不停地往盆里添热水。我必须度过这段时间，坚持到中午。早晨，在地铁动物园站什么也找不到，一个顾客也拉不到，也没有人给你注射一针毒品。早上谁也不会有可卡因。总之，能卖给你毒品的人越来越少，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到处钻营想办法：他们也越来越难弄到所需的毒品了。甚至戴特莱夫也常常无能为力。至于其他人，即使有，他们情愿扔进水沟里也不愿意给你。

毒瘾折磨得我越来越难受。我挣扎着爬出澡盆，在屋子里翻腾，想搜出一点儿钱来。客厅门锁着：一声敲门声，进来的是我母亲的男朋友，他以为我在砸他的唱片。很久以来，我就学会了用一块弯板撬锁的技巧。客厅里一分钱都没有。我突然想起我妈收集的全新的5马克的票子，她放在一个啤酒盒里，搁在厨房的碗柜上。

那盒子真沉。我拿着手都发抖。因为我的毒瘾犯了，再说我想到这是偷我妈的钱。我第一次这么干，我总认为这么干太可耻了。但是，我和其他吸毒者一样，毒瘾上来忍受不了。

例如戴特莱夫的朋友贝尔恩德几乎把他父母的的东西都卖光了——电视、电咖啡壶、电动刀。

一切可以卖的他都拿去卖了买可卡因。我至今只卖过我的手饰和唱片。

5马克的钱票在盒子里滚动。四分之一克海洛因的价钱刚刚降下来：从45马克降到35马克。我计算着：我需要七张票子，由于我接客时，每个客人一般都给我40马克，除了买海洛因，我还剩5马克，这样我每天可以放回一张票子到盒里。只需要一个星期，我就能把这些钱全部还清，我妈也不会发觉。接着，我带着7张5马克的票子溜出家门，来到柏林技术大学餐馆——早上只有在那里才能搞到海洛因。

由于我母亲每天晚上检查我的胳膊，我就在手上注射。老是在一个地方打针，那地方出现了一块硬皮，我对我妈说那是一块伤口，总也愈合不了。但她终于还是发现了一处新鲜的针眼。我承认了：“刚打了一针。我只是偶尔打一针；很少打，这对我没有什么害处。”

我妈狠狠揍了我一顿。我也不反抗。再说，我对此无所谓。总之，她把我当成坏透顶的人了，不放过任何一个教训我的机会。她本能地找到了这种好办法。由于一个吸毒者只有在堕落到底再也不行时，才准备认真地去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他或者去自杀，或者去寻找哪怕是仅有的一点微小希望来自我解脱，来戒毒。显然在当时，我远远不能懂得这点。

我妈又找到了另一线希望。她送我去外婆和表兄家里度了一个月的假，可能以后经常会这样做。外婆住在汉森乡下。我既高兴又忧虑：我怎么能与戴特莱夫和注射品分得开呢？但是我只得服从。然而我获准最后一夜与戴特莱夫呆在一起。

柏林的最后一夜使我的精神振作了一点儿。与戴特莱夫过了一夜之后，我对他说：“我们俩总是在一块儿。我想利用度假的四个星期彻底戒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希望你也这么做。我返回来时，我俩都变成新人，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戴特莱夫同意了。他说他也下了同样的决心，正准备告诉我。我已经

知道怎样搞到戒毒药，过两天，他就开始找工作，不再在街上游荡了。

第二天，在动身去外婆家开始新生活之前，我打了一针上等的毒品。到达那几时，我的毒瘾还未发作，因为情况不太一样。在农场田野这种环境中，我的身体有种陌生的感觉。一切都刺激着我，我的小表兄想爬到我的膝盖上来，后来我发现乡下的厕所很有意思。

第二天一早，毒瘾的综合症状全在我身上出现了。我溜到屋外，逃进森林里，鸟的叫声敲打着我的每一根神经，一只兔子也吓了我一跳。我爬到一座观望架上去抽烟。可我连把烟抽完的劲儿都没有。如果我能死在这儿该多好啊！过了一会儿，我终于拖着身子回到屋里，倒在床上。我对外婆说我得了流感。她同情我，但对我这副可怜相，她并不怎么担忧。

我床上有一幅张贴画：一只骨瘦如柴的手握着一只注射器。下面有一句话：“瞧，这就是下场。都是好奇所致。”我的表妹告诉我这幅画是学校里的人给她的。我不知道我妈已经把我的事告诉外婆了，我盯着注射器，我只看得见它——其它的，文字和那只手都看不见。我想象那支针管里灌满了上等的可卡因。注射器仿佛离开了画面，朝我走来。我盯着那支可恶的注射器看了好几个小时，我几乎成了疯子。

我表妹来看过我几次。她故意装着没有看到我的那副模样。她想让我听流行歌曲，她以为那大概能让我轻松一些。想起来，外婆家那样关心照顾我，真叫人感动。

戒毒的第一天显得那么漫长，没完没了。我不住地叹息。我梦见一个我在柏林见过的家伙。老是梦见他，他全身裸露。他的脚烂了。他的双脚全黑了，几乎瘫了，快走不动路。他发出一种恶臭，令人不敢接近，哪怕隔着两米远也难以忍受。人们叫他去医院就医，他只是笑笑，像具死尸。实际上，他在等死。这个家伙的影子老是缠着我，眼前总是浮现他的影子，除非我眼前冒出注射器，或处于毒瘾半发作的痛苦中时。一切又像第一次那样：我大汗淋漓，发出恶臭，呕吐。

第二天早上，我坚持不住了。我拖着身子走到村里的电话亭，给我妈打电话。我伤心地哭泣着，央求她让我回柏林。

我妈显得很冷淡：“哦，不行了吗？可你不是说你只是偶尔吸一点毒吗？那就不应该有那么严重。”

我投降了。但她只同意通过快件给我寄点安眠药。我知道在邻近的一个小城里可以找到海洛因——那是我第一次在这里时知道的——可我没有力气走到那儿去。再说，在那里我谁也不认识。一个吸毒者离开了他所熟悉的环境，就等于完全被隔离了，不知所措。

我的毒瘾幸好只持续了四天。在这之后，我感到彻底地空了，甚至都感觉不到身体从毒品中解脱出来了。柏林让我厌恶，但是在村里，我也并不觉得那是自己的家。我觉得在任何地方都不再有我的位置。我尽力克制不去这么想。

为了得到恍惚感，我只好用安眠药——我妈很晚才寄来，为的是在戒毒中用——和苹果酒（外婆家有满满一酒窖）。我胃口大开——吸毒者和其他人没有两样。早餐，我要吞进入5个小面包，下午还要吃整整12片蘸果酱的面包。夜晚，跟往常一样，在凌晨2、3点钟以前我是睡不着的，我又要吃贮藏的水果酱，李子酱、桃子酱、草莓酱，并把奶油抹在上面。

由于这种饭量，我很快长了10公斤。我的裤腰带都系不住了，臀部也

长圆了，外婆全家都很高兴。我的胳膊和腿依然顽固地像以前那样瘦骨零丁。这些我不在乎。我快成了善饥症患者。不久，我的牛仔裤也穿不进去了。我表妹把她的那条方格子的可笑的裤子借给我，这种裤子我在柏林时，从 11 岁起就不再愿意穿了。这个我也不在乎。慢慢地，我加入了村里孩子们的圈子。但这在我看来好像是在做梦：一个吸毒者，一部精彩的电影，然而打出剧终的字幕还得有一段时间。

我从不谈吸毒，再说我也不去想它了。我不想破坏这部精彩电影。但是我的毒瘾期一过，我就给戴特莱夫写信，让他给我寄海洛因。我甚至偷偷在信封里夹了 20 马克。我劝戴特莱夫戒毒后，我又干这事！话说回来，我到底没有寄那封信，因为我怕戴特莱夫不给我寄海洛因，反倒拿那 20 马克去自己注射毒品。

我几乎每天骑马，由我表妹陪着游览周围的古城堡，我们也和村里其他孩子一道在采石场玩，采石场以前是属于我外祖父的。这个采石场被外祖父喝酒“喝光了”，他死于酒精中毒脑溢血。我母亲的童年也不容易。

据我外婆说，采石场某处原先有扇铁门，门后堆放着家谱，保存了好几代的家谱。于是，我们几乎每晚都去找这扇门。工人们有时忘了拔下推土机的钥匙，于是我们就开着推土机在采石场里找。我表妹与我同岁，我俩相处得很好。我给她讲戴特莱夫，就像一位普通的热恋者在谈她的情人。我告诉她我与戴特莱夫睡过觉。她表示完全赞同。

她给我讲了一个名叫杜斯多夫的小伙子，他每年夏天来这儿附近露营。她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但是他想与她睡觉，可她没有依他。她问我这样做是不是傻瓜。

我说不是，她是对的，最好是她把贞操留给她真正爱慕的人。我表妹以及她所有的朋友都来向我诉说他们的问题。我简直成了克利斯蒂娜——出主意的人：我给他们讲如何处人处事，告诉他们尤其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他们的问题在我看来很可笑，但我仍然认真听着，而且我总是能够给他们提建议。一谈到别人的问题，我真有办法。只是解决不好自己的问题。

一天晚上，戴特莱夫打来电话。我高兴得快疯了。他告诉我他正从一个顾客家给我打电话，一个很健康的家伙，所以可以在电话里多聊一会儿。我告诉他我在戒毒的日子里，差点儿成了疯子。我问他的情况。他还没有戒毒，真见鬼。我对他说我很高兴不久就能见到他。

他答应给我写信，谁知他写不写。戴特莱夫不想写信，但他后来又从那个顾客家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这次通电话后，我再次相信戴特莱夫和我就如同夫妻了。我们患难与共，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夜晚，我躺在床上，老想着他。只想他一个人。就像在祈祷。我计算着我们重逢的日子。

外婆按时给我零用钱。我几乎全省下来了。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这样做，节省钱，我向来做不到。但这次我做到了。我攒了 40 马克。我把它们藏起来，我的 40 马克——40 马克，对于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是买一针毒品的价钱，也是我向嫖客们要的价钱。

我自言自语：“这不可能！你正在节省的钱不是为了你的第一针毒品做准备的！”我跑去给自己买了一件值 20 马克的 T 恤衫，仅仅是想摆脱这不祥的 40 马克。因为我到乡下，就是为了彻底戒毒。

假期的一个月很快过完了。我妈打来电话：“你还想在那儿呆一段时间

吗？”我冲口而出：“不。”如果她问我：“你愿在那儿呆一辈子吗？”我大概还会考虑一下，从一开始，我就把这段生活当成梦幻，开头是恐惧，结尾平静而温和。而且这也只能持续一个月，我心里明白，早有准备。现在我想回到戴特莱夫身边，因为我们已经像一对夫妻了。

我动身那天，外婆和表妹劝我带着那条方格裤子，这裤子现在我穿着正合适。我固执地换上我的牛仔裤，线缝都绷开了。拉链也拉不上。没办法，拉链让它敞着，我就这么回柏林。我穿上我的黑色长外套——一件男式外衣，穿上我的高跟鞋。一切准备好了。我重新穿上了我的吸毒的服装。

我回到柏林的第二天，就来到地铁动物园站。戴特莱夫和贝尔恩德都在那儿。却没有阿克赛尔。他大概与一个老无赖在一起。

两个小伙子热情地欢迎我。他们的确很高兴见到我。尤其是戴特莱夫，一眼就能看出。

我问他：“戒毒顺利吗？你找到了个好工作？”我们仨人全都大笑起来。

接着我问：“阿克赛尔哪儿去了？”

他们很奇怪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戴特莱夫低声说：“你不知道？阿克赛尔死了。”

真想不到，我惊得差点儿出不上气来，我对他们说：“嘿，别开玩笑。”但是我明白这是真的。

现在轮到阿克赛尔了。以前每个星期，阿克赛尔在那间吸毒的陋室里给我准备一张干干净净的床和被子，而我总是给他带一盒金枪鱼——很蠢的东西——他给我买达努纳酸奶。我与戴特莱夫吵架后，阿克赛尔是我惟一可以信赖的人。我想哭一场时，他那儿是我惟一的去处。因为至少他没有伤害过吸毒帮中的伙伴或向谁挑衅过。

“这是怎么回事？”

戴特莱夫向我解释：“有人在公共厕所里发现了，针头还扎在膀子上。”这两个小伙子提起阿克赛尔的死，就像在讲一个陈旧的故事。似乎他们不想提这事。

我不停地在想那些金枪鱼罐头盒。我心想我再也不会买它们了。突然我想到戴特莱夫：你现在住在哪儿呢？戴特莱夫告诉我：“阿克赛尔的母亲已经把房子卖了。我现在住在一个顾客家里。”

我说：“哦，见鬼！”这消息几乎与阿克赛尔的死讯一样震动了我。有一阵子，我自认为已经彻底失去了戴特莱夫了。

他继续说：“这是个不错的家伙。他年轻，25岁左右，没有情妇。我对他谈过你，你可以往他那儿。”

我随戴特莱夫去买可卡因。我们碰见一些伙伴，我不停地对他们说：“真讨厌，在阿克赛尔身上发生的一切真讨厌。”但其他人没有反应。于是我只能自言自语又重复了三、四遍：“真讨厌，阿克赛尔发生的一切。”

接着，我们来到公共卫生间。戴特莱夫大想立刻打一针。我给他帮忙。我等着他给我一点儿可卡因。我大概是想当面拒绝，说一声“不”向他显示我现在是多么坚定。但他没有给我。我还在为阿克赛尔的遭遇苦恼。戴特莱夫准备针管，又强烈地勾起了我的欲望。仅仅打一小针，大概不会损害我，还可以帮助我忘掉阿克赛尔，也不去想戴特莱夫睡在一个顾客家的事。

“又开始啦？”戴特莱夫对我说，“我还以为你早已戒掉了。”“是的，朋

友。我不住地打哈欠。你倒好，呆在家里，那当然容易。我在乡下时，你戒过毒？不是真的吧。伙计，我向你保证我戒过。这只是又开始，非常需要一点儿可卡因。”

戴特莱夫说：“戒毒也不难。我想什么时候戒都可以。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只是你不要再重新吸毒了。”

他边说边给自己注射。他在针管里给我留了一点儿。这足以使我神魂颠倒——我很长时间没有沾一点儿毒品——也几乎能使我忘掉阿克赛尔。

我比第一次陷得更快。我妈什么也没有察觉，她很高兴看见我长得这么胖。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保持住了增长起来的体重。

我经常去沃尔弗家，就是戴特莱夫多次讲过的他的那个顾客。我不得不去那儿，除此以外，我和戴特莱夫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同居的地方，我第一眼就讨厌沃尔弗。他爱戴特莱夫，当然就嫉妒我。我和戴特莱夫争吵时，他高兴得发狂，而且总站在戴特莱夫一边。这让我很生气。戴特莱夫与沃尔弗在一起时，是当丈夫，他让沃尔弗去买东西，命令他做饭洗碗。我被这一切激怒了。我很愿意由我来为戴特莱夫买东西做饭。

我对戴特莱夫说，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但他回答我，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沃尔弗总的来说还不错，没有其他顾客那么讨厌。

戴特莱夫对沃尔弗发号施令，尽给他颜色看，常常大吼大叫：“我愿意住你这儿，是你的福气。”只有当戴特莱夫急需钱时，他才到沃尔弗床上去。我和戴特莱夫与沃尔弗睡在一个房间里。我和戴特莱夫做爱时，他就看电视，或者干脆转过脸去。他是纯粹的同性恋者，不能忍受看见戴特莱夫和我睡觉。我们三人已经堕落到极点了。

如果最终戴特莱夫也成了同性恋者怎么办？我总是想这个问题。一天晚上，我担心的事发生了。由于戴特莱夫身无分文了，就去找沃尔弗。我独自睡在另一张床上。戴特莱夫熄了灯，这种时候他总是这么做。我觉得过了很长时间，我甚至觉得听见了戴特莱夫在喘气。我起身点亮一只蜡烛。他俩躺在被窝里，好像正在乱摸。这简直是对我和戴特莱夫关系的一种损害：戴特莱夫不应该让他乱摸，我气极了，很想让戴特莱夫与我在一起，但我无能为力，我朝他们大吼：“这大概不太好吧。”

戴特莱夫不说话。沃尔弗气坏了，熄掉蜡烛。戴特莱夫整夜都与沃尔弗在一起。我呢，哭得把枕头都打湿了，但没有哭出声，我不愿让他俩知道我在伤心。第二天一早，我又气又伤心，决心与戴特莱夫彻底分手。吸毒越来越损害了我们的爱情。

总之，我明白了，只要我们继续吸毒，戴特莱夫就不可能只属于我一个人。我不得不与他的顾客们共同拥有他，特别是与沃尔弗一道。从我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我重新开始每天拉客——不可能去干别的——由于我总是急需钱，所以我不再能够在我的顾客面前拿架子，也无法再由我来给他们定条件。

我不愿意常去沃尔弗家。因此，我又开始与吸毒帮中的其他人交往，尤其是与巴普西和施特拉。但是我们相处得并不是太好。每个人只想不停地谈自己，丝毫不愿听别人的话，哪怕只有两分钟。例如，巴普西不厌其烦地大谈街头广告牌上一个破折号的含义，可施特拉和我急着想讲讲我们怎样被一个卖主给骗了，他拿面粉冒充海洛因给了我们。但我和施特拉同时想讲，每个人又想按自己那套讲，于是我俩又争吵起来。大多数时候我们想要交谈

时，结局总是如此，谁都不让步！我们每个人都急需有人听他讲叙。因为说真的，这正是我们吸毒帮中不再存在的东西。以往彼此还能理解。现在全完了。惟一的办法是向警察讲叙自己的冒险经历；我们又都恨警察，这些坏蛋。我在这方面比别人经验多些：1977年初夏，我第三次被抓住。

那是在选帝侯街地铁站。戴特莱夫和我刚从一个顾客家里出来。我俩很高兴，没有干什么就得了150马克，刚好可以好好炫耀一番。我们已经买了可卡因装在口袋里，还剩了不少钱。我发现地铁站台上有大批便衣警察。是大搜捕。列车进站了。我惊慌失措，拔腿就往车厢里钻。戴特莱夫也吓坏了，紧跟在我后面。由于我碰着了一个上年纪的人，他大叫起来：“干什么，该死的吸毒鬼！”这是他的原话。报纸对地铁站发生的这一切大肆渲染，闹得人人皆知。

两个便衣警察跟在我们后面进了车厢。很显然，我们的举止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本来不会发现我们：一些人涌向我们，抓住我们的衣服，一面发疯似地大叫：“警察先生们，他们在这儿！”——这些人很快就明白了是在大搜捕。我感到自己像一个西部片中的违法者。我恨不得钻进地缝里

我紧紧拉住戴特莱夫。一个警察对我们说：“用不着再玩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把戏了。跟我们走，快走。”

他们把我们押进一辆小面包车里，带到警察局。警察很讨厌我，但没有再提什么问题。

他们只是说我是第三次被抓住了，我已经被立过案。他们甚至认为无须再通知我母亲。他们把我划入不可救药的人的行列：他们又把二、三份报告添入我的档案里，只等有一天在我的名字旁划叉了。

一小时后警察放了我们。但把我们的可卡因搜走了，我们又得回去买。幸亏我们还有足够的钱。

后来，地铁动物园站的警察终于认准了我，他们便几乎不管我了。甚至有一个较年轻的带西德南部口音的警察对我还很客气。一天，他悄悄走到我背后，突然把他的徽章伸到我眼前，吓我一大跳！但他却大笑起来，问我是否拉客。我照通常的话回答他：“不，你看我像吗？”

他并不傻。但他甚至没有看我的塑料包一眼。只是对我说：“这些天不要在这里游荡。

否则，我就不得不抓你了。”大概不是出于客气，而只是一个警告：他恐怕不想把我带进警察局，因为那里面的人不想为一个半死的14岁的少年写三十六份同样的报告。

戴特莱夫和我在选帝侯街地铁站被抓住又放出来后，我们找到另一个贩毒商——我们熟悉的贩子找不到了。我们溜进温德费尔广场公共厕所里注射毒品。那里的设备大差了，没有一个水龙头能用。我用抽水马桶里的橡皮碗，在肮脏的洗手池里洗针管。

陌生的毒贩子卖给我的毒品用后使我感到很不舒服。我瘫倒在肮脏的瓷砖地上。我立刻又爬起来，但是好一阵子，我完全处在云雾里。

我和戴特莱夫去“音响舞厅”转了一圈，很久以来这是第一次。他在舞池里扭动，我则坐在售桔子汁的机器旁。它上面有个孔，我凑近吸孔，把两根吸管插进孔里，开始吸桔子汁，我眼睛发花，直要呕吐。我走进卫生间。

我转回来时，碰上一个经理，把我当成可恶的吸毒者，命令我跟他走。我很害怕。他抓住我的胳膊，拖着我走，又拉开一扇屋门，里面放着饮料箱，

还有一把酒吧间的高脚圆凳。

我立刻明白了。别人给我讲过这里的内幕。他们把吸毒者和不受欢迎的人脱光衣服，绑在高脚凳上，然后打一顿，有时用鞭子抽。我听说有些家伙在“音响舞厅”挨揍后，需要住几个星期的医院，有几个人甚至颅骨被打碎。这些不走运挨了一顿打的人甚至连抱怨都不敢。这些该死的经理们是暴虐狂，同时也为了不让吸毒者再到他们店里来，因为警察经常威胁他们要关闭“音响舞厅”。显然那些跟他们睡觉的吸毒者不会挨打。这个“音响舞厅”是一个可耻的夜总会。假如那些父母们知道在“欧洲最现代化的迪斯科舞厅”所发生的一切，该怎么样呢？那里面的人怂恿年轻人吸毒，一些青少年落人这帮以淫乱为业者的手里是常事。‘一看见这个阴森的仓库，我害怕极了。我拼尽全身的劲儿，从那家伙手中挣脱胳膊，向门口冲去。我已跑到街上，他还没有追上我。他抓住我往一辆小汽车上撞。我没感到撞击得多狠。我想起了戴特莱夫，很为他担心。他们知道我与戴特莱夫是一道来的，他进舞池后，我再也没见着他，他大概完全沉醉在舞场上了。

我跑进一个电话亭给警察打电话。我解释说我的一个朋友正在“音响舞厅”里面挨打。

警察很高兴得到这个消息，终于有理由关闭“音响舞厅”了。他们像薨头发一样仔细搜了一遍屋子，没有发现戴特莱夫。我于是打电话给沃尔弗。戴特莱夫早已回去睡觉了。

警察警告我不准再开类似的玩笑。我回到家里，相信毒品大概正在使我发疯。

被抓过几次之后——这是他们带给我的惟一的收获——我又被召到罪犯管教所，歌德街314号办公室。我没有忘记这个门牌号码，我常进这里……

我放学后，回到家里。打算在去见警察之前，先美美地注射一针毒品：如果我神情恍惚，就不在乎他们了。可是我没有柠檬，因为可卡因看上去不太干净。当时，可卡因掺假越来越厉害：因为它已经被倒过好几道手，批发商、中介人、零售商，为了赚钱，每人都往里掺假。

怎么溶解掉这些含脏物的可卡因呢？很简单，我拿来醋。它是酸性。我立刻把醋倒进装有可卡因粉末的勺子里。我倒得大多了，因为我舍不得扔掉可卡因，我把溶液全都注射了。

它的劲儿太大了。我整整一个小时之后才醒过来，针头还插在我的膀子上。我的头剧痛，根本站不起来。这回可好，我要死了。我躺在地上哭。我害怕。我不愿意就这么一个人死去。我爬到电话机前。我至少用了10分钟来拨我妈办公室的电话。我对她说：“妈妈，我请你快来，我要死了。”

妈妈回来了。我终于站了起来。我总感到脑袋要炸似的。但我咬紧牙关。我对我妈说：“我还没有断气。”

她明白我又注射毒品了。她显出一副可怕的绝望的神情。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我。

我忍受不了这种悲哀。绝望的目光。它使我的头更疼。

过了一会儿，她问我想要什么。我说：“要草莓。”于是她出去，拿回来满满一篮子草莓。

那次我真的以为我彻底完了。那并不是由于过量，而是醋的缘故。我全身都动弹不了，四肢不听使唤。这些感受都跟那些死去的人所经过的一样。他们注射毒品后，也曾多次晕倒过。就这样，他们有一天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我不知为什么非常怕死。害怕孤独地死去。吸毒者常常孤独地死掉。经常是死在肮脏的厕所里。可我又很想死去。实际上，我什么也不期待。我不明白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前我也不明白。一个吸毒者，干嘛活着？

难道仅仅是为了自我毁灭，同时也毁坏别人吗？我想那天下午我真应该死掉，这全是出于对我母亲的爱。总之，我不清楚我是否还活着。

第二天早上，我好多了，反正我又可以坚持一会儿了。我必须去见警察，否则他们就该来找我了。但是我没有力气一个人走去。我四处打电话找施特拉，后来在一个顾客家里找到了她。她同意陪我去。她母亲刚刚提醒过她，如果上警察局，就出不来了。但是施特拉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在乎。

我俩坐在一个长走廊里的木凳上，乖乖地等着叫我进 314 号办公室。我像个规矩的小女孩似的走进办公室。我又行了个屈膝礼。一位女警察向我伸出手，非常和蔼可亲，对我说她有个女儿比我稍稍大一点儿，她女儿 15 岁。但她女儿不吸毒。哟，女警察在扮演慈母的角色。她问我的身体，又递给我一杯咖啡、一些糕点和苹果。

这位警察太太总是一副慈母的样子，对我谈论其他吸毒者，并向我打听他们的消息。她让我看一些吸毒者和贩毒者的照片；我只是对她说：“我见过他们。”她说吸毒圈里的一些人曾对她说了我的许多坏话。她想用这一手来让我招供。我意识到我被这个女坏蛋骗了，但我还是招了，我说了许多，讲完后，又在证词上签了名。那上面许多事多少都是被她诱供出来的。

后来，另一个警察来问我有关“音响舞厅”的事。关于这个我完全照直说了，我说出了我所认识的被“音响舞厅”引诱而吸毒的人，以及经营“音响舞厅”的那帮人的残暴。应我的请求，施特拉被带了进来，她证实了我所说的一切，并发誓敢于去任何一个法庭作证。警察太太不停地翻动着施特拉的档案，很快弄明白了施特拉的身份，狠狠斥责了她一顿。施特拉也回敬了她一番，我心想：“施特拉这样会被关进监狱的。”幸好警察太太该下班了。她要第二天再传讯施特拉。施特拉当然不会去。

警察太太休息时对我说：“看来我们不久还会见面。”她很有把握地对我这么说，但声音还和往常一样温和。她说得这么直截了当，看来我没有希望了。

我被这个女警察骗了，被她的咖啡。糕点和她的微笑蒙蔽了。我痛哭起来。

我接了两个客，又去买了可卡因，然后回到家里。我的小猫躺在厨房里，它站不起来。

它已经病了好几天。它看上去很凄惨，它发出的叫声真让人可怜，我想它大概也快死了。

就像不再为猫担心那样，我对自己也不再担心了。兽医给了我一些牛血提取物，但是可怜的小动物不吃：碟子里仍然是满满的。

我决定立刻给自己注射毒品。我准备器具时，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放了一点儿牛血在针管里，用它打进小猫的嘴里。小猫也不反抗。喂完小猫，我清洗了好一阵子针管。

我注射了毒品，但效果不佳。我想死，可每次打针前，又怕得要命。也许是小猫的目光感动了我。人尚未充分生活就死去，太可惜了。

我又看不见出路。自从我妈得知我又吸毒后，与我再也没有一句交流感情的话，我萎靡不振，她失望地看着我。警察也在监视我。我签过名的那

纸证词足以把我提交少年法庭，我已经够判刑的了。再说，我可以感觉到，我被抛弃，我妈会很高兴。她明白她对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她不停地四处打电话，一会儿是社会服务机构，一会儿又是反吸毒中心。她越来越失望，因为她发现没有人能够也没有人愿意帮助她和我。她唯一的办法，就是威胁着要把我送到外婆家去，远离柏林。

1977年5月的一天，我那简单的头脑终于意识到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短期内用过量的毒品，要么是彻底戒毒。我必须作出选择。我不能再依靠戴特莱夫，再说我尤其不愿让他来左右我的决定。

我来到克罗比小区。找到“团伙之家”，这是由一个牧师领导的年轻人活动中心，我吸毒就是从那儿开始的。俱乐部已经关闭：它因为吸毒泛滥而应付不下去，不得不改为反吸毒中心。反吸毒中心仅仅是为克罗比小区服务的，吸毒现象在这个小城才出现两年，海洛因就把该城毁得不像样子了。他们给我讲述我早已知道的事：我只希望得到一种好的治疗法。他们给了我吸毒调查处和“西那依”这两个机构的地址，因为只有那里反吸毒的工作开展得比较成功。

我不大相信。据说那些治疗法非常痛苦。头几个月比在监狱里还难受。在“西那依”，他们先给你剃头。照他们看来，这是开始新生活的第一步。把我剃成一个光头，我才不于呢。我最珍惜我的头发。我可以用头发遮住脸部。如果剃掉我的头发，简直就等于杀了我。

再说，向我提供地址的那个妇女说，我还可能进不去吸毒调查处或“西那依”，因为没有床位。而且他们接收条件又很苛刻：申请者必须身体状况好，并且要自觉自愿地保证有决心戒毒。

那个妇女还说，我这个年龄——刚刚14岁，还是个孩子——很难做到他们所要求的，实际上，还没有对吸毒少年进行治疗的方法。

我想去“那科隆”。这是一个宗教界办的科学治疗中心。我认识几个吸毒者，他们去过那儿，据他们说还不错。只要你先交钱，就可以进去。接受治疗者可以自己打针，可以把唱片，甚至小动物带进去。

那位妇女劝我再好好考虑一下，为什么那么多吸毒者都说“那科隆”的治疗法轻松呢，因为他们同时又可以随意注射毒品。总之，她没看见一例被“那科隆”治疗法治好的吸毒者。

但是怎么办呢？我不可能被其它机构接收。她只好给了我戒毒所的地址。

我回到家里，又拿针管给小猫灌了一点牛血提取物。我妈下班回来时，我告诉她：“我要彻底戒毒。去戒毒所，大约需要一年或几个月时间，我就会成为一个改邪归正的人。”

我妈似乎连一个字都没信。但是她还是去打了电话，了解戒毒所的情况。

我彻底投入到治疗中心去。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再生了。那天下午，没有顾客，因此，我没有钱买毒品。我想在进戒毒所之前自己先戒毒。我不想重新尝试毒瘾发作的滋味。我想先戒掉毒，以便比其他新人戒毒所的人先走一步。我希望立即向他们表明我是坚决要戒毒的。

我早早就睡了。猫病得越来越厉害。我把它放在我的枕头旁。我为自己感到很得意。我独自一人就能戒毒，而且是自觉自愿的。其他哪个吸毒者能做到这点？我把决心告诉我妈时，她只是怀疑地笑了笑。我戒毒时她来看

我，已经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她再也不相信了。

我完全是孤立的。

第二天早上，毒瘾发作了。可以说比前几次更糟糕。但是我确信我能够顶住。当我难受得要炸了似的，我自言自语：“这只不过是毒品在冒出你的体外。你可以活下去，因为你从此再不吸毒了。”我昏睡过去时，没有做噩梦，我梦想着我治愈后的生活该是美好的。

第三天，痛苦难忍，然而未来的图景却越来越具体：我在准备我的中学毕业会考，我有一套房子和一辆敞篷车，我几乎随时开着它。

我的屋子位于一块绿草如茵的地方，在一幢老式房子里。但不是资产阶级住的那种屋顶“高耸入云”，到处是灰塌的房子。不要那种带有宽大门厅的客厅、楼梯铺有红地毯、大理石、穿衣镜。刻有你名字的烫金字门牌的房子。我不愿意住带豪华气的房子。因为财富在我看来是欺诈。吵闹和压抑的同义语。

我的房子是工人居住的老房子中的一套。它包括二到三间屋子，不太大，屋顶矮矮的，窗户小小的。楼梯是稍有磨损的木阶梯，很窄，两人穿行时都要碰着，屋里总是飘荡着做饭的味道。邻居们常来问长问短。人人都辛勤劳动，大家都幸福：彼此不嫉妒，人人和睦相处，谁也不贪婪。总之，与富人不一样，与克罗比小区的工人也不一样。我的屋子是一所宁静的屋子。

在我的屋里，最大的一间是寝室。我的床很宽，靠着右墙放，床上铺着深色床单。床两边是床头柜——有一个是戴特莱夫的——和棕榈木罐。另外，屋里摆满了花木。墙上贴着张画：一片沙漠，巨大的沙丘，以及一片沙漠绿洲。棕搁树下，穿着白衣服的贝督因人围坐在一起喝茶，很轻松。多么宁静。左边，窗户角下有一个窝，是我的一隅。我像印度人或阿拉伯人那样坐着，矮圆桌旁放满了坐垫。我就在那儿过夜，安静极了。远离一切嘈杂，无忧无虑。

我的客厅与寝室相仿。有花草，有地毯。中间放着的一张木桌，上面有草莓，周围是藤椅。邀请朋友们聚餐时，我做饭。壁橱里放着书本。是一些很好的书，由一些得到安宁的人写的，他们很了解自然与动物。这些书架是我自己做的，其它大部分家具也是我做的。我不喜欢花里胡哨的东西，家具的主要作用是实用。我的房间里没有门，只有帘子——门会嘎嘎作响，发出声音。

我有一条狗，两只猫。我把我汽车的后座垫取下来让狗睡着舒服。

晚上，我做晚餐，我时间很充裕，不像我妈匆匆忙忙地做饭。门响了，戴特莱夫进来。狗扑到他脖子上。两只小猫在他腿上来回蹭。戴特莱夫抱吻我，然后坐在桌边准备吃午饭。

我在做梦。但是我不知道我在做梦。以上图景对我似乎是近在眼前的现实。治愈吸毒后的现实。我想象不出会是另一番情景。以至于我戒毒的第三天夜晚，我竟对我妈说，等我治疗结束了，要搬回自己的房子里去。

第四天，我感觉好多了，可以起床。我的牛仔裤兜里还有 20 马克，它使我心烦。20 马克 40 马克的二分之一，如果我再有 20 马克，就够买一针毒品——进“那科隆”前的最后一针。

我与小猫“谈话”。我对它说，它要单独呆上一、二个小时，没关系的，我又用针管给它灌了一点葡萄糖和洋甘菊剂——它吃不进别的食物——安慰它：“你也不会死的。”

我很想在库丹姆大喊大叫并且逛个够。因为我一进了戒毒所就不可能再随便出来，尤其不可单独出来。我想最后注射一次毒品，如果在库丹姆没有海洛因，那就名不符实了。剩下的问题是那另外 20 马克。我必须拉一个客。但是我又不想去地铁动物园站。我不知道该怎样对戴特莱夫说：“你知道，我戒毒成功了。可是我还得去找一个顾客，因为我想买一针毒品还差 20 马克。”戴特莱夫肯定不明白，他又会挖苦我：“怎么样，你还是个吸毒者。”

我坐在地铁里忽然想到一个主意：我可以去勾引一个汽车司机。我这么想完全是为了那 20 马克，那样做是合算的。施特拉和巴普西经常这么干，但是我一向讨厌那么做。因为你不可能仔细观察朝你开过来的驾车人，只能随便上一辆车。

最糟糕的是，有时落到拉皮条的人手里。他们常常装扮成顾客。一旦上了车，你就毫无办法。并非他们愿意拉女吸毒者，他们对此不感兴趣，女吸毒者花在毒品上的钱太多了。他们是想把她们驱逐出选帝侯街，因为她们把整个毒品市场的价格抬得太高了。

巴普西有一次就上了一个靠卖淫为生的人的汽车，那人把她关了三天。他玩弄够了以后，又把她转给其他男人，外国佬、醉汉，什么人都有。在这期间，巴普西当然毒瘾发作了。她那三天简直就跟在地狱里一样。但是她最终还是回到了选帝侯街。因为她是那儿的皇后，她有漂亮的脸蛋，平线条，没有胸，也没有臀部。

职业妓女几乎与靠卖淫业为生的老板一样危险。波茨坦街，一般是下层妓女的聚集区，距离吸毒女子拉客的选帝侯街只有 200 米。她们时常驱赶吸毒的女子。如果抓住一个吸毒女子，她们就打她耳光，甚至用开水毁容。

我走出选帝侯街地铁站。我怕得要命。我想起巴普西和施特拉的建议：“避开那些开赛车或庞大美国车的年轻人——这号人说不定就是靠妓女为生的人”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打着领带稍有点发福的，就可以，尤其是如果他们戴着一顶帽子就更好。然而最理想的，是那些车后座上带着儿童座椅的人：家庭里的模范父亲，出来正是寻找一点新鲜玩意儿，只是他们比我们更害怕。

我走在通向“音响舞厅”方向的路上，没有沿人行道走，而是贴着墙边走，避免显出拉客的样子。但是，有个家伙立刻向我招手。我发觉他很奇怪，一副挑衅的样子。这大概是由于他的胡子的缘故。我不理睬他，继续往前走。

他看不见别的女子。因为还不到中午。我知道——巴普西和施特拉曾告诉过我——这会使他们急得发疯，这些家伙只有半小时的空闲，可又找不到女人。有时候，在选帝侯街上，顾客比妓女还多。已经有好几辆车在我身边停下，我装着没看见。

我盯着家俱店的橱窗看。我又幻想了：我梦想有自己的房子。但是我对自己说：“克丽斯蒂娜，你一定要镇定。20 马克，必须赶快弄到手。快，全力以赴。”这个时候，我必须精力集中，不能胡思乱想。

一辆白色轿车停在我身旁。后座上并没有儿童座椅，但是那家伙看上去不像邪门歪道的人。我没有多考虑，就上了车。我们讲好价，35 马克。

我们去阿斯尼广场，那儿有一个改作它用的老车站。很快就到了。那家伙很客气，我甚至忘了这是一个顾客。他说他很想再见到我，但是他三天后就要与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去挪威度假，我问他是否能把我的票到科技大学——在那儿，早上可以找到可卡因。他欣然同意。

1975年5月18日，天气晴朗。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我15岁生日的前两天。我一边闲逛，与两、三个小伙子聊天，一边逗一只狗。真不错，我居然不着急注射毒品，我可以等到真想打针时再打。因为我还未达到身体上必须依赖毒品的程度。

不一会儿，走过来一个家伙问我们要不要毒品。我说要，我用40马克向他购买。我在东路透大街的女厕所里打针——那里比较干净。我只把一半的毒品倒进针管里，因为开始戒毒后，量就不应该用的太大。我带着庄严的神情注射毒品，心里默默地说，这是最后一针了。

我两小时后才醒来，后半身还坐在马桶上，针头插在膀子上。我的东西撒了一地。但是我感到还可以保持住平衡。如此看来，我选择戒毒正是时候，还来得及。我在库丹姆游荡的日子结束了。我在餐厅花二块五马克吃了些土豆泥和大葱，但是几分钟后我全吐了。我拖着身子走到地铁动物园站去向戴特莱夫告别，但没有找到他。我必须回家了，我的小猫需要我。

可怜的小东西没有动弹，依然睡在我枕头边上。我清洗针管，又给它灌了一点儿葡萄糖和洋甘菊剂。这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我的吸毒史的最后一天。假如我又去吸一天毒呢？

正在这时，我妈回来了，问我下午在哪儿呆着。我说：“在库丹姆大街。”她不高兴：“你说过你要去戒毒所接受治疗。”

我勃然大怒，吼叫道：“让我安静会儿！我没有时间了。你懂吗？”她也大叫道：“捆上你的东西，立刻滚到戒毒所去！你自由了，没人管你了。”

我刚做好了一盘排骨和土豆泥。我端着盘子到卫生间，把门关上在里面吃。这就是我与我妈呆在一起的最后一夜。我与她吵架，因为我烦。于是她明白我又注射毒品了。

我往我的大皮箱里塞了些衣服。我把注射器、勺子和剩下的可卡因藏在我的三角裤里。

我们到了戒毒所。那里的人什么也没有问我。果真他们什么人都接收。他们那儿甚至有掮客——在吸毒圈里溜达的人。

但是，他们问了我妈一些问题。接收我之前，他们想把付钱的事先讲清楚：第一个月先付1500马克。我妈自然拿不出这笔钱。她答应第二天早上凑足了这笔钱交来，她只有向银行借——肯定能借到。她请求他们先收下我。

我要求上厕所。他们答应了，这里他们不搜查你。不像别的地方，假如从你身上搜出吸毒的工具，就不要你了。我很快给自己注射了一针毒品。我回来时。他们看出我神情恍惚，但是没有说什么。我把注射器和剩下的一点毒品交给他们。那人先是一愣，立刻向我表示鼓励。

他们把我领到一间隔离室。里面有两个人。其中一人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他们发给我关于教堂的科学治疗法的理论书。这是个怪诞的教派。关于它的理论，你可信可不信。可我此时此刻的确需要信点什么。

两天之后，我被允许离开隔离室。我与克里斯塔同住一屋。她挨了一顿痛打，他们不再给她治疗，因为她不停地讽刺治疗法和负责治疗的人。她不住地翻地板缝，说是可能有人把可卡因藏在里面。她领我到了顶楼：“只要在这儿放几块垫子，就可以变成安乐窝，再有点儿酒。大麻，等等。”这个女人让我感到厌倦。我到戒毒所来是为了摆脱困境，是为了戒毒，可是她

却不停地谈论吸毒，毁坏戒毒所的名声。

第二天，我妈打来电话。她告诉我小猫死了。说完这个，她紧接着向我祝贺我的生日。

这些对她来说很平常。我却趴在床上哭了一上午。

那些家伙见我这个样子，说我需要来一场治疗。他们把我与一个家伙关在一个房间里——一个曾经吸过毒的人——他命令我做各种离奇古怪的动作。我不得不照着去做。

他对我说：“看这面墙。靠近墙，摸这面墙。”然后又重复这个动作，一连好几个钟头。我触摸四周的墙。不一会儿，我就烦了：“瞧，这该有多么蠢。你疯了怎么的？让我安静一会儿，够了，受够了。”他不停地笑，劝我继续坚持。后来他又让我摸其它的东西。直到我精疲力尽，我扑在地上大哭。

他笑了。当我稍稍平静一点几时，他又让我从头开始。我变得麻木了。甚至在下达口令之前，我就机械地去摸墙。我惟一的念头就是：“这一切赶快结束吧。”

五小时之后，他说：“行了，今天就到这为止。”我感觉很好。他把我带进另一间屋子，里面有一个奇怪的仪器，是手工做的。一个用白铁做的吊在两个盒子之间的挂钟。那家伙命令我把手放在那儿，又问我：“你感到好受吗？”

“是的。现在我能感觉到我周围的一切。”

那家伙看了看挂钟：“它没有动。这么说你没有说谎，一切正常。”

原来那个奇怪的东西是测谎器。它是这个教派最崇拜的一件物品。总之，我很高兴挂钟没有晃动。对于我来说，这表明我感觉很好。为了摆脱海洛因，我准备好了什么都做，什么都信。

那里尽是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例如，同一天晚上，克里斯塔发烧了：他们让她摸蜡烛，问她那是热的还是凉的。一小时之后，她的烧就退了。

这一切使我非常震惊，以至第二天早上，我跑到办公室要求再次进行训练。整整一个星期，我完全陷入了该教派的幻觉中。我确实相信了这种治疗法。全天都安排满了：练习、做杂事。做饭。这些事使我们一直忙到夜晚十点钟。没有一分钟思考的时间。

惟一使我紧张的事，就是饮食。我并不太挑剔，但是我很难咽下那里的饭菜。按我们付给的钱，伙食是能够搞好一点儿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支出。指挥训练的人几乎都是从前的吸毒者，对于他们来说，这项工作也是他们治疗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得到一点零用钱。戒毒所的老板们在另一处吃饭。一大，我看见他们正在吃饭：他们正在“消灭”一桌丰盛的酒宴！

终于，一个星期日，我有空闲认真思考一下。我首先想到戴特莱夫，这使我很难过。我问自己：“治疗后该怎么办呢？那些训练真对我有帮助吗？”我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但得不到解答。我很想与某人多谈一下，但却没有对话者：这里，禁止相互间关系密切，这是该机构的主要规定之一。假如你想与戒毒所的同伴谈谈自己的问题，他们马上让你接受训练。自从我进了这里，我就没有真正与人交谈过。

星期一，我冲着办公室啐了一口唾沫。首先抗议饭不好。再有就是他们几乎把我的三角裤偷光了。我无法钻进水房去，因为管钥匙的那个女人还在城里消磨时间，以便注射毒品。

再说并不是她一人这样。这类家伙我很讨厌。我被强迫训练和干杂活儿弄得精疲力尽，我的觉也睡不够。我对他们说：“你们的治疗法倒不错，但是它们不解决我的问题。这一切，说穿了，只是训练。你们试图训练我们。但是我需要一个能向他诉说我的问题的人。我需要时间来同我的问题作斗争。”

他们听我说，什么话也没有回答，总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在这之后，我得到了补充训练的机会。训练持续一天，一直到晚上六点。训练结束之后，我又变得麻木不仁。管他呢，反正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行了。我妈有一次来看我时说，社会保险公司把我进戒毒所的那笔费用偿付了。有国家负担这类费用，这就行了。

戒毒所里的其他寄住者比我的问题还多。例如，嘉比，她爱上了这里的一个家伙，非常想与他睡觉。她傻乎乎地去告诉老板们。结果呢：加上了补充训练。她与那人接过吻，这事被发觉后，两人被当众奚落了一顿。嘉比当晚就逃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她的恋人是一个指挥训练的人，据说戒毒已经好多年了，他几天后也走了。他又重新成了一个吸毒者。

实际上，戒毒所的老板们并不担心吸毒者们接吻，而主要是想阻止我们互相结交。但是嘉比的情人在他们中间工作已经一年多了——他怎么能忍受与情人长期分离呢？

晚上很晚时，我们有片刻的娱乐时间。我总是利用这点时间与最年轻的寄宿者在一起。

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但是在我们所形成的这个圈子里，没有谁到 17 岁。这是年轻的吸毒者们的第一次浪潮的产物：我们开始吸毒时，都还是孩子。可是两、三年后，我们成了一副鬼样子，因为在发育阶段，毒品对身体的损害比成年期还厉害。我们之所以聚集到这里来了，因为大家的理由都一样：别的治疗机构没有床位。

大多数人与我一样很快得出结论，训练不起多大作用。然而这里把两个年轻人安排在一起住，彼此变得很爱开玩笑，打趣：两人可以吵闹。可以互相对望时，怎么可能在 2 个小时中保持严肃呢。他们不再让我们接受测谎器的检查。何必呢，因为我们都说训练不起作用。

大伙儿捧腹大笑一阵儿，就结束训练。指挥我们训练的人越来越不知所措。

不久，我们谈话的主题就只剩下一个：海洛因。有时候，人少时，我就讲逃跑的办法。

在戒毒所呆了 15 天以后，我有了一个计划。两个小伙子和我，我们化装成“大扫除小队”，多亏了我们的工具。印章、扫帚。刷子和拖把，我们顺利地穿过了所有的大门。我们三人高兴坏了。我们急不可耐地想注射毒品，以至如果不大“醉”一番，太不划算了。我们在地铁入口处分了手。我朝动物园方向坐地铁。我去找戴特莱夫。

他不在那儿，施特拉在那儿。她朝我点点头。她对我说，近来没有看见戴特莱夫。我担心他进监狱了。顾客也不多，稀稀拉拉几个散在角落里。我们去选帝侯大街。那里同样什么也没有。后来一辆卧车停下来。我们认识这辆车和开车的人，一个已经跟踪了我们多次的家伙。我们一直把他当成便衣警察。原来只是一个业余的小吸毒者。

他只对我感兴趣，但是也让施特拉上了车。

我对他说：“一次 35 马克。其它的我什么都不干。”

“我给你 100 马克。”

我不知所措。类似的事我还从未碰到过。那些在梅斯代斯大街溜达的家伙总是为了 5 马克斤斤计较。这个家伙开着辆旧车，却出口给我 100。他告诉我他是情报员。好嘛，一个狂妄的家伙。但是这些往往是最理想的顾客；他们不计较钱：这也是一个自吹自擂的机会。

他最后真给了我 100 马克。施特拉立刻去买可卡因，我们就在汽车里注射。接着我们到旅馆去了。我与那个家伙呆在一起（施特拉在大厅里等我），他很宽宏大量，因为我完全处于迷醉状态——两个星期来我没有沾过毒品。我甚至不愿离开旅馆普通房间的这张窄床。

我与那家伙聊了一会儿。他有点怪。他不停地给我讲他家有半克海洛因，如果三小时后我们到选帝侯大街找他，他就把海洛因给我们。我又向他要了 30 马克，告诉他我们得好好地吃一顿。这点钱对他们这样有钱的人算不了什么，我知道他之所以乘坐这么辆破车，是为了蒙蔽敌人，不让人看出他是间谍，等等。但他还是被逮住了，他给了我钱。

施特拉和我又来到地铁动物园站。我并没有放弃找到戴特莱夫的希望。突然，一只黑白相间、绒毛散乱的小狗朝我猛跑过来，一下子跳进我的怀抱，它大概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这只狗真棒，真像一只雪撬狗。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家伙走了过来，问我是否想买这只狗。当然了。他要价 70 马克，我跟他讨价还价，最后他同意 40 马克。简直太好了：我吸毒时又有一只狗了。施特拉给狗取名叫珍妮女士，我管它叫吉妮。

我们在选帝侯大街的一家饭馆吃了午饭，吉妮跟我平分一块排骨。“间谍”到了约会时间就来了，他真给我带来了半克海洛因。真奇怪，这些值 100 马克呀。

我们又去地铁动物园站，还是没找到戴特莱夫，但我们碰到了巴普西。我挺高兴，尽管我们经常吵架，但她是最好的朋友。我们三个人来到露天咖啡厅。巴普西的脸色很不好，两条腿像火柴棍，前胸扁扁的，她的体重只有 31 公斤，可她的脸蛋还是那么漂亮。我向她讲了戒毒所，说那里面真不错。施特拉不想听我讲。她说：她生下来就是吸毒的，死也死在吸毒上。但是巴普西发火了，她以为大伙儿要一块戒毒。她父母和奶奶白白费劲在治疗吸毒的机构给她找了个床位，可她又溜走了，虽然她也想戒毒。她的状况很糟糕。

我们聊了好一会儿，随后，大伙儿分了手。我牵着小狗吉妮，去一家很昂贵的商店买东西，因为只有它晚上还开门：我为狗买了两袋食品，为我自己买了一大堆快餐甜食。买完东西，我给戒毒所打了一个电话。他们命令我回去。我告诉他们我要带一个朋友去，没有讲明是一条狗。

我对此没有过多的思考，可我心里明白，我会回到戒毒所去的。我能到哪儿去呢？回家吗？我能想象得出我妈看见我半路偷跑口来时的脸色。我妹妹回来了，她不愿意在我父亲那儿住，所以她占了我的房间和床。流浪吗？我很少那样做。去顾客家里住吗？这意味着我完全得受人支配——像个机器人似地亲吻。我还没有在一个顾客家里过过夜。因为我总是在决心戒毒。我走上了返回戒毒所的路，因我别无选择。

回到家——我们总是把戒毒所叫作“家”——他们对我很冷淡，但也并没有说长道短。他们甚至对吉妮也没说什么。这里已经有 12 只猫了。

我去地下室找来旧被子，在我的床边给吉妮搭了一个床。第二天早上，吉妮到处拉屎尿。它从不爱干净。这个小动物有颗痣，我也有颗痣。我喜欢吉妮，所以我打扫它的屎尿也不在乎。

我立刻被加上补充训练。这个我也不在乎。我像一个木头人似地执行他们的命令。惟一使我烦恼的就是训练时要与吉妮分开。由其他的人照看它使我感到很不好受，因为这是我一个人的狗。所有的人都跟它玩，它也跟什么人都玩——可以说，它是一个小妓女。人人都喂它，它眼看着长胖。但是，我是惟一与它谈话的人。现在，我总算有个可以说话的东西了。

我又逃跑过两次。最后一次持续四天。我在施特拉家睡觉——她妈妈为了戒酒住在私人诊所。糟糕的生活又重新开始了：拉客。注射毒品。在这期间，我才得知戴特莱夫和贝尔恩德到巴黎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知所措。怎么？那个可以说是我丈夫的家伙就这么溜走了，甚至连个招呼都没跟我打！我俩早就向往去巴黎。我们曾希望在蒙马特租一个小房间，在那里戒毒。我们从未听说过巴黎的吸毒者，还以为巴黎没有这些。我们想象巴黎只有艺术家、高雅的人，人们经常喝咖啡、饮酒。

戴特莱夫和贝尔恩德就这么去了巴黎。我没有朋友，我在世界上独自一人。我与巴普西和施特拉在一起，又开始那套把戏，为一点儿小事争吵不休。我只剩下吉妮了。

我给戒毒所打电话。他们说我妈去那儿把我的行李拿走了。她也不管我了，我气极了：我要让他们看看。让所有的人都看看，我自己来救自己。

我回到戒毒所，他们又收下了我。我全力投入治疗中，就像着了魔似的。我照着他们所说的一切去做。我真成了一个模范学生；我又得到了测谎器证实的荣耀，当我说到训练对我大有益处时，测谎器的挂钟从未晃动过。我对自己说：“行了，现在你快成功了。”我没有给我妈打电话。我借了一些衣服。我穿着小伙子的衬裤，这我不在乎。我不愿意求我妈给我拿东西来。

一天，我爸打来电话。“你好，克丽斯蒂娜，喂，你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刚刚得知你的地址，还是在一个很偶然的会”。

“我很惊讶，你第一次对我感兴趣。”

“告诉我，你还想呆在那帮家伙那儿吗？”

“当然。”

我爸气得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他才喘过气来。他又问我愿不愿意与他和他的一个朋友一块儿吃顿饭。我同意了。

半小时后，我被叫进办公室。谁在那儿？我亲爱的父亲，好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看见他。

他跟我来到我与另外四个姑娘同住的房间。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是怎么口事，乱七八糟的？”他总是喜欢整齐。而我们的宿舍，同那里其他的宿舍一样，真是又脏又乱的地方，床铺未叠，到处扔的是衣服。

我们正准备去吃午饭，一个负责人对我父亲说：“你应该签一张单子——领走克丽斯蒂娜的契约。”

我爸气极了，大声嚷道：他是父亲，只有他才有权决定他女儿应该呆在哪里。他女儿再也不到这儿来了。

我退出来想到治疗室去，同时央求我爸：“爸爸，我愿意呆在这儿，我不愿意死。爸爸，我求求你，让我呆在这里。”

戒毒所的人听见我们的叫声都跑来看，他们全部支持我。我父亲一边往外走一边大喊：“我要叫警察。”

我知道他会这么干的。我爬上屋顶。那上面有一个专为通烟囱的工人留的类似平台的地方。我蹲在那里，冷得直发抖。

真有两辆囚车开来了。警察和我父亲在屋里上上下下搜了一遍。戒毒所的人很担心，都在喊我。但没有一个人爬到屋顶上来。警察和我父亲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到我母亲的办公室。我哭着向她诉说所发生的一切。

她用冷冰冰的口气说：“我对你碰到的一切事情完全不感兴趣。”

“但是你是我的监护人。你不能就这么不管我。我不愿意让爸爸把我带走。我想呆在这儿，我再也不逃跑了，我向你发誓。我求求你，帮帮忙吧。妈妈，我应该留在这儿，否则，我就要死了。应该相信我，妈妈。”

我妈用不耐烦的声音说：“不。我无能为力。”“咔哒”一声，她把电话挂了。

我完全泄气了。接着我火冒三丈。我心想：“那好吧，今后我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从来没有管过我，而现在他们又高兴来管我，这些白痴只知道干蠢事。凯西的妈妈阻止她女儿陷入泥潭。我那可恶的父母连举手之劳的忙也不愿意帮，却以为只有这样对我才好。”

我要求加了补充训练，尽情享受了一番。我愿意留在戒毒所，可能今后我会成为科学教堂的一个成员。总之，我不允许任何人把我从这里领走。我再也不愿意任我父母把我毁掉。

三天以后，我又与我父亲在办公室交谈了一次。我父亲来了，很冷静，解释说他应该把我带到社会保险机构的办公室去，因为要让那里偿付我在戒毒所的那笔费用。

我回答：“不，我不愿意陪你去。我了解你，爸爸，你不会让我回来的，可我不愿意死。”

我父亲给戒毒所的负责人看了一张单子。上面签着我母亲的名字，同意把我领走。戒毒所的总管对我说，他无能为力，他不可能违抗我父亲的意愿把我留在这儿。

他建议我别忘了做练习，总想着去对抗毒品。对抗，是他们的关键词。总是应该较量。

多么蠢啊！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可较量的：我要死了。我会坚持不住的。最多半个月后。

我就会重新吸毒。我独自一人，是无法摆脱困境的。这就是我离开戒毒所时的想法，那是我最清楚地看清我的处境的一个难得的时刻。在我苦恼时，我相信戒毒所本来是可以挽救我的。我痛哭，绝望地哭泣。我受不了啦。

母亲的诉说

在戒毒所的治疗失败之后，我原来的丈夫决定把克里斯蒂娜领回他家使她就范。但依我之见，这不是一个好办法。首先，他不能白天黑夜地看着

她；其次，考虑到我和他的关系，我难以忍受把克利斯蒂娜交还给他的打算。何况由于他太严厉，我的另一个女儿已经跑回来和我一起生活了。

但是我已走投无路了。心想，他的方法也许比我的更有效，可能还因为——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我想用这个说服自己好暂时卸掉对克利斯蒂娜的责任。因为从她第一次戒毒开始，我长久地处于一种发疟疾的状态中，不断地从希望之峰跌入失望的深渊。当我求她的父亲插手时，我的精神和肉体都已疲惫不堪了。

在首次戒毒（就是克利斯蒂娜和戴特莱夫在家里进行的那次）之后的三周，他们第一次开戒给了我沉重的一击。警察局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通知我克利斯蒂娜已被拘留并要我去接她。

我坐在办公桌旁，全身颤抖，每两分钟就看一次表。我不敢马上请假出去，我不能把此事告诉任何人。我的老板会说什么？我猛地一下理解了戴特莱夫的父亲：开始感到羞耻，可怕的羞耻。

在警察分局，我见到了眼泪汪汪的克利斯蒂娜。警察让我看了她臂上还很明显的注射痕迹并告诉我她是在动物园地铁站被抓住的。那时，她正“令人怀疑地”在那里停留着。

“令人怀疑”是什么样子？我想象不出来，可能我也没有心思去想。克利斯蒂娜又非常不幸地开戒了。再次戒毒——这次不和戴特莱夫在一起。她不离家一步，好像是认真对待了。我鼓足勇气去到她们学校，把事情告诉给她的级任老师。老师吓坏了，但他感谢我的直率，他认为，学生中间肯定还有吸毒的人，可他们的家长没有这么率直。他很愿意帮助克利斯蒂娜，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事情还是老样子。我去向谁求助呢？要么是别人和我一样不知所措，要么就是对克利斯蒂娜这样的人完全不感兴趣。这是我经常碰到的情形。

逐渐地，我发现对于青少年来说，搞到海洛因是非常容易的，在去学校的路上就行。我就见过一些毒品二道贩子在努卡林区的海尔曼广场守候着。一次我们出去买东西，一个这样的家伙当着我的面就和克利斯蒂娜攀谈起来，连我对自己的耳朵都不相信了。这些毒品贩子中有些是外国人，也有德国人。克利斯蒂娜给我讲了她是怎么认识他们的，谁卖什么？卖给谁？等等，等等。

这一切让我觉得都是疯狂，我们到底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上。

我想让克利斯蒂娜转学，至少可以使她在去学校的路上避免碰上这些人。复活节假期就要到了。我希望不同的环境可以使她减少些危险。这当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不管怎么说，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另外的学校不接收她。

她非常丧气，但只是说：“这都没有什么用。惟一能帮助我的，只有治疗。”但是哪里能够找到床位呢？我给可能的和想象得出来的服务部门都打了电话。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给我一个反吸毒咨询处的地址。而咨询处要求克利斯蒂娜自愿前往。这些部门相互说别人的坏话，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克利斯蒂娜必须出于自愿，否则谁也不能治好她。

当我央求克利斯蒂娜到反吸毒咨询处去的时候，她马上怒气冲天：“我为什么要去？他们没有床位给我，我可不愿意在他们屈服后面转上几个星期。”

怎么办？我总不能把她强拉到那些人那里去吧，而且这也不符合我的

原则。今天，我已经相当理解他们的态度了：当时，克丽斯蒂娜确实还不够十分成熟，不能认真地接受治疗。

另一方面，我认为，像克丽斯蒂娜那样的儿童应该接受任何帮助，哪怕这与他们的意愿相违背。

后来，当克丽斯蒂娜感到情况糟糕透顶，最好是自己去接受治疗（哪怕这很严峻）的时候，他们却告诉我们：“已经满员了，再等上六到八周吧。”我只能这样向他们说：“如果我的女儿在这期间死了呢？”“啊，当然，那就请她来和我们的顾问谈谈吧。让我们看看她接受治疗的愿望是不是严肃的。”他们的让步使我不能报怨他们：他们的床位太少了，不得不进行一番选择。

我什么办法也没有找到。但是，当克丽斯蒂娜度假回来后，我的感觉是她不需要治疗了。她容光焕发，使我相信我们赢了。

她经常和我说起她的女朋友巴普西，她卖身给那些老家伙们，以便赚钱购买海洛因，她觉得这样子令人生厌。她自己，她永远也不会……她对我说，她很高兴终于远离了这些肮脏的东西。她的态度很诚恳。我可以向随便什么起誓，她是认真地这样认为的。

但这只持续了几天，我从她那缩成大头针头一样的瞳孔便看出来。我再也不能忍受她这样的花言巧语了：你说的是啥啊，我不过吸了一支撑大麻的烟。这是一段可怕的时间的开始，她没完没了地撒谎，虽然知道我会戳穿她。我禁止她外出，但她不放在心上；我差点把她锁在家里，可我又怕她从窗户跳出来。

我已身心交瘁，我忍受不了看见她那微小的瞳孔。自从我在浴室里发现她吸毒那天起又过了三个月。至少每周一次，报纸都要报道一起因过量使用毒品致死的消息——只用几行字——海洛因的牺牲品已经变成和车祸一样司空见惯的社会新闻了。

我害怕得要命，特别是克丽斯蒂娜再不向我说心里话了，明显的事实也要否认，这使我要发疯了。当她觉得被揭露了，就变得粗野而凶恶。逐渐地，她的人品变了。

我为她的生活而发抖。她的零钱——每月 20 马克——我只是一点一点地给她。如果我把 20 马克一下子都给她，我恐惧地想，她准会给自己注射一针，可能是致命的一针。最坏的并非是知道她已吸毒成瘾——我几乎已经形成了这个概念——而是时时担心下一次注射可能就是最后一回了。不像她的女友巴普西，她还时不时地回家，这我还得感谢她，而巴普西的妈妈常含着泪水打电话给我，问她的女儿可能在哪里。

我生活在警觉之中，电话铃一响就心惊肉跳：这会不会是警察局，尸体认领处，还是什么其它的惨祸。直到今天，电话铃的头一个音符就会让我从床上跳下来。

克丽斯蒂娜拒绝和我谈话。只要我涉及到毒品问题，口答总是不变：“让我清静一点吧！”我觉得她在任自己堕落下去。

她坚持着不再注射，却仍吸大麻。但我不再被假相蒙蔽。我经常翻动她的房间，总会发现一些可疑的用具。甚至有两三次，我找到了注射器。我把它扔到她的面前，她却像是被谁得罪了似地大喊大叫，说这是戴特莱夫的，是她没收的。

有一天，我从办公室回来，发现他们两人并肩坐在克丽斯蒂娜屋里的床上，正在给一把勺子加热。我对他们这种胆大包天的行为惊呆了，只会向

他们喊：“滚，马上滚出去！”

他们走了，我却泪流如注。我突然觉得自己被所有的人抛弃了，心中充满了对警察、对政府疯狂的仇恨。这天早上，报纸又报道了一个年轻的吸毒者的死，又是一个。那年已经死去 30 个了，可光阴才到 5 月份。我真不明白：电视告诉我们，用了数额庞大的金钱来和恐怖主义作斗争，而与此同时，那些毒品贩子却自由自在地在柏林逛来逛去，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售海洛因，就像卖冰激凌蛋卷一样。猛地，我听到自己在大声说：“混蛋！”

各种想法在我脑海中搅作一团，使我理不出头绪。我坐在起居室里，一件一件地看着我的家具，我真想把它们都砸烂。“看吧，”我对自己说：就是因为这些你才自找苦吃！”我开始哭了起来。

这天晚上，我打了克丽斯蒂娜，狠狠地揍了她一通。我先是等她回来，像根木头一样坐在床上，心中充满绝望和懊悔。我把一切都错过了，我的婚姻是错误的，我在职业上消耗了过多的精力。再加上由于怯懦，对于克丽斯蒂娜的情况视而不见。

这个夜晚，我最后的幻想也破灭了。

直到 12 点半克丽斯蒂娜才回来。我看见她从一辆奔驰牌轿车上下来，车正停在我们楼前面。天啊，我想，她已经失去了最后一点自尊，这是灾难啊！她被葬送了。我把她拽过来，揍她，打得我两手发疼，然后，我们两个面对面地站着，一起流着泪。克丽斯蒂娜完蛋了。我冲着她的脸喊她是个婊子：“别否认了，我知道。”她只是摇着头，呜咽着说：“可不像你想的那样。妈妈。”

我没有问她详情，打发她洗澡、上床。我所忍受的痛苦，任何人也想象不出来：克丽斯蒂娜卖身给男人！我觉得这一击比我知道她注射海洛因还要可怕得多。

我一夜没有闭眼。绝望之中，我甚至考虑把她送到训导学校去，但这会使事态更严重。

人们可以等她好一些把她收容到荷朗斯特夫大街的心理医疗中心里。但一个老师对我说了很多这个中心的坏话——特别是女孩子们，她们在那里互相教唆卖淫。

我看只有惟一的可能：让克丽斯蒂娜彻底地离开柏林，不管她愿意不愿意。把她从这个泥潭里拉出来，送她到没有海洛因的地方去。

住在海斯的我的母亲马上就同意接待她。还有我的姐姐也愿意。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克丽斯蒂娜的时候，她样子很狼狈。我开始准备行装，这时她带着忏悔的表情宣称她愿意接受治疗，甚至为自己在戒毒所找到了一个床位。

真让人松了一口气！我本来还担心克丽斯蒂娜不经治疗忍受不了痛苦，会从我母亲或姐姐家逃出来。

对戒毒所的详细情况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费用很高。在她 14 周岁的前两天，我用小汽车把她送到那里。一个年轻人接待了我们，进行入院谈话。他祝贺我们的决定并向我们保证从此之后我不必再担心了；一般地说来戒毒所的治疗是有成效的，我可以放心地走了。终于有这么一天！

于是，他递给我一些该签的文件。付款保证：每天 52 马克，预付四周。这已经超过我的月薪了，可这有什么要紧？再说，这个年轻人肯定地说社会保险部门会偿还给我们。

第二天，我凑齐了 500 马克送到戒毒所。然后，我又在银行借了 1000 马克，准备在下次家长会时把支票交给他们。

家长会议的发起人据说原来也是位瘾君子，他的过去似乎在他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他解释说这多亏戒毒所，是它把他改造为一个新人。这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他告诉我们克丽斯蒂娜进步很大。

而实际上，这是在演双簧。这些人真想得到的是我们的钱。不久之后，我通过报纸得悉，戒毒所属于美国一个可疑的会道门。它的巨额利润完全是对不幸的父母们的剥削。

但是，和以往一样，我明白得太晚了，又办了一件错事。而当时我想象着克丽斯蒂娜落入了好人之手，我希望她在那里能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但我需要钱。

我走遍了各个行政部门，但好像谁也无能为力，没有哪一家能告诉我戒毒所的真相。看我在各种窗口之间奔波着，真像是盗窃了这些人的时间。

最后，有个人对我说，首先应该拿到卫生部门发出的诊断证明，证明克丽斯蒂娜确实是吸毒瘾患者。拿着这个文件，我才能请求国家承担医疗费用。我以为这是在开玩笑，克丽斯蒂娜的不幸逃不过任何一双对此稍有常识的眼睛。但是，行政管理，就是这么回事。一直经过了两个星期的努力，我终于和一位官方认可的医生定了约会；而克丽斯蒂娜早已逃出了戒毒所。这是她第三次出走。

我哭得像个泪人。我想，又来了，一切又得从零开始。我和我的男友，我们开始寻找她。早晨，我们像梳头发那样在周围寻了一遭，晚上，到市中心（公共厕所都找过了）和唱片舞厅，这中间还到了火车站和地铁车站，所有的吸毒者出役的地方都找遍了，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我们向警察申报了她的失踪，警察局把她列入了寻人名册。她最终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我恨不得钻入地底下。只有惊恐不安缠绕着我，总担心电话里有人通知我：您的女儿死了。我变得神经质，对一切都没有欲望，对一切都不感兴趣。我强迫自己上班，我不愿意请病假。我的心脏不正常；左臂不能移动，一到夜间就感到麻木；我的胃也在折腾，腰疼，头像是要裂开。各种不幸都集中到我的身上了。

我去看医生，他给了我一个善意的打击。在检查之后，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神经性的，给我开了指导女儿戒毒的药方：当我告诉他我怎么会弄成这副样子后，他说，几天前有个姑娘找他看病，自称是个吸毒者，问他应该怎么办。

“那您是怎么回答她的？”

“毫无办法，干脆去上吊。”

这就是他对她说过话。

一周之后，克丽斯蒂娜又回到了戒毒所，我对这个消息并不高兴。我身上有些东西已经死亡了。我觉得，一切能办到的人性的方法我都办了，但这毫无效益。而一切却在向反面发展。

在戒毒所，克丽斯蒂娜变了，但不是变好。她一点也没有个姑娘的样子，她变得粗俗不堪——几乎是令人生厌。

从她进入戒毒所之后，我最初去探视她那几次开始，我的心就被刺伤了。突然之间，她变成了一个陌生人，她身上的什么东西被毁了。在这之前，

无论如何，她还保留着与我之间的一条纽带。现在，完了，断了，就像经过一次洗脑一样。

这时，我要我的前夫把克利斯蒂娜领回我家，但他更愿意把她领到他那里去。他要把她制服，必要时使用强硬手段。

我没有反对。我已经山穷水尽。我已经犯了那么多错误，如果顽固地坚持把她送到我母亲那里，我怕会在这一连串的错误上再加上一环。

克利斯蒂娜自述

爸爸在带我去他家之前，先在乌兹库亚地铁站附近他最喜欢的一家酒店歇了一会儿。他想给我要一杯含酒精的饮料，可我只想喝一杯苹果露。他对我说：“如果你不想死的话，就必须停止吸毒。”我回答说：“正是为了停止吸毒，我才愿意留在戒毒所里。”

酒店里反复播放着一张旧的流行歌曲唱片。有几个年轻人在玩电动弹子球和台球。爸爸说像这样的年轻人才是健康的少年。他还说，我会很快找到新朋友，到时候自己就会明白吸毒是多么愚蠢的事。

我几乎听不见他在唠叨什么。我精疲力尽，内心感到非常痛苦。我只有一个愿望：让我孤独地呆着。我恨整个世界。本来我在戒毒所里似乎感到天堂之门又重新对我开放，没想到爸爸一来又把它关上了。我抱着我的小狗吉妮躺在床上。我问它：“吉妮，你知道人类是什么东西吗？”接着，我又替它回答：“其实我也不知道。”吉妮对什么人都摇头摆尾，因为它相信人都是好的。这是它唯一使我不愉快的缺点。我似乎更喜欢她在不信任人时所发出的那种低沉的叫吠声。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吉妮并没有把屋里弄脏。于是我赶快带它出去拉屎。这时爸爸已经上班去了。

大门被锁起来了。我冲上去，使劲地摇晃门把。门被关得死死的。我尽量保持冷静。爸爸真不该把我像动物似地关在屋里，再说他也知道我得把狗带出去拉屎拉尿。

我满屋子寻找钥匙。我想爸爸一定会把它放在什么角落里。要是着火该怎么办？我寻遍床底下、窗帘后面、冰箱里面，就是找不到钥匙。这时候我没有工夫去发脾气，我只能在吉妮拉屎之前想出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我只好把它带到阳台上。它明白我的意图。

我对屋子审视了一番。自从我走以后，这里有了一些变化。卧室是空的：妈妈走的时候把床给搬走了。客厅里摆着一张我没有见过的长沙发——爸爸就在那里睡觉——还有一台崭新的彩电。那盆橡胶树不见了，还有那从前爸爸用来打我屁股的竹棍也不见了。爸爸在那块地方摆上了一盆猴面包树。

在孩子们的房间里，那个老掉牙的衣柜仍然摆在那里。这个衣柜只能打开一扇门，否则就会有倒下来的危险。那张床也和从前一样，只要一动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爸爸把我关起来的目的是为了让我变成一个正常的姑娘，可他连自己的房间都没收拾好。

我和吉妮又回到阳台。它把前脚搭在阳台的栏杆上，看着 11 层楼下面的街道，还有周围一幢幢灰色的高楼。

我很想找个人说说话。于是，我给戒毒所挂了个电话。他们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巴普西也进来了。她终于也想洗手不干了。巴普西在电话里告诉我，人们把我原来住过的床位给了她。我无法和巴普西生活在一起，心里感到非常难过。我们在电话里谈了好长时间。

当爸爸下班回家的时候，我一句话也不说。他也只三言两语地说了几句，因为他不想浪费他的时间。他为我生活做了一个安排。一个星期的每一天他都为我安排了一个时间表：干家务，买东西，喂鸽子，打扫鸽子棚等等。然后他用电话来监督我执行的情况。至于我的娱乐，他给我派来一个小姑娘，那是我从前的同学卡特琳娜。卡特琳娜是一个只爱看电视的小懒虫。

爸爸还给我许下一个愿：他将带我去泰国旅行。去泰国是他的毒瘾。他每年至少得去一趟泰国，一方面是去那里找泰国妓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上那里购买便宜的服装。他总是把钱存起来，以便能去泰国旅行。泰国就是他的毒品。

我听着爸爸讲话，心里想：眼下还只能听他的话，因为这总比被关在房子里强。从第二天起，我的行动计划就生效了。我按计划上的规定先搞家务，然后上街买菜。卡特琳娜来找我散步。我一见她就讨厌，我叫她回家算了。但她仍赖着不走。当我说我必须去喂鸽子时，她就不愿意陪着我而溜走了。

下午的时间归我自己支配。因为我的精神一片空虚，所以我真想找点东西刺激一下，可我不知道这个地方能弄到什么毒品。我跑到哈森海德公园呆一个小时。那里可以找到大麻。

我真想弄支大麻抽抽……

但是，我身无分文。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钱。爸爸有一个储蓄罐，里面装着 100 多马克的硬币。这是他准备去泰国旅行的储蓄罐。我从中取出 50 马克，还留一部分在里面。我心里想，将来我再把爸爸给我的零花钱攒起来，很快就可以填补这个缺数。

我在公园里刚走了几步就碰上了团伙里的老伙伴彼埃特。我的第一支大麻烟就是在他陪同下抽起来的。他现在也沾上了海洛因。我问他这里是否可以弄到海洛因。

他问我：“你有钞票吗？”

我回答说：“有。”

他说：“跟我来。”他把我带去见一帮外国人。我从他们那里买了一包海洛因，手头还剩 10 马克。我们一起来到公园的厕所里。他把他的注射工具递给我，我送给他一半海洛因。就这样，我们俩在那里各打了一针。

我按时回到了家里。爸爸是在 6 点钟下班回家。他并没有看见我刚才打过海洛因。我心里有点难过，因为今天忘了喂鸽子，让它们饿了一天。明天我一定加倍地喂它们，还决心以后不再打海洛因。在哈森海德公园，如果你不打针而抽大麻，别人也不会笑话你或瞧不起你。我想这倒是个戒毒的好地方，我一定会彻底戒掉我的毒瘾。

每天下午我总带着吉妮来这个公园散步。它也很喜欢这个地方，那里有很多特别温柔的狗。这个地方连狗都显得可爱。大家都喜欢吉妮，都过来抚摸它。

至于家里的鸽子，我每两天喂一次，有时候三天才喂一次。其实，只要在鸽子棚里撒些食物，不至于让它们饿死就行。

每当有人给我一支大麻烟时我就抽起来。公园里总有人递给我一支。

我渐渐对那个卖海洛因的外国人更加熟悉了。他叫穆斯达法，是个土耳其人。他常常把海洛因藏在草地里，警察来了什么也搜不到。他的买卖挺公平。他身边还有几个阿拉伯人，大家相处得很好。

穆斯达法有一天对我说，打海洛因针太危险了。要想不上瘾，只能局限于口服。他和那些阿拉伯朋友都是口服海洛因，所以没有一个上了瘾。他们和欧洲人的确不同，他们懂得如何使用毒品。而欧洲人一见海洛因就没命了。我想总有一天，东方人可以用毒品毒死所有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就像当年欧洲人用烈酒去毒害印第安人一样。

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快活，也不觉得自己是个吸毒者。直到那一天，我真感觉到没有毒品就无法支持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又重新落入了毒品的圈套。

晚上，我在爸爸面前尽量装成一个勤快的女孩子。我常常陪他上酒店去。有时候，为了讨他喜欢，我还特意为他叫一杯啤酒。在酒店时常常有一些顾客不怀好意地盯着我。但是我不理睬他们。我想有朝一日，当我不吸毒的时候，我也要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堂堂正正的女人。

我尽量振作起来。我想练习打台球，玩扑克牌。我想学会所有男人擅长的各种游戏。尽管我被迫同那些下流人生活在一起，但我至少也要求得到他们的尊重。我也会自豪的时候。我不向任何人乞怜、讨好。我从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但是，由于我的毒瘾天天发作，我只好天天跑到公园去，而这就占去我很多的时间。我又不能整天呆在穆斯达法家里。还有爸爸的那些鸽子——我已经三天没给它们喂吃的了！我每天还得按时搞家务，买东西。还得准时等待爸爸电话的监督。碰上我不在家的时候，我只好编造些谎言搪塞。可又不能天天捏造同样的谎言。我的日子真是越来越不好过。

有一天下午，我来到哈森海德公园，突然有一双手捂住我的眼睛。我转过头，原来是戴特莱夫！我们立刻拥抱起来。我看见戴特莱夫脸色很好，他说他去了一趟巴黎，的确有几天没打针了。可一回到柏林，他就马上跑到动物园地铁站弄了一针。

我们一起回到了家里。这时候离爸爸下班回家还有一段时间。因为我的床摇摇晃晃，所以我把床罩铺在地上，我们躺下做爱。此时此刻，我们真像国王一样幸福。接着，我们聊起天来。我们谈到戒毒问题。大家决定从下周就开始戒毒。戴特莱夫跟我说他是如何和贝尔恩德弄到钱去巴黎的：他们把一个嫖客关在厨房里，然后抢走他的一本欧洲银行支票。贝尔恩德终于落到警察手里，可他自己没事，因为那个被抢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我们每天都在哈森海德公园见面。后来我又常常把他带到家里来。我们几乎不再谈论戒毒的事了，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很幸福。不过，我越来越难以支配我的时间。父亲也加强了对我的监督，并且交给我一大堆新任务。我还必须抽点时间去看看那些阿拉伯人，以便给戴特莱夫带回点海洛因，可我又愿意和戴特莱夫多呆一些时间。这真叫我为难。

最后，我觉得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在吃中午饭的时间到动物园地铁站拉个客人。我一直向戴特莱夫保密。这样一来，我们俩就不愁找不到毒品

了。

大概是戴特莱夫回来的一个星期之后，我在公园里没见到戴特莱夫，却见到了罗尔夫。

他一直是戴特莱夫的同性嫖客。他的脸色很难看，并且只和我说了一句话：“他们把他关起来了。”戴特莱夫被捕了，警察立刻把抢劫支票的案子推在他身上。原来是买下那本支票的脏主把他出卖了。

我跑到公园的厕所里哭了一场。又一次，明天的歌声又不是对我们歌唱。现实又恢复它的法则，也就是说，我们将没有任何希望。由于心情混乱，我的毒瘾上来得更快。可是这个时候，我哪有心思去找那伙阿拉伯人聊天、嗑葵花子儿，等待着他们恩赐一点海洛因？我跑到动物园地铁车站去。我靠在一扇橱窗的跟前等客。可今天这里却格外宁静，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就连一个外国人也见不到。原来这时候电视正转播一场精彩的足球赛。

过了一会，来了一个熟人，他叫亨利，是施特拉和巴普西的老客户。这个家伙常常用实物支付，甚至还可以向你提供针具。不过他总要求接吻。无论如何，自从我知道戴特莱夫被抓去坐牢之后，对我来说，干什么都无所谓了。亨利没认出我来。可当我对他说“我叫克丽斯蒂娜，是施特拉、巴普西的好朋友”时，他就很高兴，立即叫我陪着他。他给我两份海洛因。这已经不算少，差不多合 80 马克。但是我还是和他讨价还价，我终于得到一点补贴，可以买些香烟和可乐。达成交易以后，我们就上路了。

在路上，亨利停下来去买他的药品。我觉得我的毒瘾已经上来，恨不得马上在车里打针。可是亨利始终不愿意先把海洛因预付给我。

到了他家里，他先打开抽屉，让我看看一大堆姑娘的裸体照片。我根本无心欣赏这些东西，我的眼睛直盯着他那口袋里的海洛因。于是，我对他说：“照片很漂亮。现在先让我打一针吧！”我们一起上楼去。他给我准备好一针海洛因，打完之后，他又让我休息一刻钟，然后才上床同他睡觉。我真急于完事好回家，可他一定要我说出有什么感觉。我只好佯装已经达到高潮。总的来说，他对我还是很慷慨的。

就这样，继施特拉和巴普西之后，我又成了亨利的私娼。我觉得这倒很省事，可以使我节省不少等客的时间，连我的家务事也不会被耽误了。

我几乎每天下午都到亨利家里去。我现在觉得他不错。他总说他喜欢我，同时也愿意听我说我喜欢他。他很害怕我再上动物园地铁车站去拉客。

除了亨利之外，我再也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戴特莱夫身在监狱，贝尔恩德也一样，巴普西进了戒毒所，施特拉似乎已经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妈妈对我不感兴趣，至少这是我的感觉。至于我的父亲，实际上我整天向他说谎。因此，我只剩下亨利一个人：我可以对他说任何问题，我没有任何可以对他隐瞒的东西。唯一我不能对他开诚布公地说出来的，那就是我对他的感情。

有些时候，当他把我抱在他的怀里时，我真觉得很幸福。我似乎觉得只有他才能尊重我。还有谁能尊重我？当我和他呆在沙发里的时候，我觉得我并不是他的情人，而是他的女儿。不过，他对我的要求越来越多。他要求我时刻陪着他，要求我帮他料理店务，同时能让他把我介绍给他那些所谓的朋友。其实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这一来，我又得同时间赛跑。而爸爸也越来越不相信我了。

他经常搜查我的东西。我必须十分小心，不能在家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我必须创造一种密码来记录我的朋友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例如：亨利住在森林街，我就在本上画两棵樹。

我还把电话号码写成一些算术作业题。因此，3954773 的电话号码就变成：3.95 马克 + 47 分 + 73 分，然后仔细算出个结果。这至少也算是个算术运算的练习。

一天，亨利终于找到施特拉失踪的秘密：也被抓进去坐牢了。这对亨利来说打击不小，倒不是为了施特拉，而是害怕她会把他出卖给警察。好久以前，我就听说由于他被指控拐骗少女卖淫吸毒，此案至今仍悬而未决。如果施特拉说出他用毒品来支付那些卖身的少女，那他的罪一定轻不了。

我也同样担心，因为弄不好我也会锒铛入狱。我真不想尝坐牢的滋味。

我又给戒毒中心挂了电话，以便把这个消息告诉巴普西。我几乎天天给她打电话。直到现在，她在那里一直呆得很好。今天，她没有来接电话：人们告诉我她已经住院了，她得了黄疸病。

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吉妮乘地铁到威斯登医院看望巴普西。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住宅区。

一幢幢时髦的别墅，周围绿树成荫，环境优美极了。我原来不知道在柏林还有如此美丽的地方。其实，我还不了解柏林，我只知道我们克罗比小区及它周围的地方，还有就是妈妈所住的克勒兹堡住宅区。天正下着倾盆大雨。我和吉妮都淋成落汤鸡。但是我们都感到很快活，因为我们都能在绿地上奔跑，还有——这只是为了我——我们马上就可以见到巴普西。

医院不让吉妮进去。我真没料想到这一点。幸好有位看门人很热情：他答应在我探视病人的时候替我看看它。我跑到住院部，但是没有找到巴普西。最后，我问我所碰见的第一个大夫她在哪儿。我对这位大夫说：“我很想见见她。”大夫告诉我，巴普西已在昨天从医院逃跑了。由于她乱吃各种毒品，她的肝脏已经腐烂，无法治好了。

我只好领吉妮回家去了。在地铁里，我一直琢磨着：要是巴普西的肝已经腐烂，那我的肝也好不了。因为我们俩都是一个样。我要是能找到巴普西该多好啊！我把我们之间过去的争吵忘得一干二净。我觉得我们俩都需要互相帮助，也许此时此刻，巴普西也正需要找个知心朋友说话，然后我会劝告她回到医院去的。可我又立刻回到了现实中来：我知道，经过两天的奔跑和毒瘾的折磨之后，她是无法回到医院的，要是我，也一样做不到。我也知道该上什么地方去找她：她可能在赛马场，要不就在某个嫖客的家里。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到处奔跑，因为爸爸一会儿就会给家里打电话。我只好用吸毒上瘾的人的道德观念来原谅自己：人人为自己。我回到家里。再说我也没必要到公园去拉客。亨利给我提供的海洛因足够我眼下用的。

第二天早上，我上街去买一份《图画报》。我每天早上都这样做。过去，每天晚上妈妈总是给我带回来一些有关“吸毒受害者”的消息的剪报。我现在对这类文章十分熟悉。

那天早上，买回来报纸以后我就准备了几片果酱面包，然后边吃边翻阅这份报纸。我发现第一版上有个大标题：《她只有 14 岁》。用不着看下文我就明白了：她就是巴普西。我似乎早就有预感。我突然变得麻木不仁，就像死了似的。我好像觉得我刚读到一则宣布我死亡的消息。

我跑到浴室去给自己打了一针，打完之后，我的眼泪才开始汪汪地流出来。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在为巴普西还是为自己哭泣。我又躺在床上。我点

了一支香烟，以便有足够的勇气读完这篇文章。这则消息写得像似一篇动人的街头见闻：“一根乳白色的塑料一次性注射器还握在她的左手，一个名叫巴贝特的女中学生已经死去。这位姑娘——这是迄今死于毒品的最年轻的姑娘——是死在布罗特罗岱街的一间公寓里。据纳吉（30岁）对警察说，他是在‘音响舞厅’的迪斯科舞场见到这个姑娘的。因为当时姑娘不知道该上哪睡觉，他便把她带到家里。巴贝特是今年以来在柏林第46个死于毒品的受害者。”等等。报纸对这类事情的报道未免过于简单，简直就是文过饰非。许多报纸还加油添醋，报道了许多有关巴普西的情况，用的是十分醒目的题目：《德国最年轻的吸毒受害女性》。

到了中午，我才比较清醒过来。我感到无比愤怒。我敢肯定，一定是哪个没良心的毒贩子的掺假毒品卖给了巴普西，可能是一种含有马钱子碱的东西。用马钱子碱冒充的毒品正在柏林蔓延开来。我再也不能犹豫。我立即到警察局去报案。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毒贩子贩卖假毒品的情况统统对警察说了。可他对这一切似乎不感兴趣。最后警察用他那句老生常谈的话打发了我：“好吧，克丽斯蒂娜，下次再见吧！”

我心里想，街上卖毒品，这对警察来说是无所谓的。因为他们所指望只是能从他们的黑名单上把一个个吸毒者的名字勾掉完事。我发誓自己一定要把害死巴普西的凶手找出来。

那个收留巴普西的男子与她的死是无关的，这个人我非常熟悉。他有的是钱，并且脾气很古怪。他喜欢找一些特别年轻的女孩子作陪。他曾经用车子带我到城里兜风，代价是请我吃一顿午饭。他只愿意和那些有性欲的女孩子睡觉。有时他找上我的时候，他可以等待我很长时间，他是一个商人，可他永远也不明白，卖淫本身也是一种交易，而不是任何别的。

我又来到选帝侯街。我的目的是在那里赚到足够的钱，以便去找那些我认为可疑的毒贩子，把他们的毒品买下来好做鉴定。谁也不知道巴普西最后的一针海洛因是从谁手里买下来的。我总觉得我现在正在寻找害死巴普西的凶手的下落。实际上，这也只是我购买毒品的一个借口。我心里完全明白。我一直记住这样一句话：“一定要把这个坏蛋找出来，那怕丢了你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就这样，我再也不怕给自己注射海洛因了。

一份心理学家的分析报告

柏林精神病情报中心主任贝尔恩德·乔治—汤姆心理学家霍斯特·布罗梅尔

根据我们的估计，最近3年来，在联邦德国和西柏林，12岁到16岁的海洛因成瘾者的比例已经从零达到百分之二十。克丽斯蒂娜典型地代表了毒品贩子的新靶子。她的女友巴普西也是如此。巴普西曾在1977年就教于我们并在两个月后由于过量用毒而死亡。我们无力帮助这个只有14岁的少女。此后，施特拉和克丽斯蒂娜团伙里的其他一些麻醉品使用者，也来向我咨询，他们表现出新一代年轻吸毒者所有的特点：明显的好斗性。但此外，他们还需要一种对幼儿一样的保护、重视、爱和热情。

巴普西是在 1977 年 5 月由一些对她负有教育责任的人带到我们这里来的。她的行为很像一个还抓住妈妈裙子不放的神情忧郁的小姑娘。但实际上，两年以来，她已经经历过瘾君子各种天堂和地狱般的生活了。

一个吸毒者随时都企图从海洛因的奴役及其后果——卖淫、违法、体质衰退——中解脱出来。那些年纪最大的吸毒者——那些 16、18 或 19 岁才落入罗网中的人——在多次尝试独自戒毒无效之后——便转向专门的部门。直到目前为止，这些部门和他们拥有的手段——建议、疗养、治疗——都是为这些人，即这些近乎成年的瘾君子而设计的，其基本原则是有关的患者应出于自愿，我们的工作帮助他们自己进行戒毒。

面对 5 万左右的吸毒者，我们在公众部门大约有 180 个治疗床位，在私人部门（诊所、团体等）有 1100 个床位。一些老吸毒者在这里过集体生活并被强迫接受严峻的制度。我们没有治疗成功率的可靠数字，但我们估计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重新开戒，特别是因为这些人戒毒之后又重返同样境遇的起点：正是那些境遇使他们走上吸毒之路。

但由 12 到 16 岁的麻醉剂使用者组成的团伙越来越多。他们得不到帮助。当然，我们接待那些像巴普西那样的由于老师或社会服务部门强迫而来的人进行咨询，但他们拒绝目前这些治疗中心严峻的规定，不愿承担被收入院所必须的条件：出于自愿。

他们从再次开戒的吸毒者口中听到过治疗中心所犯下的“暴行”，所以巴普西在和我们交谈的整个过程中都对我们流露出完全不信任。我不能消除她的恐惧而勉强地把她送到什么地方去。确实，对于随便哪一个吸毒者来说，下决心进入医疗中心都是困难的。当然，他们得忍受毒瘾及其所带来的痛苦。但这种痛苦他们已经习惯了。在一个治疗团体中，他们不但要放弃他们熟悉的环境，习惯的交往，连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也要听命于人，直到损伤他们的人身自由。例如，为了表明他们已经与毒品世界决裂，他们应该剪掉头发，更换衣着方式和放弃刺激性的“狂风式”音乐。

但是，对于一个 14 岁的孩子来说，发型、服饰和音乐比对一个 20 岁的瘾君子要重要得多。为了留长发，穿紧身牛仔裤或者为了唱片，他们可能与双亲吵上两年。在他们痛苦地猜度着在医疗中心里等待着他们的命运的时候，作为进入这个中心的人门证却是牺牲象征他们激烈斗争而取得的成果。而正是这些成果为他们赢得了朋友、伙伴和团伙的尊重。依我们之见，取消它们对于这些孩子未免太苛求了。

这些吸毒的孩子们的感情还不很稳定。他们在对一个充满安全感的世界幼稚的憧憬与梦想和大人人们在竞争中的行为表现之间摇摆着。人类在青春期遇到的心理冲突，他们通过在精神和肉体上使用毒品进行了“补偿”。这些孩子没有逐渐地脱离父母家庭，慢慢地取得自主的经验。他们只学会了每当生活的关键时刻逃避现实。

尽管这些 12 到 16 岁的孩子们在弱肉强食的毒品世界中经历了很艰苦的生活，尽管有他们在那里学到的那种东西，从感情的方面上讲，他们仍然是孩子。所以当他们的不屈服于目前的这种确实不适宜于孩子的治疗时，他们表现得倔强不驯。

像很多其他的孩子一样，巴普西不能屈从于这种长期治疗的要求，我们曾在多次长时间的谈话中力图使她思想有所准备。当她在一家神经精神病学机构中断毒之后，我们把她送往杜宾根吸毒者救济协会，那是一个少有的

能破例接受她那种年龄的吸毒者的中心。在途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她显得紧张，同时又处在一种愉快的兴奋状态中。我们长时间地谈着上帝和世界。肉体上的戒毒给她带来了欢悦和自信。但是，在快到杜宾根时，她表现出不安与神经质。

我们到达之后，巴普西由一个前吸毒者领到为新来的人准备的接待室。但是，甚至在入院谈话之前，她就声称要回柏林。她已经看到了她必须接受的一切：她刚刚经过搜查（行李、衣物、甚至还要搜身），避免把毒品带到医院中，现在，又要把她的长发剪短。当她看到理发师拿着剪刀走近她时，她忍不住了。医疗中心的人又和她谈了一次，但也不能改变她的决心。在下述的状况下把她收留在杜宾根是不合乎情理的：她将被关在医疗部，而且，由于她的对抗，她可能会构成某种对其他人的危险。此外，一有机会，她就有可能逃走。

巴普西因为过量用毒在 44 天后死去。她是 1977 年在柏林因海洛因致死的第 84 人，这是官方数字，她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

巴普西之死加强了我们的信念：应该立即把援助更年长的瘾君子的网络扩大到 12 到 16 岁的吸毒者中，或者把他们列入成年人中间，或另外建立一个网络。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德国与毒品斗争的未来就取决于此。假如不改变这种状态，这部分这个年纪的人就会继续从网孔中冲出去。应该想到这部分孩子，发展新的医疗概念，特别是对其自愿性的要求不必如此僵硬，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遇到美国的那种形势：一个因过量使用毒品致死的孩子，已不被看作是特例了。

然而，通过专门的顾问与医疗人员之手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比经过警察之手好些，不能把它比作仅用还原和加固的办法便可奏效的传染病或精神分裂症，不能把它归复为一个人体医疗过程。

医疗的不幸在于无法创造奇迹，它只是对极少数年轻人的一种有效的帮助。

毒品，现在已渗透到学校、舞厅和娱乐中心，依我们之见，它将继续向越来越年轻的人进行扫荡。它不再仅仅威胁极少数的 12 岁到 18 岁的人。例如，往往是侥幸之机决定一个 13 岁的幼女渡入青春期的方式：未受明显的伤害或者没有沉溺于酒精。海洛因，没参加会道门或某个宣扬暴力的无政府组织。今天的年轻人对毒品有很强的接受力，就像成年人易于接受制药工业的诱惑一样。每个，或者几乎是每个年轻人都认识某个人，朋友或是一面之交的人，这些人曾经或正在吸毒，或者有吸毒的愿望。今天的吸毒者的动机与 60 年代“大麻”和麻醉品的爱好者的动机非常不同：当年的嬉皮士的动机是开阔理性，而今天吸毒者则是要消灭它，对于那些酒精和轻型毒品的消费者也是一样。所以，今天难以把处于危险中的年轻人分为“酗酒者”、“大麻吸食者”和“不可救药的吸毒者”这样的等级，因为从这级过渡到那级是很容易的，而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却是相同的。

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公众舆论对问题的规模，无论是在质的方面还是在量的方面都没有足够的了解。大部分政界的人物总是认为这是一股即将到达顶峰的“浪潮”，用不了很久就会跌落下来。国会议员也向我们大谈“抑制”吸毒现象，好像如同拧紧“水龙头”一样简单。

实际上，我们的社会正在产生日益增多的主观的社会边缘主义者。很

多的年轻人避身于毒品之中，因为他们在学校，在工作环境或在消遣中，都找不到有关他们所需要的答案

与这个进程（其发展节奏在加快）相平行，非法的麻醉品如大麻、LSD、海洛因，与合法的麻醉品如酒精和某些医药制品相比，已成为获得头等利润的源泉了。假如我们估计——而且是保守的——仅在西柏林的 5000 左右的一批人——他们是海洛因消费的死硬核心——每天可集资 50 万马克（通过卖淫、偷盗或抢劫），那么可以想象在全国的范围内这意味着什么？那些自吸毒者身上攫取如此之大的利润的人，是不会放弃他们的生意的，而地方警察和地区警察也没有力量限制他们，落入警察之手的海洛因和轻型毒品的数量，只不过是消费量的一个微弱的零头而已。在联邦德国和西柏林，毒品的交易已扩展成一个紧密的销售网。

这样一来，就如同那些轻型毒品一样，人们到处都可以弄到海洛因。事实上已经不存在未曾沾染毒品的地区了：只不过是各地区之间有所不同，传染危险的尖锐程度有大有小而已。

每个大城市都有其“舞台”，毒品贩子将他们的销售点置于唱片舞厅和青年娱乐中心里。

毒品的无处不在肯定是其消费量日渐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一个追求“补偿行为”的年轻人不用费难便可以得到。而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很多年轻人忍受着一种莫大的烦恼，一种感到他们的存在没有意义而产生的愧疚。他们唯一的消遣便是每周一次到唱片舞厅去。

但是在那里，这部分数量日增的年轻人也少有交往的可能，特别是口头交往。在被音乐搞得头昏脑胀之后，失望地走出舞厅：他们又一次感到生活得毫无价值。

这些孩子和年轻人对现实不满，既不能从他们的未来获得鼓舞，也不能从他们的经历中汲取力量。因为他们的童年——这个自发的、相对说来自由成长的、免除他人操纵的、所以说是均衡的阶段，一般在他们进入学校后便告结束。从入学开始，他们的天地便是一个竞争和消极消费的世界。

在这些被剥夺了童年的年轻人身上，想象力是匮乏的，自信心和自制能力是微弱的。他们不停地追求着刺激，却不能形成自卫能力以对抗那些从他们年幼时便置身其中的消费社会的种种诱惑。

学校的选拔变得日趋严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他们的青春期开始便发现，尽管他们做出种种努力，他们未来的中等财力将不允许他们得到广告和商店橱窗所吹嘘的那些富于魅力的东西，进入那个从孩提时代就使他们着迷的世界。当然，有时他们做出一副蔑视这一切的样子，高傲地标榜他们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更多的人看到自己被拒于消费享乐之外，感到一种苦涩。

金钱越来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也是如此。为了结识一个姑娘，一个年轻人一开始就得在唱片商店里花上 10、20 或 30 马克，还不算最时髦的衣着、购买唱片和参加流行歌曲音乐会的开销。对于一个学徒工或中学生来说，这是沉重的。这样就产生了重大的问题——滴水汇成了河——年轻人用另外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父母们无法为他们指出道路，因为他们自己还陷身于难以解决的矛盾之中呢。他们的工作成果——过去的和将来的——不允许他们为自己提供他们追求的或人们告诉他们要追求的东西。与他们的孩子不同，他们并不放弃

奔波，而是以双倍的努力尽心竭力地从事他们在西西弗的劳作，同时却丢弃了对他人的不幸的诸如友谊、互助、正直、理解的价值。

家庭生活被摧毁过程的规模已经引起了不安。在西柏林，已决定向不少的家庭派出“家庭助理员”（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大学生等等）。他们在那里看到一种由于敌对情绪和缺乏气息相通的而造成的难以致信的精神不幸。离婚（离婚率不断上升）、常开的电视、自杀、滥用药物（真正的“精神支柱”）：这就是很多年轻人的生活环境——还没加上青春期问题所带来的烦扰。这个男孩或这个女孩便处于这样一个有着多处出口的迷宫和若干条称谓不同的迷廊之中，其中有家庭、消遣、工作前景、校内竞争、性和梦幻。问题是他怎么从中脱身。他找到的出口可能朝向一个会道门，一个酒鬼团伙，也可能是吸毒。而海洛因这种最危险的毒品也是以创纪录速度“解决”所有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

对于很多处于危险中的年轻人来说，关键性的障碍是毒品的价格昂贵，所以姑娘们就成了毒品贩子们先于一切的靶子。最近几年，在 12 到 16 岁的海洛因消费者中间，姑娘的增长数字远比男孩子们快得多。由于卖淫可以使她们易于得到钱，毒品贩子便把她们视为猎捕对象，从而任意地使她们成为毒品的依附者。

这一切往往是在音响舞厅开始的，方式非常简单。一个年轻的男人露面了：面相不凡，身穿符合这种场合要求的时髦衣裳。他和年轻的女孩子们搭话，她们发现他很出众，热情得让人倾慕。很快，他向他选中的受害者提供了第一批几小包海洛因，而且是免费的。他重复几次这种做法。于是，又一个姑娘“上钩”了，而她很可能把毒品引入到她的朋友们的圈子里去。

这种招揽生意的方式是小的二道贩子的特点，有时还得付佣金。与中间商和批发商不同，他们本身便是瘾君子，而他们获得的利润勉强地够他们维持生计，甚至有时候还得为他们本人需要的海洛因奔忙。他们不需要说服人的才干。年轻人喜欢冒险。可以理解的是，他们期望获得他人没有的经验，而在世界上这种经验越来越罕见，于是他们抓住了毒品贩子的“救援之手”。而在最初结识海洛因之时，他们确实有一种幸福的感觉，一种从所有的烦恼中解脱出来的感觉。

他们不大愿意离开这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超级支柱”，三次之后，精神上对海洛因的依附就形成了。此后，看他们使用海洛因频率大小，大约几周之后，又轮到了肉体的依附。

吸毒者再也离不开海洛因了，否则就得忍受毒瘾发作时的种种痛苦症状，这样他们就变成了毒品贩子的常客。对大部分瘾君子来说，他们组成了一条齿轮传动系统。假如哪个毒品小贩被捕了，第二天马上就有人代替他。每个瘾君子都希望自己成为二道贩子，认为这样总比去偷——小偷小摸或溜门撬锁——去卖淫能更惬意地满足自己的要求。换句话说，海洛因贸易的蔓延不但为他赢得了客户，而且准备了未来的销售人员。在柏林，已经是 14 到 16 岁的二道毒品贩子“当政”了。

在农村地区，毒品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主要是因为其表现还不如城市里那么显而易见。而或迟或早，一批农村的年轻人会来到城市的大中心，因为在乡下的村镇上难于弄到他们所必须的数额越来越大的款项。

毒品瘾几乎总会把女人和姑娘们引向卖淫之路，而那些男性吸毒者，绝大部分专搞一些偷盗财产的犯罪勾当：一些去偷仓库，培训中心或者运货

汽车；另外一些则去偷手袋、偷展品。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窝主，至少有个销赃点，把这些相机、录音机，小型家用电器、酒品等卖出去。但无论如何，除非是受人所委，这些赃物所值（当然不是它们的实际价格）只能勉强地给这些瘾君子弄来日常所需的海洛因的款项。

由于这笔款数在 40 到 100 马克之间起落，毒品舞台便带有永远为钱奔忙的痕印。因为每天必须搞到这么一笔数目的钱的局限。这些吸毒者变得粗野、凶暴、彼此不交往。尽管海洛因的用量不断加大，但它的快感却逐渐下降。最后这种快感会完全消失：他们不过是为了逃避瘾发时的痛苦而进行注射。

克利斯蒂娜自述

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蒙骗我父亲，但无论如何，很长时间以来他就对有些事表示怀疑了。我觉得他是在等着确凿的证据，而这证据不久就落在他手中了。

那是一天晚上，我发现已经没有第二天早晨用的兴奋剂了。但是我不能出去找，因为父亲在家。我偷偷地打电话给亨利，约他在克罗比小区见面。我父亲在苏尔克商店门前发现了我们，亨利刚好来得及溜走——但我父亲拿到了可卡因。

从我和亨利交往的开始，我把一切都讲了出来，我连扯谎的力气都没有了。父亲命令我和亨利再订一个约会，让他第二天，带可卡因到哈森海德公园来。然后，他给警察打电话，把一切讲给他们听，要求他们到公园去逮捕亨利。他们回答父亲说，他们不能这么干，应该进行符合法律程序的搜捕，而这样的行动又不是一夜就可以组织起来的。那么你们就不想抓住一个“少年诱拐犯”了？——这是我父亲使用的词句。警察要干的活太多了。至于我，我当然很高兴能避免充当钓饵这么一个下流的角色。

我早就想象过我父亲发现真情那一天的情景：我会被他打得半死，扔在楼板上。但实际上他的反应却不是这样。他似乎被失望攫获了，几乎和我母亲一样。他和蔼地跟我谈，最后他想让我明白，就是真心和海洛因决裂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但他还没放弃让我做到这一点的希望。

第二天，他又把我锁在家中。他把吉妮带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它。我的瘾发得很凶。到了中午，我坚持不住了，就给亨利打电话。我求他给我带海洛因来。进公寓大楼的楼门需要钥匙，我会从我家 12 楼的窗子放下一根绳子去，最后我终于把他说服了。但是作为交换，他要我用那绳子送给他一封情书和我的一条内裤。没有交换物他的兴奋剂是不出手的。这可真是商人，对吧。

我在家里东翻西找，从晾晒衣服的塑料绳到睡衣上的腰带，一切能结成绳子的东西，我都找到了。我把这些东西连接在一起，真是长得要命。为了它能够足够地长，还得没完没了地打结，没完没了地试验。然后，在毒品瘾中，我胡乱地涂写了一封“情书”。

亨利准时赴约。我从抽屉里拿出一条绣花内裤，那是我亲手绣的，把

它和那封信塞到电吹风机的套子里，然后把这个空中邮包从儿童室的窗子放了下去。还可以。亨利取出了“应付货款”，又把兴奋剂纸包塞进罩子里。很多人对我们的活计颇感兴趣。可这丝毫不妨碍亨利。至于我自己，我才不在乎呢。我只想着一件事，可卡因。

它终于到手了。我正准备拿去加热，电话铃响了，是亨利。我们闹了个误会，他要的是一条我穿脏的内裤。海洛因已在我手中，其它对我都无所谓了。为了让那个家伙别再跟我捣乱，我从衣服篮里抓了一条最旧的裤衩，从窗户扔了出去。裤衩掉进了灌木丛中，亨利本来要走了，又跑回来去找它。

这小子真是个疯子。我后来才知道，在我们使用绳子那天的前三个星期，一张逮捕证就等着他了，不过是那帮警察没功夫来找他而已。甚至他的律师也告诉他，他已经把自己放到了不妙的境地。但是一沾姑娘的边，他就昏头胀脑了。

后来，在他的案件中，我不得不作证。我实话实说。一方面和其它的买主一样，我才顾不了他那么多呢！可另一方面，我也有点不忍心这么轻易地做出不利于他的证明。说来说去，他并不比另外的贩子们坏多少。他们都清楚，有毒品瘾的人把那点票子都用到买毒品上去了，这些人都是些下流坯。但亨利是个不幸的瘾君子，他的“毒品”，是年轻的姑娘们。

我以为，他的位置不该在监狱，而该在精神病院。

一连几天，我都被关在家里。好在亨利事先已经给我带来了海洛因储备，我没有断毒。

一天早晨，父亲离家时没有锁门，我溜了出来。整整一个星期中我东游西窜，直到父亲又找到我，把我领回家中。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揍我。只是他显得更加失望了。

我就对他说，我独自一人戒不了毒。一个人整天给关在家中，这太苦了。巴普西死了，戴特莱夫进了班房，施特拉也进了班房。14岁的施特拉正在铁栅栏后面受罪，这我是听一个曾和施特拉关在同一间号子里刚被释放的女孩讲的。施特拉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自杀。她的唯一支柱，是恐怖主义分子——一些和她拘禁在同一监狱的红军派的姑娘们。她见过莫妮卡·贝尔贝里斯多次，被这个女人迷住了。很多吸毒的人都觉得恐怖主义分子了不起，甚至他们有些人在陷到海洛因里之前，还试着参加到恐怖主义分子小组里去呢。在绑架斯莱那尔那些日子里，这对我也挺有吸引力的。但是，我讨厌暴力。我永远也不能伤害人，光是看见暴力景象就能让我大病一场。但我还是觉得波阿代尔邦的那些人可能对形势做了不错的分析：要改变这个腐朽的社会只能使用暴力。

施特拉的故事还真的使父亲动了心。他愿意使她出狱并收养她。我还说服她，只要把我们俩人，施特拉和我，放在一起，我就能从毒品这个钩子上下来，对他说来也是一样，这是为最后的运气而战了。我在父亲家度过的这段日子里，他用来对付我的方法肯定并不总是好的。但如同母亲一样，他已经尽力而为了。

父亲开始在各社会部门奔走，并且成功地使施特拉得到释放。她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确实已经精疲力竭，比被捕之前还糟。我曾经答应在她来到我家之前把一切“清扫”干净，但我没做到。从第一天起，我就又把她拉下了水——不过，她迟早也会这样干的。还真有那么几天，我们认真地讨论“脱钩”的事。接下来，我们却研究出来一种几乎是无懈可击的瞒混我

父亲的方法。两个人要容易一点，我们把要干的分开干。我们甚至轮流到赛马场去，或是到选帝侯街去。

赛马场，去搜刮那帮开汽车的。

我对一切都无所谓，所以这个也不再让我讨厌了。我们这帮有 4 个姑娘：施特拉和我，再加上两个蒂娜，她们俩的名子都是蒂娜，这纯属偶然。她们中的一个比我小 1 岁，刚满 14 周岁。

这种活我们至少是两个人一起干的，一个要跟客人走的时候，另一个就大模大样地把他的车号记下来——这样可以使那些有意要和我们恶作剧的家伙们胆寒。这不过是防备那些拉皮条的小子们的一种自卫方法。我们不太害怕警察，有些警察路过的时候还从巡逻车里向我们打个友好的手势呢。在我的常客里就有这么一个挺友好的人，那是个非常滑稽的小伙子。

他总是要求得到爱情，我就老得向他解释，拉客是一种营生，而不是谈恋爱。

需要这样解释的还不止是这一位客人，他们大部分都愿意瞎聊一通。一开始总是那些老一套的玩意儿。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干起这个来啦？总还是可以想别的法子吧，等等。

这类的花言巧语最使我恼火了。有些人脑子里还冒出了搭救我们的念头。我就收到过有些人让我和他们合法结婚的请求。而这些美妙的感情却并不能阻止他们利用我们这些吸毒的人的困境来达到他们个人的满足，可他们偏偏又知道原因所在。这些家伙简直就像拔牙的野郎中那样说谎，他们自己已经是过着河的泥菩萨，却还想象着能来帮助我们。

他们中间的大部分都没有胆量去找职业妓女。总而言之，他们对付女人都有些困难，所以便来找雏妓。他们告诉我们，因为他们的老婆、他们的家庭、他们过的那种永远一成不变的生活，他们已经彻底地绝望了。有的时候，他们甚至露出羡慕我们的神气，因为，至少我们年轻。他们向我们打听眼下年轻的一代，他们的口味、音乐、言语。流行的服装等等。

有一回，一个 50 多岁的家伙，无论如何非要吸大麻，因为他觉得所有的年轻人都吸。

于是他多给了我一笔钱，我们就一起去找二道贩子。我们跑遍了半个柏林，我这才发觉，在我们这个随便哪个街角都能弄到海洛因的城市，却在哪儿都找不到大麻。我们用了差不多 3 个小时才弄到一点。这个家伙在汽车里抽了这颗夹心烟。这么一件小事却使他兴奋异常！

干这一行能碰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疯魔。有个小子曾在骑摩托车时受过伤，他就让人不停地敲那根接在他小腿里的钢棍。另一个展示着一张盖着图章的纸片子，好像是什么正式文件：一张不育证明——他不愿意用避孕套。还有一个比他们都混蛋的小子，自称是电影界的人物，他想让我先试一下子。后来，他掏出手枪，强迫我免费侍候他。

我最喜欢的客人是大学生们。他们是用两条腿走来的，总的说来，他们相当窘迫。但我喜欢和他们聊天，谈论这个社会的腐败。我只陪他们，到他们的窝里去。而和其他的客人，都是在汽车里或旅馆里。那里才真叫惨呢：客人只多给 10 个马克，而我们连使用床铺的权力都没有，只是加个小床而已。

施特拉和我是用乱写在墙上或莫里斯商店柱子上的密码短语来联络的。用这种办法，在换班的时候，我们总能知道另一个人在干什么；要是父

亲发明了什么新招术更好地监督我们，我们也能够知道。有的时候，当我真的对选帝侯街、赛马场腻了，觉得恶心的时候，我就到一家名叫“少年挑战者”的店里去呆上一会儿。店里分发着一些关于幼年吸毒者和美国雏妓故事的小册子，发放的人说多亏了他们，人们才找到了通往天堂的道路。他们就在离雏妓和“音响舞厅”两步远的地方安置下来，以便在现场发展信徒。在“少年挑战者”，我一边喝咖啡，吃煎饼，一边聊天。等他们开始大谈慈悲的上帝，我就溜之大吉。实际上，他们也是在利用吸毒者：当他们发现我们走投无路时，就试着把我们招揽到他们的会道门里去。

我也看看选帝侯街和根特奈尔的大家具店的橱窗，它使我想起了属于我和戴特莱夫的一所住宅的旧梦。而这之后，我就更加觉得不幸了。

我已经落到一个吸毒者生涯的最后阶段了。

当很难找到客人的时候，在犯罪面前我也不退缩。噢，我不会走得很远，我天生就不能干这个，我没有那么坚强的神经。有一天，一帮吸毒者想引我到一家银行偷窃时，我就泄气了。我的最伟大的业绩不过是用带有钢指环的手套打碎了一辆小汽车的玻璃，偷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而已，而那还是在喝了四分之三瓶的苦艾酒之后，鼓足了勇气才干的。我通常是帮助吸毒者销赃，我还管给那些普通的小偷运送刚偷到的东西：把它们存放在自动寄存处去，然后再取出来。这能让我赚上 20 马克，可这比偷东西危险多了。不过，反正我不知道我到了哪一步。

在家里，我向父亲胡吹，说我跟施特拉吵架，我们俩本来说定共同干活平分可卡因的，但是每人都觉得被另一个骗了。这真是像地狱一样。

很明显，我父亲什么都知道，而且是很有一阵子时间了。但是，他完全不知如何是好。

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是肯定的：我的父母已经不能再帮助我了。

我再也忍受不了学校了，甚至到学校露个面都受不了，我受不了什么也不干地坐在那里，我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忍受不了，客人们使我怒火冲天。我变得不能像以前那样到塞纳区那边平静地闲逛了。我再也忍受不了我父亲了。

这正是一个吸毒者山穷水尽之时，烦恼无边，只想自杀。但我从来就是个胆小鬼，没胆量给自己扎上“火燎燎的一针”我还在找出路。

我决心到精神病院去，到那所被人称为“美丽牧场”的戒毒医院去。对于一个吸毒的家伙来说，这几乎是最可怕的玩意儿了。我总听人说：宁肯蹲四年班房，而不要到“美丽牧场”过 4 个星期。有些吸毒者躺倒在大街上之后就被关到那里。出来的时候，他们讲了不少恐怖的故事。

但是，我天真地想，假如我是出于自愿地去。至少有人照料我吧。在儿童救济会或其它部门，他们不能对一个需要紧急救助而父母又无能为力的姑娘视而不见。而我到“美丽牧场”的决心却有点像企图自尽而又悄悄地希望被救的人，为的是让人们能够反思：“可怜的姑娘，我们以前对她照料不够，再也不能这么恶劣地待她了。”

我去找我的妈妈，告诉她我的决心。一开始，她显得很冷淡，我马上哭了起来。接着，我试着把我的事讲给她听，并不太歪曲真情。这回轮到她哭了。她把我搂在怀里，一直不放开。我们哭得像泪人一样。这可真是舒服极了。我的妹妹也是一样，她也很高兴又能看到我，这夜晚我们俩一起睡在我原来的床上。

很快，我就感到了毒瘾发作的初期症状。

又一次断毒开始了，我已经不知这是第几次了。我大概是断毒次数最多的世界冠军，总之，我不知道有谁，像我这样心甘情愿地断了这么多次毒，却从来没有一次成功的运气。

这几乎和第一次一模一样。妈妈请了假，给我带回来了我所要的一切：瓦里姆、葡萄酒、鸡蛋烤饼、水果。然后，到第四天，妈妈把我领到了“美丽牧场”。这是我坚持要去的，因为我深深地知道，不这样，我可能第二天又会开始注射毒品了。

他们马上让我脱去衣服，送我去洗澡间，像对待麻风病人一样。那里已经有两个完全是疯疯癫癫的老婆子在洗澡。人们把我塞进第三个浴盆，并且在我擦洗的时候寸步不离地监视着我。在那里，给了我一件仿古的睡衣和一条从肋骨到膝盖那么长的短裤，我要是不想让它掉下来，就只有提着它。我被带到留诊处，接受观察。我是惟一在 16 岁以下的病人。除了一个大家叫她“洋娃娃”的外，其余的完全是一群疯子。

“洋娃娃”从早到晚找活干，在留诊处，她很有用，帮了护士们的大忙。“洋娃娃”是个和我能聊聊的人，她一点疯样也没有，只是头脑有些迟钝。从 14 岁那年她的哥哥姐姐把她送来住院起，她就一直留在“美丽牧场”。很明显，她没有接受过治疗，就这么随随便便地被留在留诊处了，可能是因为她非常有用的缘故吧，但是，依我看，这事办得不怎么样。

因为一个人头脑有点迟钝，就该让她在留诊处呆上 15 年吗？

最初的几天里，我在足足有一个小队的大夫面前接受检查。实际上，这群白大褂中的大部分是大学生，他们不顾廉耻地朝我这件仿古睡衣里面偷看。他们的头目向我提了几个问题，我天真地告诉他，我愿意接受几天治疗，然后就去寄宿学校，在那儿我能准备我的学士考试。他不断地说：“好。好。”就像人们跟疯子说话一样。

一些关于疯人的故事冲上了我的脑海。我想，我说过的这些话真能让他们把我看成是一个自以为是拿破仑的疯子。我突然怕了起来：我会不会也一辈子被他们留在这里，怪里怪气地穿着一件仿古睡衣和一条给巨人准备的短裤？

但是，两天之后，断毒的病状消失了。我被送到 B 病区。我的衣服也还给了我，我甚至有权使用刀叉吃饭了（在留诊处，只发一把吃粥的勺子）。我遇到了另外 3 个吸毒鬼，是 3 个我认识的姑娘。我们总坐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很快就被那些老奶奶们命名为：“恐怖分子专桌。”

她们之中有一个名叫丽姬娜的姑娘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不少时光了。她也肯定地说：“美丽牧场”比监狱更糟。特别是在牢房里还能想方设法搞海洛因，而这里，却非常难。

除此之外，现在我们是四个人，过得挺高兴。尽管如此，我慢慢地开始感到不安。每当我问医生什么时候送我去治疗时，根本就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一句意思明确的话来。他们总是说：“再看看吧。”或是诸如此类的他们整天向疯子们说的废话。

本来我妈妈和儿童救济会说定，我在“美丽牧场”过四天——以保证我戒除毒瘾——然后再把我送去治疗。但这时，治疗中心答应的床位不再是问题了。而且，我独自断了毒，几乎不再有瘾了。

就这样，有一天，他们要我在一个文件上签字，根据这个文件，我自

愿地在戒毒所医院居留三个月。当然，我拒绝了，我宣布我要马上离开此地：我是自愿而来，那么，我当然可以随意而去。这样，主任医师来了，并且肯定地告诉我，如果我不签字，就将要求当局给我进行6个月的行政拘留。

我觉得上当了。极度慌乱中，我想象着自己已经束手就擒，任这群傻瓜大夫摆布了。他们可以给我贴上随便什么疾病的标签：严重神经官能症啦，精神分裂症啦，谁知道还会有什么名堂。等把我关进疯人院，就再也没有什么权力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和洋娃娃一样的命运。

更糟的是，我也不知道自己疯到什么程度了。我的神经官能有问题，这是肯定无疑的。

和反毒品中心顾问们的谈话至少使我知道了这个：毒品瘾，这是一种神经官能症，一种强迫性冲动型的神经官能症。一想到这里，我就能解释一些事：明知毒品会使自己完蛋，却多次用了又戒，戒了又用；我让母亲受了那么多罪，我待人接物的态度，都明显地不正常。我可能是莫名其妙地疯了。

于是我就想方设法使医生和护士们不能发现我的神经失常。

那些女护士把我当成一个白痴，就像别的白痴一样。我控制自己，不让自己对待她们很凶；医生们向我提问题，我的答案与我当时所想的完全不同。我努力使自己不成为我自己，而成为另外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可等他们一转过身，我就骂自己说的全是蠢话。这回，肯定他们会认为我是彻头彻尾地疯了。

关于医疗，他们建议我的不过是编织。可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呢？我不相信这会有助于我。窗子前自然是装着铁栅栏的。但因为“美丽牧场”不是一所监狱，这些铁条都是弯曲成涡型的，更富于装饰性。这样，只要把头偏一偏，我就能从两根铁条的弯曲部分钻出去。脖子卡在这样一个铁项圈里，我一呆就是几个小时。秋天到了，树叶黄了，红了。每天有一个小时，从两棵树间通过的阳光低低地直射在我的窗刚。

有的时候，我把我的金属茶杯连在毛线的一头，通过窗子，让茶杯在墙上撞来撞去取乐。或者，花上整整一个下午，我徒劳无益地试着用一根细绳钓一根树枝，想摘下一片叶子。晚上，我对自己说：“如果你来的时候还不是疯子，现在可真是疯了。”

他们甚至不允许我和那些老婆子一起到花园里转一转。恐怖分子还有权每天得到一瓶新鲜空气，而我没有，我有逃跑的危险——其实他们是有道理的。

我在壁橱里找到一个足球内胎，没完没了地朝着一扇上锁的门上的窗子撞来撞去，没准它会被撞碎的吧。不久，他们就把球拿走了。我把头朝玻璃撞去，当然，这是加固玻璃。我觉得自己是一头关在笼子——一个极小的笼子——里的野兽，整天地沿着墙壁跑来跑去。有一回，一种奔跑的可怕欲望控制了我，我就像一个短跑运动员那样从走廊的这头跑到那一头，跑来跑去，跑去跑来，直到筋疲力尽瘫倒为止。

有一天，我偷到了一把刀子。晚上，丽姬娜和我就去挖一扇门，门没插销也没铁栏的窗子，那玻璃连一丝一毫也不动。接下去的那个夜晚，我们先吓住了那些老太婆（她们中的某些人真的把我们当成恐怖分子了），让她们不敢唠叨，就拆了一张床，去撬一扇没关好的窗子上的铁栅栏。这个活儿注定要失败，而我们又发出了那么大的声音，夜间看守马上抓住了我们。

我的如此表现，这使我深深地感到，再也没有从这家疯人院出去的希

望了。停止使用毒品也是多余，我的健康还是越来越糟：脸色苍白，肌肉松弛，腹部胀大，全身浮肿。从镜子里看自己，我看到的是一张在“美丽牧场”过了15年的人的面孔。我几乎是彻夜无眠，再说，几乎每夜，病区里都会出点小事故把人吵醒。我随时都在伺机出逃。虽然知道这毫无用处，每天早晨我还是要精心打扮一番，就像要到“音响舞厅”去一样：没完没了地梳理头发，涂脂抹粉，甚至连上衣都穿好。

一天，儿童救济会来人看我。他也找不到什么除了“再看看吧”之外的话说，但他至少告诉了我戴特莱夫在什么地方。我马上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刚把这封扔进了邮筒，我又写开了第二封。把心里话都倒出来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当然也不是全部：我知道这些信是要被人拆开的，很可能在“美丽牧场”一付邮就会被拆，而到了监狱就肯定无疑地被打开了。所以我不得不说谎：比如说，我告诉他我再也不想吸毒了。

不久，我就得到了戴特莱夫的消息：同时收到了一叠信。他写道他偷盗欧洲银行支票是办了一件大蠢事，但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到巴黎去戒毒；他想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们还没一起到那里去过。戴特莱夫还说他很快就会获释，然后就去治疗。我呢，告诉他我的治疗马上也要开始。我们互相约定，治疗之后，我们要在我们的家里共同生活。我们又重新开始——这回是通过鱼雁往返——在西班牙建设我们的城堡了。不过，当我不给戴特莱夫写信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美丽牧场”里了。

我的机会来了：我的真菌病又复发了。我唠唠叨叨地对女医生说说我难受得要命，必须马上把我送到医院去。一天早晨，在一队人的护送下，我被送到了鲁道夫·维尔苏医院。院方立即留我住院，因为我的病确实相当严重。通过“吸毒者之声”的广播，我已经知道该怎么样从医院逃脱。我弄到了一张“花园通行证”，也就是说，允许我到医院的花园里去。很明显，这种通行证是不轻易发给吸毒者的，但我知道该怎么办：我去找一个女护士——一个漂亮的眼睛已经有了鱼尾纹的可爱的姑娘，向她解释说，我很愿意帮助那些瘫在轮椅上的老太太们，能不能允许我偶尔地推她们到花园里散步？那个护士丝毫也没有怀疑，夸我有副好心肠。

我找了一个老太太，提出要给她帮忙。她称我“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我把她的轮椅在园中小径上推了几步，对她说：“老奶奶，等我一分钟，我马上回来。”而半分钟后，我已经在大街上了。

我钻进了地铁，朝着动物园车站奔走。我从来没有这样一种“自由”的感觉。我推开技术大学咖啡厅的门，转了一圈之后，坐在了一条长凳上，那上面已经坐着三个扎吗啡的年轻人。我告诉他们我刚从“美丽牧场”逃了出来，他们惊讶得嘴都闭不上了。

我想来一针想得人命。一个当二道贩子的男孩同意赊给我，条件是我给他引来别的买主。好吧，我马上跑到食堂的厕所里给自己注射。

我只注射了他给我的一半。这玩意儿的质量不怎么样，但我感到舒服，头脑清楚。再说，我还得为那个小伙子搭一把手。这是个非常年轻的男孩子，16岁左右，我曾在哈森海德公园里见过他一回，他是和那些吸大麻的人在一起的。当二道贩子他还是个新手，不然。

他不会马上就把海洛因给我的：我得先为他干点什么来挣这份药。

猛地，我发现这块地方布满了便衣警察。那小子可什么都没看到，他连我的警报手势都看不明白。我得凑到他身边去，在他耳朵根上说一声“雷

子”他才有反应。然后，我悄悄地朝动物园走，他紧跟在我身后。一个吸毒的家伙靠近我，我冲他说：“别动了，老朋友。食堂那边正在搜捕。不过，我能帮你弄到地道的海洛因。”这时，那个二道贩子已经在我身边，并且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大包药。怎么能这么干呢！300 米以外就在搜捕，而这个傻小子却从口袋里掏出这么一大包海洛因！

两个正在这个角落溜达的便衣朝我们走来。跑是没有用了，他们马上就会抓着我们。那个二道贩子把那些小药包向上空扔去——真是一团淡紫色铝铂纸的旋风啊，他一定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这一切栽到我和那个“老瘾”身上。

他们让我们举起双手，靠着一辆伏尔克车站好，搜查我们的身上——因为有时这伙人是带有武器的。可是，我们中间最大的还没有 16 岁。那个混蛋的“雷子”竟乘机揉我的奶！

但我显得十分得意。药我用过了，而经过了“美丽牧场”之后，什么也不能使我害怕了。我又重新扮起受过很好教育的小姑娘的角色。在收缴了我的身份证后，便衣们马上变得客气起来。一个便衣说：“老天爷，你还不到 15 岁，在这里干什么？”我回答：“我逛逛。”我把一支烟塞进嘴里，这可让他火了：“扔了它！这是毒药！这么年轻！”我把烟扔了。

他们把我们带到了艾尔恩斯特广场的警察局，关在一间拘留室里。那个刚下海的二道贩子慌了手脚，不住声地嚷嚷：“让我出去！让我出去！”而我，脱掉上衣，把它卷成一个枕头，躺在床架上，打起盹来。拘留，这吓不倒我。他们肯定还不知道我是从“美丽牧场”逃出来的呢！

果然，两小时后，他们把我放了。我又转回技术大学。路上，我的良心在折磨我：就这样，我又一次在碰到第一个机会时就又陷进去了。热泪从我脸上流下来，现在可怎么办呢？我总不能去找妈妈吧？就这样瞳孔缩得像针眼，娇滴滴地，噘着嘴，对她说：“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我逃出来了，美美地给我准备顿饭吃吧！”

我到了技术大学的“反毒品中心”，它就设在原来的食堂那里。在那里工作的人也很有“能耐”，他们使我有了足够的理智来决定给我母亲打电话。她得知我在技术大学，稍稍放下心来。一到家，我就睡在床上：发烧 40 度。妈妈叫来了急诊医生。医生要给我打针。

我怕得要死：在胳膊上一天注射 2、3 次算不了什么，可是在臀部注射，就把我吓坏了。

体温马上降了下来，可这时我已经瘫软成一团了——“美丽牧场”从精神到肉体都使我完蛋了。我在床上躺了 3 天。等我一能起床，我马上就跑到了反毒品中心。要到那里去，“午餐和咖啡厅”是必经之路，我是跑着经过这段路的，绝没左顾右盼。

整整一个星期，我每天都到那里去。我终于找到一个肯听我说话的人。让我讲话，这是第一次。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人，妈妈，爸爸，戒毒所的人总是对我长篇大套地说。而这里，他们让我讲讲在我身上发生的事，让我自己试着总结一下。我还跑到传染病医院去，因为这时候我的脸黄得像柠檬了。那天早晨，我在咖啡厅前碰到了几个伙伴，他们全都跑开了，还一边向我喊：“快走开，你没看见自己得了黄疸病了吗？”

是的，我不想看到。真是古怪，每当我怀着最近“脱钩”的希望，停止使用一段时间的毒品之后，就会得注射毒品的人的通病。当我的腹疼已经

无法忍受的时候，我就要妈妈陪我到斯特格里菲诊所去（我之所以选中了这家诊所，是因为那里的伙食还可以）。我们在候诊室里等了 2 个小时，肚子疼得使我在椅子上扭来扭去。随便哪个护士都可以给我下诊断，因为这从我黄黄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但是谁也不动弹。屋子里满是人，还有一些孩子，如果我的黄疸是传染性的——我已经得过传染性黄疸了——那可真有传染给所有的人的危险。

两个小时之后，我觉得太过份了。我扶着墙朝走廊走去——我太虚弱，又疼得像个受炼狱之苦的罪人。我寻找传染科。一个医生从我面前经过，我对他说：“给我一张床位吧，我可不愿意传染那些人。我有黄疸，也许您已经看出来了吧？”那家伙表示了歉意，他无能为力，我还得回到候诊室去。

最后终于有个医生接待我了。我宁愿马上告诉他我是个吸毒者，扔给我的是冷冰冰的答案：“很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能力。”

一说到吸毒者，所有的人都没有能力。又上了出租汽车。因为这些医生不愿意为我诊治，我妈妈非常气愤。第二天早晨，妈妈又把我送到鲁道夫·维尔苏医院。因为我最早就是从他们那里逃出来的，这回可把小鞋穿上了。

一个年轻的实习大夫要给我抽血化验。我一上来就告诉他：“这根血管不行，它硬得像木头。你得在下面另找一根。而且进针也不能直着，而应该斜着刺。要不然就扎不进去。”那家伙无言以对，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去刺一根硬化的血管。他徒劳地抽针筒：一滴血都吸不出来。最后，由于针管里形成的真空，针头整个从我手臂上脱了出来。这之后，他才问我该扎什么地方。

我整整睡了两天。我的黄疸不是传染性的。到了第四天，我的肝指标差不多令人满意了，小便不那么红了，面色也逐渐恢复了它的白色。

我如约每天给反毒品中心打电话，希望他们很快地给我找到一张治疗床位。而一个星期天，在探视时间内，让我吃了一惊：我妈妈陪着戴特莱夫来了，他刚刚获释。

海誓山盟，拥抱接吻，抚爱与祝贺。我们想单独在一起，就到医院的花园里去转一圈，就像我们从来没有分手一样。而忽然间，我们就进了地铁，朝着动物园站奔走。我们的运气不错，头一个碰上的就是个熟人：基雍姆，他是个走运的小子。他和一个有相公癖的人住在一起，那是个医生，作家，非常有名气。基雍姆的袋子不单单塞满了票子，他还在一所私立中学读书。

基雍姆送了我们一针，然后我在吃晚饭的时候回到医院。第二天，戴特莱夫又来了，这回我们设法弄“老海”，回到医院已经是 10 点半了。我错过了见到父亲的机会，他是在飞往泰国之前来和我道别的。

戴特莱夫再来的时候，妈妈又露出满脸的失望表情。这是厉害的一手！再加上毒品情报所的人来看我，并且把我看成是个不可救药的人。我向他发誓，我有真诚的脱钩愿望，我向自己和其他人发誓。戴特莱夫说这都是他的错。他哭了。然后，轮到他去找反毒品中心的人了。再一个星期日，

他告诉我他们已经为他找到一张治疗床位，第二天他就入院。

我祝贺他：“现在，一切都好。我也会有床位的，咱们再也不干蠢事了。”

我们到花园里去散步。我提议：“咱们快去快回地到动物园地铁站去一趟怎么样？我想买一本《从死神头颅星球上归来》的第三卷（这是一本我正在读的恐怖小说），我妈妈没有买到。”

戴特莱夫说：“好极了，老伙计。你真的非得到动物园——只到动物园——去买你的恐怖小说？你不如干脆告诉我你想来一针呢！”

戴特莱夫的这副高傲面孔，这种道貌岸然的样子真让我恼火，再说，我确实没有什么其它的念头，只想把《从死神头颅星球上归来》看完。我回答他：“你少胡扯。再说，你也不必非陪我去不可！”

当然，他还是陪我去。在地铁里，我又玩起我常玩的小把戏来了：逗弄那些老太婆。

这一直使戴特莱夫讨厌。他躲到车厢的另一头去了。我呢，和过去一样，冲他嚷嚷：“哎，老伙计，犯不上装着不认识我，你也比我强不了多少，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时，我又开始流鼻血了。一个星期几天，只要我一在地铁里落脚，鼻子就流血。这真烦人，而我就老得把血从脸上擦掉。

所幸的是，我马上买到了那本书。心情一好，我就建议戴特莱夫该去溜达溜达：“无论如何，这是你自由自在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的两腿自动地就把我们领到了塞纳区。施特拉在那里，两个蒂娜也在那里。施特拉看到我高兴得要命，但两个蒂娜正难受异常：她们的毒瘾发作了。她们刚从选帝侯街赛马场回来，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她们忘了这天是星期日，而星期日，嫖客们正和他们的夫人及男女公子在过周末。

我很高兴自己已经从这个泥塘里拔了出来。我不再怕犯瘾，我用不着再去拉客。几个星期以来，我有一种优越感，感到兴高采烈。这真是妙极了：我在塞纳区里逛，却不想扎一针。

我们走到了库尔夫斯登达姆地铁站附近的公共汽车站。我们旁边，有两个外国佬。他们一直在向我打手势。虽然我有黄疸，但因为我戒毒时间相当长了，所以在四个姑娘中我显得气色最好。还有，我没有穿吸毒者们的“制服”，我穿的是向妹妹借来的衣服——纯粹是“姑娘”式的——正为的是区别于那些瘾君子。在医院里，我甚至请人剪了发，剪得相当短。

两个外国佬不停地向我使眼色。我向两个蒂娜说：“要不要我给你们搭上？哪怕他们只给40马克，你们也能两人分一份药了。”不管怎样，处于当时的境地，她们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很轻松地朝那两个外国佬走去：“你们想要两个姑娘吗？我替你们问。50马克，怎么样？”我指着两个蒂娜说。

他们俩傻笑着：“不，要你。你，睡觉，你，旅馆。”

我很轻松，不愿为几个铜子而气势汹汹。我回答他们：“好，没问题，不过，这些姑娘，棒极了。14岁，只要50马克。”那个小蒂娜确实只有14岁。

两个外国佬不为我的话所动。我知道他们的心思，两个蒂娜正在缺毒犯瘾，确实吊不起胃口来。我走回到她们身边，告诉她们事情吹了。后来，不知怎么鬼使神差，我把施特拉拉到一旁：“看蒂娜这副样子，她们是没法找到客人的。咱们两个去，把他们的火勾起来，后面让蒂娜来干。反正她们要跟客人睡的。和他们要上100克我们可以买半克药。”

施特拉不等劝就同意了。虽然，她对对我这都是最差劲的。不过，至少我们彼此从来没有向对方说过我们和外国佬有过什么交往。

我转回来找那两个土耳其人，我的建议马上使他们兴奋起来了。戴特莱夫满面沮丧他说：“行了，你又开始拉客了。”我说：“少胡扯，我什么也不会干的，你没有看见我们是4个姑娘吗？”我觉得我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对两个蒂娜的怜悯，可能真的有一点。但是，不知不觉地，我无疑正在寻找一条迂回通往毒品的路。

我向其它的几个人解释我们得到努尔马旅馆去，外国佬们在那里有大

房间。其它的地方是不会让6个人到一间房子里去的。那好，上路吧。突然，又一个外国佬凑了过来。那两个声明：“他，朋友，旅馆也去。”

这个时候，我们什么也不说，我们高兴的是拿到100马克。施特拉和一个家伙去买海洛因了，她认识一个卖主，卖的半克份额的药分量足，是这块地方最棒的。等施特拉回来之后，8个人继续赶路：4个女孩子和戴特莱夫在前，手臂扣着手臂，把人行道的整个路面都切断了；3个外国佬跟在后面。

但是，气氛有点紧张。两个蒂娜想马上使用海洛因。施特拉不答应，当然是怕她们把我们蒙了。除此之外，还得想个主意摆脱第3个外国佬，因为我们这笔生意里没包括他。

施特拉转过身，用手指着他，十分干脆地说：“要是这个鬼子也去，我们可什么都不干！”她真有胆量这样对待这个上土耳其佬。

可是这3个家伙手拉手走着，什么也不想听进去。施特拉建议我们干脆把他们甩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好主意”。我穿的是平跟鞋——这是差不多3年以来的头一回——我是能跑的。可是，想了一想，觉得这办法也不很巧妙：“他们迟早会找到我们的，那么到哪一天，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完全忘了，总的说来，我已经不常到“舞厅”去了，我也不再拉客了。

施特拉不高兴了，她落在了后面，又和那些外国佬们争了起来。到了“欧洲中心”地下通道的时候，我们再也听不到身后的声音了。我转过身子，施特拉不见了，她从地面上消失了，带走了全部的海洛因。那几个外国佬也发现她不在了，显得十分不安。

这一切都怨施特拉！我愤怒极了。依我看，她只能在欧洲中心里。我向那里冲去，戴特莱夫紧跟我。两蒂娜停在那里不能动，外国佬抓住了她们。我像疯子一样在商业中心里跑了一圈。戴特莱夫从左路找，我从右路。没有施特拉的影子。再加上那两个蒂娜，搅得我心绪纷乱。我看见那几个土耳其人把她们拖进了一家旅馆，我们等着她们干完那件下贱的活儿后出来，等了好几个小时。现在，她们真配得上那一针了！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施特拉。两个姑娘和我走到了库尔夫尔大街地铁站。这里几乎空无一人，因为我们是为找施特拉而来，便直奔地铁站的公共厕所。一走进门，我就听到施特拉的声音，听到她正在行动，正向谁喊着什么。厕所中有很多厕间，可我一下子就找到了施特拉的那间。我一边用双拳猛力敲打阁子门，一边喊：“施特拉，马上开门，不然有你的好看！”

门开了，施特拉探出头，小蒂娜脆脆地给了她一记耳光。施特拉正处于刚刚用完毒品的兴奋中，她声明：“看，这一整袋老海都留给你们，我并不想要它。”然后，她就走了。

很明显，这是个弥天大谎，她用了这半克的一半还多，说来说去就是不愿意和我们均分。两个蒂娜和我把这袋里剩下的加上我们刚才买的那包放在一起，平均分成了三份。

对于我这么一个很久没有使用毒品的人来说，这份比我所需要的量要大得多。我的两腿发软，步履蹒跚。我们走到了特莱保斯，施特拉在那里。她正在跟一个商人拉买卖，我们走到她的面前：“嗨，别忘了，你还欠我们四分之一克呢！”她没扯皮，看来她还有点良心。

我对她喊：“你是一个臭婊子，我再也不和你说话了。”然后，我就跑开去注射施特拉还给我们那份海洛因中我的那部分，又买了一瓶可口可乐。

我孤零零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这是过午以来刚有的几分钟平静。有那么一会儿，我希望戴特莱夫能来。后来，我就开始思索了。

开头还算好。我归结了一下：先是最要好的男朋友扔下我不管了；接着是我最好的女朋友把我戏弄了一番。你得记住：吸毒者之间是没有友谊。你绝对是孤身一人，永远如此，其它一切都是废话。下午的这场恶梦为的不过是一针“老海”！可是，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恶梦不是天天在做吗？

有几回，我也有意识清醒的时候，可都是在吸毒之后的兴奋之际。没有毒品，我什么都干得出来，身不由己，鬼使神差。今天的事，就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我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之中。我很平静——因为血液中有足量的海洛因。我不能再回医院了，再说，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

总之，他们会把我赶出来的。再不会有任何医院愿意收留我了。医生早就警告过我妈妈：我的肝脏已经到了硬变的边缘。如果我这样继续下去，最多活不了两年。至于毒品咨询处，也毫无希望了。甚至没有必要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和医院保持着联系，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要我了，他们是有道理的：在柏林，有这么多的吸毒的人愿意接受治疗，却没有几张床位。他们当然要把床位留给那些还有勇气戒毒。有希望从毒品中解脱出来的人。而我，很明显，我不属于这类人。可能我开始戒毒有点太早，没有运气从中脱身。

我头脑清醒。一边呷着可口可乐，一边把问题归拢在一起，同时也没忘记实际问题。

他们定会把我关在门外，或者说，她用不着这么着急，完全可以等到明天早晨去找警察送我到管教所去。要是在她的位置上，我也会这么干的。我的父亲在泰国。施特拉？不可能。戴特莱夫？我甚至不知道他去哪里熬过这一夜。如果他真的决心脱钩，他应该在他父亲那里，无论如何，明天早晨他就走了，不论是今夜，还是以后，我连一张床都找不到。

我最后一次清醒地估量我的处境，得出的结论是：我面前只有两条路：或者彻底地脱钩，或者再猛猛地来一针，要命的一针。不幸的是，今晚这第一条路已经堵死了。五、六次戒毒都没有成功，够了，反正比起其他的吸毒者来，我既不比他们强，也不比他们差，干嘛我非留在他们已经离开了的这条窄胡同里呢？

我走到了库夫尔斯特拉街，我还从来没有在夜里在这里拉过客。到了夜里，吸毒者就让位给那些靠卖淫吃饭的老手了。可是我不怕。我很快地拉了两个客，然后回到特莱保斯。口袋里装着 100 马克，于是我买了半克药。

我不愿意去库夫尔斯特拉街的厕所，也不愿意去特莱保斯那边的公厕。因为人太多。那上哪儿？我又买了一筒可口可乐，思索着。我决定到邦代斯广场那边的厕所去。一到夜里，那里空无一人。

我步行到邦代斯广场，心绪平静。夜晚，公共厕所空荡荡的，给人一种奇特的窒息感。

而我却感到莫名其妙的安全，厕所清洁，明亮。这是柏林最棒的公厕，而今只属于我一个人。厕间很大（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厕间里挤进了 6 个人），门一直挡到地面，隔墙上也没有洞。很多吸毒者都选择这类厕所自杀：因为它太棒了。

没有拉客的老太婆，没有偷看女人的下流汉，没有警察，我不慌不忙地支配我的时间。

我洗脸，梳头。然后，仔细地冲洗蒂娜借给我的注射器。半克药足够了。肯定无疑。在我最后几次戒毒之后，四分之一克的药就足以击倒我了，而今天，我不但有四分之一，甚至更多。而且，黄疸使我十分虚弱。我当然希望能够有整整一克药，可是我觉得自己没法再拉客了。

我平静地选择最干净的厕间，我感到十分冷静。真的，我一点也不害怕。我从没料到自杀会连一点悲伤的气味都没有。我即不想过去的，也不想我的妈妈和戴特莱夫。我只想要给自己注射的这一针。

照老习惯。我把衣物散乱地扔在马桶的周围，把药倒在也是从蒂娜那里借来的勺子里。

我忽然想到我也在欺弄蒂娜了，因为她还在等着注射器和勺子。后来，我发现忘记了柠檬。

可是，海洛因的质量不错，没有柠檬也会溶解的。

我在自己的左臂上寻找静脉。实际上，这一次注射和以往的一样，惟一的区别是，这是我最后的一针了。真真正正的最后一针。第二次刺入时扎入了静脉，注射器里马上有了回血。我把半克药一下子注射进去。我没时间干第二回了：我感到心脏被撕裂，颅骨从头上被掀开了。

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外面的汽车发出强烈的噪声。我倒在马桶边上。我从手臂上抽下了注射器，试着站起来。我发现自己的右腿好像瘫了一样。我能略微动一动，但付出的代价是关节要命的疼痛，特别是大腿关节。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把厕所的门打开的。我向外爬了几步，然后站起身来。我靠着墙，用一条腿跳着向前走。在厕所的入口，有两个 15 岁左右的穿着紧身牛仔裤和绸衫的男孩——两个小兔子——盯着这个用单脚跳的魔鬼。在我就要摔倒的时候，他们恰好扶住了我。他们马上就什么都明白了，其中的一个对我说：“嘿嘿，这可真是回事啊！”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在动物园地铁站见过我。他们把我放在一条长凳上。这是个 10 月的早晨，天冷得要命。一个男孩子递给我一支万宝路。我想：“真怪，为什么这些相公都爱抽骆驼和万宝路呢？”说真的，我很高兴自己没有死去。

我给他们讲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施特拉怎么骗了我，我又怎样给自己注射了半克海洛因。这两个小家伙非常乖：如果我想到哪里去，他们可以送我。这个问题激怒了我，我想也没想，便对他们说，把我一个人留在这条凳子上就行了，可是，我冷得发抖，根本走不了路，他们建议把我送到医院去。

我不愿意要什么医生。他们说他们认识一个非常热心的家伙，一个相公，一个喜欢鸡奸的医生，这使我放下心来：在我当时所处的境地，这倒更让人信赖。他们招来了一辆出租汽车把我送到了他们的伙伴那里。那家伙果真非常热情。他把我安置在他自己的床上，然后开始给我检查。他想让我谈谈毒品，讲述这一切。我可没有这个兴致，对任何人都没有。我向他要安眠药，他给了我一片，还给了其它的药。

我又开始发烧和流鼻血。我几乎是一刻未醒地睡了两天，第三天，当我的大脑几乎可以正常干活的时候，我坚持不了了。我不想思索，强迫自己不去思索。两个念头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一是善良的上帝不希望这回要了你的小命；二是下回你得注射整整一克药。

我想出去。到大舞台去，去注射毒品，去获取那注射后的快感——特别是不要再思索了——直到注射的极限。此刻我走路还很困难。喜爱鸡奸的

医生对我十分关切，弄来了拐杖，我架着拐杖走了，可又在半路上把它们扔了：我可不愿意拄着双拐在人前露面。只要咬紧牙关，离开拐杖也是可以走路的。

我一瘸一拐地走到动物园地铁站的广场上。我接了几个客人，其中甚至有个外国佬，他不是土耳其人，而是个希腊人。老实说，我不反对外国人，但我不和外国佬打任何交道，这定约可真有点古怪。不论如何，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一样，反正不过如此了。

可能我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妈妈来找我。她如果寻找我，就一定会到动物园地铁站来的，所以我才没到库尔夫斯特拉街那边去。但是我也深深地感到不再会有人找我了，这已经不是妈妈焦虑地等我回家的时代了。

我买了一份药，给自己打了一针，然后又干起营生。我需要钱，准备着万一找不到过夜的客人时使用，那时我就得住旅馆。

突然，我碰上了沃尔弗，他是戴特莱夫的老主顾，最近，戴特莱夫不曾到他家去过夜。

不过他不再是一位主顾，他对海洛因上了瘾，所以现在跑到生意线的这边来了。可能他拉客人很难，因为他都 26 岁了。我问他有没有关于戴特莱夫的消息。他的热泪夺眶而出。不错，戴特莱夫是在治疗所，没有他，生活就彻底完蛋了，活着没有一点意思，他想脱钩，他爱戴特莱夫，他想自杀。总之，他向我唠叨了一大堆吸毒者们常说的废话。关于戴特莱夫的那些昏话弄得我糊里糊涂。我真不能理解，这个可怜的小相公，竟然自作多情地以为他在戴特莱夫身上有着某种权力。戴特莱夫应该离开治疗所回到他身边，仅此而已。他甚至把一把公寓的钥匙留给了戴特莱夫。听到这句话，我不禁脱口说道：“你真是一个混蛋，一个蠢货！把你家的钥匙留给戴特莱夫，这样，他就知道，万一治疗所把他赶出来，他就会有落脚之处。要是你真的爱他，你就该想方设法让他脱钩。但是，你不过是个下流的鸡奸犯而已！”

沃尔弗正当瘾发之际，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弄得灰溜溜的。忽然，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如果我到他家去过夜又如何？我平静了下来并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为了酬答他的好客之意，我马上接个客人，给他买上一份药。他特别高兴我能到他家去睡，因为除了戴特莱夫和我之外，他再也不认识别的人了。

我们一起睡在他的那张大床上，由于戴特莱夫不在，我还能够和他相处。他让我讨厌，但还能忍受，这个可怜的小相公。

于是，戴特莱夫的两个爱人就睡在一张双人床上了。每天晚上，几乎都是老一套：沃尔弗没完没了地重复他多么爱戴，大哭一场然后入梦。这使我的神经焦躁不安，但我还是忍住不发火，因为我需要这张床位。甚至有一天他向我宣称，在戴特莱夫戒毒之后他们俩将在一所漂亮的公寓里同居，我都没有发怒。再说，左右对我来说都是一样。此外，我想，戴特莱夫和我对他还该有点爱怜之意：如果当初他不是结交了我们，他不过是一个孤独的小相公，偶尔地，到酒馆里买个醉醺醺以忘掉他的不幸，仅此而已。

我们就这样打发了一周的时光，注射毒品，地铁站，地铁站，注射毒品，晚上是沃尔弗无止无休的哀叹。

一天早晨，我醒了，因为我听到有人打开了公寓的门，在走廊里弄着什么东西。可能是沃尔弗。我喊着：“别吵了，我要睡觉！”走进来的是戴特莱夫。

我们拥抱。我们接吻。重逢的快乐。突然我明白了：“你溜出来了！”

他向我解释。像所有新到医疗所的吸毒者一样，人们要他担任三周司晨员。要一个扎吗啡的人遵守时刻，这几乎比要他登天还难。戴特莱夫必须每天在同一时刻醒来，然后叫醒其他的人。这对他来说是一场极为可怕的考验。所方之所以制定这种制度，对接受医疗的病员进行选择，是希望把他们掌握得太少的床位保留给那些还有些意志的人。戴特莱夫没能经得住这种考验，有三次他没能按时醒来，所方把他开除了。

戴特莱夫告诉我戒毒医疗所是个不坏的地方。不错，挺苦的，但他下回一定能够成功地坚持下来。目前，他打算不动毒品——而且，他马上着手到戒毒医疗所去找一张床位。他告诉我，在那里他遇到了好几个我们过去的老朋友，比如说佛朗克，在他的朋友安哥死后想试着脱钩。安哥死的时候 14 岁，和巴普西一样。

我问戴特莱夫今天他打算干什么。先来一针再说。我要他给我带回兴奋剂来。两个小时之后，他回来了，还跟着一个叫比科的人，那是他过去的客人。比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放在桌子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满满的一袋海洛因！足足 10 克。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海洛因。等我醒过神来，马上向戴特莱夫喊道：“你疯了？怎么能往家里带 10 克海洛因？”

“从今天开始，我当毒贩子了。”

“你有没有想过警察？如果他们抓住你，那你就会再进班房，而且会是几年！”

戴特莱夫不高兴了：“我没功夫想警察，别再给我泼凉水好不好！”

他马上干了起来。用小刀把它分成若干小份，放在小方块铝铂纸上，我觉得纸裁得大小了，并让他注意到这一点：“老伙计，你要注意。它的大小最要紧。货的量不变，可包要大些。记得洗衣粉吗？那么大的盒子，可里面只装了四分之三”。

“你开始跟上我了。我的药量一定要足。人们马上就可以发现，我这里的服是是最好的。”

这时我才想到要问一问这些毒品属于谁。自然是属于比科。这个小流氓！当初，他干的是溜门撬锁盗窃写字间的勾当。刚刚出狱，还处于监管期间，就想利用戴特莱夫这个傻瓜干活来摆脱他自己的困境。他用二道贩子的价格从他在狱中结识的波茨但街的老鸽子千里买了货，他自己不去卖——他也不会卖，他只是个酒鬼——却让戴特莱夫给他干活。

等戴特莱夫把包包好，我开始数共有多少包。其中有一克一包的，半克一包的和四分之一克一包的。我的数学从来学得不好。可是我马上就算出只有 8 克：他把分量给得太大了。

如果不核实一遍的话，我们就得掏自己的口袋来付那两克海洛因的钱了。

好办，我们重新干起。因为纸上总会沾着些粉末，我就把它们收集起来留为自用。

戴特莱夫决定把包包得更大一些，并且同时赠送一瓶啤酒，这样可以显得他货源充足。

这回他决定只包四分之一克的，最后，共有 24 包。

我们马上先注射了两包：当然应该品尝一下自己的货物。这可真是质

量极佳的海洛因。

晚上，我们把货物带到了特莱保斯。我们把大部分货埋到了大楼后面的垃圾桶旁边，身上所带的决不超过 3 包。这样，当突然搜查时，我们就不会被划为毒品贩子。买卖开头还不错，头天晚上就脱手了 5 克，很快人们就知道我们手里有质好量足的海洛因了。只有一个人埋怨我们的货色不好，当然是施特拉。就是这样，也不妨碍她提出当我们的代销客，而我，这个可怜的傻瓜，居然接受了：她每代我们售出 5 包，便可以得到四分之一克。而结果是：我们自己什么也嫌不到了。我们和比科约定的是，每销出 10 克，我们可以提成 1 克半。而我们支付了代销者的服务之后，剩给我们这些二道贩子的仅仅是能够满足每天需要的海洛因了。

比科每天早晨来结帐。每天晚上，我们的钱箱一般能有 2 千马克——这就意味着比科能拿到 1 千马克的纯利；而我们，只有 1 克半的海洛因。比科基本上不冒任何风险，除非我们揭发他。

他是很谨慎的。他早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被捕，如果我们把他出卖给警方，最好是事先准备好棺材。他的波茨坦街的伙伴会承担这项工作。就是在监狱里也逃脱不了，到处都有他们的伙计。他还威胁我们，如果察觉我们伪造账目，他也会让这些伙计们来干预的。我们真的相信他的威胁。

戴特莱夫不愿意承认比科在诈骗我们：“你还想干什么？首先，这可以使你不必去街上拉客。我可不愿意你再去卖淫了，我呢，也不想再去干。那么，我们只好走现在这条路了。”

大部分的小二道贩子的处境和我们相同。我们从没有足够的钱直接向中间人购进十克海洛因。再者，我们也不了解毒品的分配网。我们又怎么能够与波茨坦街的保护毒品的地痞们接上头呢。街上的毒品小贩——他们自己就是吸毒者——一般都需要用现金买进毒品，也正是这些可怜的上瘾的家伙最后进了班房。而像比科这样的人，基本上在警察的打击范围之外，而且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替换的代销小贩，为了每天能注射两针，每个吸毒者都愿意干这个买卖。

几天之后，我们感到在特莱保斯附近不安全了。到处都充斥着便衣警察，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压力。我们重新组织了销售方式：由我在特莱保斯担任推销员，而戴特莱夫拿着货在稍远的地方等候，由我把买主打发到他那里去。

大约又过了一个星期，戴特莱夫毫不在意地在特莱保斯附近晃来晃去，口袋里装满了药包。一辆汽车停在他的旁边，司机问他去动物园地铁站该走哪条路。戴特莱夫慌了手脚，拔腿飞跑，把货扔进了他碰到的第一个荆棘丛中。

他向我解释说那家伙肯定是个警察，因为不会有人不知道动物园地铁站在什么地方。

这下糟了，我们看着每个朝着库丹姆开车的或散步的人都像是警察。我们也不敢去取回扔掉的货：要是警察在那里等着我们可怎么得了？

我们真是陷进了泥淖。第二天早晨，我们没法和比科清帐。跟他实话实说？他不会相信。我想了个主意：就告诉比科我们被外国佬抢了，他们拿走了一切，连钱带毒品。反正事情闹大了，干脆把手里有的这几个钱也花掉！这个混蛋真卑鄙！他每天从我们身上赚 1 千马克，而我们却一个子儿都没有。我得买几件衣服了。我没有暖和衣服，我总不能一冬天总穿着我从医院里溜

出来时所穿的衣服在街上逛。

戴特莱夫终于明白了给比科 200 马克和一文不给没有多大区别。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去了旧货市场，看到什么顺眼的东西，戴特莱夫先试，然后我试。我们仅买那些他能穿我也能穿的衣服。我决定买一件黑兔皮上衣。戴特莱夫穿着正合适，显得十分招人喜欢。后来，我们还买了香水，一个人音盒和其它杂七杂八的东西。但是，我们并没有把钱全部花光——我们不能什么都买，仅仅是为了需要高兴而已。我们把剩下的钱都藏了起来。

我们刚刚回到沃尔弗家，比科就来了。戴特莱夫说他还没有注射，他得先扎一针然后再算帐。当然这不是真话。跟往常一样，一起床我们就注射过了。但是，戴特莱夫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怕得要死。

比科说：“好吧。”然后就埋头去读我的一本恐怖小说。戴特莱夫又注射了四分之一克海洛因，针还没有从胳膊上拔下来，便坐下了。

我想，好，连着注射了两针，想打个盹也没有什么让人不放心的。只不过得马上把注射器从手臂上拔下来。不然血液就会凝在针里，要清洗就麻烦了，再说，我们也没有备用的针。我用一块棉花沾着酒精去擦戴特莱夫臂上的针孔。我发觉他很奇怪：我扶起他的手臂，一放手，他的手臂便无力地垂下来。我推他，想让他醒过来，他却从椅子上滑到了地上，他的面孔灰暗，嘴唇青紫。我解开他的衬衫听他的心律，根本没有心跳。

我马上闯到一个邻居家，一个退休的女人，请她让我使用她的电话。为了救急，我拨了警察局应急号：“我的朋友没气了，是因为过量注射毒品造成的。”我告诉了他们这里的地址。这时比科朝我喊道：“他醒过来了，别说了。”我对警察说：“谢谢，不麻烦你们了，警报有误。”接着便挂断了电话。

戴特莱夫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眼睛已经睁开了。比科问我是否和警察提到过毒品，是不是已经把地址告诉了他们，“没有，没有直接提到，我想他们不会把两者联系起来。”——我说。

比科像对待神经质的蠢货那样待我。他给了戴特莱夫一记耳光，命令他马上站起来。我要他不要缠住戴特莱夫，他朝我喊道：“闭上你的臭嘴，蠢货！拿水来！”等我从厨房取回水来，我看见戴特莱夫已经站了起来，比科正在训斥他。我真高兴戴特莱夫已经恢复了常态，想去拥抱他，他把我推开了。比科朝他的脸上泼了一碗水，对他说：“来吧，傻小子，快点溜吧。”

戴特莱夫仍旧面色灰白，站立不稳。我求他还是躺下，比科喊了起来：“闭嘴！”而戴特莱夫却对我说：“我没时间了。”他们就这样走了，比科搀着戴特莱夫。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浑身抖作一团。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戴特莱夫死了。我倒在床上，试图把精力集中到恐怖小说中去。有人敲门，我从窥视孔朝外看：那是警察。

这时我丢魂落魄，没有从窗户跳出去逃跑，反而开开了房门，我十分勉强地向他们解释：公寓是属于一个鸡奸犯的，他出外旅行去了，把房子借给了我。今天早晨，两个年轻人闯了进来，他们彼此注射了毒品，其中的一个倒在了地上，所以我叫了警察。

警察问我那两个年轻人的名字，能不能描述他们的外貌，等等。我胡乱地向他们说了。

他们看了我的身份证。事情马上有了结果：“好吧，你跟我们走吧，人们已经报案说你失踪了。”

他们对我还不错，给我时间让我把两本小说塞到我的塑料包里并且给戴特莱夫留了个条子：“亲爱的戴特莱夫，正如你想到的，我到底进去了。一有机会我就告诉你我的消息。温柔地拥抱你。你的克丽斯蒂娜。”我把这个条子用胶纸贴在公寓的门上。

他们先把我带到了弗里特里斯特拉街警察局，然后送我到拘留所。在那里，他们把我塞进像是从西部片里借来的一间牢房：一面完全用铁栅栏组成的墙，门开门闭总是发出《道奇城的司法官》影片里的那种声音。我把身子贴在铁栅栏上，双手紧抓住铁栏。真是让人丧气死了。于是我躺在了那架纸床上，由于海洛因的药劲还没失去，我很快睡着了。人们给我拿来一个小杯，让我在里面小便，以便化验尿，杯子放在一个小桶里，免得把地面弄脏。无论谁从这里经过都能看见我小便。这一天，他们既没给我吃，也没给我喝。

下午快过完的时候，我看到母亲来了。在经过栅栏的时候，她只向我投来了无神的一眼。可能有些问题还要和警方解决吧。后来，门开了，妈妈向我说：“你好！”抓住了我的胳膊，抓得很紧。很紧。外面有辆汽车在等我们。妈妈的男朋友卡洛斯坐在驾驶座上。妈妈把我塞在后排座上，她坐在了我的身旁。所有的人都一言不发。卡洛斯好像迷了路，我们朝柏林驶去。我想：这回可好，他们全都呆了，连到克勒贝尔的路也找不到了。

我们停下来加油。我告诉妈妈我饿了。我想吃面包，她给我买了3个。在开始吃第2个的时候，我感觉不舒服。卡洛斯不得不停车让我到外面去吐。我们走在高速公路上，他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呢？到儿童教养院去吗？我会逃出来的。后来，我看到了“特凯尔”机场的牌子，这太过分了，他们要把我赶出柏林去。

我们下了车。妈妈一秒钟也不离开我，一直像刚下车那样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腕。这时我说了这天晚上的第二句话：“请您放开我的手好吗？”我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她放开了我，但仍旧停在伸手就可以抓住我的位置。卡洛斯断后，也保持着警惕状态。我更加萎靡不振。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反正他们从我身上什么也得不到。当母亲拉着我朝写有汉堡的通道走去时，我还是朝周围瞥了一眼，看看有没有办法溜掉。但是我已经筋疲力尽，不能试一试了。

汉堡！真让人丧气。我有一个奶奶，一个婶婶，一个叔叔和一个表兄住在离汉堡50公里的村子里。再也不是城里人啦。他们的房子维护得如此完美无缺，真让人作呕。地上连个灰尘颗粒都没有。有一天，我光着脚在地上走了几个小时，晚上，我连脚都不用洗，可见有多么干净。

在飞机里的时候，我装作专心致志地看我的恐怖小说，实际上我也真的看了几页。妈妈一直像条鱼一样一言不发，她甚至都没告诉我，我们要到哪里去。当空中小姐开始那一套惯常的花言巧语时——您的旅途愉快……希望尽快地再次为您服务，等等——我发现妈妈哭了。接着，她开始说话，用机关枪的速度。她一直是为我好。最近，她总是梦见了我死在了公共厕所里，四脚抽搐，到处是血。是让个毒品贩子害死的，而警察通知她去认领尸体。

我总是觉得妈妈有心理玄学方面的特殊才能。假如某天晚上她对我说：“孩子，不要出门，我有一种古怪的感觉。”这时，就会发生某些意外：在

一次紧急搜查中被抓住啦，上当受骗啦，一件讨人嫌的事故啦，等等。听她述说她的梦境，我马上想到了比科，他的威胁，和他的那些充当保护人的地痞朋友。可能这回是妈妈救了我的命，我不让自己想得太远。自从我错过了出去的机会，我就不再思索了。

我的婶婶在机场迎接我们。我们和妈妈一起吃午饭，因为她要乘下一个航班回柏林。我想要一瓶“弗罗里达男子酒”，可是在这个豪华级的饭店里却没有这种牌子的汽水。虽然我渴得要命，可是我什么也没喝。

我妈妈和婶婶给我上了一大堂课。她们二位在半个小时之中，为我描绘了今后年代中我的生活计划：上学，交新的朋友，学会某种有益的技能，然后带着职业教育证书回柏林去。

这并不复杂。妈妈流着泪向我们告别，而我，我克制住自己不去受影响。

母亲的诉说

白天真难过。我克制着自己，紧张得快要裂开了。从飞机场回来的路上，我终于能够流泪了。我又难过又心安：难过的是克利斯蒂娜离开了我，放心的是终于让她从海洛因中脱身了。

这一次，我肯定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戒毒中心的失败教训使我觉得，唯一的办法是把克利斯蒂娜带到弄不到海洛因的地方去。这是使她活下去仅有的机会了。当她父亲把她领到他那去后，这给了我一点时间进行判断，我得到的结论是，只要她留在柏林，她就算完了。我的前夫多次向我保证她会戒毒，我根本不相信。很久以来我就为克利斯蒂娜的生命担忧，但我们没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糟。而在巴普西死后，我就没有一分钟的平静。

我知道片刻都不能等，马上就得把克利斯蒂娜送到我自己家中去，但她父亲不同意。因为克利斯蒂娜正生活在他的屋顶下面，他就取得了对她暂时的监护权。我说服不了他，他不能理解我。可能他没有我的经验，也可能他不愿承认他的失败。

这时，我收到了克利斯蒂娜因触犯麻醉品法而被控告的通知，这是反麻醉品警察署的西克夫人打电话告诉我的。依她之见，我没有什么自责的：“怎么办呢？谁要想注射，他就注射——每个吸毒者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她知道很多吸毒者都像克利斯蒂娜一样，出身于正派的家庭，却出庭受审。她劝告我，不必自寻烦恼。

当看到为指控克利斯蒂娜而收集的罪证中有一小包在她房间中找到的海洛因时，我被刺伤了。这是我找到的，在疯狂中我把这个用电话告诉了西克夫人。她请求我——虚伪！——给她寄去进行化验，我当然没有想到我的这个发现有朝一日会用来指控自己的女儿。这个西克夫人还向我说：“别写邮寄者的姓名，这样，别人就证明不了什么了。”

我认为，因为用毒成瘾便对像克利斯蒂娜那样的年轻人进行审判是不公正的。克利斯蒂娜没伤害过别人，她不过是自我毁灭而已，谁能审判她？更不用说谁都知道监狱是治不好白面鬼的。

起诉书的宣读更加强了我的决心，我鼓足勇气，我找儿童监护部门，向他们介绍了所有的情况。从我在各种管理部门跑来走去以来，这是第一次有人认真听我讲话。负责我这件事的社会工作者蒂尔曼先生也认为最好让克利斯蒂娜远离柏林。在把对她的监护权归我之前——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由他来照管此事，到一家治疗中心去找床位。我的前夫会很容易地同意的，这肯定无疑。我感到，至少这次人们不是空许愿，蒂尔曼先生真的把克利斯蒂娜的事挂在心上了。

就在这次会面后不久的一个下午，有人敲门，是克利斯蒂娜。她刚从反毒品咨询处回来。她筋疲力竭，带着海洛因，大谈她要过量用毒来自杀。我先是让她安静下来，让她睡下。接着，我打电话给蒂尔曼先生，他很快就到了。于是，和克利斯蒂娜一起，我们3个人制定了一个行动计划：她先到精神病医院住上几天，实行肉体戒毒，然后从那里直接到治疗组织去（在此期间，或者由反毒品组织，或者由蒂尔曼先生为她找一个床位）。

克利斯蒂娜显得心甘情愿。蒂尔曼先生负责种种手续，而且进行得很快。我们见了精神病医生和社会安全部医生。蒂尔曼先生拿着诊断证明去见我的前夫，劝说他在自愿申请床位的申请书上签字。这样，我就能把克利斯蒂娜领到精神病医院去了。

半个月之后，她被转到鲁道夫·维尔那医院去治疗她身上的霉菌。我认为波尼·朗斯的人不该让一个有毒品瘾的孩子任其所为，应由他们在途中监督她并且到鲁道夫·维尔那医院继续照料她。但他们却宁愿只把她送到为止，然后，就没他们的事了。这样，她逃起来就没有丝毫的不便了。

多么漫不经心！这把我对这些团体的最后一点信任都粉碎了。我对自己说：“要救你的孩子，只有靠你自己。”蒂尔曼先生则试着鼓励我。

所幸的是，她这次出走持续时间不长。第二天晚上，她就回到我身边，扑在我怀里哭了起来。她请求我饶恕，她又注射海洛因了。我没有骂她。过去，由于我对自己无力帮助她感到失望，使我有时把怒气出在她的身上。此时，我的怒火已经熄灭了，我把她搂在怀里。我们平静地交谈。

克利斯蒂娜继续坚持原定的行动计划。我对她说：“好吧。”但是我也让她明白，再做一回蠢事，她就得到外婆家去，没有商量的余地。她向我发了誓。

在好几天中，她都按时到反毒品咨询处去。她还真够顽强，有时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轮到她。而回到家中，她就坐在桌旁，为办理接纳手续起草简历。

我见到了隧道的尽头。人们已经在—一个医疗团体为她找到了床位——这几乎是毫无问题的了。我们一起谈起圣诞节：她肯定不能在家里过节了，因为当时已经是11月初了。

在这期间，我的前夫也明白了他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不再反对我们的计划，我们脚下的土地又变得坚实了。

这时候，克利斯蒂娜又第二次出现了黄疸。猛然之间。一天夜里，她高烧41度。第二天早晨，我把她领到斯代格里兹诊所。她面色蜡黄，已经站不住了。那位给她检查的女医生对我说：“她的肝部因为吸毒而阻塞了。”不幸的是，不能留她住院，诊所没有隔离设施。

这是谎话。后来我打听过，斯代格里兹诊所有25张隔离床位。实际上是他们不愿意收留吸毒者，那样做对他们太慈悲了。最后，女医生向鲁道夫·维

尔舒医生提出了接受她的要求。

克丽斯蒂娜的病情在几天内有了好转。她有了活力并准备接受治疗。甚至于技术大学反毒品中心的人也来看望她，人们都用力支持她。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有这么乐观了。

一直到她的女友斯代拉来探望她那天为止。在此之前，我曾请求过女护士，在我离开期间不要放任何人进去——当然，反毒品中心的人除外。

但是，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给她领来了戴特莱夫，因为她是那么想见他。戴特莱夫刚被释放，虽然自由了，但还被监视着。他也被某个治疗中心接收了。我没有那么硬的心肠阻止他们相会：他们相爱，这两个孩子，而我想，一个知道另一个也在治疗会使他们坚持下去，可能他们会互相鼓励的。我怎么会想得那么天真呢？

克丽斯蒂娜开始溜出去几个小时。有一天晚上，跟往常那样，我下班以后来看她，发现她又注射海洛因了。她是在我到达医院前几分钟才回来的。这样的事发生在她身上对我来说并不显得如何严重（但是，当她开始胡扯，借口是仅仅到城里去吃意大利面条——她又向我说谎了，这时候，我觉得我的两条腿已经不是我的了。

我要求同意我陪同克丽斯蒂娜过夜，自然我付钱。护士向我解释说，很遗憾，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以后，她们会监视克丽斯蒂娜的。3天之后，护士在她的病区入口处迎接我，并告诉我说：“您的女儿不在这里。”

“啊，是这样？您能告诉我她在哪里吗？”

“我不知道。她得到允许到公园里去散步，但她没有回来。”

听到这些话，我感受到的痛苦是无法形容的。

我回到家中，坐在电话机旁。晚上11点20分接到了电话：她回去了。护士的冷漠态度使我惊惶不安：“假如她要逃，她总会逃的。这是她的事。吸毒的人有这个习惯，她们都会跑的。”当我对那位女护士略加微辞的时候，她正是这样回答我的。

女医生的态度也不比护士好多少，她简单地向我表明：她对此无能为力。如果克丽斯蒂娜再次违反规定，他们将不得不以不守院规而强迫她出院。此外，生物化验已有了结果：假如她继续这样下去，她不会活过20岁的。他们争取再说服她，不过，很遗憾，他们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第二天晚上，医院又来了一个电话：克丽斯蒂娜又逃跑了。我在电话机旁的沙发上过了一夜，克丽斯蒂娜没有回去。她销声匿迹整整两个星期，一点消息也没有。

头两、三天，我和我的男友到外面去找她，照过去的样子，我们把所有的唱片舞厅和地铁车站走了一圈。接着，医院要求把她的衣物取回。当我拿着她的书包、书籍和杂七杂八的小东西回到家中之后，我头一次决定撒手不管了，让她自己去碰个鼻青脸肿吧。

我对自己说：“好，这是她自己的愿望，她知道她会走到那一步。”我停止了对她的搜寻，我想向她表明，我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不过，当时我也不知道我能在多长的时间里保持这种态度。

我向警方申报了她的失踪，并留下了她的照片。他们总会伸手管这件事的，可能利用大搜捕的机会吧。然后，我就要把她塞进第一班飞机，把她带到远离柏林的地方去。

半个月后，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收到了我久等的电话：克丽斯蒂娜

在弗里特里兹斯特斯警察局。尽管克丽斯蒂娜大吵大闹，给我打电话的人却表现得出乎意料的理解，我求他把她置于他们的监督之下，下午我就去接她。我们马上乘飞机离开柏林。

我去买机票，一张往返的给我自己，另一张单程票是克丽斯蒂娜的——说这句话可真使我难过。接着，我给我家打了电话。

我要我的男友陪我到收容所去。我想，我们两个人总能防止她逃跑吧。

克丽斯蒂娜一言不发，我也是一样，我觉得自己没有说话的气力。

在办理登机手续时，我觉得膝盖发抖，心脏乱跳。克丽斯蒂娜总是沉默着，看都不看我一眼。一直到飞机降落，一直沉默不语，呆坐在座位上，咬着手指或看她带的一本小说。她没有试图溜走。

当飞机飞上高空，她开始从舷窗向外看，这时黑夜已经降临了。我对女儿说：“好吧，到此为止。毒品这本书该合上了。你到你埃瓦丽娜婶婶家去住，开始新的生活。”

克丽斯蒂娜自述

在祖母家过的前 4 天我处于因中断毒品而发瘾的病态中。刚一能起床，我就穿上了瘾君子的大礼服，兔皮上衣、超高跟皮靴，然后带上我婶婶的狗，到树林里去。

每天早晨都是同样的节目：像过去到动物园地铁站之前一样的打扮、化妆，然后到树林里去闲逛。高高的鞋后跟总是陷到沙地里，每隔十米就会绊倒一次，由于跌跤，膝头上磕得紫斑累累。祖母建议我穿旅行鞋，我十分厌恶地拒绝了——单是“旅行鞋”这个词就让人恶心。

慢慢地，我发觉我的婶婶——她正好 30 岁——还是可以谈一谈的。可就是跟她我也不敢说起我的真正的问题。再说，我也没有心思谈，甚至想这些问题。我的真正问题叫作毒品和与它有关的一切：戴特莱夫，塞纳区，古丹姆大街，过瘾，不被逼着动脑筋，自由自在。

实际上，我只想一件事：你很快就会溜走的。但是，这次与以往不同，我没有制定一个逃跑的计划。这只是个念头：有朝一日，你会逃走的。可能我并非真有这种愿望。我对最近两年里被叫作“自由”的东西太害怕了。

我的婶子用一张禁令之网紧紧地把我箍住了。我 15 岁了，可是当我要出去的时候，我必须准时在 9 点半前回家。从 11 岁起我就没经受过这种事。这使我恼火，可奇怪的是，我几乎总是照办的。

我们到汉堡为圣诞节去买东西。一大早出发，朝着大商店冲去，在那一群群抓住货物不放或者乱翻漂亮钱包的市民中间开辟出一条路来。奶奶、婶子、叔叔和表兄试着新衣服，买不到给埃瓦丽娜婶子。伊达婶子和齐什姆的礼品，也找不到给玛琴狄斯夫妇的礼品，叔叔要买一双放在自己鞋里的鞋垫，再有，他还想给汽车买个什么东西，而且非得在大商店买，因为价格比较便宜。

奶奶又瘦又小，还挺起劲地东看西问，不断地迷失在人堆里，这时，就得去寻找她。不时地，就剩下我孤身一人。这时，我当然想到乘机溜走。我已经发现了汉堡的“大舞台”。

只要我走到街上，与 2、3 个吸毒者模样的家伙搭上话，过去的一切就会继续下去。可是，我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要的是什么。当然我又一想：“瞧那些人：惟一能使他们沉醉的就是买东西。逛商店。我宁愿倒在肮脏的厕所里，也不愿意像他们那样。”说实话，如果有一个吸

毒者过来与我攀谈，我就会溜走。

但是实际上我又不愿意溜走。我甚至多次央求我外婆家里的人把我先送回去：“我受不了了。让我们回去吧。然后你们再独自回来买东西。”可是他们惊讶地看着我，好像我突然疯了似的：对于他们，采购过圣诞节的东西无疑是一年中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

晚上，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汽车了。我们跑了一个又一个停车场，还是没有车。可我很欣赏这种处境：突然间我们变成了一个共同体。人人都在说话，每个人都有一个主意，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共同的：找到那辆该死的汽车。然而我觉得这一切很可笑，我不停地在笑，可其他人却越来越生气。天气越来越冷，除了我以外，其余的人都冻得直哆嗦：我的身体早已领教过比这更厉害的环境。

后来我婶婶干脆就站在卡尔斯坦进门的暖风口下，拒绝再挪动一步。我叔叔不得不费九牛二虎之力把她从这处安乐窝里拉走。最后，我们终于还是找到了汽车，于是这场风波就在大家一阵大笑声中结束。回家的路上，气氛活跃极了。我的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我已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

我有点适应了。至少在努力这么做。真难呀。我说话时必须时刻留心。每句话，每个字都要注意。我一不小心冒出一句“他妈的”，我祖母立刻就说：“这么脏的活出自一张那么漂亮的嘴。”这样一来我就紧张了，我很想与别人讨论，但最好别这么做，因为到后来我总是惹得别人生气。

圣诞节到了。两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与亲人在圣诞树下吃年夜饭：去年和前年，我都是在塞纳区度过圣诞节之夜的。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高兴。总之，我决定至少在分发礼物的时刻，要努力做出高兴的样子。可是到了那时候，我却无须装样子，礼物的确使我高兴。我第一次得到如此多的圣诞节礼物，以至我惊讶地计算了好一阵子，这些礼物要花多少钱，相当于买多少海洛因。

我父亲来与我们一道过圣诞节。跟往常一样，他坐不住。乃日和 26 日两晚上，他都带我去迪斯科舞厅。两次我都一口气喝了六、七杯可口——郎姆酒，喝完之后，我就在酒吧的小桌旁睡着了。我父亲见我喝白酒很高兴。我心想我最终会适应这个偏僻的村庄，这些年轻的乡下人以及迪斯科音乐的。

第二天，我父亲返回柏林：有一场冰球赛，他不想误了。这是他的一个新的爱好。

圣诞假期一过，我又接着上学。我升到四年级。这使我害怕：三年以来我几乎什么都没有学。另外，去年，我缺了许多课——生病，戒毒，或者干脆说，是我自己逃课。然而从第一天起，我就很喜欢我的新学校。那天早上，老师让我们画一幅很大的画，覆盖教室里整堵墙的画。老师立刻允许我加入这个集体劳动。我们画了一些房子，一些漂亮的古老房子。确切地说，类似我向往有朝一日能住上的那种房子。我们在画面的街道上，画满了面带笑容的人群，还画了一只拴在棕榈树下的骆驼。真是一幅杰作。我们在画的下面写了一行字：“大路下面是海滩。”

我后来注意到，青年俱乐部里有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画。只不过那里的图画说明文字是：“不要哭泣，不要喝醉，拿起镰刀和斧头。”显然俱乐部的画被具有政治色彩的人定了调。

我的知识还很浅薄，但我愿意努力：至少要获得毕业证书。从上小学

以来，我第一次做了作业。三个星期后，我几乎完全融汇在学习生活中了，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坚持到底。

校长轻咳了一下，向我宣布，他很遗憾不能继续把我留在他的学校里。我不具备被中学接纳的条件。可以确信，是我的档案让他感到震惊，他甚至不等下课，就径直到课堂上来找我，并撵我走。

我什么也没有说。我说不出一个字。他再也不想多留我一小时。我必须在下一堂课间休息时去找补习课的主课老师。我像一个木头人似地乖乖服从。一进补习课负责老师的办公室，我的眼泪就唰唰地掉下来。他对我说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我坚持上补习课，板凳把裤子都磨破了：因为我想重要的是好好学习，拿到毕业证。

我从办公室出来后，试图弄清楚我的处境——很久以来我没有这么做过。我不是可怜自己。咎由自取，我很清楚这点。我忽然明白了，我梦求的戒毒后的新生活完全是荒谬的。其他人并没有以现在的我来看待我，还是以过去的我来判断我，所有其他的人：包括我母亲。

我婶婶。校长先生。

我同时还发现我已无法改头换面，也不可能在一、两天内成为另一个克丽斯蒂娜。我的身心都不停地使我回想起过去。我那严重受损的心脏，就是我使之遭受毁坏的一个记录。我与我婶婶在一起的每天的生活也不平静。为了一个“不”与“是”。我常常发怒，我们不停地吵嘴。一点压力都会使我不舒服，所有的催促我都受不了。在我最沮丧的时候，我心想，美美地注射一针毒品，这一切烦恼就都解决了！

在被职业学校驱逐后，我对自己在学业上的成功完全失去了信心。我甚至不敢再去试一试。我再一次陷入没有愿望的境地。我被开除，自己却无法为自己辩护。但是，这位校长肯定不会知道三个星期后，我是否还在继续上学。好吧，我可以去上综合学校——附近有一所这种学校，我只需坐公共汽车去就行了——在那里，我可显露我的聪明才智。但是我实在害怕又被撵出来。真害怕又遭失败。

我逐渐明白过来——我需要一定的时间——什么叫“补课”？在这个村子里，有两个迪斯科舞厅，类似青年俱乐部。其中一个几乎全是公立中学生和职业学校的中学生光顾，另一个是学徒工和上补习课的学生常去的地方。开始，我去中学生常去的那个俱乐部。我被职业学校开除后，我立刻感到中学生就斜眼看我了。于是我就只好去另一个俱乐部。

这是我第一次遭遇这种经历。在柏林，这类歧视不存在。在柏林的综合学校不会遇到这种情况，更不用说在吸毒帮里了。在这里，这种歧视表现在课间休息的庭院里，一道粗白线条把院子一分为二，不能越过白线。一边是职业学校的学生，一边是补习生。我如果想跟以前的同学说话，我们双方都必须站在白线两侧。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前途远大的年轻人与已经被扔进废品堆的年轻人——我们这些补习生区别开来。

这就是人们要我去适应的社会。“适应”，这是我祖母的口头禅。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向我提建议，我被职业学校开除后，她劝我课后不要和补习生在一起，劝我在公立和私立中学生中间交朋友。我对她说：“你必须说出一个理由，你自己的孙女也在上补习课。我正在适应，我将会在补习生中间交朋友。”这又造成一次口角。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对学业完全不再感兴趣。但是我发觉班主任是一个

非常好的人。他已经上了年纪，有一些完全老古板的思想——总之，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但是他有权威，他让别人尊重他而不会大叫大骂。他一进教室，全体学生自发地起立。他是唯一一个能使学生们这样做的老师。他没有给人施加压力的样子，对我们每个人都很有责任。当然也包括我。

我们的许多年轻老师完全是超理想主义的，只是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不知所措。在许多事情上，他们并不比我们学生强。有时他们完全让我们放任自流，结果看到一切都乱了套，他们又大叫大嚷。尤其他们对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不能给予清楚的回答。他们总是不断地说：“如果”，又不住地说：“但是”——他们也像我们一样茫然。

我们的班主任从来不让我们对未来——，对如今等待补习生的未来报幻想。他丝毫不掩饰这个未来是很艰难的。但是他认为，只要我们稍稍用点心，就能在某一方面比公立中学生强。例如，在拼写方面——如今那些中学毕业会考及格者已经不会拼写了。我们能正确无误地起草一份求职书，就将使我们多得到一张王牌。他试图让我们学会那些自认了不起的人的为人处事的方法。而且他总是要引用几句格言，通常都是上一个世纪的格言。学生们对此总要报以笑声——再说大多数学生从不克制笑声——但是我觉得每个格言多少都包含了一点真理。这位老师的看法我还不是都赞成，但是这位老师让我喜欢的地方就在于他似乎还能分辨黑白。

绝大多数学生不太喜欢他。他们觉得他过于苛求，他时常进行道德说教，使他们感到紧张。总之，我的大多数同学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有几个人学习稍微用心点，为的是想得到一个好点的毕业证书。以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上完补习课后找到一个工作。他们老实地做作业——确切地说是按照所要求的去做。读一本真正的书，对课程以外的事情感兴趣，他们连想都不去想。当班主任或一个青年教师偶尔试图发起一场讨论时）老师得到的是一阵愚蠢的冷笑。我们班的同学对未来的打算不比我多：再说，一个补习生怎么可能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呢？假如他有机会找到一个学徒工的位置，不管他是否喜欢，他都不得不去干。

实际上，很多学生对他们今后干什么完全不在乎。他们的理由是：总之，在这个国家谁也不会饿死。从补习校出来的人在生活中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因而何必担忧呢？有几个学生是未来的匪徒——已经看得出来——其他人则开始喝酒。而女孩子们呢，她们也不自寻烦恼：总有一天，她们可以找到一个满足其需要的配偶。在等待的过程中，她们总还可以当售货员，工厂女工——必要时在流水线上工作——或者还可以闲散在家。

并非人人如此，但是这个学校的总的气氛就是这样。没有幻想，更没有理想。我也士气低落：这并不是我所想象的戒毒后的生活。

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年轻人的处境如此艰难。再没有什么能使他们高兴的事。16岁有辆摩托车，18岁有辆小汽车，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谁没有这个，就会感到太不幸了。

我也是如此，在我的所有梦想中，我总是梦想有套房子和一辆小汽车，这点很明确。像我母亲那样为了一套住房或一间新客厅而绞尽脑汁，真是无能。按照我母亲过去的理论，这对他们来说还不错。对于我来说——我认为对于我这一代的许多人来讲——这些物质，这点舒适，仅仅是“维持生活的最低要求。”我们需要更多的东西。这才能赋予生活一个意义。但是生活的意义哪儿也找不到。然而一部分年轻人——包括我——总是在寻找能赋予生

活意义的东西。

我们在课堂上讨论民族主义时，我有一种矛盾的心绪。一方面，我深深厌恶所有这些残暴——想一想一些人居然能干出这类事！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总还是存在能让人相信的事情。有一天，我甚至从正在上课的课堂里走了出去：从某种观点看，我情愿生活在另一个时代。至少那时候的青年知道他们所处的位置，他们有理想。我认为对于一个青年，即使理想是错的，也比什么都没有好。我当时这么说也不太严肃。但是有那么点意思。

甚至在乡下，年轻人也已经开始各种各样的吸毒，因为他们对成年人所提供的的生活图景不满意。我住的这个小村庄也没有幸免于暴力：人们好斗而不忍让。旁客运动（传到柏林还晚两年）在男男女女中都有信徒。看见一些人从来没有吸过毒，却把旁客当作了了不起的吸毒者，我总是感到害怕，其实旁客只是纯粹的粗暴行为者。甚至连他们的音乐也完全缺乏创造性，只是嘣嘣的声音。

我有一个伙伴成了旁客。在他把一枚别针别在脸颊上，把拼板游戏装在口袋里，到处游逛之前，他的确是一个可以与之交谈的伙伴。有一天，村里的小酒馆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殴斗：打架的人把两把椅子砸在他头上打断了，他肚子上又被一个瓶子狠狠砸了一下，在医院里，医生及时把他抢救过来。

对于我来说，最难以忍受的，是小伙子和姑娘们之间那种粗野的关系。人们告诉我许多关于妇女解放和开化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对于我，我简直无法相信小伙子们能如此粗野地对待姑娘们。什么样的粗俗行为、无礼举动都出来了。他们渴求权威和成功，就去找女人，因为他们在别处得不到这两样东西。

大部分这类家伙都去光顾我住的村子里的迪斯科舞厅，把我吓得够呛。大概是因为我有点与众不同的缘故，他们总是凑在我身边。他们的口哨声，“怎么样，我的小妞，去溜一圈？”这类的话语，比柏林库尔富尔斯特大街顾客的伎俩还让我恶心。库尔富尔斯特大街的顾客们握着方向盘坐在汽车里向你打招呼时，至少还冲你微笑一下。可是这帮村里的痞子甚至懒得这么做一下。我认为柏林的大多数嫖客显得更客气些，尤其对我比较温和，比这帮小痞子对他们的女伴要好。他们想亲吻一个女人，连一句话一个可爱的动作都没有，更谈不上丝毫的温柔举动——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这样做是要付钱的。

这一切使我如此厌恶，以至于任何一个小伙子碰我，我都无法忍受。所有这些勾引妇女的事在我看来都非常肮脏。为什么一个小伙子就能自动地窃取这种权利，第二次与姑娘出去，就动手动脚对她无礼？而姑娘还任随小伙人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她并没有欲望。

很简单。这是规矩。她很害怕，如果她拒绝，那个家伙就会凌辱她，还会对他的所有伙伴讲：这是一个性欲冷淡症的女人。

我不允许什么人对我胡来。甚至当我喜欢一个小伙子，想跟他一道外出时，我都是有言在先：“不准碰我。如果我们之间需要有点什么举动的话，得由我来先开始。”但是，我离开柏林 6 个月了，我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当他想与我睡觉时，我总是中断与这小伙子的关系。

当然，这么做也属于弥补我过去的一部分。以前我错误地以为卖淫是吸毒的副产品，不可避免，那样做与真实的我没有多大关系。但那样做多少

还是影响了我与小伙子们的关系。

看见村里这些小伙子的举动，我总觉得他们又想算计我一次。

我试图从我班上的女同学们那儿得到有关男人的经验。我不能确切地告诉她们我怎么得到的。但是，我的话的意思没有被听出来。因为我在班上已经被当成“可以向其诉说心声的使者”，女同学们都把她们与小伙子的问题告诉我，并向我讨主意——她们感觉到了，我在这方面很有经验——但是，我没有能够让她们明白我所要表达的意思。

大多数女孩子只是为了小伙子们活着，她们被动地接受他们的粗野举动，对彼此间的关系却丝毫不敏感。假如一个男人玩弄一个女子后，又与另一个女子走了，她们不指责那个家伙，反倒指责另外的那个女人。骂她是妓女、混蛋，等等。常常是那些最粗野的男人最受人欣赏。

这一切，我只是在我们全班去帕奈特旅行时才弄明白的。我们当时住宿在一个迪斯科舞厅旁边，大多数女同学第一天晚上就想去那里。她们回来时，只是一个劲地讲那些带着可怕机器的家伙们——即摩托车手。那些摩托车手对于她们来说简直是上帝。

我去瞧了一眼这家人人谈论的迪斯科舞厅。那里面的一切并不复杂：附近的男人们来到那里——驾着他们的机动车，摩托车或小汽车——勾引参加学校组织的郊游的女学生们。

我试图劝说我们班的女孩子们，那帮家伙纯粹是想玩弄她们。但是我白费劲。离迪斯科舞厅的开门时间至少还有一个小时，瞧，这些女孩子们个个都在镜子前梳妆打扮。然后她们一动都不敢动，生怕碰乱了发型。

站在镜子前，她们完全失去了个性。她们都只剩下一副假面具，去讨男人们的欢心。我看到这些都快急疯了。不久以前，我也是这样，乔装打扮去付男人们的欢心：开始是去讨吸大麻的家伙们的欢心，后来是讨吸毒者的欢心。我曾丢掉了自己的个性——只为当一个吸毒者。

在整个旅行过程中，尽碰到这些可怜的追逐女性的男人们。然而大多数女同学在家都有一个情夫。跟我同屋的埃尔克，甚至第一天就用了整整一个夜晚给她的情夫写信。第二天，她去了迪斯科舞厅，回来时非常虚弱。她告诉我有一个家伙对她动手动脚。我认为，她其实是在向别人显示有男人对她感兴趣。她感到内疚，像一个玛德兰娜似地哭着，自以为爱上了一个摩托车手——她的情夫还没有摩托车。第二天晚上，她回来时状态极其悲惨，哭了整整一夜。那个追求过她的家伙又去追求另一个女生，还问她：“告诉我，那个女孩子让人吻她吗？”而另一个女孩子罗茜，这种事变成了一场灾祸。她正与一个男人在汽车里接吻。被一个老师撞见了。那个不幸的女孩子被灌了个酩酊大醉，那个男人让她喝可口——郎姆酒。

罗茜是个处女。当然她现在很沮丧。其他的女生们聚集在一起决定处理办法：一致同意送她回家。却丝毫没有想到要谴责那个家伙，他把罗茜灌醉又奸污了她。我是唯一的反对者。由于这件事，我们的老师决定禁止大家再去迪斯科舞厅。

我讨厌这件事，女生们之间完全缺乏团结。一涉及到小伙子，一切友谊都被忘到九霄云外了。就像巴普西、施特拉和我之间一谈到海洛因那样。

虽然这件事没有涉及到我，但是却让我恶心。旅行的最后两天，我又重染恶习。直到我们返回时，我才酒醒。

尽管这样，我还是决定与这种模样的世界和解。我不想再逃避它。我

很清楚地知道，逃避意味着重新躲避到吸毒中去。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吸毒不是一个办法。我想在逃避这个腐烂的社会与完全适应这个社会之间，大概很需要有一个折衷的办法。

我找到了一个依靠：一个男朋友。他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平静。我可以与他交谈。他谈话总是有条不紊。既善于幻想，也能在任何情况下找到较实际的解决办法。他也认为确实有些腐败的事情。但是他认为只要努力，人们总有一无能够从这个世界里拯救自己。他想经商，赚许许多多的钱。然后，他打算在加拿大的森林中买一幢由圆木构成的木屋，他将在那里生活。戴特莱夫也曾向往加拿大。

我的男友是一个公立中学生，他使我也对学习产生了兴趣。我发觉即使是补习课，我也能获得点儿收获，只要我认真去学，而不仅仅是为了记分册。我开始大量阅读。不论什么书都读上一阵。歌德的“维特”，以及东德作家普朗兹多弗的作品，海曼·海塞，尤其是埃里齐·弗洛姆的一些著作，他的著作《爱的艺术》成了我的圣经。由于我反复地读弗洛姆的书，我能把一些章节，整章整段地背出来。我还把一些段落摘抄下来，贴在我的床头。这个弗洛姆真是了个了不起的家伙，他的思想有惊人的洞察力。假如人们实践他的思想，生活大概就会有一个意义。人们就会坚持下去。但是，要遵守这些生活的准则却太困难了。因为其他的人并不了解这些规则。我很想问一问埃里齐·弗洛姆，怎么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按照他的原则去生活。总之，我认为当人们想把他的原则用于对现实，便不是总能行得通的。

不管怎样，我认为这本书都应该是所有学校的必读书。但是，我甚至不敢在班上谈论此书，其他人会以冷笑来讥讽我。有一次，我在课堂上翻开这本书，因为对大家刚提出的问题我想从这书中找出一个答案来。老师发现了书名，立即把它没收了。当我课后去要还该书时，老师拒绝还给我，并且说：“好啊，小姐，在课堂上看黄色书籍！”还算他诚实。他连弗洛姆的名字都不知道，一见书名《爱的艺术》，他只会想到是黄色书籍。这不可避免：昔日吸毒的小妓女把黄色文艺书籍带到课堂上来腐蚀学生们。

第二天，他把书还给我，并说了该书一大堆好话。但是，他说最好不要把该书带到学校里来，因为书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我与校长之间的麻烦更大。这是个没有自信心的家伙。还是一个使人扫兴的人。虽然他的职位摆在那儿，但是他没有任何威信。于是他试图任意指挥我们以挽回面子。当我们第一节上他的课时，他让我们唱歌，做操。他以为这样一来就会使我们心情愉快。要想从他那里得到好分数，唯一的办法就是原原本本地背诵他所讲过的一切。

他也兼任我们的音乐老师。一天，他想让我们高兴，就谈论我们感兴趣的音乐。他不停地提到“今天的爵士乐。”我实在不明白他想说什么，大概是指通俗音乐？我问他：“你说‘今天的爵士乐’是什么意思？”是我的语调又一次不够尊重吗？反正我没有考虑过我的话的后果。校长气极了，立刻把我撵出教室，好像一个着了魔的人似地大吼大叫。

在他关门之前，我仍然试图解释：“恐怕我们是误会了。”于是，他又喊。但是，我不想太失面子，我就站在走廊里听完了这节课。我完全没有失去自我控制：我没有溜走。

上午快结束时，我被召到校长办公室。他手里拿着一份档案。当然是我的档案。他翻动着，装着在读的样子。然后，他对我说，这里不是柏林。

他在他的学校里对我是友好的，相应地我应该表现好点，他有权随时开除我。

这一下，我张惶失措。我再也不想回学校了。我无力正视这一切。这太让我受不了了，已经有许多比这轻得多的事情使我不知所措。

我又退却了。以前——一半是受我的男友的影响——我决心好好学习，重新上一遍中学的课，准备中学毕业会考，尽管从补校出来仍会遇到很多困难。现在已谈不上这些了。我知道我永远也达不到。应该去通过心理检查，去获得科学院检查员的特别许可，等等。不过我很清楚，我的档案到了哪里都会先入为主。

我只有我的男友了，这个小伙子很理智。后来，我逐渐与村里其他的年轻人也混得很熟了。他们是一些与我很不一样的人，但是很热情。总的来说，他们的境况比邻镇的年轻人要好。他们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他们甚至创办了自己的俱乐部。一个没有追逐女人的家伙的俱乐部。俱乐部里有规矩，完全是老式的。小伙子们常常多喝几杯。这里大多数小伙子和姑娘们对我不错，尽管我与他们很不相同。

有一阵子，我甚至相信我可以变成他们那样，或者像我的男友一样。但是，这没能持久。我与男友断了交——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他想与我睡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与戴特莱夫以外的小伙子睡觉。甚至都不能想象。我一直爱着戴特莱夫。我一直想念他。尽管我竭力不去这么做。我有时给他写信，写的是沃尔弗的地址。但是我还是比较理智，从未把信寄出去。

我听说他又坐监狱了。施特拉也进去了。他一直想与我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

我被附近几个年轻人吸引了。我能够自由地与他们谈我的问题。跟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受到了尊重，我不害怕他们发现我的过去。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几乎与我一样。在这个世界里，不用扮演什么角色，也无须去“适应”：我们的谈话很投机。可是在开始，我还试图存点儿戒心。因为他们多少都尝试过吸毒。

我母亲，我婶婶和我，我们三人原先都以为这里不存在吸毒。总之，吸毒在延续。新闻报纸谈到海洛因时，总是只谈到柏林的这个问题，最多再涉及到法兰克福。而且我原先以为我是这一带惟一的吸毒者。

我跟我婶婶第一次去采购东西时，我才醒悟过来。那是 1978 年，我们去北爱斯特镇买东西，这是一个新城，是汉堡郊区的一个住宅小区。跟往常一样，我首先注意到那些家伙有点心不在焉。我心想：“他们吸毒，他们注射毒品？或者他们只不过是大学生？”我们走进一家快餐馆。一伙外国佬围着一张桌子。其中两个人突然站起来，想坐到另一张桌子上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立刻嗅出是在进行海洛因交易。我对我婶婶说，我想离开这个餐馆，没有向她解释为什么。

100 米远处，有一个卖牛仔裤的店铺前，聚集着一大群人，我立刻分辨出其中的吸毒者。我惊恐不安。我抓住我婶婶的胳膊，我对她说应该赶快离开这里。她觉察出一点苗头，安慰我：“你与这些毫无关系。”我告诉她，我现在还没有能力抵御它。

一回到家里，我立刻换衣服，卸妆。我再也不穿高跟鞋了。从这天起，我努力做到——至少从外表看来——跟我班上的女同学一样。

但是在俱乐部，我却经常与吸大麻和吸麻醉毒品的人在一起。一次，我抽了一支接有毒品的烟；另一次，我找了个借口拒绝了。

后来我结交了一伙很不错的人。邻村的年轻人几乎都是学徒工，他们受到了压榨。一些人思考问题并提出问题。当我同他们讨论时，我感到有所收获。尤其是他们既不粗鲁，也不好斗。在这伙人中间，气氛总是很平静。

一天，我提了个愚蠢的问题：为什么总是需要有一点超脱？他们回答我：这很显然，应该使自己与一天的烦恼分离一下。他们在工作中感到很失望。除了一个人是例外：他是工会会员，并在他的公司里负责青年职工的问题。他认为他一天所做的工作有某种意义。在他看来，人们可以改变社会。晚上，四分之三的时间，他甚至不需要一支烟来寻求安逸。他只喝几口红酒。

其他的人下了班总是又失望又窝火，工作在他们看来完全失去了意义。他们不停地说要辞掉工作。当大伙儿凑在一起时，总有一个人讲述他与师傅的争执或遇到的麻烦。于是其他的人就对他讲：“别再想工作中的事啦。”大家轮流吸一支接有毒品的烟，晚会这才算正式开始了。

一方面，我比他们幸运点儿：我在学校的功课有时还能让我喜欢。另一方面，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我也不知道那对我有什么用。为什么要有这些压力呢？我现在明白了，我既不可能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也拿不到毕业证书。另外我很清楚，即使我能得到一张优秀的学习结束的证书，一个过去的女吸毒者也完全不可能找到一个有意义的工作。

事实上，我获得的毕业证书确实是优秀的。但是，连当学徒的可能也没有。鉴于有法律规定禁止年轻失业者流落街头，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将近有一年我没有再注射毒品。但是我知道真正戒毒当然需要几年。眼前，这对我来说不存在太大的问题。

晚上，当我们这个圈子的小伙子和姑娘又聚在一起，大伙儿围着一支大麻烟和一瓶红酒时，一天的烦恼都被忘掉了。我们谈论刚刚读过的书。我们对魔法。对心理分析、对佛教感兴趣。我们寻找有门路弄到上等毒品的人，想象着他们会给我们一些东西。因为我们用的是劣质毒品。圈子里一个学护士的女学生带来一些小药丸。有一阵子，我重新使用瓦里姆毒品。我没有使用麦角酸二乙基酰胺，我实在害怕死。其他的人，他们使用这个一般还成功。

在我们的小城里，看不见过量吸毒后陷入虚幻的人。如果有一个人想吸毒，他就去汉堡沉醉一番。这里也没有贩卖海洛因的人，因此在这里，不像在柏林、汉堡、甚至北爱斯特镇那样，容易吸毒成性。

但是，假如有人实在想搞到毒品，也不难弄到。有些家伙有门路。有时甚至有贩毒者藏在角落。他们备有各种货色。只须弄一点儿毒品就可以飘飘然一番，贩毒者会问：“你想要哪一种？瓦里姆、瓦尔隆、大麻。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可卡因，还是海洛因？”

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每个人都以为能把握住自己，不会吸毒上瘾。总之，这里的情形与3、4年前克罗比小区的情况在许多方面都很不同。

如果说吸毒同样给我们带来某种自由，它却完全不是一类的。我们不需要“音响舞厅”，不需要震耳欲聋的音乐。柏林库尔富斯特丹姆大街闪耀的广告灯牌在我们看来丝毫没有魅力。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我们恨城市。我们吸毒是一种本性。每个周末，我们都去横渡史莱斯文—霍斯坦因湖。我们把汽车停在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徒步走到一个我们认为绝好的地方。我们在沼泽地里闲逛——那儿，绝对不会碰到任何人。

但是最令人惊奇的，还是我们的石膏采石场。这是一个位于田野中的巨大的坑。大约有一公里长，二百米宽，一百米深。坑内有垂直的壁板。坑

底部，很温暖，没有风。坑里长着一些我们在别处没有见过的植物。这条奇异的峡谷有结晶岩矿床，峡谷壁上奔流着瀑布。被染成褐色的流水把雪白的岩石涂上了锈色。地上铺满了类似史前动物骨骼的白岩石碎片，也许真是猛犸的骨骼。庞大的挖掘机和传送带整个星期都发出一阵阵可怕的嘈杂声，星期天则没有了动静，鸦雀无声，又好像沉睡了几个世纪似的。石膏也使这些机器穿了一层白衣服。

只有我们孤零零的。陡峭的白峡谷壁把我们与外部世界隔离开。听不到一点儿声音，只能听到瀑布声。

我们决定等到采石场不再开采时买下它。我们就住在这谷底。我们在里面搭个小窝棚，建一个巨大的花园，饲养一些动物。我们要炸出一条通往地面的小路。

无论如何，我们毫无回到地面上来的愿望。

柏林大法庭的起诉书（节录）

克丽斯蒂娜，女中学生，并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未成年人，被指控未经卫生部批准，私自从 1976 年 5 月 20 日起接连不断的非法贩卖麻醉品，触犯有关麻醉品管理的法律条款。

被告自从 1976 年 2 月起一直使用海洛因自我注射，起初是间隔性的，后来发展为天天注射，每天用量为四分之一克左右。因此，她必须从 1976 年 5 月 20 日起承担法律刑事责任。被告曾于 1977 年 3 月 1 日先后两次在动物园大东站大厅和地铁库尔富斯登达姆站受到警方审讯，并被查明身份。这两次都发现其身上带着含有海洛因的物质，第一次为 18 毫克，第二次为 140.7 毫克。

此外，1977 年 5 月 12 日，从被告的个人物品中又发现一个锡纸小口袋，内装 62.4 毫克含有海洛因的物质。从被告家里也发现用于注射毒品的针具。经化验，证实这些针具附着有含海洛因的物质，从对被告进行验尿的结果同样表明，其尿液中有吗啡存在。1977 年 5 月 12 日，被告的母亲 F 太太从她女儿的个人物品中发现 62.4 毫克含有海洛因的物质，并把她送到司法局，被告在审讯时承认自己从 1976 年 2 月份以来一直使用海洛因，此外，她曾在 1976 年冬天卖淫，以换取购买海洛因所需要的钱。

可以断言，被告并没有停止使用毒品……

新蒙斯特法庭的判决书（节录）

在女中学生克丽斯蒂娜被指控触犯有关麻醉药物管理法令一案中、被告犯有多次非法私购麻醉药品以及偷漏税收等罪行。法庭根据未成年者的有关规定暂缓宣布对其判刑。理由是：被告在 13 岁以前发育均属正常，其智力也高于儿童的中等水平，因此，她本人完全明白私购海洛因构成犯罪行为

因而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我们也有充分证据认为被告在 1976 年 5 月 20 日（她的刑事责任年龄）之前就已经染上吸毒的恶习。但是这一点不能为她开脱罪责，也无法否认她已经具备意识到这是一个犯罪行为的能力。在此期间，被告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且主动努力戒毒。因此，她完全可以明白对她的品行所做的处分的性质以及当局由此可能采取的行动。

关于她将来情况如何，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其征兆是有利的，尽管不能排除再度堕落的可能性。对被告悔改的进展必须严加监督，尤其是在最近一个时期内。

译后记

吸毒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许多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因为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的滥用和非法贩运不仅影响人身健康和国家的稳定，而且国际安全本身也受到威胁。

尽管近年来许多国家的政府在反毒缉毒方面做了不少的努力，但收效甚微，毒品的扩散仍越来越广泛，甚至连小学生也开始服用麻醉品。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它每年在吸毒上的花费高达 500 至 700 亿美元，而贩毒者所获得的利润竟高于美国 10 大财团的利润总和。可见贩毒与吸毒在这些所谓“文明社会”的国家里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柱。这也正是这些国家对于吸毒问题“欲禁不能”的根本原因之一。

本书可取之处，正是由于作者凭着记者特殊的敏锐眼光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及良心，把笔触深入到他们本身所处的社会当中青少年吸毒、卖淫这一领域。他们通过对失足青年本人及其家长、法官、学者的直接采访记录，描绘吸毒者的痛苦和绝望，分析这一社会问题的社会根源，使我们了解到所谓“文明社会”的一个黑暗面。

非法贩毒的直接受害者就是吸毒者本身，特别是那些青少年吸毒上瘾的人。由于毒品的交易——尤其是象可卡因、海洛固一类的烈性毒品——几乎都是在黑市进行，因而价格贵得惊人。例如每公斤经过提纯的可卡固可以卖到 50 万美元，中间再经过层层批发、零售的“二道贩子”，到了吸毒者手里的价格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一旦吸毒成瘾，根本就无法支付这笔费用，何况那些尚未步入社会的青少年，他们没有经济来源，只要染上这一恶习，势必落到“男盗女娼”的下场。而当他们无法忍受这种精神上和内体上的残酷折磨时，除了自杀，别无他路，这就是本书主人公克丽斯蒂娜及其伙伴们的命运。

近年来，艾滋病的蔓延又给吸毒者带来一个新的致命的威胁，因为吸毒者所使用的注射器通常都未加消毒，而且一个针头多人共用，加上吸毒者往往就是卖淫者或同性恋者，使得艾滋病在吸毒者中间的发病率居于首位。在德国，艾滋病已成为报刊的“永恒主题”。德国的卫生部曾经给金国的每个家庭寄出一本小册子，口号是：“艾滋病与人人有关。”有的中学甚至已经把对艾滋病的介绍列入正式课程。《星期日世界报》曾经刊登过两幅漫画，一幅是“嬉皮士”打扮的一男一女在七十年代举着标语牌要求“性自由”；

另一幅是这一男一女今天举着标语牌要求制止艾滋病，他们的装束再也不象“嬉皮士”那样花里胡哨，而是规规矩矩，暗示着他们对性行为问题重新严肃起来。这种转变无疑是好事，只是未免来得太晚了，而且象克丽斯蒂娜那样，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取缔“吸毒”和“唱妓”这两大社会公害，挽救了千千万万坠落在痛苦深渊的人们，使我们的民族从“东亚病夫”变成今天世界上少有的健康民族。这是我们的党为炎黄子孙所办的两件了不起的功德事。凡是经历过新旧两个社会的人对此都是有口皆碑、赞颂不已的。

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国门大开，难免泥沙俱下，西方形形色色不健康的东西必然也会流进我们这块洁白的国土，危害缺乏免疫力的年轻一代的身心健康。青少年的犯罪问题毕竟也已经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我国著名电影工作者张良夫妇之所以改变初衷去拍摄《少年犯》，也正是由于他们在深入监狱体验生活时发现“关在高墙里的却是青少年居多”的缘故。根据江苏、浙江省教育部门对 1000 名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调查表明：早恋、吸烟、出走、厌学、作弊的学生增多，其中心理不健康的学生占百分之十六。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我国的青少年当中，十三岁左右也是开始犯错误年龄的高峰区。例如在湖北省少管所里的一百六十名少管人员当中，十三岁始犯年龄的人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一。综合比较，十三岁开始犯各种错误的孩子，比十二岁陡然增加一倍以上！

这就是我们决定把这本在西方早已家喻户晓的畅销书介绍给我国读者的缘由。但愿广大青少年读者能从克前斯蒂娜的不幸遭遇中吸取教训；广大家长、教师以及社会上关心青少年成长的人们也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正视现实，防患于未然，使我国的青少年都能健康成长，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

戴明沛

